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变化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本辑诸篇即是向人们展示这“地覆天翻”的改造景象和分析改造背后的深层缘由。

【第一辑】

中国当代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征粮、民变与“匪乱”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第一节课”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

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

---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

1950～1956年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传统娱乐与社会主义娱乐并存，但传统日益受到打击、控制、改造，社会主义娱乐日益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传统娱乐与革命文艺间的冲突，在国家机器的干预下，传统大众娱乐活动逐渐衰落，为充分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娱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

ISBN 978-7-5108-0043-6

9 787510 800436

定价：45.00元

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变化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的历史，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本辑诸篇即是向人们展示这“地覆天翻”的改造景象和分析改造背后的深层缘由。

【第一辑】

中国当代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征粮、民变与“匪乱”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第一节课”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

九州出版社
JIUZHOU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4
（中国当代史研究文丛．第1辑）
ISBN 978-7-5108-0043-6

Ⅰ.中…　Ⅱ.华…　Ⅲ.中国—现代史—研究　Ⅳ.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882号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

作　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毫米　16开
印　张	24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043-6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许纪霖	李丹慧	李海文
李蓓蓓	杨奎松	沈志华	陈　兼
林蕴晖	姜　进	徐思彦	萧冬连
董志凯	韩　钢	翟　强	

Elizabeth J. Perry

Paul G. Pickowicz

执行主编　韩　钢　　徐思彦

卷首语

《中国当代史研究》是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以中国当代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连续出版物，暂拟每年出版两辑。举凡1949年以还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国防、外交、教育、科学、社会等历史问题，均属本出版物讨论范围。本出版物以还原和解读历史为宗旨，奉行学术自由、治学严谨、力求新知之原则，并以此为选稿的基本标准。本出版物设置专题研究、史实讨论、外稿选译、史料辑录、回忆和口述、书评书介等栏目，愿意成为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之学界同仁展示优秀成果的园地，竭诚欢迎各位研究者赐稿。

本书首辑的关注焦点在1950年代。1950年代，是中国大陆新旧政权更替之后的最初时期。此一时期历史的基本特征，可用“改造”一言以蔽之。新政权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颠覆原有架构和体系，建立起迥异于以往之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确立了新意识形态的法定地位，并对社会实施改造，直至干预和渗透社会生活和国民心理。其“改造”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可谓“地覆天翻”。本辑诸篇论文即对新政权下的多方面改造，作了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深入探讨。

杨奎松的《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县地级干部的任用、地下党干部的任用等四个方面，讨论了执政初期的中共干部政策。在这个时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有效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建立了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

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了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但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对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现象，埋下了1950年代初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种子。

张济顺、张藜分别考察了私营报业和报人的改造、科学家在新政权之下的生存状况。张济顺的文章《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探讨了中共新政权对上海私营报业进行全面改造的过程。新政权是如何与一群文化人建立新认同的，上海的文化人和知识者又是如何应对文化体制急剧转型这场急风暴雨的变革的，他们如何经历了思想改造的被迫与自觉，如何适应私营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以及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对此，文中有细腻的梳理。张藜的文章《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例，以第一手文献、表格和日记、口述、回忆录，探讨了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科学家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声望随着政治命运的改变所发生的变化，揭示出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

如果说二张的文章观照的是社会精英阶层，那么，王笛、阮清华则将研究触角伸向了社会底层。王、阮考察对象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关注城市“改造”问题。王文《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考察了1950~1956年间新政权在成都怎样利用改造曲艺演唱之地——书场，以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和建立“宣传教育的场所”，表明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的。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机器第一次真正深入人民日常娱乐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并有力量改变其形式与内容，决定整个从事娱乐行业人们的生计、命运，控制人们从娱乐中所接受的思想和价值观。阮文《“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则再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如何将旧上海臭名昭著的“游民窟”哈尔滨大楼变成专门用来改造上海无业游民的新人习艺的过程。

“对比研究”栏目，发表了王海光的《征粮、民变与“匪乱”——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和杰瑞米·布朗的《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的文章。两位学者探讨的都是中共初掌政权的

贵州，并揭示了一个共通的历史事实：随着贵州解放而来的仍有一段血与火的岁月，中共在建政初期经受了最初的执政考验。然而由于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其描述和观点均有所不同，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思考。

林蕴晖的《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考察了因如何认识土改以后农村开始出现贫富差距，以至个别富裕中农发展成富农的现实资本主义问题而在中共高层发生的争论，指出这场争论的结果，对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选译的两篇外稿，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的一篇《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通过私人信件、回忆录及其他文献，讲述了“火柴大王”刘鸿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旧交替之时离开又最终选择共产党中国的过程。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一篇《“第一节课”——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通过1950年代初期“从猿到人”的通俗性宣传和教育，向国民灌输“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以取代“唯心主义”，透视出新政权对意识形态功能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新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国民心理的。

“回忆与口述”栏目的两篇访谈录，受访者均来自中国科学院，一位是沈善炯院士，一位是许良英先生。两位先生对在中国科学院经历的口述，与张藜的文章相得益彰。读者若能将三篇文章对照阅读，想必会对新政权下的知识分子境遇和心理获得来自亲历实感和文本研究的双重印象。

编 者

2009年4月

目　录

卷首语

专题研究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杨奎松　3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张济顺　40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王　笛　76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张　藜　106

“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

——以哈尔滨大楼的清理为例\阮清华　143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刘　统　156

对比研究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杰瑞米·布朗　177

征粮、民变与“匪乱”

——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王海光　201

史实讨论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 林蕴晖　237

外稿选译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1948~1956年的上海刘氏家族 \ 高家龙　263
"第一节课"
——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 \ 舒喜乐　285

回忆与口述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我的科学生涯》补遗 \ 熊卫民访问整理　311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 \ 樊洪业　王德禄　尉红宁访问　尉红宁整理　323

史料辑录

朝鲜战争文献·志愿军战士家书往来 \ 343

书评书介

季羡林：《我这一生》\ 邱　路　359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6-1968）》\ 邱　路　362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邱　路　365
谢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邱　路　368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邱　路　371

专题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illegible]

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

——兼谈1950年代反“地方主义”的由来

杨奎松[①]

摘要：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但它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对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情况，埋下了1950年代初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种子。

关键词：接管　干部政策　南下干部　地下党　“地方主义”

1927~1928年，国民党单独完成北伐建立了全国统一政权时，曾经面临过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以国民党当时22万普通党员，约等于全国人口1:1820的比例数，[②]要想实现其“以党治国”的目标，可谓难乎其难。为解决执政困难，国民党在事实上大量借助和利用了旧人员（如旧官僚、旧军阀和地方士绅）来达成执政的目标。最为典型的是，1928年国民党宣告北伐大功告成时，其四大集团军，除了蒋介石

---

①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转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作者按：1928年时通过集体宣誓登记方式入党的军队党员还有数十万，但因其名无实，故未统计在内。

南京中央政府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以外，另外三支集团军，均为地方军阀势力。[①]结果，北伐战争刚刚结束，这几支不同派系军队相互间就再度爆发了大规模内战。这种时断时续的内战虽然没有根本破坏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的地位，但是，接纳和依赖于这些旧势力执政的后果，却明显地消解了国民党此前各种平民化的社会变革诉求，导致了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的根本性改变。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之际，看上去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危险。尽管，1949 年的中共党员人数多达 450 万，[②]与当时全国人口的比例约为 1:120，远比国民党 1928 年时强得多。但是，第一，其党员人数上的这种优势，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西北及华东的一些根据地和军队里面，在广大新占领区域，党员人数还是十分有限。而且，凡是没有经历过整风学习、土改运动和战争考验，尤其是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大批新区的党员干部，中共中央也难寄予信任，这更局限了可用党员的数量。第二，中共中央建国伊始，也一样面临到国民党 1928 年统一中国时所面临到的十分相似的问题，即四大野战军及其各根据地“诸侯”所形成的“五雄七霸”的局面。[③]刚刚从农村中走出来，对以城市为中心确立各级政权还毫无经验的中共中央，既必须要依靠各路“诸侯”打天下、坐天下，又不能对“山头主义”掉以轻心，以至养虎遗患，其策略分寸把握之难，亦可想而知。

迄今为止，我们从已有的研究中看到最多的涉及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干部任用政策问题的研究，只有 1952 年和 1957 年发生在广东地区的反“地方主义”事件。[④]但是，究竟这一事件由何而来，广东本来就具有特殊性，中共中央何以进据广东之后仍旧大量任用广东籍干部在广东各级政权中担纲挂帅，最终造成所谓“地方主义”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国建政初期，究竟有着怎样的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这种政策和策略形成的背景、原因及其效用如何？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还没有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本文不准备讨论中共建国初“地方主义”形成和反“地方主义”事件的经过情形，只想尝试着从中共干部任用政策和策略的角度，来考察中共干部政策的本质及其他同反“地方主义”情绪的各种内在逻辑联系。

---

① 即以西北军为基础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以晋军为基础的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和以桂系为基础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

②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1950 年 5 月 21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42 页。

③ 参见《陈毅 1954 年 2 月 23 日在饶漱石同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和饶漱石 1954 年 3 月 27 日的《检讨报告》。两人均提到建国初期党内所存在的这种现象。

④ 比较全面地探讨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经过的著作，首推古大存秘书杨立所著《带刺的玫瑰——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 年）。较系统地谈论这一话题的论文，则以朱健国的《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朱健国搜狐博客，http://zaojl.blog.sohu.com/820301.html.）为代表。

关于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中共中央是从 1948 年秋天才开始面对统一各根据地军事力量问题的。毛泽东在 9 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仗打到现在，出现了正规化的问题，编制要统一起来了。但当时毛估计还要 5 年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因此，统一编制的问题还显得不十分急迫。他甚至还担心，过早统一，后勤补给仍旧各补各的，正规化不仅实现不了，还会造成很多麻烦。①

但进入 1948 年 11 月，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明确提出："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达成"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②为此，经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于 11 月 1 日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第一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的要求。《规定》将全军各地的部队按地域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其中，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③

进入 1949 年 1 月，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前以地域命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故 1 月 15 日，中央军委又下达了《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④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仍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二两个兵团共 6 个军；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仍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 3 个兵团共 10 个军又 1 个特种兵纵队；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

① 故毛这时主张还只能逐渐正规化，说过早正规化也会犯错误。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48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文集》第 5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33 页。

② 《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的电报》，1948 年 11 月 11 日，《毛泽东文集》第 5 卷，第 194 页。

③ 《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 年 11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446~451 页。

④ 《中央军委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5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8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 34 页。

九、十4个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简称四野），仍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4个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另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战略机动部队，下辖第十八、十九、二十3个兵团共11个军，后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一野是由抗战时期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来的，主要活动在陕、甘、晋几省区。一野组建后，在彭德怀将领的指挥下，亦主要担负攻略西北各省的任务。历经各大战役后，一野于1949年夏秋，先后攻取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

二野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曾参与淮海战役。二野组建后，在刘伯承、陈赓将领的指挥下，在实施渡江作战，占领南京后，主要负责攻略西南各省，历经各次战役，至1949年底，在一野贺龙所率一部配合下，已经完全占领了四川、西康、贵州、云南等省。

三野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一直活动在华东各省，是淮海战役的主力部队。三野组建后，在陈毅、粟裕等将领的指挥下，主要负责攻略东南沿海诸省。历经各大战役，于1949年秋完成了占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各省市的任务。

四野是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部队，曾成功举行过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四野组建后，在林彪等将领的率领下，于1949年春渡江后，主要负责攻略中南及华南数省。至1949年12月已成功夺取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各省，并于1950年4月攻占了海南岛。

四大野战军，虽在1950年作战任务完成后，先后被取消了番号，但所属部队及其主要将领仍按所占地域分别安排辖地。如一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即并入西北军区，彭德怀为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二野番号取消后，组成西南军区，刘伯承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三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陈毅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四野番号取消后，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林彪为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连同先后成立的高岗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东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的华北军区，新中国建国后设立的六大军区，事实上仍是迁就原有地方军事系统而设立的。不仅如此，

中共中央部署作战及安排各大军区统帅人物时，还特别注意考虑负责将领对新占领区的熟悉程度问题，有意按照籍贯及工作经历等要素分派占领任务。比如刘伯承、邓小平所率二野 1949 年渡江南下时最初的任务是在华东方向，但考虑到二人的川籍背景，中共中央很快即在部署下一步南下作战任务时，将已经占据南京地区的二野，越过已经占据武汉的四野，调去西南方向。从这一点更可看出，中共中央这时任用高层干部的首要条件，就是着眼于能否有助于实现有效占领和建立巩固政权。因此，它一反中国传统的职官任用模式，“举贤不避亲”，越是自己亲近了解的，越是熟悉所任地方情况的干部，就越是要用。①

有关这种部署与安排的内在关联性，可参见表 1。

表 1　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

序号	军区负责人名衔	军区名称	辖地范围	籍贯	与辖地关系	党政兼职	备 注
1	彭德怀司令员	西北军区	陕、甘、宁、青、新	湖南	长期在陕甘作战	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2	习仲勋政委	西北军区	同上	陕西	本地人	原为第三书记，1950 年初任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3	林彪司令员	中南军区	豫、鄂、湘、粤、桂、琼	湖北	本地人	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4	罗荣桓政委	中南军区	同上	湖南	本地人	中南局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5	陈毅司令员	华东军区	鲁、苏、浙、皖、赣、闽、沪	四川	长期在华东各省作战	华东局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6	饶漱石政委	华东军区	同上	江西	本地人并长期在华东工作	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白区干部
7	刘伯承司令员	西南军区	川、黔、滇、康、渝	四川（今属重庆）	本地人	西南局第二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苏区干部

① 不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即任官要“避籍”，明清都有明确规定。明朝有“南人官北，北人官南”的规矩，清朝有异地 500 里为官的要求。

表 1　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续表）

8	邓小平政委	西南军区	同上	四川	本地人	西南局第一书记	苏区干部
9	聂荣臻司令员	华北军区	京、津、冀、豫、晋、内蒙古	四川（今属重庆）	长期在晋冀几省作战	华北局第二书记	苏区干部
10	薄一波政委	华北军区	同上	山西	本地人	华北局第一书记	白区干部
11	高岗司令员兼政委	华北军区	黑、吉、辽等	陕西	抗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苏区干部

由表 1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六大区 11 位主要负责人当中，仅本地人就用了 6 位，其他 4 位非本地人中，只有高岗在当地工作生活时间为几年，其他如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都在当地工作生活了十多年之久。

对建国初的地方军政机构设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于各大根据地和各大野战军，亦即各大山头客观存在的现实状况。①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时实行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除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②但基于党高于一切的原则，各大区实行的是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尽管，毛泽东建议，军政委员会主席应由所在地大军区司令员来担任，③但党的书记在这里仍旧是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在六大区里，中央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即党政军一把手一肩挑的，有三位。如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都由林彪一人担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都由高岗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都由彭德怀担任。其他如华东、西南，也基本上是党政军一体。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委为饶漱石，陈毅为军区司令员；西

① 这种情况在中共七大时即有过。高岗讲："'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转见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页。

② 东北和华北因情况特殊，故先行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但区划原则相同。

③ 如《毛泽东关于中原局书记人选等问题给刘少奇等同志的信》，1948 年 12 月 12 日，转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362 页，并见前引陈毅、饶漱石的发言与检讨。

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区司令员为刘伯承，西南局第一书记为邓小平。只有华北区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如1949年建国前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为董必武，华北局第一书记一度由刘少奇兼任，后才交予薄一波，军区司令员则为聂荣臻。但无论如何，经过这样一种设置后，各大区军政权力机关，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牢牢地控制在中共中央派出机构，即各中央局的领导之下的。

当然，对军事行动及其建政需要的这种迁就，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事实上，熟读古书的毛泽东深知新国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权倾一方的中共高级将领，也一样深谙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权的道理。故国内战争结束不久，一方面毛泽东巧施谋略，另一方面各将领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现了一场现代版的“杯酒释兵权”。彭德怀受命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离开了西北地区；刘伯承则主动要求去筹建陆军大学（即后来的军事学院），离开了西南地区。林彪将原四野主力交给彭德怀带去了朝鲜，自己以治病为理由去了苏联；聂荣臻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入住中南海，协助军委处理全军军事作战事务，无暇多顾华北军区的工作。于是，建国不过一年时间，六大军区司令员中，三位最具军事才能的将领均脱离了自己的军队和地盘。聂荣臻虽仍兼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职务，其实也离开军区的具体工作了。另外两位，高岗不懂军事，只有陈毅有指挥能力，但毛与陈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陈与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长期不和，处处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闹独立性的可能。[①]

将各大区主要军事将领调开，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0年饶漱石抗拒毛泽东的提议，阻挠陈毅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②]让毛泽东清楚地感觉到，长期在各大区担任书记的地方领导人，同样有可能发展到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步。同时，鉴于建国以来，中央机构设置，刘少奇掌管了组织人事和财经事务，周恩来统管了外事、统战和经济工作，党中央最高领导中枢“颐年堂（毛泽东办公地点）门可罗雀”[③]的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开始，陆续通过各种办法，如改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为行政委员会，和成立与政务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把各大区书记，包括邓小平、饶漱石和高岗，以及在地方上有较大影响的

① 华东区因饶漱石与陈毅矛盾的关系，陈未能得到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的情况，在前引陈毅和饶漱石的发言中有详细的说明。

② 饶漱石在前引检讨书中明确讲，陈毅1950年从北京回到华东时专门传达了毛泽东建议由陈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指示，但他并未理会，坚持要由自己出任主席一职。事后饶到北京见到毛时，毛又再度提到此议，而饶“除托辞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赞成陈毅同志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外，并无拥护陈毅同志担任此职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决定由我兼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③ 毛泽东曾发牢骚称：“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转见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第74页。

叶剑英等，都先后调到北京来，让他们担任中央一级的领导工作。[①]1954年，又进一步把大区仅剩的负责的军事将领陈毅、贺龙等，也都调到中央来了。

按时任高岗秘书的赵家梁所说，毛此举实为“一石三鸟”。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计划委员会成立，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刘主管的财经委员会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区首领调到自己身边来，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未然之举”。[②]

赵之说法，不无道理。就砍“山头”一点而言，大行政区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利切割，便利于各大区之间在利益上相互依托，进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在1953年的“高饶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来。高岗和饶漱石当时刚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很快利用其所占两大“地方诸侯”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四处串联。高岗以“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为由，强调“夺取革命的胜利的，还是要依靠人民解放军”，联络各大区“诸侯”，试图扳倒身为“白区”[③]斗争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刘少奇。此举虽因多数领导人反对而未能成功，[④]但由此也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迅速取消存在极大隐患的大区制。

1954年4月27日，高饶事件刚一定性，中共中央就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各大区行政委员会随同各中央局、分局一并撤销。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随后，各大区将权力部分上交中央，大部分事务性工作移交给省、市；人员也向中央机关和省市地方分流。至10月份，各行政大区及其相

---

① 《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增设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1952年11月1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421~422页。

②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第76页。按根据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所做决定，周恩来分管外交，包括外贸与侨务等；高岗分管计划工作及重工业8个部门；陈云和薄一波分管财政、金融和贸易；董必武、彭真、罗瑞卿等负责政法；邓小平负责铁路、交通、邮电等；习仲勋负责文教。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7页。

③ 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着“苏区干部”和“白区干部”的区分。前者是指苏维埃时期工作在根据地和军队中的干部，后者是指同一时期工作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的干部。延安整风时在肯定毛泽东为苏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时，曾有决议明文肯定刘少奇是党在白区的“正确路线”代表。此一决议显然更加强化了这一区分。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980页。

④ 该事件最后被定性为反党联盟性质，高岗1954年自杀身亡；饶漱石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徒刑，长期囚禁，1975年病逝。

关党政机构已不复存在。至此，这种伴随着中共长期在农村各处实行武装割据而来的大区体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脱离了军政实权的党内各大山头，由此也不复存在。新中国从此走上了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

关于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问题

由于中共干部人数有限，中央政府各部委及各大区等所需干部甚多，再加上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共中央组织部在资历上一般要求必须在抗战以前参加革命，故够资格担任省市级首长的干部明显不敷分配。因此，中共建政之初对省市首长的任用，就无法像对大区负责人的任用那样，全面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表2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建国初在省市干部任用问题上的一些特点。

表2　各主要省市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

序号	姓名	所在地	职衔	籍贯	与辖地关系	文化程度	原属系统	备注
1	彭　真	北京	书记	山西		中学	党务	白区干部
2	聂荣臻	北京	市长	四川（今属重庆）	长期在晋察冀	曾赴法勤工俭学	军队（华北野战军）	苏区干部
3	黄　敬	天津	市长	浙江	早年在天津读书	大学	党务	白区干部
4	林　铁	河北	书记	四川（今属重庆）	长期在河北和晋察冀工作	大学	党务	白区干部
5	杨秀峰	河北	省主席	河北	本地人	大学，曾留法	政务	白区干部
6	张　玺	河南	书记	河北	长期在冀鲁豫	中专	党务	白区干部
7	吴芝圃	河南	省主席	河南	本地人	中学	政务	白区干部
8	杨耕田	察哈尔	书记	河北	本地人	小学	党务	白区干部
9	张　苏	察哈尔	省主席	河北	本地人	大学	政务	白区干部
10	潘复生	平原	书记	山东	本地人	中学	党务	白区干部
11	晁哲甫	平原	省主席	河南	本地人	中专	政务	白区干部
12	程子华	山西	书记兼省主席	山西	本地人	中学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13	康　生	山东	书记兼省主席	山东	本地人（回）	大学	党务	白区干部

表 2　各主要省市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续表 1）

14	乌兰夫	内蒙古	书记兼区主席	内蒙	本地人	大学，曾留苏	军队(华野)	白区干部
15	高克林	绥远	书记	陕西	曾在北平、顺直、天津、河北工作	中学	军队(华野)	苏区干部
16	王国权	热河	书记	河南	战后即派赴热河工作	大学肄业	政务	白区干部
17	张　策	松江	书记	陕西	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中专	党务	苏区干部
18	于毅夫	松江	省主席	吉林	本地人	大学	政务	白区干部
19	张启龙	黑龙江	书记	湖南	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小学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20	赵德尊	黑龙江	省主席	辽宁	本地人	大学	党务	白区干部
21	刘锡五	吉林	书记	河南	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大学肄业	党务	白区干部
22	刘澜波	辽东	省主席	辽宁	本地人(回)	大学肄业	政务	白区干部
23	郭　峰	辽西	书记	吉林	本地人	中学	政务	白区干部
24	杨易辰	辽西	省主席	辽宁	本地人(回)	大学	党务	白区干部
25	黄欧东	沈阳	书记	江西	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大学肄业	党务	苏区干部
26	朱其文	沈阳	市长	江苏		大学	政务	白区干部
27	欧阳钦	旅大	书记	湖南	战后即在东北工作	大学，曾赴法并留苏	党务	苏区干部
28	韩　光	旅大	市长	黑龙江	本地人	中专	党务	白区干部
29	马明方*	陕西	书记兼省主席	陕西	本地人(回)	中学	政务	苏区干部
30	贾拓夫	西安	书记兼市长	陕西	本地人(回)	中学	党务	苏区干部
31	张德生	甘肃	书记	陕西		高小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32	王世泰	甘肃	省主席	陕西		中学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33	张仲良	青海	书记	陕西		小学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34	廖汉生	青海	省副主席	湖南		小学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35	王　震	新疆	书记	湖南		无学历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表 2　各主要省市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续表 2）

36	潘自力	宁夏	书记兼省主席	陕西		中学，曾赴苏留学	军队(华野)	苏区干部
37	饶漱石	上海	书记	江西	曾长期工作在上海	大学	军队(三野)	白区干部
38	陈　毅	上海	书记兼市长	四川	曾长期在华东地区工作	赴法勤工俭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39	陈丕显	苏南	书记	福建	曾长期在江浙工作	小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0	萧望东	苏北	书记	江西	曾长期在江浙工作	中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1	粟　裕	南京	书记兼市长	湖南	曾长期在江浙工作	中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2	谭震林	浙江	书记兼省主席	湖南	曾长期在江浙工作	无学历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3	江　华	杭州	书记兼市长	湖南	曾长期在江浙工作	中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4	曾希圣	皖北	书记	湖南	曾长期在安徽工作	中学，黄埔军校四期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5	牛树才	皖南	书记	河北		中专	党务	白区干部
46	张鼎承	福建	书记兼省主席	福建	本地人(回)	小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47	陈正人	江西	书记	江西	本地人(回)	中学	党务(四野)	苏区干部
48	邵式平	江西	省主席	江西	本地人(回)	大学肄业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49	李先念	湖北	书记兼省主席	湖北	本地人	无学历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50	张平化	武汉	书记	湖南		中专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51	吴德峰	武汉	市长	湖北	本地人(回)	中专	党务	苏区干部
52	黄克诚	湖南	书记	湖南	本地人(回)	中专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53	王首道[**]	湖南	省主席	湖南	本地人(回)	中学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54	叶剑英	广东及广州市	书记兼省主席并市长	广东	本地人(回)	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	军队	苏区干部

表2 各主要省市负责人籍贯、经历及与属地关系（续表3）

55	冯白驹	海南	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任	海南	本地人	大学预科	军队（游击队）	苏区干部
56	张云逸	广西	书记兼省主席	广东（今属海南）	曾长期在广西工作	中学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57	胡耀邦	川北	书记兼行署主任	湖南		中学	军队（一野）	苏区干部
58	谢富治	川东	书记	湖北		小学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59	阎红彦	川东	行署主任	陕西		无学历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60	李大章	川南	书记兼行署主任	四川	本地人（回）	曾赴法勤工俭学	党务	白区干部
61	李井泉	川西	书记兼行署主任	江西		中学肄业	军队（华野）	苏区干部
62	陈锡联	重庆	书记兼市长	湖北		无学历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63	廖志高	西康	书记兼主席	四川	本地人（回）	高中	党务	苏区干部
64	苏振华	贵州	书记	湖南		无学历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65	杨　勇	贵州	省主席	湖南		无学历	军队（二野）	苏区干部
66	宋任穷	云南	书记	湖南		无学历	军队（三野）	苏区干部
67	陈赓***	云南	省主席	湖南		小学	军队（四野）	苏区干部

资料来源：照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1949.10~1966.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何虎生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1996年）等制成，但略去几个省市非共产党负责人。

说明：

* 陕西省人民政府于1950年1月始正式成立，故马明方任职时间从1950年1月起。

**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王首道于 1950 年 4 月接替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1952 年 12 月再让位于程潜。

*** 陈赓于 1950 年 10 月接替国民党起义将领卢汉，任省主席。

从表 2 所列 48 个省市区的 67 位省市级首长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各大区中央局在任用各地负责人时，也曾尽力考虑安排熟悉当地情况的领导人。如李大章，入川前一直在东北局负责民运、城工和宣传部工作，并非二野干部，竟因其川籍的原因，也被安排入川担任川南区负责人。又如廖志高，延安时已长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入川前已是组织部干部处代处长。也因其川籍的原因，被二野调来担任西康省负责人。周林的情况最典型。他是三野的干部，已经担任上海市府秘书长，因贵州省籍干部奇缺，邓小平与陈毅协商，被调来贵州任职。任副职的本地干部，就又多些了。最有名的是长期在东北领导抗日联军的周保中，几十年没有回过原籍，也因为其原籍云南，被从东北调去云南担任副省长。但是，就全国范围看，即使加上华北、东北和早年红军所在的湘、鄂、赣、闽、粤这些老根据地所在省区，各省市最高负责人中能用到的本地人也只有 28 位，[①]能用到的长期在被任用地学习或工作过的干部也只有 13 位，加起来连一半都不到。[②]

对于新占领区域，在干部任用上的军事占领特点更为突出。由表 2 可知，67 位省市级首长当中军队系统的干部占到了 35 位，超过一半；在 48 个省市区中有 30 个都用的是军队干部，几近三分之二。换言之，几乎所有新占领区，都是各野战军或各大区分别任用自己系统的军队干部来担任地方首长。由此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南方各省市，包括西北一些省市，因为军事占领的关系，几乎都任用的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华北、东北各省市，因为根据地建立较多和时间较长的关系，绝大多数省市首长都用的是非军队系统的干部。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南方和西北各省市任用的，几乎都是苏区干部，只有极个别白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各省市任用的，则多半属于白区干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列 67 位省市级首长中，24 位白区干部有 15 位，即约 63% 是大学或大学肄业，8 位是师范或中学毕业或肄业，只有一位是小学文化程度。也就是说，白区干部中将近 96% 都是师范或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而 43 位

① 如表 2 所注，其中绝大多数也并非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而是在外长期工作后被派回原籍任职的本地人，且东三省籍贯者不分省籍，均算本地人。

② 战后派赴东北及热河的干部未计算在内。

苏区干部，算上军校生和赴法勤工俭学者，也只有9位是大学或大学肄业，不足21%，19位是师范生或初中肄业生，加起来也只有67%，还有三分之一，即7位是小学文化程度，8位没有学历。

如果注意到南方和西北多数省市任用的多是军事干部，且是苏区干部，而华北、东北多用的是党政干部，且是白区干部，两部分干部不仅有苏区、白区之分野，在文化程度上还相差甚多。那么我们也就不难了解，这种分别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干部当中造成某些隔阂与矛盾。这种隔阂与矛盾最突出地反映在了中央各部委一级干部的任用问题上面。这是因为，与过去农村苏维埃政权时期的情况非常不同的是，新的全国性的中央政府的建立，不仅要考虑到绝大多数部委带有很强的专业性质和文化水平的要求，而且还要考虑到当时因联合政府的关系，一些重要部委的负责人，包括政府各部委成员中有相当数量文化知识程度很高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央部委负责干部的任用难免也要考虑到文化水平的问题。何况中央主管干部难免会找自己熟悉和用起来顺手的干部来负责手下的部门，结果，在新成立的政务院部委，包括组织部和财经委员会等机构的负责人当中，除了李维汉、谢觉哉、滕代远、李富春、王诤等少数人因长期在中央工作，或文化程度相对较好，或过去就有相当的专业工作经历，故得以分任中央统战部、内政部、铁道部、重工业部、邮电部的部长、副部长外，其他多数部委的负责干部都选用了非军队系统的干部，且多用的是白区干部。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相当一批军队干部和苏区干部的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刘少奇，大力提携重用经他营救出狱并曾长期在他手下工作的一些干部，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廖鲁言、胡锡奎[①]等人，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这里面彭真、安子文掌握着组织人事大权，彭还因得毛、刘重视，不仅在中共七大上成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他同时还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法委副主任。安子文则被任命为彭真的副手，即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任政务院人事部部长。薄一波被赋予了财经大权，身兼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部长等多项财经要职。这些都让部分军队和苏区干部内心不平衡了。

有“谭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就曾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表示过对这种情况的强烈不满。林彪也在背后有所谓“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的说法。不

① 胡锡奎，留俄学生，曾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西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

难了解，“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促成的。

毛泽东作为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自然也不能不受到此种情绪的影响。他在高岗到京后的言谈话语间所透露出来的对刘少奇的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就反映出他这时也并非不受影响。[1]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不能不公开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在接见各大区负责人时，他一方面告诉大家：“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政权（政法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大权旁落，这很危险，应该把权夺回来。”一方面解释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批评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一个司令部，就是党中央。”[2]而事实上，从他这时采取各种措施分散政府部门的权力，强化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接连发布《关于加强人民下令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等文件，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以及通过财经会议及组织会议批评薄一波及安子文等等的做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非对此毫无戒心与防范。[3]

当然，他这时尚不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谭震林、林彪等人所说的那种地步，因而相信不宜过分夸大党内干部之间的这种不和，需要做些弥合的工作。但是，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建国初期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凡涉及苏区与白区、本省籍与外省籍，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通常都会存在很多矛盾。关于省市一级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只要举出原贵州地下党人朱厚泽的一段回忆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他说：

> 接管贵州的力量分两部分：军队方面是五兵团，杨勇、苏振华的部队，属于二野；地方干部是以徐运北为首的冀鲁豫干部……这批干部的特点主要是农村干部，而且是很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干部……
>
> 来贵州接管的干部中，也有几个原籍贵州的干部。如与杨勇、苏振华同时进贵州的省委副书记，实际上的常务副省长陈曾固，很老的，是从中央派回来的。如省委委员、贵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秦天真，也是早就离开贵州到延安，再回来的。再如徐建生，在省政府任秘书长，曾为延安时期的新华

① 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第107~114页。

② 参见赵家梁等：《高岗在北京》，第101~103页；《毛泽东传》（上卷），第277~278页；张明远回忆录，未刊稿。转见林蕴晖：《高岗落马的真实原因》（未刊稿）。

③ “文革”初期“白区干部”受到激烈冲击的情况，与建国初期干部任用问题上埋下的这种裂痕不无联系。

社秘书长。两年后徐运北调走了，跟着苏振华来、管常务的副省长陈曾固也调到北京任教育部副部长。两人走后，在上海做市政府秘书长的周林来做省委书记，后兼省长。他也是很早离开贵州出去的。还有贵阳市委书记伍嘉谟，也都是在1930年代在贵州参加共产党，或在外地做学生时参加共产党的。还有青年团省工委副书记汪行远，是张友渔介绍入党的干部，属于北平地下党系统的。总共只有这几个人。省委班子中，只有周林是贵州人，个别人如伍嘉谟是贵州人，其他的副书记、副省长统统都是冀鲁豫或军队来的。地区和县一级干部也都是军队或冀鲁豫来的。这两部分干部是有些矛盾的……队伍都是我们带来的，结果既不让我们做书记，也不让我们做省长。①

因此，一旦贵州籍干部出了一点问题，马上就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这种矛盾在其他地方也多有发生。

关于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

相对于中央、大区和省市等高中级负责干部的任用而言，基层地县级干部的任用问题显得更为关键与复杂。这是因为，按照中共的历史经验，只有牢固地掌握和巩固住基层政权，中共中央的权力和地位才有稳固的可能。但是，由于干部的数量有限，随着军事占领的持续扩大，有一定领导经验和相应领导能力的干部，自然十分缺乏。据此，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地讲过要培养和重用本地干部的话。最典型的就是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讲："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②

类似的指示到1951年初还能够见到。但是，在中共中央看来，这里所说的本地干部，更多的还是指那些本地出生，外出革命，经历了一系列考验和训练的本地干部，并非是指新占领区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如果没有这样的本地干部，就必须要大量引入北方根据地的经过考验和训练的基层干部。因此，除了在各根据地大量

---

① 朱厚泽口述，王海光、李国芳整理：《贵州"四清"运动及其内部矛盾的由来》（未刊稿）。
② 《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347页。

征召南方干部随部队南下外，[①]在 1948 年 10 月 28 日《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了组织南下干部工作团的要求。

决议提出：估计在今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将会在相当于现有区域和人口一倍的新区建立新政权。根据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 75 人左右，500 个县则需要干部 3.75 万人左右。平均 5 个县设一个地委，每个地委至少需干部 60 人左右，500 个县有 100 个地委，共需干部 6 000 人左右。平均 30 个县设 1 个区党委，每 1 个区党委至少需干部 80 人左右，500 个县有 17 个区党委，共需干部至少 1 360 人左右。500 个县左右的地区需成立 4 个中央局，每 1 个中央局至少需干部 300 人左右，共需干部 1 200 人左右。此外还需准备 7 000 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故它要求各中央局据此配备干部 5.3 万人左右。为此，决议决定由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立即因地制宜地开办党校和军政学校，抽调各种骨干进行学习；所有重要工作岗位，马上增设副职，熟悉训练新干部；创办中等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以补充干部队伍；大量吸收大城市中的工人及知识分子去根据地，经过训练后，再派往各种工作岗位担任干部。到 1949 年 3 月，已知各中央局总共送出随军南下干部 62 859 名。[②]由于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人数严重不足，各中央局都征召了大批青年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后，编入到南下工作团当中。

上述接收接管干部的需求数量，距离实际需要仍旧差得很远。对此，只要简单列举几个数字就可一目了然：

1948 年 9 月攻占济南前后，中共中央华东局抽调了 8 000 余干部参与接收；[③]

1948 年 11 月接管沈阳时，中共中央东北局抽调了 4 000 名干部入城参与接收；[④]

---

① 关于征召华南和西南籍贯的干部回原籍工作的情况，有许多回忆都具体提到过。如方士新：《忆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走向大西南——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 40 周年》，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年，第 25 页，等。

②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1948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7 册，第 426~431 页；《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 357~358 页。

③ 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济南市档案馆编：《济南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 年，第 3、5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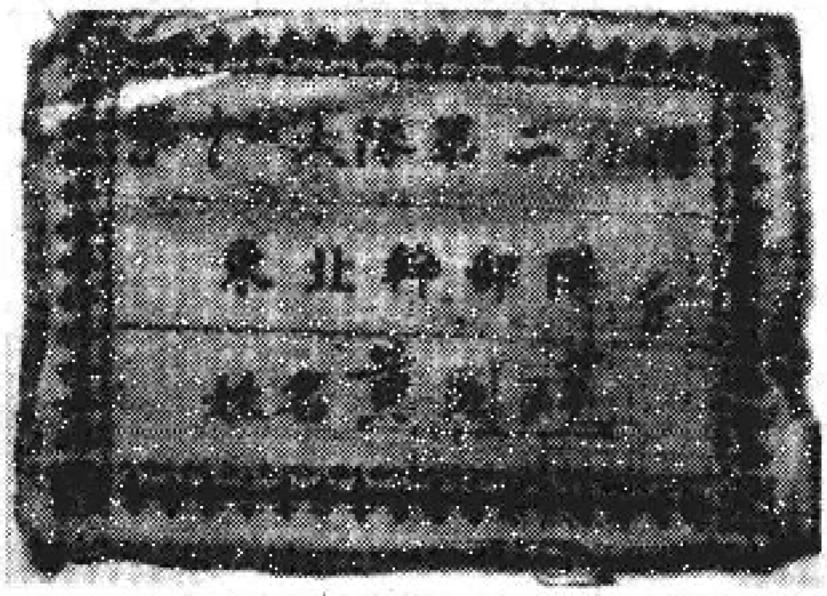
④ 《接收沈阳的经验》，1948 年 11 月 28 日，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1 页。

1949年4月进占南京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抽调干部学生超过4 600人；[①]

1949年5月进据上海时，中共中央华东局派出的包括从香港抽调来的接管干部，就超过3万人。[②]

即使是对各中小城市，包括对新开辟县的接收和接管，所需干部的数量也远超过上述估计。如河南洛阳当时仅10万人左右，中共就调派了353名干部进城接管。[③]仅湖南一省，大约70个县，因大小不同，所派干部多则200余人，少则几十人，再加上11个专区行署和两个市，以及省委省府等各种机构，一下子就留下了南下干部近1.5万人之多。[④]

因此，上述指示发出不过几个月，中共中央就不能不接连几度指示各中央局抽调干部准备随军南下。先是要求抽调几万名干部准备接收华东、华中地区，后又要求抽调干部准备接管即将占领的粤、桂、滇、川、黔、宁、青等省。中共中央还具体分配了派往各新开辟省的干部数量。而由于“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因此，中共中央明确决定“二野、四野应准备从本身抽出大批较强的干部来担负新区党务、财经、公安、宣传、民运等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同意“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参与接收和接管工作。[⑤]



⊙ 1949年南下的东北干部佩戴的布标

关于军队干部因接管地方政权的需要而转入地方军政工作的情况，可以从四川省接收过程中的一组数字当中看出大概。据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1950

① 据1948年6月统计，南京市有人口135万，其中公教人员、军警宪特及其亲属超过30万以上，解放军入城前已大批撤离。而中共入城干部学生中，根据地干部2 190人，军队干部452人，其他系统干部500人，军大学生1 500人，本市地下党800人。见《南京市委向中央及华东局五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5月23日，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市党史资料——纪念南京解放四十周年专辑》（第24~26辑），1989年，第246、248页。

② 范征夫：《南下学习生活片断》，《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③ 《洛阳解放以来的城市工作总结》，1949年2月19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河南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

④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名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附录《南下入湘干部来源统计表》。

⑤ 《中共中央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等编：《南下入湘干部名录》，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816~818页；《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326~328页。

年 2 月 5 日给西南局的报告称：晋绥南下地方干部实际入川者 4 294 人，川北留 1 284 人，川西（含成都）留 2 220 人，西康留 790 人。由于干部缺乏，故又从晋绥军区南下干部中留下 1 752 人。[①]

上述政策，带来了中共在新占领区中县级干部任用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新开辟县的负责干部全面北方化。这可以由下表中看出大概。

表 3 建国初安徽、四川、贵州、广东四省本省籍干部担任书记、县长情况变动统计

	统计县数	职务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备注
安徽省	41	书记	23	21	20	13	11	9	
	46	县长	36	29	23	18	16	16	安徽只有濉溪一县始终由本省人任县长
广东省	60	书记	57	55	30	10	7	3	
	69	县长	53	61	56	33	20	11	
福建	46	书记	12	8	4	0	3	3	
	48	县长	13	13	8	5	6	3	
四川省	103	书记	3	7	9	8	7	5	
	103	县长	2	14	21	19	17	13	
贵州省	57	书记	4	2	2	1	1	1	
	57	县长	3	5	6	5	0	0	

注：本表依据四省县志中所列历任书记、县长相关籍贯、任期统计表制成，因各县志列表方法不一，一些县志或整个缺少籍贯说明，或有县长籍贯说明，而无书记籍贯说明，故本表中所列各省县数亦不尽统一。

上表选择的 5 个省各有其特点。中共在安徽省有长期活动的基础，特别是抗战期间新四军创建了大片的根据地，本有很庞大的组织。该省仅 1949~1950 年党员数量超过 1 000 人的县，就有 22 个。党员数量最多的定远县，1949 年就多达 2 704 人。党员多，自然干部就多。该省这时在数量上超过 1 000 名干部的县，就有 7 个

① 转见挺进大西南编委会编：《挺进大西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南下工作团入川五十周年纪念文集》，1999 年，第 8 页。另据《南下干部入湘名录》统计，当年进驻湘西的第四十七军亦留转地方干部 620 余人，见该书第 15 页。

之多。但如表3所示，该省并不因其党员多、干部多，有较好的组织基础，就较多任用当地干部做“一把手”。定远县党员多、干部多，建国后第一任书记、县长都是本县干部，半年后书记就换成了外来干部，县长8个月后先换成了外县干部，一年后也换成了外省籍干部。①因此，不过一两年时间，该省本地干部在书记职位上就只剩下不足四分之一，在县长职位上也只剩下四分之一多了。

广东省的情况同样比较特殊。一方面，中共在该省也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好的组织基础，1949年中共党员人数超千人的县，也有5个之多。另一方面，该省华侨人数众多，经济上的影响力很大，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特别注意照顾广东（也包括广西）的这一特点，因而专门在中共中南局之下成立了中共华南分局，并派身为广东籍的叶剑英、方方、张云逸等分任华南分局第一、二、三书记。再加上广东长期存在着革命根据地和自己的武装力量，干部数量较多，因此当中共中央准备接收广东时，也特别考虑到了可以借助于广东本地干部参与接收和接管的情况。故叶剑英等在分配南下干部时，就基于这一特点，将随军南下的1 700余名县级以上干部大部派去广西参加全面接管各级政权的工作，对广东的基层政权则基本上选用本地干部来负责。当然，叶等也考虑到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的平衡问题。比如在分局和省一级负责干部当中，就注意多安排南下干部；而地委、区委，特别是县乡级的负责人，则较多安排广东籍的干部。②这也是为什么和南方及西北各省不同，中共建国后广东省最初两年左右各县书记、县长90%左右都用的是本省人的原因。

但是，由于四野驻军和干部对广东的这种安排不满，再加上在土改运动当中众多出身地主家庭的广东籍干部被揭发阻碍甚至干扰土改进行，导致党内对广东批评颇多，叶剑英等不能不根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决心依靠大军，大面积改组了原来以广东干部为主的基层领导班子。相继成立了粤东、粤西两区党委，分别领导广东各地委。区委及地委书均由四野兵团及军师级干部来担任，原地委书记改任第二书记。同时，“以驻军所在地的团政委担任各该县的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人地不宜或历史不清者调离受训或处理，历史清白政治无问题者可继续留任，改任

① 《定远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507、563页。

② 周德光：《彻底肃清“松仔岭事件”血案的遗毒》，《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第2卷，广东省恩平县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印，1995年，第166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关于征研广东省反“地方主义”的情况汇报》，《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第3卷，第175页；张江明、刘子健：《方方“地方主义”冤案始末》，同前书，第235页。另杨立著《古大存沉冤录》则称此1700人是1950年9月华南分局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要的，见该书第112~113页。

第二书记或副书记。"[1]而此举仍未能让中共中央和中南局感到满意，故1951年底派前四野干部陶铸[2]前来主持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1952年，鉴于本地干部难以信任，中共华南分局不得不要求中共中央为广东重新调配干部。广东当时所辖98个县、960个区，包括若干城市，总共要求中共中央配备区长以上干部2 007名。[3]仅仅是由于中共中央一时无法满足广东省的这一要求，其县一级书记还有少数没有被换掉，而县长半数也保留了下来。

与广东情况颇有些类似的是福建。福建许多偏远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回籍的老干部较多，此时的福建省委12人中，从书记兼省长的张鼎丞，到委员叶飞、曾镜冰、方毅、梁国斌、伍洪祥、黄国璋等8人都是福建本省人。只有冷楚一人是3 339名由太行、太岳根据地抽调南来的"长江支队"的南下干部负责人。[4]但是，从表3中可以看出，和广东的做法有很大不同的是，福建省委并没有因为本省干部主政，就在基层大量任用土生土长的本省干部担任负责职务。相反，由于1950年5月从俘获的国民党人员口供中和相关档案中发现闽西南地下党主要负责人有叛变投敌嫌疑，福建省地下党相当多数受到审查，直接影响到干部的任用问题。[5]依据表3对该省基层各县负责人的统计资料，可知无论是书记，还是县长，1949年间本省干部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1950年书记中本省干部的人数已降到将近六分之一，1951年甚至降到不足十一分之一，1952年干脆一个本省籍的干部都没有了。很显然，福建之所以没有和广东一样发生大规模的所谓"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与该省领导机关在建国初基层干部任用问题上的这种作法有很大的关系。[6]

相比较而言，四川省的情况显然还要彻底得多。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几个月里，该省可知籍贯的103个县的党政负责人，几乎全部由外来干部担任。直到一年以后，本地干部才陆续有被任命为县长的情况出现。但在建国初的几年时间里，本地干部担任县长的数量，最多时也没有超过五分之一。担任书记的数量，更是少得多。

---

① 《华南分局对广东基层组织不纯问题所采取的措施的报告》，1951年3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年）》，1999年，第202~204页。

② 陶铸为湖南人，此前任中共广西省委代书记。

③ 《华南分局请中央配备干部2007名》，1952年5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1999年，第87~88页。

④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516页。

⑤ 何载：《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173~1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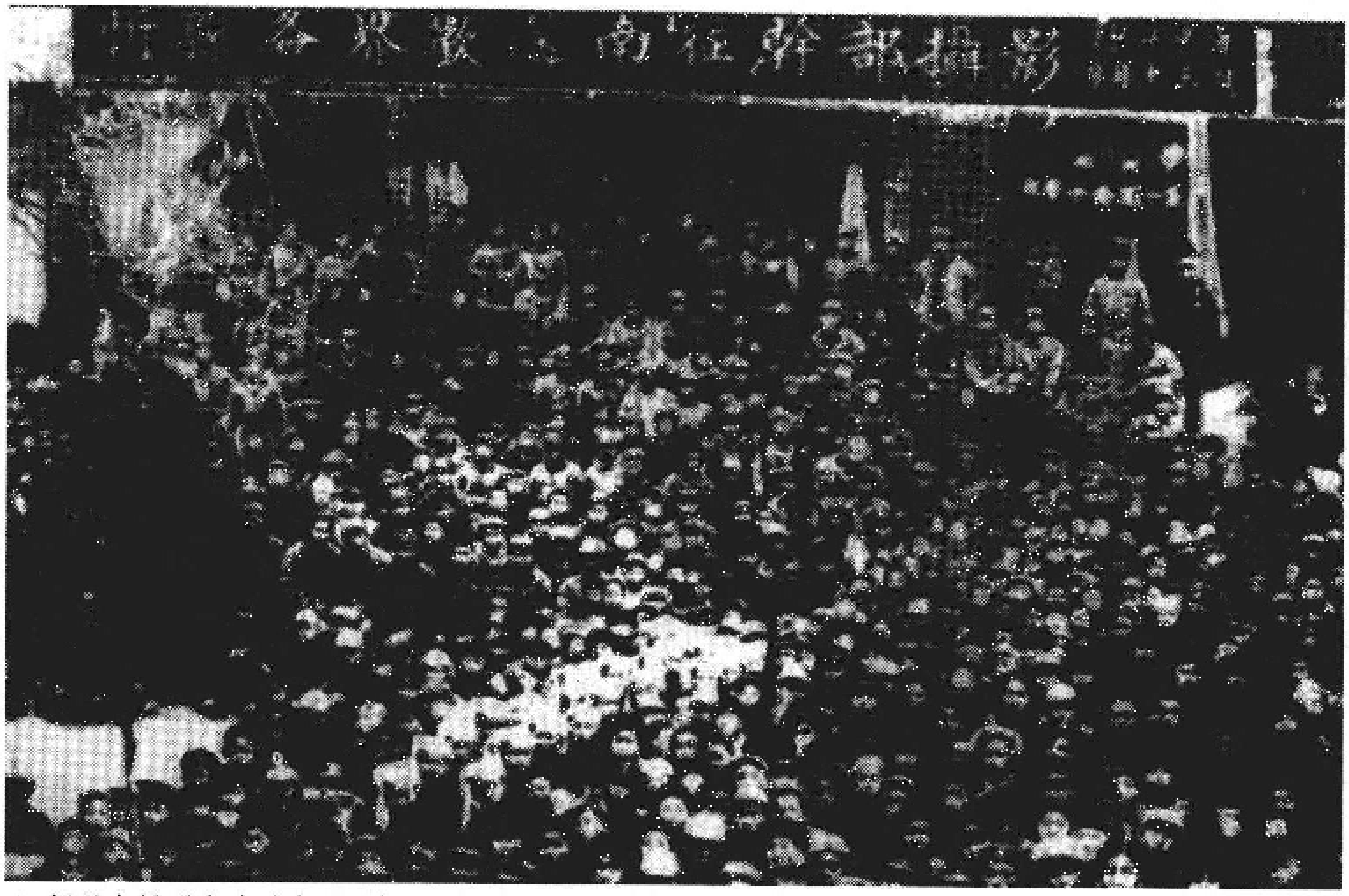
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福建省没有展开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事实上，福建省不仅也开展了这一斗争，而且也导致了多达177名地方干部被定性为"地方主义错误"和"地方主义反党分子"而受到处理。同上引注，第521页。

最能够反映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和各大区领导人更信任外来干部的例子，无疑就是贵州省了。据有籍贯说明的57个县志里记载，建国初的几年时间里，本地干部担任书记一职的，最多时也不到4人，最少时干脆只有1人。本地干部担任县长一职的，最多时也不过6人，最少时一个也没有。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按照一般资料所说，新占领区通常指的都是长江以南各省区，因而随军南下的接收干部也统称为“南下干部”。但实际上，不仅南方各省，就是西北方向的新占领区，任用外来干部执掌基层地县政权也是通例。如据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籍贯可查的甘肃30多个县的县志记载，1949年底至1950年代初，被任命为这些县的书记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甘肃本地人，被任命为县长的甘肃省籍干部虽有一些，但也不超过三分之一，而且多数很快也被换掉了。[①]

之所以许多地方还是不得不任用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干部担任基层政府方面的负责人，一方面是因为政府部门与本地民众接触更多，出面贯彻推行上级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更为便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下干部的数量毕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当时情况下，南下工作团大都根据地方情况，预先配备了成套的地、县级接管干部队伍。如中共华北局即下令太行、太岳两区党委各配备一套行署班子、一套军区班子，各配备三套地委班子，每个地委另组织两三个县和十几个区的领导班子。有的地方，如晋绥分局，更要求晋西北、晋西南每个地县委都配备二至三套地县级干部班子南下。所配备班子中，通常县以下班子人员均基本齐备，即有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武委会主任、县委秘书、民政科长、财粮科长、税务局长、银行行长。而区干部一般亦党政各七八人。实际上，南下到地方后，这些已经组成的班子要面对多得多的县区需要接管，原班子往往会被打散另

① 参见《广河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53页；《高台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320页；《合水县志》，合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8年，第191、235页；《华亭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461页；《徽县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2、655页；《和政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3、138页；《静宁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6、389页；《泾川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9、441页；《静远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00、431页；《景泰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47、492页；《康乐县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12页；《康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8、487页；《两当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425、475页；《陇西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3、424页；《临夏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4页；《礼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6、452页；《临泽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0、387页；《民乐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65、604页；《永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0、880页，等。



⊙ 忻县各界群众欢送南下干部

组，并不得不用到一些本地干部。[①]

有关中共高层对新占领区坚持要用外来干部取代本地干部来担任地县主要领导人的原因，目前所见最典型的一则文献反映在1951年5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的《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中。《决定》明白写道：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原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有的须重新调整和分配工作，将他们放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提高。同时要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逐渐培养和提拔成为党的各种工作干部。凡地主富农出身和与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必须坚决调离本地。毫无疑问，云南省委这一决定绝不是该省委自行做出的，它原本就与中央局和中共中央此前任用干部的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它注意到，过去关于这一点做得还不够彻底。因此，毛泽东见到此电也没有丝毫犹豫。他当即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批示，称："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②]

① 贾久民等：《中共太行、太岳南下区党委第三地委入闽史料》，中共南平市委党史研究室印，1996年，第39~44，45~51，68~73页；《挺进大西南》，第38页。

②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批语》，1951年6月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46~347页。

采取这样一种措施的结果，导致南方各省的县党政第一把手，即县委第一书记，长达二十年左右都始终掌握在南下干部的手中。以四川北川县为例，从1950年2月起，一直到1970年，该县八任第一书记，七任21位副书记，除1人外，全部都是山西籍的南下干部。①四川达县、宜宾、江油、彰明等县，自1950年1月起，一直到1976年，县委第一书记基本上都是山西、河北和山东的南下干部。②就连江苏无锡，一直到1974年，江苏太仓，一直到1980年，才开始有苏南的干部出任县委第一书记。③换言之，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发达如江苏省，苏南各县也多是用来自山东、安徽或苏北根据地的南下干部，长期担任第一把手的。

据粗略估算，随军南下的十几万干部，连同留在南方的数百万军队，和随后南迁的大批干部家属子女，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北方南下人员达到近千万之多。这几乎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的浪潮。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之大，亦可想而知。

关于对地下党干部的任用问题

如前所述，依照中国传统选任官吏制度，有所谓“避籍”等明文规定。民国以前中国地方基层官吏，向来严格禁止本地人做本地官。如清末光绪二年至宣统三年（1876~1911年），江苏无锡10任知县，有浙江籍、安徽籍、四川籍、湖南籍、河北籍，就是没有江苏人。贵州毕节县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宣统三年，116任知县，云南蒙自县105任知县，也是一个本省人都没用。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割据，文治系统中断，“避籍”规矩受到某种破坏，但政府仍试图依照清例对任用官员的省籍和出身流品加以规范。如江苏无锡县，从1912~1927年，共14位县知事，除3位江苏籍（一太仓，一仪征，一苏州）外，余均为外省籍。云南罗平县，从1912~1927年，总共13任县知事，除一昆明、一大理人为云南本省人外，其他也均为外省人。④然而，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一传统已被破坏殆尽。如前述江苏无

① 《北川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第215~216页。

② 《达县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150~151页；《宜宾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374页，等。

③ 《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15页。

④ 不大受北京政府控制的地区，情况则不同。如四川省一直处于半割据状态，其县一级行政长官多为省派，如三台县此期间总共6位县知事，5位均为川籍，但均非本县人士。见《三台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

锡县，自1927年8月至1949年4月，23任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中，仅6任为外省人，其他用的都是本省人，其中8人干脆就是无锡本县人。①

但是，中共建国后所采取的任用干部的做法，显然不是从恢复传统的“避籍”办法的初衷出发的。因为，传统的“避籍”办法主要是为了避免同籍所带来的太过密切的利益关联的弊病，这并非中共中央大量安排任用外来干部最初的出发点。而且，传统的“避籍”办法是与传统的科举选拔制度相结合的，它对被任用者的文化水平有相当高的要求。故凡明清任知县者，多为进士、举人，最低也是贡生、监生。②到北京政府时期，对县级官吏的出身仍照搬旧例。③即使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破除了“避籍”的规矩，对县官学历的要求仍旧很高。即使是那些偏远省份的县长，如甘肃安西县民国时期任县知事或县长，有学历统计的31任中17任为贡生或附生，有两任为警官学校毕业生，其他则均为大学生。④四川省国民党最后一任32个县长中，有学历说明的有26位县长，除一名为中等师范学历，其余全部是大学学历。⑤而中共建国初几年中对县级党政负责人的任用，却完全没有文化水平的要求。如四川省有学历统计的45部县志中，只有江油、武隆、安县各有一任书记和一任县长，大足、宜宾、仁寿、中江各有一任四川籍书记有大学或相当于大学的文

① 《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661~662页。

② 参见《无锡县志》，第659页；《蒙自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03~206页；《毕节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11~215页。

③ 参见魏光奇：《北洋政府时期的县知事任用制度》，《河北学刊》2004年5月号。

④ 《安西县志》，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498~499页。

⑤ 参见《邻水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58页；《荥经县志》，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6页；《梓潼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767页；《资阳县志》，重庆：巴蜀书社社，1993年，第575页；《峨嵋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页；《渠县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583页；《南充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8页；《垫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5页；《安岳县志》，第514页；《苍溪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3页；《绵阳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78页；《盐亭县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55页；《射洪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33页；《宣汉县志》，重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57页；《中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8页；《西充县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88页；《名山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第138页。

化程度，其他都在中学文化程度以下，相当部分或“初识字”，或无学历。①从已有的统计资料上可以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这些地方的党员或干部真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如四川新津县，1949年中共进占时，连同南下人员，就有459名干部，其中大学程度的干部就有33人，高中程度的干部有88人，然而任用的书记却只有小学文化程度。②眉山县这时有干部359人，大学程度者即有44人，高中程度者118人，而书记和县长除最初几个月用过一个河南干部有高中学历外，以后几年用的都是只有初中程度的山西干部。长寿这时有干部642名，其中大学程度者36人，高中程度者135人，初中程度者259人，书记和县长却都是只有高小程

① 《西充县志》，第134、194页；《邻水县志》，第646页；《达县志》，第150页；《宜宾县志》，第374，396页；《北川县志》，第215、265页；《中江县志》，第427、494页；《苍溪县志》，第214页；《峨嵋县志》，第106、145页；《盐亭县志》，第455页；《南充县志》，第501、548页；《宣汉县志》，第529页；《梓潼县志》，第704、768页；《渠县志》，第539、584页；《射洪县志》，第563页；《万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437、487页；《通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7、563页；《万源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6页；《威远县志》，重庆：巴蜀书社，1994年，第472、539页；《岳池县志》，成都：电子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51、382页；《永川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99、659页；《营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61、509页；《仪陇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81、535页；《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399、435页；《仁寿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4、353页、584页；《邛崃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页；《青神县志》，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8、372页；《平武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蓬安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88、137页；《彭水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4、504页；《合江县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450、477页；《江安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510、564页；《长寿县志》，送审稿，1993年，第152、218页；《井研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18、444页；《开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9、441页；《南部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茂汶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第416、455页；《芦山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515、553页；《大竹县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第140页；《长宁县志》，重庆：巴蜀书社，1994年，第516页；《武隆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9、138页；《新津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09页；《屏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13、558页；《沐川县志》，重庆：巴蜀书社，1993年，第337、378页；《眉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3、228页；《江油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9、300页；《夹江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5、442页；《南溪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6、439页；《彭山县志》，重庆：巴蜀书社，1991年，第341、394页；《潼南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2、558页；《云阳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4页，等。另注：已知许多县志中关于学历的说明并不准确。因编撰者必须为本县之尊者讳，往往对建国初期干部中不识字者采取略去学历不提的办法来处理，故不少无书记或县长学历说明的县志，实际上并非是编者不了解情况，而是有意避而不述。而有些县志，则故意用小学（含文盲）的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故一些县志中“小学”、“初小”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其实也是含糊其辞。

② 《新津县志》，第509、545页。

度的山东干部。[①]

如果说对担任县一级负责人的“南下干部”，中央曾有明确指示要组织培训，各中央局对干部的资历、职级和文化程度还多少有所注意的话，那么，对县以下的干部，以及对西去干部的要求就明显没有那么多规矩了。

比如，朱厚泽就回忆说：当时“整个贵州的接管，基本由军队干部加冀鲁豫干部往来配派。贵州大概80个左右县市，再加上区、乡等。干部如何调配呢？一些接管老干部自己说：有些老区来的区委书记做了县委书记，副县长做了县委书记，警卫员当了公安局长。军队下来的干部也是如此，管粮草的司务长当了粮食局长。”[②]四川地下党干部，“红岩烈士”车耀先的儿子也回忆称，当时接管乡一级政权的山西人，有些连干部都不是，只不过是在担架队或运输队担任队长的普通农民而已。[③]

接管西北各省基层政权，情况也差不多。由于大批干部已经北上或南下，有的原不过是陕北根据地的农民，只因为抽到乡里当了一段时间干部，就被编入工作团，分派到西北各省的县里去做书记或县长。由于他们中有些人大字不识一个，不要说上级文件看不了，就连盖县政府大印都不知道如何盖正。结果也就在这些陕北干部中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很特殊的相互传授的“经验”，就是找识字的人把印章的下方锯一个缺口，每次用章时把缺口向着自己，以保证不会把印盖倒了。[④]

本地干部明明很多，他们不仅熟悉本地情况，而且有较高文化程度，容易正确理解上级指示精神。对他们弃而不用，指派语言不通、习惯不合，在任职的地方毫无人脉，且文化程度又很低的外来干部，全面掌管占领区内地县乡各级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妨碍上级部署的各项政策的有效实施，甚或因为领会不够和做法简单生硬，而造成许多严重问题。[⑤]1950年4月民主人士、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即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和周恩来，呼吁快快轮训“许多不够格的县长和一班县工作干部”，务必任用熟悉本地情况的人士担任副助长，以减少外来干部只顾任务指标不

① 《长寿县志》，第152、218、278页。

② 朱厚泽口述，王海光、李国芳整理：《贵州“四清”运动及其内部矛盾的由来》（未刊稿）。

③ 笔者访问车伯英的笔记，2005年6月18日上午。

④ 笔者访问《广河县志》主要撰稿人马明达教授的笔记。2008年2月21日上午。

⑤ 如建国初期在南方许多省区发生的大规模“匪乱”现象，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南下干部”不顾当地情况，硬性贯彻执行上级征粮任务，激成民变所造成的。

顾民生的粗暴作法。[①]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及所属各省之所以必欲如此，其原因也显而易见，即对本地干部严重缺乏信任感。

中共自有根据地和政权以来，就存在着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区别与矛盾。因为多数根据地都是靠本地的党员干部利用本地的各种资源创办起来的，因此本地干部在政府和军队中当权的情况曾经相当普遍。但因为所有根据地及其红军，都受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中共中央指派外来干部担任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再加上各地红军游击性极强，一些部队常常被迫放弃原有的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转入更大的根据地。这就更容易在这些较大根据地内的外来干部及军队与本地干部及军队之间造成各种矛盾与摩擦。基于中共高度集权的体制与思维惯性，得到中央授权的外来干部势必要与对地方事务有着强烈自信的地方干部，发生尖锐的冲突与斗争。1930 年代初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反 AB 团事件”（即所谓“富田事变”），发生在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大肃反”，发生在湘鄂西苏区的大肃反，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背景下，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严重猜疑与不信任所导致的权力斗争的结果。[②]

战争条件下这种被无限放大的敌情意识，在中共中央把苏联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圭臬之后，不可避免地从意识形态的方面进一步得到了强化。该书对党内必然会存在“特务”、“两面派”、“暗害分子”之类危险的极力渲染，再加上苏联 1930 年代中后期在党内大规模肃反的刺激，都越发造成了他们对“内部敌人”的严重恐惧。比较 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中共领导机关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虽然也存在着部分共产党人变节或投靠国民党，转而成为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情况，却并没有引发党内对所谓“白区党”的普遍怀疑与不信任；而随着中共中央长期转入农村，到 1943 年延安整风时，虽然并未发生任何可能造成党的危险的严重事件，却在延安普遍发生了以严重“逼供信”[③]为特征的主

① 黄炎培在信中提到，仅苏南一区因征粮和摊派公债等即已发生逼死人命和上千人被押被吊的情况，恐怖消极的情绪十分普遍。这种情况恐不止苏南一区。实际上包括建国初期在南方许多省区发生的大规模的“匪乱”现象，有相当部分就是“南下干部”不顾当地情况，粗暴执行上级征粮任务激成民变所造成的。参见黄方毅：《1950 年：黄炎培上书毛泽东》，王家声等编：《历史深处》，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3~4 页。

② “富田事变”中本地党政军各级干部被害超过 4000 人，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中本地军队干部被害超过 2500 人，湘鄂西肃反中受害者超过 1 万人。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48~152 页；戴向青：《论 AB 团与富田事变》，《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第 156~161 页；何立波：《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文史精华》2006 年第 2 期。

③ 这是对那种因怀疑某人某事，便滥施肉刑，以逼出口供的刑讯方式的一种概括的说法。

要针对“白区党”的党员干部的所谓“抢救”运动。几乎所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干部都受到怀疑，甚至被打成“敌特”或“反革命”。很显然，对“内部敌人”的极度恐惧和由此形成的对来自国统区党组织纯洁性的严重猜疑，是造成这种自我戕害行为的基本原因。

另一个导致中共中央对本地干部难以信任的原因，无疑是阶级斗争的观念和经验问题。关于中共中央及其来自根据地的军政领导人总是容易习惯性地从阶级斗争的观念，把怀疑的矛头指向国统区的地下党（亦即所谓“白区党”）的问题，只要指出以下这种情况就足够了。由于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成分，相信阶级出身与阶级成分与个人的阶级意识相联系，因此，贫苦阶级出身还是富裕阶级出身，是做苦力的工人、农民还是收入丰厚的知识分子，常常会成为判别一个党员或干部革命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些生长在根据地，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党员干部自不必说，那些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一来因其人数有限，二来长期过军旅生活，在农村根据地里摸爬滚打，特别是参加过整风、土改等斗争和锻炼之后，他们已逐渐在观念上把自己融入了贫苦阶级的行列。特别是绝大多数资历较高的中共干部，也包括多数南下干部，大多出身学历都较低，他们与那些生长在富裕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得以利用各种条件和关系在国统区里做地下工作，没有受到党的各种政治运动考验，更不曾经历过艰难困苦考验的众多地下党干部，难免格格不入。再加上语言、习惯等种种差异，自然愈加扩大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感和不信任感。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出身与知识分子成分，很容易变成地下党干部的一种“原罪”。战争条件下发生“反 AB 团事件”、“白雀园大肃反”、“抢救运动”，建政时期发生对地下党干部集体不信任，乃至于排斥的情况，均在所难免。

建国初期在各地反映出来的这种针对地下党及本地干部缺乏信任的态度，严格说来应当是解放军大举渡江南下之后才突显出来的。

据身为南京地下党干部的穆广仁回忆，1949 年 5 月，南京刚刚占领不久，新成立的南京市委就得到了关于南京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的情报。据此，南京市委上报中共华东局，一方面提出应马上进行组织整顿，一方面请示对这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同时政治背景又极为复杂的南京地下党干部应如何安排适当工作。中共华东局不能自作主张，故经曾作过中央社会部部长的第二副书记康生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随即下达指示，除同意马上进行整党以外，并提出具体办法

为："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①]

受此影响，1949 年 7 月新设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个如何对待本地地下党问题的指示。指示在高度肯定湖南省地下党过去的光荣斗争历史，告诫干部要重视地下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和生活习惯的同时，明确要求南下干部注意地下党的普遍问题，即（1）一般党员的质量不高，一年以内的占 80% 以上，候补党员占 60%，这些新党员缺乏应有的教育和锻炼。（2）因为发展过快，存在着明显的拉夫现象，个别地方有伪县长、民社党和自首分子都发展了进来。（3）干部少，质量差，一般掌握政策差，组织纪律性差，阶级立场不稳。因此，对地下党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组织清理。[②]对他们的任用，要尽量利用他们熟悉情况和群众关系多的特点，一般不宜留在机关，有能力者一般也只应配置在各种副职上，确实德才适合又为工作上不可缺少的干部，"应视作特殊情况，经过党委研究提交上级批准后，可以分配负责工作"。[③]

由于南下干部对地下党人员不习惯、不信任，南京地下党人员亦发生对南下干部"不满不受领导等等"情况。[④]针对这种情况，二野政委邓小平于 9 月 17 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党员大会上专门做了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一方面动员整党，一方面对地下党人员加强教育和引导。他除了强调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是党中央批准的、是极为必要的以外，突出强调了一个观点，即地下党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⑤]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刘、邓部队进驻西南后，自然会对地下党"严重不纯"的问题更加重视了。邓小平在一份报告中曾经说明：以云南丽江地区为例，当地解放之初原说有地下党员几千人，但不久就变成了万余人，再不久又变成了两万余人，"究竟多少弄不清楚"。表面上看起来，"支部遍于各村，（但）有百分之九十九为特

---

①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何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08 年，第 458 页。

② 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我们进入湖南与地下党会师的几个问题》，1949 年 7 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联络组编：《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二卷，2006 年 9 月，第 34~36 页。

③ 湖南省委：《关于与地下党会师问题的几点补充指示》，1949 年 9 月 12 日，《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二卷，第 39~40 页。

④ 转见湖南省委组织部：《关于我们进入湖南与地下党会师的几个问题》，1949 年 7 月 30 日，《南下入湘干部资料选编》第二卷，第 36 页。

⑤ 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何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第 458、460 页。

务地主和坏分子所掌握。”。还有“许多县委内部成分不纯，有国民党书记长变为我们县委干事者，有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变为我们的宣传干事者，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现象，不少党员实际上是斗争对象。”故目前必须展开“整党”，“首先着重于县委（可能也包括一部分地委）领导，保障县委成分纯洁，清洗不可靠的分子”。整个西南地区实际有地下党员约4万，但“有一个相当数目是不合乎党员标准的，有一部分则是很复杂的”①。

各新区整党开始后，大批地下党组织被解散，党员被停止党籍。南京100多地下党员受到“停止党籍”的处分。地下党出身的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另就高位，南京市团委书记仍旧不用文化水平较高且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干部，而是又从苏北调来了一位营级干部接续此位。②

广东随后所以会发生“反地方主义”的斗争，说起来也是由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这一理由所引发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在出身、学历等方面的差距以及语言习俗的隔阂，明显地使身为解放者的外来干部和大军干部对广东主要依靠本地干部的做法十分不满。土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进一步印证了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队伍素质的看法。这种问题不可避免地直接触动了中南局，特别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神经。结果，广东的问题就被认定为：“广东党内有相当一大批坏分子（其中包括贪污腐化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恶霸分子和与敌人始终保持联系的内奸分子）占据着重要工作岗位。因此，广东党的现状，不仅是基层组织有问题，而且地专一级、县一级、区一级均有问题，尤以县、区两级问题最为严重。”就连“广东现有的几万个土改队员，（也）大半为县委、区委经封建关系拉入的，其中亦有大批坏分子”。③

严格说来，在中国社会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因地方差异而影响到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远近亲疏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要说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就是那些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或延安整风的南下本地干部，也很难拒绝同宗、同乡、

① 《邓小平一、二两月工作情况综合报告》，1950年3月13日；《邓小平九月十一日给毛主席的报告》，1950年9月11日（油印件）。

② 穆广仁前引文。

③ 《罗瑞卿关于广东地方组织不纯的报告》，1952年3月21日，《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39~40页。

同学的情谊。毛泽东手下的战将之一，曾任红一军团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1950年1月随四野南下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广州警备司令员的陈光，就没有抗拒住家乡亲戚朋友的亲情，违反规定，帮助这些人谋职和经商，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遭到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①]同样，在延安和陕北工作了10年之久，1950年回到故乡云南做省文联筹委会秘书长的谭碧波，碍不过众多亲戚、故旧、同学求情，在"硬是谢绝不掉"的情况下，介绍其二弟进了"革大""师训班"；并给一个起义军人和一个旧法官介绍了工作。结果，因为这三个人成份都不好，"以后每到运动一来，都要翻出来整一整，左一次审查，又一次审查，没有个完！"[②]

由上不难看出，在本地干部的问题上，囿于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在阶级关系上达不到党的严格要求的情况当不在不少。但在革命和战争年代，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这却成了党性和立场问题。因此，渡江战役之后，也就是解放军大举南下之初，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占领区内就已经开始注意限制地下党及其本地干部在接管过程中发挥作用了。随之而来的，是大军进入南方各省之后，进一步相信问题之普遍与严重，因而愈发加强了警惕和整治的力度。结果，中共各大区对几乎所有新占领区中的地下党及其相关武装力量，如广东党组织、云南地下党、湖南地下党、福建地下党、南昌地下党、滇桂黔边纵队、海南岛琼崖纵队以及地下隐蔽人员等等，不论就个人事实上有无问题，几乎都被认定为组织"严重不纯"，有的不被承认。一些发生问题或被怀疑有问题的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干脆被打为"匪特分子"或"恶霸地主"集团，惨遭判刑或枪毙。[③]建国初中共党内第一大特嫌案，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扬帆为首的"反革命案件"的发生，亦是在此种情况下造成的一起重大冤案。

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像表3所显示的那样，太过重用本地干部的广东省，自然很容易成为从中央到中南局到广东本地所有非广东籍的外来干部严重猜忌的对象，进而引来一系列麻烦。

① 转见刘统：《建国初陈光、沙飞事件的反思》，《同舟共济》2008年第11期。

② 谭碧波：《峥嵘岁月——谭碧波革命回忆录》，作者自印，第102、106页。

③ 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进而指认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刘因此被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该地下党组织200余人受此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第129~137页。

结论：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由来

建国初曾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的曾生曾经回忆起1949年春初见毛泽东时的情景。毛泽东当时问他：“你知道你们广东是什么时候开化的吗？”他答不出来。毛告诉他说：“你们广东开化很早。秦始皇时代，广东就是秦朝管辖的地方。河北人赵佗在广东做官，他对地方治理得不错。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他乘机扩占了粤西、海南岛等地方，自立为王。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派人去见他，他表示臣服，接受汉朝的管辖。”①联系到近代以来广东与中央政府之间始终若即若离的关系，毛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多少能够反映出他内心中对广东的特殊性，不无隐忧。不过，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个问题的关键，根本上不过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亦即中央能否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地自如行使权力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让叶剑英回广东主政，不仅没有放虎归山的担心，而且批准安排了一批广东籍的干部回去协助叶剑英工作。②因为毛泽东并不担心叶剑英等会割据称雄，他所担心的是，如果没有对中央一心不二的广东籍干部叶剑英，换了其他广东本土干部，能不能够在稳固地建立起共产党政权的同时，顺利地实现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与各地保持同步？

毛泽东在颇具特殊性的广东任用叶剑英这件事，最清楚地说明了中共在全国建政之初任用各地干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就是一切以政权巩固和集权统一为目的。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尽可能选择本地干部来担任第一把手。前提是，这些干部必须是长期在外，经受过战争洗礼、土改整风等历次运动，已经熟悉中央各项政策者。换言之，就是懂得和熟悉中央所坚持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方法，对中央绝对忠诚的人。建国初各大区军政首长的选任，各省市负责人的任用，都体现出这一点。而对于绝大多数找不到具有这种经历的干部的地区，则仍以政权巩固和集权统一为先着，宁可选用不熟悉当地情况，甚至不通当地语言的，但有这样经历和经验的外来干部。之所以必须如此，根本上就是因为，中共中央相信，考察干部对中央忠诚与否，非考察其在中央领导下进行各种阶级斗争时的表现不可。表现好，则可信；没有经受过这种考察者，则不可信。进城之初，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问题、新形

① 转见《曾生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564页。

② 建国初中共中央除安排叶剑英执掌广东大权外，还调回古大存、曾生等原广东将领和干部回广东工作。

势，毛泽东的应对之策，就是一切拿“阶级”说事儿。还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再三强调过这一点。他告诉与会的高级干部：在进城以后，更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①]显然，在中共干部的任用问题上，坚持这一点，是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把阶级这把达摩克利斯宝剑高悬在党员干部的头顶上，说到底就是要强化全党对中央的忠诚度，因为只有中央才是最懂阶级问题和最能够制定正确的阶级政策的。但这样做的结果，在中共普遍的军事化传统及其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不可避免地会极度强化中共金字塔式的等级观念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②]的长官意志。在这种体制下，对阶级忠诚与否决定着党员干部的政治生命。而对阶级的忠诚，只能通过对党的忠诚来体现；对党的忠诚，又需要通过对上级的服从来表现。结果就是，上级对下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对上级却碍于民主必须服从集中，下级必须服从于上级，不仅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而且必须加倍地去贯彻执行上级的意志。[③]身为本地干部的周克就回忆过建国初期中共干部关系存在中的这种现象。他写道：因为自视是南下干部，因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之一的马天水对本地干部一向声色俱厉。而因为曾长期在延安工作，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对下级更是极其霸道。在下级的工作汇报时总是随意打断，总是疾言厉色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将军”式的拷问，还“不许回嘴”、“不准解释”。就是对排名仅在其后的其他书记，包括对马天水，也照样经常不给好脸，甚至会当面责骂。“不许回嘴”、“不准解释”，稍有不满，即可能招致政治上的种种刁难与迫害，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渐渐开始成为当时中共干部体制内上下级关系的一种常态了。[④]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广东在任用基层干部，包括在随后土改运动过程中强调地方特殊性的作法，自然无法继续。对于广东任用干部的特殊作法，党内议论随之而来，驻军负责人邓华、赖传珠等就明确提出：“广东一般县级干部的水平，和抗战初期刚参加革命时的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要搞好广东工作，需要外面插进一批骨

①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1948年9月。

②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1945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

③ 中共七大党章明文规定：党员和下级在运用民主权利时，不得妨害集中原则，否则就是“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或“向党闹独立性”。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25页。

④ 周克口述，顾训中整理《风雨七十年——时代大潮中的我和我的一家》，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204~207页。身为上海市委工业部副部长的周克即因针对柯庆施及其党内干部关系中的这种现象在整风会议上公开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改造。

干进去。而地方武装不纯，更需要大加改造。”[①]如前所述，叶剑英、方方等正是迫于此种压力，不得不采取措施开始用南下干部来替换本地干部，担任地县主要领导人，进而要求全体党员树立依靠大军思想，并以大军干部为骨干，参加各级党委担负领导责任。[②]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陶铸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干部的阶级成分和出身。广东本地的党组织为什么会“严重不纯”，就是因为它的“很大一部分党员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他们过去打日本、打蒋介石还可以，现在打到自己的父母头上了，就出来帮地主阶级叫嚣。为什么中央确定广东工作要依靠南下干部、大军干部呢？就是因为他们对地主阶级有很深的仇恨，久经革命锻炼，立场坚定。而这些，恰恰是广东地方干部所缺乏的。”[③]

进入到1952年，毛泽东也开始批评广东省在干部任用问题上“犯了地方主义错误”，[④]广东再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调换。最后，“80个县（合并的13个县在内）80%主要领导骨干为南下与大军干部，6个地委主要领导骨干为南下与大军干部（只3个地委书记为本地干部，但都配有南下干部为第二书记或副书记），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为南下与大军干部。”领导权已基本上为外来干部所掌握了。[⑤]

一旦外来干部掌握了相当权力，一些广东本地干部就难免会成为打击的对象。德庆县被南下干部接管后，当即宣布县长以下全部“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⑥]此后接连出现的“江门事件”、“松仔岭事件”等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使一大批广东地方干部被打成了“右倾投降主义”或“地主恶霸集团”。随之而来的持续了多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最终更是导致上万名广东籍干部受到

---

① 陶铸：《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20~621页。

② 《华南分局对广东基层组织不纯问题所采取的报告》，1951年3月9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205页。

③ 《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620~621页。

④ 杨立：《古大存沉冤录》，第120页。

⑤ 《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02页。

⑥ 《刘田夫回忆录》，第217~218页。

打击和压制，有些干部甚至还被公开判刑或处决。①

表面上，1952 年在广东发生的这场名为反“地方主义”的政治风波，是因叶剑英、方方等在主持土改工作的过程中，强调广东特殊，坚持在土改中对华侨要取温和态度，引起毛泽东不满所致。实际上，毛真正不满的是，方方等土生土长的地方领导人，及其所依靠的本地土生土长的各级干部，以广东特殊为借口，反对在广东开展激烈的阶级斗争。对于毛泽东而言，这不仅会严重妨碍中央意志在广东的贯彻，而且会使广东的农民无法像全国其他省区的农民那样，彻底从地主阶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死心塌地地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思考问题的结果，使毛泽东和其他各级军政领导人相信，广东出现的和平土改，并不是偶然的。它和中共历史上历次土改斗争中都曾经出现过的“富农路线”②是一脉相承的。根本上还是地方干部和地下党人员的家庭出身、较高学历和成分所决定的。换言之，他们显然相信，所谓“地方主义”的问题，根本上还是一个阶级意识、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的问题。

由上可知，建国初期，中共通过军事占领的办法，以选派“南下干部”全面掌管新占领区党政军民大权的措施，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的接管，而且在中国前所未有地全面建构起一个由上至下的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这一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遍布广大新占领区，且处于各级权力中心地位的“南下干部”对中央政权的高度依赖，确立了中共中央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威权指挥地位。由前所述可知，此种体制的建构是以地方干部的权益及其地方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但注重于中央权力的中共中央很长时间显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恰恰相反，基于阶级斗争的理念及其经验，它在最初建政过程中，几乎不能不把所有不合乎中央意志与期待的行为，与阶级间的冲突与斗争联系起来。这种思维惯性及其由此造成的全面依靠外来干部的干部政策，显然是造成反“地方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原因。

① 松仔岭事件最为典型。郑鼎诺原为恩平县委书记，后经省委决定，让位给南下干部慕君。因慕自称扛大枪出身，作风粗鲁，本地干部颇多不满，慕自然归因于郑，对郑颇多猜忌与敌视。因郑出身地主家庭，领导土改又做法温和，更引起外来干部的阶级联想。1952 年初有人提起郑在位时参与处理过的一起农民杀人案件，认为公安局和法院经议决处决某杀人犯，有压制农民土改积极性之嫌。这时主持广东土改工作的陶铸马上指派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前往松仔岭彻查。这位北方干部走马观花，只用了 8 天时间，就按照陶铸想要的结果，草草得出结论，认定郑鼎诺与公安局长等地方干部同属地主恶霸集团，杀害农民凶犯实为阶级报复。结果恩平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均被迅速枪决，郑鼎诺等经其老上级力保，才没被处死，但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开除党籍和公职。

② “富农路线”，最早曾经是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批判本地干部包庇地主、富农做法的一个政治名词。以后在 1947 年华北地区土改运动过程中也被沿用来指责基层干部中的温和倾向。

当然，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共党史上的所谓“地方主义”者，其实多半也仍旧是阶级斗争论者。因为同样习惯于从阶级出身、阶级成分的角度看问题，即使在以后被打成“地方主义”者的人群当中，也同样难免会犯类似于反“地方主义”的错误。福建省 1948 年地下党整地下党，导致 117 名地下党干部被杀，1 276 名党员被除名的所谓“城工部事件”，就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①]后来被打成“地方主义”代表的琼崖纵队领导人，在 1949 年前后曾将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海口市学联打成“特务组织”，冤杀其中众多青年学生骨干，就是一例。据生还者事后回忆，造成这一滥杀惨剧的基本原因，就是长期在山林里活动，文化程度和出身较低的众多军人和干部，看不惯这些青年学生“骄傲自大”、“贬低领导威信”。加上这些学生往往出生于华侨家庭，或地主资本家家庭，就更容易受到怀疑与敌视。当 1949 年夏某女干部食物中毒突然身亡，琼崖纵队领导人马上就怀疑内部有人投毒。靠严刑逼供、诱供，他们最终把来到根据地里的学联成员统统打成了特务分子，除将 90 余青年学生全部关押刑讯以外，还将所谓主犯 20 余人集体处决。直至 1950 年代初，该组织及其被冤杀者，仍旧不能得到平反申冤。[②]

这一事件更足以说明，反地方主义事件的发生，根本上是一种中共党内固有阶级信任感的问题，而非真的与“地方”这两个字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①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五卷（9），第 518 页；文理：《城工部事件始末》，福建省情资料库网，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19^index=47^..

② 《“刀下留人”——幸存的烈士张光明和他的战友们的故事》，何燕凌等编著：《红岩儿女的罪与罚》，第 266~276 页。

从民办到党管：上海私营报业体制变革中的思想改造运动

——以文汇报为中心案例的考察

张济顺[①]

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中共新政权对包括文汇报在内的上海私营报业进行全面改造。思想改造运动则是其中重要的一环。经过1952年8月至12月的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上海私营报业实现了向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和民间报人从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私营报业从此在上海大众文化的民间领域中不复存在，党管报纸的报业国家化实现了关键的一步。

关键词： 上海私营报业　思想改造　文汇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年代里，中共新政权对上海大众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实行计划体制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帅地位是改造的两大目标。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关键，则是将大批文化市场的自由职业者纳入国家计划之下的单位，使之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办报出书，写戏演戏，拍片映片，从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螺丝钉"。[②]

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相同步、相纠缠、相交织的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计划文化体制改革只用了不到四年时间便摧枯拉朽般地取代了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但新政权对上海文化人的掌控却不像延安时期改造从上海投奔革

---

① 作者张济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机器中的螺丝钉'"。《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985页。

命的“亭子间文人”那样得心应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因袭了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传统，但战略考虑和策略选择上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上海文化消费领域里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人也不都是消极被动挨批，更不如通常理解的那样，都是违心的检查和服从，真诚的呼应和能动的抵制同样呈现在这一过程之中。

本文选取1949年至1953年上海私营报业改造为研究路径，以文汇报为核心案例，重点描述新政权与一群文化人建立新认同的复杂过程。试图透过文化体制急剧转型的表层，去揭示上海的文化人和知识者如何应对这场急风暴雨的变革，进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都市社会如何构建新的权力关系。①

扶助与控制：新格局中的旧报业

还在西柏坡谋划新中国大政方针之时，中共已经将建国后新闻事业的各项原则基本定夺。新闻事业的新格局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就其功能而言，则是执政党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新的报业格局是各级党委主管的党报为统领的国营报业体系。这一设计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即认为新闻事业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②与都市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品绝不能同日而语。形成这一格局虽然需要时日，需要部署，但从一开始中共就秉承“全党办报”之传统，紧紧抓住三大要素：自上而下的党管报纸的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党报及其权威地位的确立，民营报业的控制与改造，以此推动报业国营化、报纸政治化的进程。

严密的新闻管理机构和严格的新闻审查及纪律规定，是党管报纸的组织及制度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的新闻总署即成为掌管全

---

① 有关本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上海通史·当代文化》、《文汇报史略（1949.6 — 1966.5）》以及《徐铸成回忆录》等书中，有关1950年代私营报业生存状况的叙述，但与思想改造运动相关的问题，或没有提及，或语焉不详。有关1950年代上海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已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但目前问世的研究成果还不多。值得注意的一是姜进的《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另是周武的《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史林》2006年第6期），两文择取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上海大众文化的“改制”过程，但对此过程中人的改造问题，涉及不多。

②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八）》（以下简称《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65页。

国新闻事业的行政权威机构。但中共中央同时强调，政府文教委及其所属机构必须“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有关重大问题仍需按照此前相关的中央文件规定，“经过党的系统，向中央报告和请示”。① 自1948年7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每半年向中宣部“作一次系统的情况报告”的制度继续执行，其中之第一项报告内容便是“党的与非党的报纸种类、发行数，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数目”。②

关于新闻出版的审查和纪律，中共中央下达了明确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社论、涉及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编者按语及答读者问，“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各地新华社要求向全国广播的稿件，新华总社有“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③

党报建设迅速推进。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决定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系统，以此为全国报纸的示范和引领。1948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两次就党报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切实担负起领导党报的责任，确保党报“主要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的方向，并逐步积累“在城市办报的经验”。④

在建立国营报业的总目标牵引下，中共对民营报纸作了统筹考虑。总的指导原则是根据报纸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明确“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但要区别对待旧有报刊中“有反动的政治背景”的和“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既不能“毫无限制的放任”，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这个文件还点名上海申报、新闻报，是“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

①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党的文化教育工作问题的指示》，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66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选集》第17册，第204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选集》第17册，第202~203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1948年6月5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1948年8月15日；均见《选集》第17册，第202、312页。

治”的报纸，指示“应予没收”。[①]

遵照中央的部署和政策，人民解放军一进驻大上海，中共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就着手上海报业破旧立新的工作。

新闻出版的领导和组织机构从 1949 年 5 月底起相继建立。由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亲自挂帅的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新闻出版处负责接管新闻机构和报刊的登记工作。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责任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担负，两部分别设置的新闻出版处为职能部门，管理各报的编辑业务。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人民政府下设新闻出版处，行使对各报的经营管理权。1950 年六七月间，鉴于非公营报业的中共党员人数甚少，除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无法成立党支部，文汇报只有 1 名党员，连党小组都无法建立，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便根据党章规定，酝酿在“群众性的同业公会”——上海市新闻协会中建立党组，“指定在各报社担任负责工作、能起作用的党员”为其成员。7 月 19 日，新闻协会党组正式成立，由市委宣传部派出的及指定的各报 10 名党员组成，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社副社长陈虞孙为书记。[②] 这个党组在私营报业乃至上海新闻界的作用举足轻重。

上海党报备受重视。经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时代党中央机关报报名解放日报给予上海。1949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为解放日报社配备了强大的领导阵容，由中共党内的资深办报人范长江、恽逸群、魏克明、陈虞孙、陈祥生等组成社务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全盘接收了申报原有的场馆和设备，并沿袭了申报的管理制度。华东局还特设党报委员会，凸显党报地位，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③]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民国第一大报的硬件条件打底，解放日报一问世就显现出上海第一大报的势头。

在上海报业立新的同时，号称全国新闻中心的旧报业迅速瓦解。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报告显示，上海解放仅两月，实行军管和接管的“报馆通讯社 20 个”，“停止了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纸和过去作为反动喉舌的报纸，刊行了人民的报纸，实行了两家报纸的改组，扶助了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受压迫而停刊的进步报纸的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八）》第 17 册，第 465~467 页。

②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成立上海市新闻协会党组和各报社党组问题与有关单位往来文书，1950 年。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B36（上海市新闻协会党组档案），目录号 1，案卷号 2（以下略写：上档 B36-1-2）。

③ 华东局党报委员会由舒同、刘晓、魏文伯、夏衍、恽逸群五人组成，舒同为书记。见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091 页。

刊”。[1] 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官办以及官僚资本独资举办的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14家报刊被市军管会接管后停刊。官商合股的申报、新闻报被接管后，受到不同对待。前者彻底终结，以解放日报全新开始；后者改组为公私合营新闻日报，进入新的报业体系。43家中国人办的民营报纸按军管会要求前往登记，获准登记的只有14家，未获批准的或自行停业，或陆续由军管部门接管。外商外侨的报纸也先后退出上海。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大美晚报》因取敌视立场受到军管会警告于1951年先告停刊，其余外报也坚持未久，到1953年全部销声匿迹。[2]

在新旧报业的激烈变动中，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等几家上海民营大报以及亦报等几家民营小报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和空间。

从1948年到1949年，为筹备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中共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数百民主人士、知识精英和文化名人从香港启程，取道东北、华北、山东解放区到北平，与他们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著名的“知北游”。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新民报的赵超构等上海报界名流均受到邀请。1949年3至5月，徐铸成利用北上之机会，数次就文汇报回上海复刊一事与中共有关领导商议，[3]并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负责新闻出版接管工作的范长江明确首肯。大公、新民两报也获得建国后继续办报的指示。徐铸成与一部分上海知名报人得中共中央允诺，于5月初随人民解放军南下。行前，周恩来设宴为之饯行，给各报以很大鼓励。6月21日，文汇报在上海正式复刊。在此前后，大公报、新民报晚刊获准继续出刊。

上海民营大报的复刊或继续出刊，得到了新政权在物质上的大力支持，文汇报尤是。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空间狭小，是文汇报复刊的几大障碍。报社向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复刊求援立即得到应允，文管会指示其下属新闻出版处“给予纸张和印刷方面的资助”，后又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等，并协助解决房屋、机器等方面的困难”。[4]复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文汇报一直亏损经营，步履维艰，[5]人民政府批准文汇报向国外订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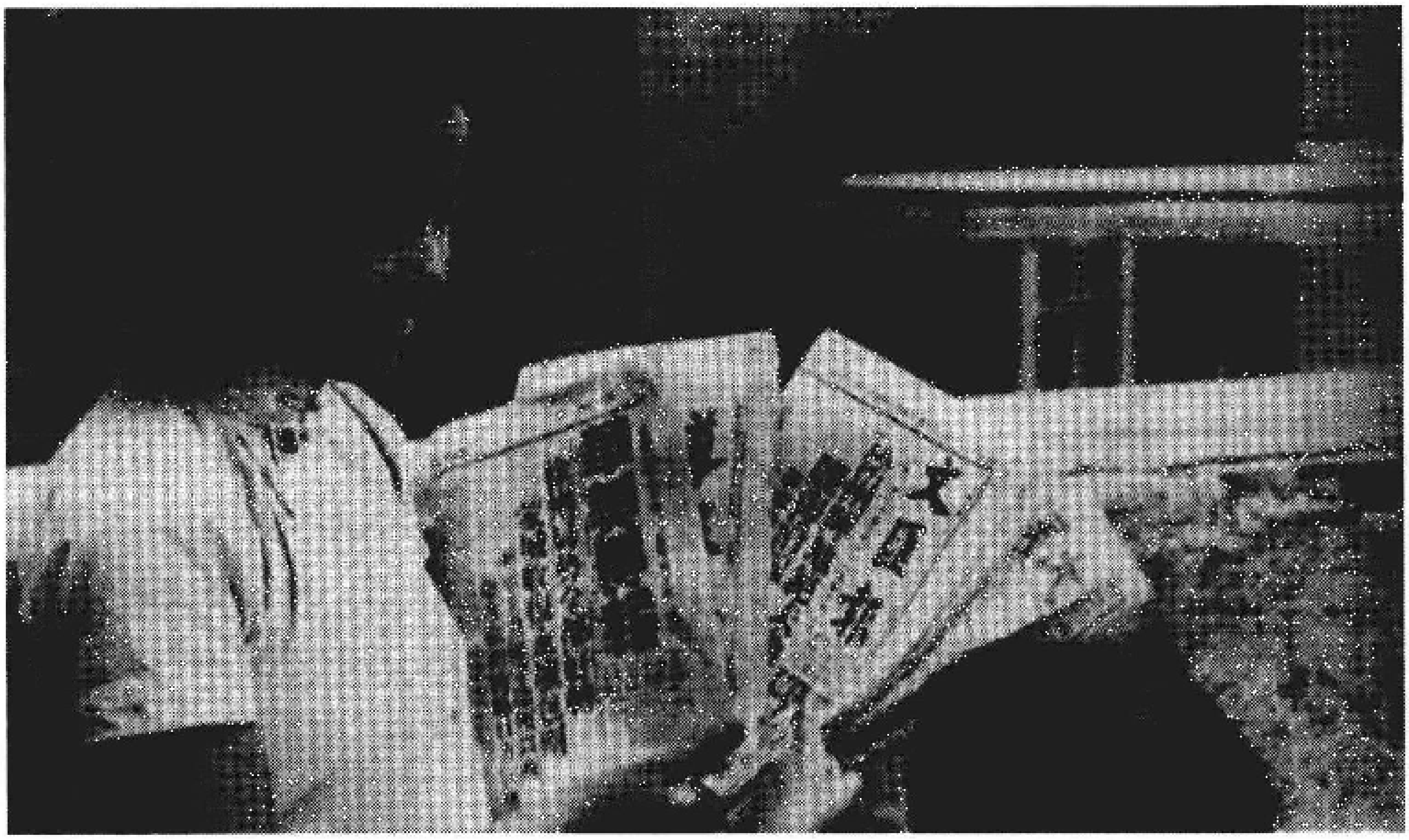
① 陈毅：《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工作的报告》，1949年8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149、153页。

② 熊月之主编，陈同等著：《上海通史·当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③ 1947年5月25日，因文汇报为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宣传造势，遭国民政府查封，被迫停刊。次年9月3日，香港文汇报创刊。

④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1949.6－1966.5）》，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⑤ 文汇报1949年5月26日至12月31日的损益状况统计显示，这一时段内，文汇报纯亏139 477万元。见上档G20（文汇报社档案）-1-8。



⊙ 1950年代初上海发行的《文汇报》等私营报纸

1000吨白报纸来周转资金，以出售进口纸购买国产纸赚取差价的方式，来维持报馆日常开支。[①]此间，文汇与大公等5家报社联名敦请享受优惠水电费、减免房捐、核减邮政运费以及免征营业税等项，市军管会均予一段时间内的准许，以救燃眉之急。[②]为缓解文汇报高达54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以上的亏损，华东新闻出版局、市新闻出版处与之签订协议，从1950年9月起至1951年2月，由政府拨给补助费人民币8亿元，并商请银行给予贷款10亿元。[③]

在扶助民营大报的同时，新执政者一刻也没有忘记行使对上海民营报纸的领导责任。而最为紧要的，便是民营报纸的准确定位定性和办报行为的纪律整饬。

遏制民营报纸的全国大报发展态势，形成综合性第一大报解放日报为统领的专业报纸分工合作的上海报业新格局，是领导者们用心用力最多的事。

1949年以后继续生存的文汇、大公、新民三家民营大报，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报界都曾名噪多时。它们的实力虽不及申报和新闻报，但就其在民间舆论界的影响以及大众传播的辐射力而论，都称得上全国性的大报。而在上海土生土长并一直沿

① 《文汇报史略（1949.6 － 1966.5）》，第7页。

② 《文汇报关于5报联名申请享受优惠水电费、减免房捐、核减邮政运费、卷筒纸管理措施的函及市府及有关部门的复函》，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上档G20-1-26；《文汇报社关于5报联名申请准予免征营业税的函、复函》，1949年8月至1950年4月，上档G20-1-27。

③ 《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新闻出版处与文汇报关于政府扶助事宜的协议》，1951年，上档G20-1-30。

用创刊报名至今的，文汇报是其中之唯一。[①]其主办人和经营者在民营报业中也颇为独特："它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它是由少数并无多少资财的中小职员偶然凑合兴办的"，自1938年创刊始，就以其鲜明的民间立场和抗日主张受到广泛欢迎，在孤岛上海"发行曾近六万，擢为上海各报的首次"。据总经理严宝礼聘请的汇丰银行总会计师查账所计，当时的营业情况表明，"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应升为720元"。[②]徐铸成曾说，文汇报是"异军苍头突起，蒸蒸日上"。[③]此话是毫不夸张的。1939年5月和1947年5月，文汇报先后遭日伪迫害和国民政府查封，两度停刊，它不但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在民间舆论界声名大振，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1956年10月，文汇报结束在京办教师报的短暂历史重返上海时，许多大学者、大名人、文汇报的老朋友，包括陈叔通、郭沫若、马叙伦、梅兰芳、老舍等，欣然命笔，祝贺第三次复刊。[④]这也佐证了文汇报挥之不去的历史性影响。

凭借如此的历史底蕴和社会声誉步入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文汇报自然不甘于局限在上海，成为一张地方报纸。还在复刊准备期间，徐铸成就"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以后至少全国有三个文汇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从复刊之时起，文汇报就决心要"代替大公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⑤] 大公报、新民报本来就是一报数地数版，[⑥]王芸生、赵超构更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然而，全国大报的憧憬很快变得迷茫。"知北游"途中，曾在文汇报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的宦乡对徐铸成耐心讲解党的新闻工作方针，对其大报计划婉言劝弃，使他意识到"这个计划不能实现"。[⑦]

民营报纸的定位很快被提到各级新闻领导机关掌门人的议事日程。1950年春

---

① 大公报于1902年6月在天津创刊。1936年4月，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创刊，其主要骨干从天津移师上海。1953年初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成为天津大公报，后迁北京，直至"文革"结束，只留香港大公报存在至今。新民报于1929年创办于南京。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出版新民报晚刊。1958年4月改为新民晚报。

②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0、283、288页。

③ 徐铸成：《报海旧闻》，第288页。

④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1949.6 － 1966.5)》，第4~7插页。

⑤ 《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分会办公室）编：《学习》第10号，1952年9月25日，上档A22（上海市委宣传部档案）-2-1550。

⑥ 大公报最盛时期，同时有重庆、上海、香港、天津四馆。新民报在抗战爆发后，从南京迁至重庆出版，后又增出成都版。抗战胜利后，以南京新民报为总社，又创办北平版和上海新民报晚刊，形成了五社八版的报业集团。

⑦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20页；《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10号，上档A22-2-1550。

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上海报业的各领导机关根据会议精神，研究各民营大报的分工问题，力图进一步转变各报根深蒂固的大报观念，定格在专业性的报纸上。拟议中的意见虽不一致，报纸调整方案也有几套，但相关领导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上海的报纸太多，群众不需要那么多种的报纸”；二是民营报纸须重新定位，“调整集中办好一两张报纸”。[①] 关于文汇报，也有过多种考虑，最终没有离开以教育界为对象的专业性报纸的定位，[②] 全国性综合大报的地位将成为昔日辉煌。

去掉民营帽子，换上私营帽子，是新闻领导者对民营报纸性质的重新认定。一字之差的改性既是民营报纸在报业新格局中准确定位的需要，也为民营报纸的改造敷设前提和依据，新执政者对此毫不含糊。复刊第一天的文汇报就刊登了相关消息，在市军管会文教管理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文管会副主任范长江明确阐述：“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有些私营的文化出版事业中，是曾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人民的，是应当称为‘民’营，或属于‘民间’的，但在人民政权下，政权的本身是代表人民的，这里只有公营和私营之分，不再是‘官方’与‘民间’的区别”。[③]由民改私的性质认定，不仅动摇了文汇报“人民报纸”的自我认同，强化了它的资本和阶级属性，而且预示着作为国家文化权力的公营报纸将在上海舆论空间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私营报纸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早地脱掉“资帽”，加入公营的行列。

用党的新闻纪律和规范约束私营报业，破除抢新闻、抢市场、争独家、自主办报、张扬个性等在旧报业内通行无阻的行规和理念，也是新执政者一开始就十分关注的问题。

上海市军管会不仅要求各报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下达的新闻审查的各项纪律和操作规范，而且对私营报纸的纪律要求进一步加码，规定“对于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重大的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中共及政府的法令政策”。[④] 私营报纸稍一不慎，就会受到批评。徐铸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举例说：“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

①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② 《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几张私营报纸整顿的情况报告》，1952年7月1日，上档A22-1-47。

③ 《文汇报》1949年6月21日。

④ 王中：《上海解放初期接管新闻机构的情况》，《上海解放35周年》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3页；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17页，均转引自《文汇报史略》，第22页。

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①

新闻总署对上海民营报纸的监控也十分到位，向上的请示报告制度很快就建立起来。1950年6月，文汇报等接到胡乔木署长函示，要求各报社长、总编辑自6月份起，“于每月初旬向本署作上一个月报纸工作情况和问题的简要报告。在6月初旬的报告应以‘改进报纸工作决定’的执行情况为主要题目之一。务希准时交到”。②9月，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又要求文汇报编辑部自当月起，“将工作报告分寄新闻总署、华东新闻出版局及本处”，并将8月报告退回按新要求重寄。③

经过定位、改性和纪律整饬，党管报纸的上海报业新格局已见雏形。但这只完成了制度变革的第一步，还未触动私营报业的所有制，也未从根本改变上海报纸的市场消费主导的权力结构，更未触及私营报业从业者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的王国”。④随着新政权和私营报业共处关系日久，人的改造问题日显紧迫。

危机与契机：迟疑的决策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因解放日报等公营报纸已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而“毋须参加”，故参加者仅限于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亦报五个单位的编辑、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共566人，其中编辑部门人员356人。⑤除公私合营的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为私营报纸。可以说，这就是一次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运动。

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在整个运动进入尾声时开始的。1951年9月，京、津两地高校首先启动了教育界思想改造运动。11月，经毛泽东亲拟批语，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的报告。⑥次年9月，文艺界

① 《徐铸成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0页。
②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致文汇报社函》，1950年5月20日，上档G20-1-17。
③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致文汇报编辑部》，1950年9月15日，上档G20-1-17。
④ 毛泽东曾批评延安的知识分子立场还未转变，“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第977页。
⑤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⑥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2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各校教師學習第一階段大致結束

⊙ 1951年10月25日，教育部发出通报，介绍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学习情况和初步经验。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此后，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

整风告结束，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总结报告，历数整风成绩种种。[①]10月17日，政务院第155次会议听取了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全国各级学校教师思想改造报告，紧接着，“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改造全部胜利完成”的消息见诸报端。[②]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推论，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可以按部就班、援引先例，顺理成章地启动了。运动的领导者确实做了这样的设想：拟“参照教育界的思想改造与文艺界的文艺整风的办法”，进行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③]然具体的历史情境并不如此，上海私营报业的思想改造面临着一些特有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运动的发动者慎重考量。

上海私营报业思想改造的直接导因，是上海各报的调整和分工问题。中共新政权一直将建立解放日报引领下的各专业报纸分工合作的新格局，视为实现党对私营报纸领导的关键之举，并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的直接目标、口径分寸、启动时机等一系列重要决策密切关联。

正如上文论及，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前两年，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就在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对此十分重视，曾与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当面交换意见，上海方面也多次向他作书面汇报。

然而，此项工作的进展并不理想。领导机关虽一致认为此举“从领导新闻工作方面来说非常必要”，但对调整的方案意见不一，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定夺。[④]关于调整工作的时机如何把握，领导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究其原因，除了私营报纸“旧的办报思想”作祟外，[⑤]上海各报的业务经营困境也是当政者不能不权衡再三的因素。

① 沈雁冰：《三年来的文化艺术工作》，《文汇报》1952年9月26日。

② 《文汇报》1952年10月20、21日。

③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④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⑤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据1951年9~12月的统计，私营的文汇、大公、新民3报均有亏损，“发行既无起色，广告又每况愈下，更严重地威胁了自给自足的方针”。①文汇报的经营危机更为严重，1952年5月的统计显示，文汇报“每月亏耗在2亿元以上”，估计“两三个月后也要搁浅”。7月，该报致函解放日报称，其两年前所借的24.5亿元人民币，还欠1.4497亿元尚未还清，要求解放日报理解其“资金短拙暂仍无法归还”的困难。②如此小数的借款尚无力还清，足见文汇报当时的窘境。

对于在经营危机之下能否进行私营报纸的分工调整问题，上海新闻工作的几位领导人意见相左。1951年秋冬之交，夏衍等认为到了“下决心，用大力来调整”的时候了，否则“结果亏累不堪，增加我们的包袱”。③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长陈虞孙等则顾虑此时“总销数没有很大发展，遽尔分工以后，可能使销数反减”，主张观察一段时间再行决定。④

领导层的意见虽不一致，但都觉察到了私营报业经营危机背后上海文化市场所起的负面作用。面对持续多时的亏损，私营报业一面在新政府的继续补助上打主意，一面还是从市场上动脑筋，争份额，这样既形成对政府的压力，又使得大报意识重新抬头，自由主义办报作风再度兴盛。这种状况令新闻管理部门的领导十分焦急，他们向上级报告说：“过去虽一再强调分工，但实际上分工很不容易明确。更由于发行情况不佳，各报为了争取读者，不能不使内容‘应有尽有’，因而更使各报内容交叉重复，与分工的方针背道而驰”。因为亏损，各报“都在广告上打主意，不断组织所谓‘专业广告’，动辄牺牲新闻与副刊篇幅，刊出整版广告，而且在第三、四版等重要地位，简直是为广告办报，不成其为应该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报纸了。这并不表示其业务经营上的发展，恰恰暴露了其在业务上的狼狈状态”。⑤

既然市场竞争助长了私营报业的旧思想、旧作风，阻碍了报纸分工调整的推进，干扰了党对私营报纸的领导，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应当是进行私营改公营的体制变革。领导们理应迅即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进而成为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但他们并没有如此决策。

①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②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文汇报经理部函致解放日报所借资金无法归还由》，1952年7月16日，上档A73（解放日报社档案）-1-113。
③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④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⑤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消费大众的选择是决策者必须顾及的重要现实。中共执政后，尽管迅速摧毁了国民党官办和外人经营的报业市场，但不可能同样迅速地取消上海大众消费文化市场。即使党管报纸的新报业格局初步形成，市场的拉动作用仍然十分强大，无论是党报、公营报还是私营报，都难以摆脱消费大众的市场考验。解放日报创刊后7个月，计亏损23~24亿，导致亏损的原因，一为政治考虑，照顾其直接订户中90%的工人、学生享受优待折扣；二是市场考虑，要压低价格与新闻日报、大公报竞争。①党报虽然有强大的权力后盾，1952年发行情况大有好转，到5月底日销量已稳居各报第一，②但上海市民的多元选择依然要求报纸的多样化。正如新闻界几位上级领导人意识到的：上海“没有达到大家都只以看党报为满足的程度”，“解放日报面对整个华东又要具体照顾上海这个大城市中的异常复杂的业务，亦有许多困难”，“需要有一张强有力的比党报更灵活一些的教育上海人民的报纸”。③因此，几家私营报纸或合并、或重组、或北迁的种种方案应运而生。而各种方案的核心意图都在于：既不能让私营报纸完全脱离市场，变为公营，又不能任其随市场摆布，迁就“落后群众”。

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新闻工作的领导们也一致认为，对于私营报业的亏损“公家万难无止境地补贴维持”。即使是政府为促进各报分工提供“适当的援助”，也“不能用于消极性的弥补亏损”。④ 也就是说，至少到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前夕，政府是不考虑将这些处在亏损中的私营报纸变为公营的。事实也是如此。上海解放之初政府给予私营报业的优惠政策并未维持多久。从1950年元月起，市政府先前给予文汇、新民、大公等五家大报的水电费八折优惠，经公用事业局审核后不再继续；4月，财政部又驳回上述五报免征营业税的请求。⑤尽管文汇报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胜于其他私营报纸，但政府在给予补助的同时，要求其承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在1951年2月底以前，做到自给自足”。⑥补贴和优惠政策的逐步收

① 《解放日报1949年工作总结报告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草案）》，上档A73-1-3。

② 1952年5月29日，解放日报销量达154415份，占全市报纸当日销量的近30%，比第二位的新闻日报高出55000多份。见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③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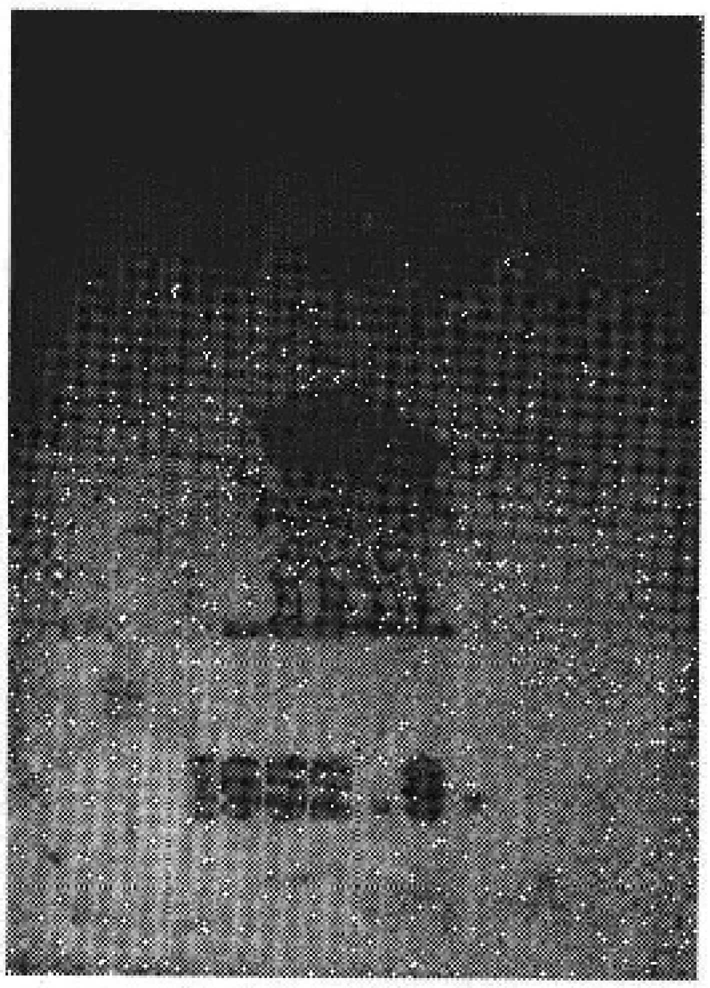
④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年1月4日，上档A22-1-20；陈虞孙致市委宣传部：《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⑤ 《上海市人民政府函致文汇、大公等报社不再继续优惠水电费由》，1950年1月11日，上档G20-1-26；《财政部长薄一波等函复报业不免营业税由》，1950年4月5日，上档G20-1-27。

⑥ 《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新闻出版处与文汇报关于政府扶助文汇报事宜达成的协议》，上档G20-1-30。

缩表明了党和政府在体制问题上的审慎态度。

改制虽然缓行，改人却日益紧迫。执政者可以对私营报纸的经济亏损不予援助，却不能对其政治表现置之不理。1951年10月，夏衍和姚溱①不无忧虑地向胡乔木报告："工作日益深入复杂，三张报纸（指文汇、大公、新民——笔者注）的编辑部都没有力量单独应付这个局面。最近报上泄露机密事件层出不穷，生产虽成中心，而大公报公然说'与报纸无关'，文汇报的编辑负责人甚至连郝建秀工作法这样常识的东西也一无所知"。②领导们感到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中共在私营报业内力量薄弱，"领导不够有力"。文汇、大公、新民三家私营报社各有两名共产党员，加上新闻日报13名党员，不过19人，且"能真正起领导作用的党员不过一两个，有的党员竟跟在民主人士后面向党'要求'、'竞争'"。而各私营报的大部分人是"从解放以前原封不动继续下来的"，"不仅情况复杂，而且都保持了过去一套旧的办报思想与作风"。③有鉴于此，夏衍等急切吁请："就我们对私营报纸的领导上来说，也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否则"一定会出乱子的"，故望从速指示，"以便我们提出最后方案，请华东局与中央宣传部最后决定"。④


⊙ 1952年《文汇报》合订本

与此同时，私营报业出现了若干有利于执政者决策的好兆头。先是私营报的几位头面人物对调整工作的看法有了转变，不再认为"调整就是'涸辙之鲋，相忘于江湖'、'与共产党共患难易'"，⑤尔后是各报销量从低谷中走出，经营困境出现了转机。1952年春，全市报纸总销数从3月4日最低的日销量35.7万余份，增加到5月29日的47万余份，并有"继续增加之势"。⑥

最好的兆头还是来自文汇报。在各报经营走

① 姚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②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③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1189号，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④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⑤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⑥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出低谷之时，文汇报不但销量上升的幅度居私营报纸之首，“致新闻、大公、新民等报不得不考虑其工作方针”，而且让领导们从中总结出两条“成功经验”：其一，“放下‘全国性’的大报架子，明确地以教育界（中小学教师，乡村教师、职工教师、中学生以及一部分大学生与职业青年）为对象；小型；通俗化”。其二，“加强报纸的群众工作”。①在领导们看来，这些变化和转机，都是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办报人和读者的觉悟所致。因而，通过思想改造来实现报纸分工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其实，在这些变化和转机后面，还潜藏着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私营报纸的经营危机也还没有根本度过。然而，对于持续两年多未能将分工调整做到位的上海新闻工作领导机关来说，这些变化足以为决策提供一个契机。195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新协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经市委宣传部批示呈送华东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其中对各私营报纸和新闻日报的分工作了规定，并提出：“为了使各报在‘三反’‘五反’后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各得其所，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各发挥其战斗力量”，拟从 6 月份起在私营及公私合营各报“进行一次思想改造，并经过这一运动来进一步明确分工，改进工作”。②数日后，市委宣传部正式向上级递交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

经过两年多的反复酝酿，上海新闻工作的领导机关将不改变所有制前提下实现私营报纸的分工作为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启动了上海私营报业的人的改造。

矛盾与悖论：报人们的最初反响

上海私营报界的报人们对思想改造并不陌生。且不论他们早就不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旁观者，就思想改造运动而言，这是毛泽东早在 1949 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提出，并在 1951 年 10 月的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宣布与抗美援朝、爱国增产节约同步进行的“三大任务”之一，上海所有报纸对此有大量报导，部分编辑记者还参加过文艺整风、五反运动及学校思想改造，对此耳熟能详，有相当的心理和思

①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 年 5 月 29 日，上档 A22-1-47。

② 报告提出：新闻日报的读者对象应以工商界、高级职员与广大店员为主，多登本市新闻。大公报在国内以大资产阶级与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并应多登国际新闻。新民报以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为主要对象，多登文娱消息。文汇报以教育界为主要对象（具体的文中已引）。见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 年 5 月 29 日，上档 A22-1-47。

想准备。尽管如此，上海私营报业的报人们还是对思想改造态度不一，反响各异，有着许多不同声音。文汇报当然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文汇报一直面向知识分子读者，虽然被新政权确定为以教育界为主要对象的专业性报纸，但终究没有离开知识界这个读者圈子。所以，“配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出版一个专搞思想改造与学习的《文汇》周刊”，曾经是拟议中的报纸调整方案之一。[①]此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文汇报多多承担思想改造的报导任务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从 1951 年 9 月京津地区高校思想改造运动起到 1952 年底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告结束，在文汇报刊出的有关思想改造运动的各类报导、专题文章计 767 篇，[②]新闻强度和密度前所未有。可以说，文汇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发挥了党所期待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自身进入改造后理应表现上乘。但报道别人如何检查如何改造是一回事，轮到自己就是另一回事了。运动开始两周后，各报联络员向上级报告学习情况，反映文汇报还是“较混乱”，“小组汇报空洞，只是双手拥护，联系学习态度就联系念小学时的学习态度，连姓名都不敢讲”，“学习文件很不耐烦，觉得都懂了”。[③]文教组认为“教育界文艺界整风都参加过，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几千字的学习心得也写得出来，为什么要像小学生一样拿起文件读上 2 小时”。还有人以当时正大力宣传推广的苏联产妇“无痛分娩法”作喻，调侃说思想改造是不是可以“发明一种‘无痛改造法’？”[④]

文汇报后来在总结回顾时坦言：在运动初期，“有不少同志存在着各种不正确的看法，挨整、整人、陪整和过关等等错误的思想很普遍。有些同志恐惧，有些同志轻松”。[⑤]正如新协党组书记、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处长陈虞孙刻画的那样：“我们新闻界一般来说在思想上有一定认识，在文艺整风中受过鞭，在三反五反中打过滚，在教育界思想改造中熟悉行情，每个人都有一套”。[⑥]

上述种种言论和表现其实是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之初来自基层的难以避免的普遍反应，教育界、文艺界莫不如此。更多的意见和情绪反应则聚焦在私营报业自身特有的问题上，因为这与每一个被改造者休戚相关。

---

① 夏衍、恽逸群、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2 年 1 月 4 日，上档 A22-1-20。
② 从文汇报图文光盘检索而得。
③ 《联络员汇报记录》，1952 年 8 月 26~30 日，上档 A22-2-1539。
④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7）· 对思想改造的看法与学习态度、方法》，1952 年 8 月 30 日，上档 A22-2-1539。
⑤ 《文汇报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学习》第 13 号，1952 年 10 月 8 日，上档 A22-2-1550。
⑥ 《学习分会支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52 年 8 月 30 日，上档 A22-2-1539。

首要的问题还是由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而引发。根据预定的思想改造学习计划并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到任不久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其中特别对报界思想改造的根本任务和直接目标作了如下的阐述：这次运动的根本任务是要使我们的报纸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旗手”，“劳动人民利益的表达者和争取人民民主事业彻底胜利的不倦战士”，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根本任务的前提下，各报纸根据其具体条件可以而且必需（原文如此，下同——作者注）分工，可以而且必须分别联系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阶级、阶层的人民群众；可以而且必需在内容与形式上多种多样而不千篇一律，甚至在企业经营的性质上，也可以有私营、公私合营或公营等等的不同”。但是，不论企业为何种性质，它的经营管理“都必须按照共同纲领所规定，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报告强调，思想改造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展开的以肃清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为中心内容的“批评和自我批评”。① 谷牧的这段话把领导层酝酿了两年多的思想改造的直接目标公布于众，具有“定调子”的意义，即：思想改造既不是为私营报业摘掉私营帽子，又必须改变其私营的头脑，简言之，换脑不换帽。

然而，在报人们看来，这个要求是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围绕“资产阶级为什么办报”、“如何看待私营报纸的服务对象”两个核心问题，一系列相关的诘问、困惑甚至是牢骚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运动的领导者那里。最有代表性的一说是：“私营报业的资本家拿钱办报，请我们去宣传工人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不是天下最笨的资本家么？出了钱请人打自己的耳光”。另一说是：“私营报纸能否宣传马列主义？既宣传马列主义为什么要私营报？”再一说是：“我们报纸的对象是小市民，或者是教师，他们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我们为他们服务，算不算为工农兵服务呢？”② 有些人甚至抱怨说，解放三年来，私营报业“错就错在服务对象上”。③

问题的症结很清楚：顶着私营帽子的报纸，又被框定了带着小资产阶级帽子的读者对象，怎么可能换上报告所要求的工人阶级的头脑呢？然这一切不都来自于上级领导吗？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症结在提起各报分工问题时业已存在，但谷牧

① 谷牧：《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草稿）》，1952 年 8 月，上档 A22-1-47。

②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 年 8 月 23 日，上档 A22-2-1551；《党内的以及初步转向党外后的一些反映（供陈虞孙同志作报告时参考）》，1952 年 8 月，上档 A22-2-1539。

③ 《党组会议记录》，1952 年 8 月 29 日，上档 A22-2-1539。

的动员报告还是没有达到释疑解惑的效果。各报群众对报告“普遍存在轻视思想”，“积极分子”的听后感是“有和平土改的味道”，“报告太客气，搞得不疼”，“报告帮助不大，没有一定要激起思想改造的要求”；“思想落后的”听了报告“松了一口气”，“觉得好像不是痛整一番”。①这些感想很能代表许多人对动员报告的误读。

由困惑和不解引发的对私营报业前途的担忧和苦闷，弥漫在各报的党员和群众中。业内的中共党员几乎都对领导机关保留私营报业的目的和方针大惑不解。几位党员批评上级领导部门“办私营报的方针有问题，采取了私营路线，把报交给民主人士去办”，“对私营报不看作人民的报纸，而看作私营企业”，“向来不关心”。②有的党员在党支部讨论时说得更为尖锐：“领导上将私营报纸当作花瓶，用来点缀点缀。一般机关原来把民主人士当花瓶，民主人士办的报纸自然也是花瓶”。③他们甚至怀疑说，既然领导上一再强调“上海报纸太多了”，那么把党员放在私营报业到底是想“把报纸搞好还是搞垮”，或者仅仅是“为了敷衍民主人士”？最积极的想法也只是自我解嘲：私营报纸的对象是“落后群众，小市民群”，可能“因为上海的落后群众多些”，才需要“我们教育他们进步”，“替解放日报培养读者”，等到他们进步了，“变成解放日报的读者”，“我们的任务尽到就可以关门了”。④

低落的情绪却带来了一个亢奋的呼声：早日改为公营。这成了运动初期私营报界上上下下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多种多样的动机也一起摆上桌面：共产党员和“要求进步者”本来就不屑与私营为伍，但还没有找到机会“另谋高就”；一部分“能力较差”的群众担心私营报纸难以维持，会“敲碎饭碗”，“被迫转业”。因此，这两种相反取向的动机殊途同归：“都希望报纸改为公营”。⑤

而相当一部分报人表达出摆脱私营报业窘境的强烈愿望。经营困境引起的思想波动自不待说，私营报的政治待遇更使报人们感到痛苦。在上海报业的新格局中，解放日报作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享有分级别列席华东局书记办公会、上海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各委员会及行政会议的特权，许多官方文件、资料也直接送

---

①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6）· 对谷、姚部长报告的反映》1952年8月28日，上档A22-2-1551。

②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 对私营报纸的性质与方针的意见》，1952年8月7日。A22-2-1551。

③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1952年8月7日，上档A22-2-1551。

④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年8月23日，上档A22-2-1551。

⑤ 分会办公室编：《上海各报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新闻界党员学习期内的初步反映）》，1952年8月23日，上档A22-2-1551。

达报社。他们的记者更是以“无冕之王”的架势在各种场合通行无阻。[①]与党报的信息权威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私营报纸不但没有这些特权，而且受到新闻纪律的约束和党政机关、国营单位的歧视和冷遇，政治劣势地位时时显现。《文汇报史略》记载：“党报记者与非党报记者是在很不平等的条件下竞争的。有时各报记者同赴一个单位采访，党报个别记者常常取走所有数据和材料，有次一位女记者为此回报社大哭一场”。[②]与党报政治待遇的反差促使私营报界一部分人一面对党报“牢骚很多”，对其享受的特殊权力“普遍不满”，一面却肯定私营报“迟早总是党报或公私合营报纸”。[③]他们寄希望于通过思想改造实现改制，进而获得与党报或公营报同等的权力和待遇。

在关注私营报业前途和自身出路的同时，各报社头面人物的一举一动也是运动初期上下注目的一个聚焦点。这不仅因为头面人物的表现往往对运动进展和结果举足轻重，更重要的，是他们被运动的领导机关赋予了特殊的角色。

思想改造运动的一般原则，是“先领导，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党内严，党外宽”。[④]教育界、文艺界的领导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⑤]这一原则不难体现，而进入运动的上海各报主要负责人，全部为中共党外人士，先后顺序和宽严尺度就难以按上述原则操作了。因此，除了各报的中共党员在运动前“先行一步”进行了四十天的集中整风外，运动的领导机关作出了一个既不违反原则，又顾及私营报业特殊性的安排。市委宣传部一方面将各报负责编辑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全部安排进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指定王芸生、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分别为各报学习支会的主持人，赋予他们领导实施思想改造学习计划的重要责任，“一切工作部署均由分会与支会讨论决定”，同时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学习”，与共产党干部一起“在本报的一定范围内作检查报告”；[⑥]另一方面，在学习动员前，下达了“这次思想改造不同于三反，不是首长带头，层层下水”的精神。[⑦]内定的政策

① 《文汇报史略》，第21~22页；《市府关于记者列席市府各种会议范围给解放日报社的通知》，1951年9月21日，上档A73-1-61。

② 《文汇报史略》，第22页。

③ 邹凡扬：《新闻日报编辑部人员3年来情况与问题》，1952年7月5日，上档A22-2-1532。

④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⑤ 参加整风学习的上海文艺工作者共1 343人，其中包括共产党员215人，多数为各单位的领导。见《文汇报》1952年6月13日。

⑥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⑦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7）》，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更为宽松，市委宣传部上报的学习计划中提出对各报负责人中的民主人士“应坚决保护过关”，“应保证没有通不过的检讨”。[①]

这样的安排和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这些民主人士扮演起矛盾的双重角色，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由此造成了各报干群关系、党内外关系一度紧张，双方只盯住对方，相互较劲。

各报负责人对于他们的“教练员”身份格外重视，同时对“这次不是领导带头”的精神特别入耳。文汇报反映：徐铸成“一直以领导者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听到思想改造不是领导带头后，比较麻痹”，“一直不能真正带起头来”。[②]徐本人也承认“开始时我也有些轻松，后又为带头而带头”。在文汇报学习支会上，徐铸成将上级所提“学习生产两不误”的口号解读为“学习、生产对半开”，“屁股坐在整风上，眼睛看着生产”，还提出“9月份是旺季，强调生产”。文汇报的中共党员一时无法应对，只能向新协党组报告说：对徐铸成“我们摸他不透，不知（他）有无自觉性”，“如何促使他们检查没办法”。[③]

群众的反响却十分强烈，议论纷纷。新闻界学习分会和各报支会联席会议分析运动开始后存在的问题时，最为集中的问题之一便是“这次运动与文艺界、教育界之间有何不同？为什么不（是）领导带头？”虽然在讨论中有人给予有力解释，“但有些人认为还是不能解决，因为大家对领导有很多意见。有些人说我们对领导要求高，希望领导检查，启发大家”。[④]文汇报的小组讨论中不但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一个带讥讽的解释：“文艺界的领导都是党员，而且报刊上曾一再对他们提出批评，新闻界的领导水平低，和大家差不多，检查不出什么来，带不带头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⑤]领导既不能带头检查，群众自然消极观望，有些人认为这次运动“要求太低，不及‘三反’有劲”，也“不如整风、五反那样‘过瘾’”。甚至连青年团员也抱此态度，认为思想改造应该“整的是那些元老”，我们“搞新闻

---

①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 A22-1-47。

②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8）·领导学习的方法，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问题》，1952年8月30日，上档 A22-2-1539。

③ 《市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 A22-2-1539；《1952年思想改造文汇报学习支会会议记录》，1952年8月25日，上档 G20-1-42。

④ 《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支会联席会议记录》，1952年8月30日，上档 A22-2-1539。

⑤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9）·对思想改造的看法和学习态度》，1952年9月2日，上档 A22-2-1539。

工作时间短，手面干净，没啥可批判”。[①]运动开始两周后，陈虞孙在听取各报学习情况的汇报后仍然批评文汇报“教条式的汇报，证明群众没有真正地动起来”。[②]

尽管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在矛盾和悖论中走过了最初的学习阶段，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和基层众生有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表现，但是，领导者们依然认为运动“情况很正常”，并会沿着预设的轨道进展。[③]因为由上海新闻工作的各级领导机关组成的政治网络，既牢牢地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又及时了解基层的各种动向，将所有的被改造者无一例外地拢在其中。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本来就是“党管报纸”的领导机关，当然在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中负有领导责任，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夏衍，上海市委宣传部正、副部长谷牧、姚溱为领导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改造的计划及主要政策、动员与总结报告、进展情况的分析及对策等重大问题，或由他们亲自指示，或由他们亲临现场，都一一抓实。这两个领导机关还要随时将运动情况报告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和新闻总署，并通过他们“向毛主席汇报”。[④]掌控运动中各报社第一手情况的是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和各支会分别下设的办公室，这两个临时性组织虽然是办公机构，但与分会、支会明显不同的是，办公室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组成，陈虞孙任分会办公室主任，支会办公室也都由各报的中共党员担纲。分会办公室专门汇编了一张名为《学习》的内部小报，下发至各学习小组传阅，定期回收。新协党组也随时召集各报社的中共党员研究运动中的各种动向。分会与各报社支会以及各支会之间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各报社还设有联络员，随时向各种会议报告最新的运动情况。

在如此严密的组织系统的高速运作之下，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动员阶段的各种不同声音迅速沉寂，运动的激进者开始活跃。当学习动员阶段接近尾声时，运动开始时仅限于“检查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要求，被群众大揭发的激情所突破，“极其自然地扩大深入，去检查一切非工人阶级的错误思想与作风”，直至每个人“全面检查与交代”。[⑤]享有“特殊待遇”的私营报界的头面人物，虽然被赋予“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但也一样受到这个权力网络的制约。随着运动的

①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8）》，1952年8月30日，上档A22-2-1539。

② 《联络员汇报记录》，1952年8月26~30日，上档A22-2-1539。

③ 《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思想改造文汇报学习支会第4次会议记录》，1952年8月25日，上档G20-1-42。

④ 《新闻协会党组会议记录》，1952年8月29日，上档A22-2-1539。

⑤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推进，“裁判员”的身份迅速淡出。

被迫与自觉：运动中的徐铸成与严宝礼

1952年8月底至9月初，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进入自我检查和揭发批判阶段。领导机关发现几位头面人物开始放下“领导架子”，主动联系思想，进行自我批判，真正进入运动状态。

在文汇报上报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办公室的情况汇报中，认为总主笔徐铸成的态度转变是“突破”性的：“他的表现较好，自己批判说：‘过去我是站在新社会的外边的。’同时检查了个人学习上的教条主义，小组空气也因之转变”。[①] 文汇报学习支会记录了徐铸成对自己学习态度的反思：“思想改造有没有痛苦，这两天有时觉得轻松，有时觉得沉重，是否在学习程度上有缺点？”[②] 新闻界学习分会和各报支会的联席会议记录也显示，徐铸成和其他私营报的总主笔就“领导起示范作用的问题，都表示了态度”。[③]

由学习态度的反思进到严厉的揭发与自我批判，徐铸成先后在学习支会、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大会上检讨。9月24日，供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所有学习小组传阅的内部小报《学习》第9号摘要发表了徐铸成的长篇思想检查，围绕着批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这个主题，他历数了自己在“办报方针路线”、“对待干部的政策”两方面所犯的“异常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错误”，并剖析了“错误的思想根源”。[④]

徐铸成的检查获得了文汇报群众的基本认可。大家认为“总的说来，徐的检查是真诚的，还比较完整、全面、深刻，而在检查精神上，亦不是全包下来的态度。”大多数人还十分肯定徐铸成的进步，认为“以过去的情形来看，今天能作这样的检查，是很不容易，是放下架子面子的，经过了激烈思想斗争的”。文汇报向上级的报告中，也充分反映了徐铸成转变后的示范作用：“在大会上作检查后，表现出轻松与开朗，他利用深夜等大量的空隙对大部分同志进行帮助，要他们别抓住过去进步的一点不放，须首先否定自己，找最痛之处挖下去，他在第一组起了很大作

①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9）》，1952年9月2日，上档A22-2-1539。
② 《1952年思想改造文汇报学习支会第4次会议记录》，1952年8月25日，上档G20-1-42。
③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9）》，1952年9月2日，上档A22-2-1539。
④ 上档A22-2-1550。

用”。[1]当然，还是有不少人指出了徐的检查中若干“不够”、“不深刻”之处。[2]

从8月11日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正式启动，到9月下旬各报社总编辑的检查相继通过，不过短短一个半月。徐铸成从蹩脚的“裁判员”变成了示范的“运动员”，其变化之速似难以令人置信：角色的迅速转换如何可能，态度的转变是否可信？

作为建国初期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之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具有一般政治运动的特征，即根据发动者预定的计划在特定的时间内形成政治高压的环境与氛围。上海新闻界运动的领导机关虽然在策略上和方式上充分考虑到私营报业的特殊性，但是运动进展到普遍揭发阶段，群众性的相互揭发检举还是将运动推向了政治高压的环境之中。《学习》第2~8号连续刊登编者的评论或短论，号召“消除顾虑，无情揭发，深刻批判”，赞扬“普遍揭发热烈展开”，运动“形成了新高涨”。在“揭发通讯”的专栏下，每期《学习》都刊出各报检举的大量事例，诸如，“把人民日报头条新闻照抄一番，发成本报专电”的“盗窃性行为”；“组织整版广告，还奉送宣传文字，内容不惜违反政策，甚至泄露机密，以迁就私商”；“搞廉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刊登“乱捧旧艺人的黄色内容”；“争着采访封闭妓院，动机不纯”等等，所登揭发事例森罗万象，具体而微。[3]《学习》甚至连续两期刊登一篇题为“电车里面养下双胞胎”报道的批判文章，[4]指责由于记者的不良动机，原本应该体现“新社会新道德”和宣传“无痛分娩法”的报导，写成了“旧社会封建剥削阶级所‘欣赏’的‘磨坊产子’、‘雪地产子’那样的戏剧性的故事。并未想到剥削者所‘欣赏’的事情，正是劳动人民最感狼狈和痛苦的遭遇”。[5]文汇报揭发的五花八门的事例当然也罗列其中。

在大揭发的紧张氛围中，上上下下聚焦的徐铸成和其他几位头面人物是不可能不来一番转变的。

如果通读徐铸成、王芸生、赵超构的检查，不难发现他们在检讨“资产阶级办

---

①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1）·各报民主人士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的表现》，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

②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18）·对各报领导同志检查报告的反映》，1952年9月25日，上档A22-2-1551。

③ 上档A22-2-1550。

④ 《新民报》1952年8月4日。

⑤ 《〈电车里养下双胞胎〉的写作动机和效果》、《也来批判〈电车里养小囡〉的写作动机》，《学习》第5、6号，1952年9月14、16日，上档A22-2-1550。

报思想”方面，只有具体内容的不同，而无思路和认识程度的区别，话语框架也完全一致。诸如“把报纸当商品，把读者当顾客”的“资产阶级经营思想”，“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追求版面的形式主义”，“标榜新闻独立”、“超阶级”、“超政治”的“自由主义”等等，跃然于他们的检查中。关于错误的思想根源的分析，也不外乎旧社会和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带来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检讨自己“背着进步的历史包袱”。①显然，这些格式化的检查达到了思想改造预定的要求，既便于上级领导“保护他们过关”，也能够在报社群众中获得通过。

但也不难发现，这些格式化的检查带有明显的表态意味，其中确有不少牵强和生硬之处，那么，是否可以就此断定，这些检查都是政治高压下的违心之作呢？

徐铸成的两点检查提供了其思想变化的某种可信度。一是他的“进步包袱”不只是指文汇报在国民党时代的“光荣革命历史”，还指文汇报第四次改版后的现实进步表现。另是在检讨“家长式的领导方法”时，特别列举了他对总经理严宝礼的“不正确”态度。②

从1950年6月21日复刊一周年到1951年8月1日，文汇报经历了三次改版。尽管每次改版都是为贯彻上级对私营报纸分工的指示，凸现文汇报的主要读者是“工农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主要面向“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③但是，指示者和执行者对这几次改版都不满意。领导机关认为，文汇报的编辑方针还是“强调‘市民路线’，强调‘趣味化’、‘人情味’，以‘四大连载’吸引读者，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去影响读者”，“资本主义办报思想，曾严重地支配着文汇报每一个工作人员”，“今天还没有肃清”。④文汇报对改版也左右为难。面向青年读者和文教界的方针一方面发挥了文汇过去的特长，另一方面却影响了销量，“除一部分教职员订阅外，学生订报者甚少”，“学生穷，都喜欢看本报而无经济能力”。而多数读者认为文汇报的“经济版不够充实，甚至太忽视了，不能满足读者要求，因而在外埠的发行受到很大限制”。⑤一年内三次改版，文汇报销量不升反降，在外债台高筑，在内拖欠职工工资，经营危机十分严重，以至于在1951

① 《王芸生同志的思想检查》、《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赵超构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10号，上档A22-2-1550。
② 《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上档A22-2-1550。
③ 《本报复刊一周年》（社论），载《文汇报》1950年6月21日。
④ 孙葵君：《文汇报工作人员3年来的情况与问题》，1952年7月，上档A22-2-1532。
⑤ 《文汇报1950年9月份工作报告》，上档G20-1-18。

年12月报社自发开展“起死回生”的增产节约运动，谓之“救报运动”。

文汇报第四次改版发生在1952年4月。与以往三次改版不同，大张改小张是文汇报这次改版的一个带有战略意味的抉择。3月，报纸编委会提出了“改版缩张，为提高文汇报的质量而奋斗”的方案，动员全社上下为改版做准备。4月1日起，文汇报由正张对开4版加副页4开4版改为4开两张8版，缩减半张，[①]版面内容更加突出为教育界服务的宗旨。这次“改版缩张”之举，表明文汇报公开宣布放弃大报路线，接受上级领导机关的调整分工方案。正如在改版当天发表的《敬告读者》中所称：“希望通过这样的改版，放下我们大而无当的旧架子，进一步贯彻大众化的文教路线”。[②]这次改版带来了销量走出低谷的经济效益和受到领导机关高度赞扬的政治效应，这在前面已有涉及，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文汇报第四次改版的始作俑者，是正在制定私营报纸分工调整方案和思想改造计划的陈虞孙。是陈的“缩张改版”、“办出特色”的建议，使得正在经营危机中开展“救报运动”的徐铸成等得到了关键的一招。[③]反之，也正是文汇报这关键之举，推动了陈虞孙向上级提交了上海私营报纸分工调整方案并获批准，从而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契机。

第四次改版对于徐铸成理解私营报纸的分工调整，认同共产党对私营报纸的领导，都具有促进意义。只是从思想改造自我批判的要求出发，徐铸成把这个重要的进步叙述成一个“思想包袱”。如他的“思想检查”开门见山所写：“在这次运动开始以前，我知道我们工作中的毛病很多，但在知道这次运动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以后，以为我报在4月改版以后，方向已正确了，这种错误思想已不存在了，所以感觉很轻松。不仅自己轻松，而且告诉同志们不要紧张”。徐还检查自己在第四次改版过程中一度产生过“改头换面”、“别开生面”以“争取销路”的“老一套”思想，特别提及，是“在领导方面的一再帮助下，才初步明确了改版的意义，才决定放下架子，明确读者对象”。[④]

由此可见，徐铸成的态度发生“突破性”的转变，是文汇报第四次改版带来的认识延续和揭发批判阶段的政治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既有言不由衷的表态，又有

①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37页。
② 《文汇报》1952年4月1日。
③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写：《文汇报史略》，第37页。
④ 本段及以下数段，《徐铸成同志的思想检查》，《学习》第9号，1952年9月24日，上档A22-2-1550。

出自内心的认同。

如果说，徐铸成的"进步包袱"表示他在运动前已有的认识基础，那么，在与严宝礼关系的检讨中，更多的却表露出他在资产阶级问题上的游移和困惑。

如前所述，徐铸成的思想检查中，"对待干部的政策"是他自我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而其中又用了很大篇幅剖析了他对待总经理严宝礼的态度。他自述道："三年来，我和严先生的关系，简单说可分两个时期。在解放之初，是强调斗争"；一度，"又一味无原则的团结，百事不问，怕伤和气；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到现在，又一味强调斗争"。

徐铸成自述的这种忽左忽右的态度，尽管有他和严宝礼的个人恩怨所致的原因，但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是出自于他对资产阶级的复杂认知和心态。徐铸成在检查中反复写道："我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不是从原则出发，不是从群众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看到"严先生积极的一面"，同时"好好帮助他进步"，克服"他的消极性"，而是"一心追求名利地位和个人利益"，"只想表现自己进步"，从而使得严先生"感到孤立，感到我和群众一起在攻击他，对付他，而不是希望他进步"。徐的思想检查中有一段心理剖析却是另一番滋味："对于严先生的铺张浪费的生活，不是鄙视，而是羡慕。由于我和他同住一处，生活上精神上受到种种压迫，由羡生恨，这个感情，今天想来是非常可耻的。所以，我在报馆虽然没有参加剥削，但不能否认有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我也俨然以'老板'自居，到三反、五反以后，才认识这是可耻的想法，时时想摆脱这个尴尬的地位"。"于是就一直消极怠工，以为自己卖力，让严先生享乐发财，是不甘心的"。①

急于表现自己进步的动机和又羡又恨的复杂心态，构成了徐铸成自责的对待严宝礼的"基本错误的"态度。②虽然目前尚无更多的资料证实徐、严之间的关系是否都起于徐的错误，但他的检查至少表明：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徐铸成正在努力按照思想改造的要求，摈除曾有过的左右为难的困惑和曲解，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可以说，这又是一个政治压力和自我反省双重作用的结果，既有迎合需要的上纲上线，又有真实的内心独白。

相比之下，总经理严宝礼对思想改造运动的态度似乎消极得多。直到徐铸成等检查两周以后，也就是10月13日，文汇报仍然向运动的领导机关报告了严宝礼近

①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16）·各报民主人士的检查报告（1）》，1952年9月23日，上档A22-2-1551。

②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16）》，1952年9月23日，上档A22-2-1551。

乎抗拒的表现："要他作检查报告，推动大家，他表示很愿意"，但"一再拖延"，他对大家提的意见，表面上很镇静，未表示抗拒，但只笼统地接受，对一些具体意见不接受，加以辩护；他不承认办报的投机性（有人说他抗战时合资贩米不成才办文汇报），他强调办报的效果，他不愿意否定他的进步包袱。后来在支会上再作一次检查，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是搞不通，不肯抹杀他过去的'进步性'，对五毒行为也不肯交代"。"一般认为他的检查不深刻，不虚心，对大家提的意见逐条强辩"。①

而事实上，严宝礼在运动前后确有积极表现的另一面，而且是表现在文汇报的公营和分工调整的问题上，也就是事关这次运动直接目标的大问题上。

还在思想改造酝酿时期，文汇报总经理严宝礼就"一直在等待公营"，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也"早下决心，要仿北京（新民报）办法，卖给政府"。②在当时经营危机的情况下，领导们当然认为他们这种要求无异于金蝉脱壳的权宜之计，但也不否认经过历次运动，这些私营报的头面人物"逐渐了解报纸企业必先于一般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的道理"。也就在领导们为私营报调整方案举棋不定之时，严宝礼提出的"以'文汇'财产，搞一企业，又保存'文汇'的金字招牌"的思路，深得领导赞许，认为其"创造了便于我们'调整'后安排人事的条件"，并写入了可供选择的第一方案。③

含有"文汇报改组为文汇出版公司"的"第一方案"最终虽然没有实行，但严宝礼的公营要求却始终未变。文汇报群众对他的思想检查总体不满意，但是他在检查中"表示愿将股份缴出"，在公营后"愿作人民的勤务员"的表态，还是备受关注的。④

在支会上检查后的10月17日，严宝礼亲笔致信市政府新闻出版处，表达了将自己的股权全部献给政府的急不可耐的强烈愿望："宝礼创办文汇报的主要动机，原是激于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热情，虽然这些年来，我也曾犯过大大小小不少次数的错误，但大体上总还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自从受了'三反''五反'伟大运动的教育，以及我报'整风'及思想改造的学习，更使我开了眼，使我对人生及宇宙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关系何等重大，放在私人手里经营根本上是不妥当的。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决意将我投在文汇报的资金共34,024

①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1）》，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

② 市委宣传部抄报上海新闻协会党组：《关于上海私营报纸调整办法的报告》，1952年5月29日，上档A22-1-47。

③ 夏衍、姚溱致胡乔木：《关于调整上海各报纸的问题》，1951年10月11日，上档A22-1-20。

④ 分会办公室编：《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21）》，1952年10月13日，上档A22-2-1551。

股全部献给政府。同时我认识到属于我名下的这些资金，大部分是由于各种各样方式剥削来的，一天不交还给人民，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啃着我的心。因此我十分恳切的请求政府为我开路，立刻接受我的要求。”在同一封信内，严宝礼特别向处长陈虞孙个人写了更为动情的几行：“关于我的文汇报股权，献给政府一事，我的决意不是起于今天。我不愿意再拖延了。拖延使我痛苦。不但这点股权，还有我借给虞顺懋的一笔款子，以及在苏州买的一幢房屋，我也决意全部献出，其手续如何，请示为感”。[①]

如果说，在文汇报经营窘迫的情况下，严宝礼的公营要求还夹带着转嫁危机的投机心理的话，那么，在思想改造的揭发批判运动将告结束，马上就要转入组织人事整顿的建设阶段之时，严宝礼郑重其事地向人民政府表示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动真格的。更何况，思想改造运动开始的目标并没有定在私营改公营的体制变革上。严的信同时印证了他确如文汇报群众所反复批判的背着“进步包袱”：他从来也不肯否定自己办文汇报的初衷是出于爱国，而且这种爱国热忱从抗战一直持续到了共产党执政的时代。

但须指出，作为文汇报的大股东、总经理，严宝礼的献股之念也是巨大政治压力的结果。在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严宝礼不仅不可能置身其外，而且因他的资本家身份及其在私营报界的地位备受中共领导人的关注。就在思想改造开始前数周，陈虞孙就文汇报一再延宕归还向解放日报所借纸张和资金以及再度请求市政府给予补助等事，“花了三小时”与严宝礼“作了一次长谈”，希望他“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以后，对目前文汇的经济上的责任勇敢地毫不自私地担当起来，对政府不要再存片面照顾的幻想，对过去经办的纸张应有老实的交代，从此全心全意来办好文汇报这一份有光荣历史的人民事业”。数日后，陈虞孙认为严宝礼“并未通彻了解”谈话的意义，又写下一封长信，语气严厉，措辞尖锐。信中列举了严的六大错误：一是“自以为摸到了对付共产党的规律，其实并未摸到，而只是把旧社会中所使用惯了的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二是“一向只看到人民政府对文汇的照顾，而没有真正（着重号原文所有）了解为什么要照顾。更没有了解这照顾是有一定条件，一定限度的。因而把‘照顾’看成了政府的弱点，看成了空子，常向这个弱点进攻，向这个空子钻”；三是“一直强调，文汇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靠

① 《严宝礼致陈虞孙》，1952 年 10 月 17 日，市新闻出版处关于新闻界思想改造建设阶段组织建设制度等材料，1952 年，上档 A22-2-1545。

你在纸张中翻筋斗翻出来的"，"而文汇报之所以搞不好，主要是由于职工不尽力"；四是"以为文汇究竟是私营企业，你有专断处理之权"；五是"以为文汇的账（包括纸张）是谁亦无法搞得清楚的"，自以为"与共产党人民政府关系好，'吃得开'"，谁也"不来揭露"，这是"用旧社会的眼光来看新社会"；六是"以为政府对你一向是很好看待的，你跟我（指陈本人）以及其他政党干部是有一定交情的。九九归原，总会加以照顾的"。指出这六大错误的同时，陈虞孙向严宝礼提出警示性的忠告："私人交情是从人民利益作基础的，如果你损害了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所唾弃，这所谓私交便失去了基础，就无私交可言"。"你过去对革命是有一些贡献的。因此，政府照顾你，人民尊重你。你现在已有了一定的声名和地位。但如果你在文汇事业上做了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不立即改过来而还要继续向错误的路上发展，那么你将在文汇事业上弄得身败名裂，谁也救不了你"。①

陈虞孙的信虽然是给严宝礼个人的，但原稿同时在市政府新闻出版处归档并在解放日报社留有副本。因此，这封信完全可视为陈虞孙代表一级组织对严宝礼的批判和规劝。严宝礼由此感到的压力也就非同小可了。

然耐人寻味的是，与陈、严谈话和通信几乎同步，由陈虞孙草拟的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得到上海市委和中央宣传部的批准。其中不但规定了对私营报总编辑们的宽松政策，而且明确"对严宝礼等资方或资方代理人，不进行'五反'"，强调新闻界"以思想改造为主，着重工作检查中的批判"，"不采取打虎斗争方式"。②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领导者的报告及其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也一直传达着这样的精神：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以"共同纲领"为基准。这也一度引起了文汇报群众的不解："为什么对小资产阶级要求高，要他们树立无产阶级思想，而对资产阶级要求低，只要他们学习共同纲领？我们私营报的资方是否和我们一样改造？"。③

公开的宽松政策和私下的严厉批判，构建了新执政者与私营报业老板互动的历史情境。无论是面对群众大揭发的消极态度，还是如坐针毡急于摘帽的表示，严宝礼在两个极端上的言行，都可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找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① 《陈虞孙致严宝礼》，1952年7月，上档A73-1-113。
② 陈虞孙：《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计划（草案）》，上档A22-1-47。
③ 《党内的以及初步转向党外后的一些反映（供陈虞孙同志作报告时参考）》，1952年8月，上档A22-2-1539。

还须观照的是，徐铸成、严宝礼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放言立论，不仅是政治运动的特殊环境所致，更可以从他们与中共的历史渊源和关系变化中找到内在的逻辑。

中国共产党和上海各大民营报纸并非陌路人。不少中共的笔杆子、秀才曾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在这些报社也很活跃。报界的几大总主笔，如文汇的徐铸成、大公的王芸生、新民的赵超构等，在1949年以前同中共关系非浅。即使如严宝礼这样的报业资本家，也同左翼文化领导人过从近密，并得到中共领导人的称赞。夏衍曾对其部下说，“严宝礼虽然不会编报，不会写稿，也不擅辞令，却是创办文汇报的元老。你别看他像个生意人，其实是有政治头脑的，否则就不会自讨苦吃来办报”。[①]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的“革命历史”，更加强了徐、严和中共之间的纽带。

中共执掌政权以后，新政权和民营报业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革命党和民间进步舆论界的同盟转变为执政党和都市大众媒体的两方。尽管在政治安排上，同盟关系仍然存续在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中，但在权力和话语系统中，一方面，执政党的国家政治空间与民营报业的社会舆论空间的分野时隐时现，另一方面，国家强力统合社会的态势日益明显。

在这历史的转折中，执掌政权的中共与上海文化人都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共处关系。

在共同纲领的规定下，中共领导人一方面要维持与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统一战线”，给予一定的活动场域，也给予徐铸成、严宝礼这样的有“反蒋”、“爱国”历史的报界头面人物以一定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和批判小资产阶级则是中共的既定方针，如徐、严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及其占有的民间舆论空间，又注定是要被改造和消灭的。而且，在建国初期的中共基层党员中，对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取蔑视态度者不在少数。私营报业的党员就对业内的民主人士和统一战线问题歧义颇多。最为极端的意见是：“领导到底靠谁办报？应当检查一下。上海四张报纸，五个民主人士，三年来一事无成，一个也没有教育好。领导在党内是家长，在党外是迁就，一味迁就民主人士，这是甚么路线？其实，你越迁就，他越嚣张，越是要到中央告状。实际上，如果把这五位大亨一脚踢

① 《在两次运动中——追忆夏衍》，载《文汇报》1996年3月27日。

开，报纸一样可以办下去，甚至会办得更好。”[①] 中共党员们对民主党派在私营报业的组织和发展严加防范，对徐铸成及其民盟组织的活动尤其警惕。徐铸成要把文汇报副刊“社会大学”的讲座与民盟合办的设想被负责该刊的党员坚决否定，“觉得这样会把文汇报办成民盟的机关报”。还有的党员担心“文汇报有被民盟抓住的倾向”。[②]徐铸成曾要求新民报的中共党员“协助”他发展民盟成员，那位党员“口头答应了而实际上按兵不动”。[③]在如此的“左倾”氛围中，徐铸成、严宝礼所处的日常政治环境也不难想象。

转折时期的报人们对上层政治变化的反应也十分矛盾。一方面，他们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心怀憧憬，抱有希望。正如徐铸成在亲历“十一”开国盛典的日记中所写：“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并大声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全场一片欢腾，余亦感极泪下”。[④]数日后的中秋节，徐在天安门赏月归后又在日记中激扬文字，感慨这“沧海桑田”：“回顾这一年内，祖国的变化真大……祝愿五亿同胞，从此脱离苦海，年年欢度团圆节，共庆太平、自由、幸福，共庆国家日益富强康盛！”[⑤] 三十七八年后，徐铸成在重读这些日记时，当时的情景和心绪仍记忆犹新：“解放之初，民主生活是相当充分的；各界上层人士，都热烈拥护党的领导，而决心于自我改造主观世界。他们的私人生活是自由的、舒畅的”，“我当时心情也无比开朗”。[⑥]

这些记载和记忆当然都是真情实感。同时俱来的另一种真情实感，却是民营报纸在党和政府的指令和民间办报自主性之间的彷徨，以及由此引发的对报纸的地位、属性的困惑。徐铸成在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日记里写下了与储安平谈《观察》复刊引发的感触：“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⑦]

尽管这种情感常常是潜在的，或刚一露头就被大转折的历史潮流所裹挟，所淹没，或被建国初期的繁忙、紧张所笼罩，所驱赶，但徐铸成们着实感受到了民营报

---

① 分会办公室：《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3）·对私营报中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1952 年 8 月 7 日，上档 A22-2-1551。

② 分会办公室：《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3）》，1952 年 8 月 7 日，上档 A22-2-1551。

③ 分会办公室：《新闻界思想改造情况（3）》，1952 年 8 月 7 日，上档 A22-2-1551。

④ 《徐铸成回忆录》，第 204 页。

⑤ 《徐铸成回忆录》，第 207 页。

⑥ 《徐铸成回忆录》，第 210、189 页。

⑦ 《徐铸成回忆录》，第 203 页。

纸和党的要求之间的差距：想跟上，又很难；想顺从，又不甘。徐铸成、严宝礼抱着如此的心态，度过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日日夜夜。

体制内外：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

在各报学习支会及各小组完成学习总结，每个人填写履历表“交代历史”和进行“自我鉴定”之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宣告基本结束，转入建设阶段。11月初，夏衍、姚溱在思想改造建设阶段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充分肯前一阶段的学习检查是“破坏旧的、不正确的思想”，体现了“推陈”的一面，强调要继续进行思想建设，“树立和发扬好的、新的、正确的思想”，以确保思想改造“完全胜利成功”。①

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进展到建设阶段，虽然运动的领导人反复说明仍要以思想建设入手，要克服学习检查阶段以后产生的自满情绪或“四大皆空”、“两手空空”等“不敢碰、不敢写”的消极反应，但是，这一阶段工作重心实际上已落在解决包括人事整编在内的“机构与制度”问题上。②

也就是说，建设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经突破思想改造预设“换脑不换帽”的目标，进于私营报业的制度性变革。

还在普遍揭发检查阶段刚过，各私营报的去向已有定论。除大公报北迁天津外，亦报并入新民报。这样，留沪的私营报就只有文汇、新民两家。而这两家报纸的改制问题也已提上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10月17日，市委宣传部主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姚溱在严宝礼要求捐献股权和私产的信上批有文汇报今后“实际上公私合营”等语。③一个月后，由陈虞孙草拟的“公私合营报社董事会暂行章程”呈送市委宣传部各位部长，姚溱批示“原则同意”，部长谷牧提出若干修改意见，私营报改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④

与此相配合，各报在个人交代历史、组织摸底排队的基础上，进行人事整编，为报纸的迁移、合并和改制作人事的准备。根据报纸调整计划，市政府决定：北迁

---

① 夏衍：《对上海新闻界思想建设的几点意见》，1952年11月1日，《学习》第18号，1952年11月4日，上档 A22-2-1550。

② 夏衍：《对上海新闻界思想建设的几点意见》，1952年11月1日，《学习》第18号，1952年11月4日，上档 A22-2-1550。

③ 《严宝礼致陈虞孙》，1952年10月17日，市新闻出版处关于新闻界思想改造建设阶段组织建设制度等材料，1952年，上档 A22-2-1545。

④ 陈虞孙（起草）：《公私合营报社董事会暂行办法》，1952年11月，上档 A22-2-1545。

的大公报和并入新民报的亦报共有编余人员289人，“由政府包下来”，“加上中央决定停刊的上海新闻（英文）的编余人员（约60人），各报调整人事机构的编余人员（约100人）和各私营电台改为公私合营后的编余人员（10余人）共500余人，设立新闻学校，予以训练学习，逐步助其转业”。[①] 就私营报编余待转业的总人数约390人计，占据了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总人数566人的一半以上，可见整编力度之大，波及面之广。

实施人事整编的任务落到了各报领导人主持下的学习支会。陈虞孙在学习分会、支会的联席会上指示各报支会主持人：“思想改造是群众性的运动，组织建设则不是群众性的运动”，“这阶段的做法强调要有领导”。因此，“大家要明确，人事调整基本上要领导决定，当然一方面要防止领导上独断独行，强迫命令”，另一方面，“尤其要防止极端民主”。[②]

根据陈虞孙的指示精神，文汇报学习支会慎重研究了人事调整方案，参考新闻日报、大公报的做法，结合自身情况，确定了两条整编原则：一是将指派去新闻学校参加轮训班学习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结束后仍回报社工作，另一类是不回来的，转行不再从事新闻工作；二是“不回”者的标准是“思想改造中收获不大”，“政治面目不清”，以及“思想落后，能力不强”。[③]会上还拟议了参加轮训的名单，初定编辑部去10人，经理部去15人。会后数日，也就是11月17日，文汇报将思想改造后、合营前去新闻学校学习的名单送达新闻界学习分会。共有21人列入名单，其中11人被确定学习后不再回文汇报，3人被内定仍回报社工作，其余7人未注明。凡被指定“不回”者，或有“历史复杂”未搞清的，或有对思想改造“无动于衷”甚至“态度恶劣”的，或有“思想落后，讲怪话，工作不积极的”，也有各种情况兼而有之的，总之，政治表现是去留的决定性因素。[④]

留下继续从事新闻工作的，除了工人身份之外，不管其职位高低，全部告别了“自由职业者”身份，一律当上了“国家干部”。身为文汇报股东的严宝礼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对于迫切要求“摘帽”归公的严宝礼，姚溱不仅指示陈虞孙口头答复他仍可保存私股，“对人民利益并无妨碍”，“不必多虑”，而且说明在文汇报公私合营

①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字第1189号，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② 《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各报支会联席会议》，1952年10月31日，上档A22-2-1544。

③ 《文汇报学习支会会议记录》，1952年11月4日，上档G20-1-42。

④ 《关于文汇报思想改造后合营前去新闻印刷学校学习的名单》，1952年11月17日，上档G20-1-44。

后，“他主要是国家干部，没有什么痛苦的”。[①]

这次人事整编不只是通常的政治运动后期整顿组织、纯洁队伍的必经步骤，更是人事制度上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从此，决定报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命运的，不再是市场操控下的自由竞争和自主择业，而是权力指挥下的组织调动。正如陈虞孙在向各报部署人事整编工作时所说：“这次是否能做到如大学的院系调整的精神，大家通过建设阶段的思想提高，认识是国家干部服从统一调配，这样公布具体名单牵涉到具体人时就不至有问题”。[②]从自由职业者向国家干部的身份转变，标志着上海私营报业的报人们从党管国办的体制之外踏入了体制之内。

思想改造结束后上海仅存的两家私营报纸——文汇报与新民报，自 1953 年 1 月起实行公私合营。两报虽然还有少量的私股，但完全不足以掌握报业的经营命脉。文汇报从 1953 年公私合营起至 1954 年 9 月，总计股数是 700 万股，每股股值是人民币 500 元，总计股值 35 亿元；其中，公股 6 444 100 股，股值 32.2205 亿，占 92.06%；合营股 1 200 股，股值 60 万，占 0.02%；私股 529 752 股，股值 2.64872 亿，占 7.56%；其他股 24 948 股，股值 12 474 000，占 0.36%。以上股份结构表明，文汇报的公股占据了绝对优势。[③]新民报在公私合营前就发生 90% 的董事“声明退股、捐献或辞去董事职务”，“股东也纷纷退股或捐献”的“董事会危机”，私股已日渐式微。[④]所以，文汇、新民两报从公私合营之日起，实际上已实现了公营，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转变的关键一步，为党管国办的报业新格局提供了体制性的保障。

身处这个体制内的“国家干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待遇。国家干部与自由报人待遇的首要区别，是享受来自政府投入而不是来自市场效益的工资。尽管存在工资级别的差异，但工资的起落是国家计划所致，基本与市场无关。所以，还在建设阶段酝酿体制改革之时，工资问题就成为报人们十分关心的敏感话题。为了防止干扰思想建设的主题，陈虞孙在学习分会委员会会议上特别提醒大家：“薪水问题最后是会解决的。这个问题开始不好碰，否则思想改造的一些基础都弄垮”。[⑤]在公私合营后，政府也没有立即在文汇报实行国家工资制度，编辑、经营两部大部分人员

① 《严宝礼致陈虞孙》，1952 年 10 月 17 日，上档 A22-2-1545。

② 《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会议记录》，1952 年 10 月 8 日，上档 A22-2-1544。

③ 《文汇报社 1953 年起公私合营后股份情况》，1954 年 9 月 13 日，上档 G20-1-72。

④ 《陈铭德致赵超构》，1952 年 11 月 4 日，市新闻出版处关于新闻界思想改造建设阶段组织建设制度等材料，1952 年，上档 A22-2-1545。

⑤ 《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新闻界分会委员会会议记录》，1952 年 10 月 31 日，上档 A22-2-1544。

维持私营时期的工资，“较目前国家的统一工资标准为高”，也没有套上相应的行政级别，即所谓“定职不定级”。直至1956年下半年，文汇报才进行工资改革，确定相应的级别，实行国家工资。①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政府所持方针仍是“拨给一定的资金，做到自给自足”。②然正如上文所示，文汇等公私合营的报纸，公股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无论是政府以财政拨款的方式，还是用资本注入的方式，国家业已成为“国家干部”名符其实的“老板”。

国家干部身份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其政治待遇。与所有的国家干部一样，从公私合营那天起，文汇、新民两报中取得国家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开始累计自己“参加革命”的“工龄”，③以便为今后的政治提拔升迁和待遇升等晋级积累不可或缺的政治资历。

享有获取信息的某种优先权则是公私合营后文汇等报获得的渴望已久的又一项政治待遇。1953年2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向所属各部、委及各区委、党委、党组、分党组发出通知，告知“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工作已经结束，新闻、文汇、新民三报的机构调整也已完成，这三种报纸已改为公私合营报纸”，要求“今后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给这三个报纸经过正式介绍的工作人员以必要的帮助与便利，纠正过去有意无意加以排斥的倾向”；通知还明确指出：三报“都是党领导下的公私合营的报纸，各级党委及邮局在发行工作上，不应有所歧视”。④

各报编辑部以上的干部享有更高层次的政治待遇。1月24日，上海市委据中央指示精神下达通知，其中规定，在市府党组与市府例会开会时，除请解放日报等单位的相关人员列席外，“可视必要”请“有关新闻单位的编辑部正副主任或有关组长以上干部列席”；市委各部委、各人民团体、市府各委开会时，上述相关人员也在“视必要”时被“指定列席”；市委市府召集的“局处长级干部参加之干部会议”，“一般亦吸收新闻单位的编辑部主任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市委领导人至少每两个月召集一次“提示一定时间内的报导宣传要点”的座谈会，“必要时吸收各报党外负责人”参加。⑤

---

① 《文汇报编辑部、管理部工资改革计划（草案）》，1956年，上档G20-1-115

② 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总结》，沪委宣（52）字第1189号，1952年12月13日，上档A22-1-47。

③ 张林岚：《赵超构传》，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④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沪委（53）字第030，1953年2月9日，上档A22-2-163。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与新闻机关、报纸、通讯社及广播电台联系的通知》，沪委（53）字第020号，1953年1月24日，上档A22-2-163。

显然，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报人们所享有的种种待遇均来自国家权力。而执政者正是通过权力运作，进一步凸现党管国办的体制优势，不断增强报人们对报业新格局的认同度和向心力。

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后，市委连续下达关于报纸分工和加强领导的通知，明确要求公私合营三报“应进一步明确分工，改进工作，更好地发挥其宣传与教育作用”，其中，“文汇报进一步明确为教育界服务，以中小学教师，高中学生和一部分大学师生为主要对象，亦着重提高报纸质量”。市委指示各级党委及有关各部门应“重视与应用”这三家报纸，“使之成为配合党报解释政策法令、交流经验、指导工作的工具”。①市委根据三家报纸的分工，要求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相关群众团体各指派一名负责干部参加各报编委会，文汇报编委会由市教育局、市青年联合委员会、市学生联合会及教育工会各指定一名领导人参加。公私合营各报此时虽已实行社长负责制，且正副社长基本都是民主人士，但上述的“社外编委”无疑代表着他们身后的权力部门，显示着党的领导力量。如文汇报的正副社长虽分别由徐铸成、严宝礼担当，但社外的编委中，就有新协党组书记陈虞孙、市教育局长戴白韬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编委会成立不久，经戴白韬推荐，调《新教育》杂志的责任编辑叶夫出任文汇报的重点组——教育组组长并参加编委会。②市委还重新调整了新协党组，要求其活动“应进一步加强”，并委托市委宣传部“经常领导其工作”。③

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在私营报业并无大起色的中共建党工作在合营后迅速推进，曾经因私营各报党员人数太少而建立的联合党支部逐步裂变为各报独立的党组织。文汇报在公私合营之初仅 3 名中共党员的基础上，调进 3 名，在 1954 年 8 月成立中共文汇报分支部，到年底共发展中共党员 7 名，成为有 13 名党员的中共支部。中共在各报建立党组织，扩大党员队伍的工作，强化了党管报纸的内在机制。正如文汇报 1955 年的建党工作总结中所述：“经过去年的建党工作，不仅壮大了党在文汇报的力量，直接增强了党对文汇报的领导，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提高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而且使全体党员明确了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端正了建党思想，对培养、考察积极分子，掌握人党条件等工作获得了一些经验”。④

---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后加强领导问题的通知》，沪委（53）字第 011 号，1953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上海市委通知》，沪委（53）字第 030 号，1953 年 2 月 9 日，上档 A22-2-163。

② 文汇报史研究室编：《文汇报史略》，第 40 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后加强领导问题的通知》，沪委（53）字第 011 号，1953 年 1 月 10 日，上档 A22-2-163。

④ 中共文汇报分支部：《建党工作总结》，1955 年，上档 G20-1-81。

党管国办的体制运作既强化了党对公私合营报业的领导，又提高了体制内的办报人员对新体制的接受度。各报在报纸的性质与功能、报人的新身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实现方式这三个基本问题上纷纷表态。文汇报在建设阶段制定的“今后的方针、方向和组织机构”这样表示：“经过了思想改造学习，已经明确了人民报纸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是为人民利益服务、为人民民主事业斗争的有力工具”；“报纸不同于其它企业，它是生产思想的工具，是思想斗争的武器，因此，不论经营的方式如何，新闻工作者都应该自觉地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人民的勤务员”；“要把我报从旧形式的私营企业，改变成一个思想阵地上的战斗单位”，首要的是“贯彻党和政府的领导意图，加强党的领导”，在组织上，“编辑委员会是生产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战斗的总司令部，集中掌握思想领导和具体领导”，“编辑委员一部分有领导机关决定，一部分从本报领导同志中选拔，经上级批准聘任之”。[①]

由私营到公私合营的体制变革，从民间报人到国家干部的身份转换，共同构成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运动可告胜利结束的两大依据。报业体制变革和报人身份转换同时意味着私营报业的历史从此终结，党管国办的报业新格局由此而奠定。上海报业告别了大众文化消费市场，走进国家报业与政治报纸的新境地。

① 《学习》第20号，1952年12月6日。

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

——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

王　笛[①]

提要： 1949年以后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的，国家机器第一次能够真正深入到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并有力量改变其形式与内容，决定整个从事娱乐行业人们的生计、命运，控制人们从娱乐中所接受的思想和价值观。从这时期共产党政府对曲艺行业所采取的政策看，虽然带有强制的倾向，与随后的政策相比，应该说还是采用的是比较渐进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不过，无论方法怎样的不同，其改造和控制的基本目标是不变的。

关键词： 曲艺　茶馆　国家控制　社会主义改造　成都

1949年12月27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乎三个月之后，成都由解放军接管。虽然当时是百废待举，但对日常生活和大众娱乐的控制立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并立即着手对地方文化的控制和改造。[②]国家控制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系列措施和较长时期的努力。虽然较之民国时期在城市管理和控制上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新政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娱乐生活，却并非在一夜之间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过去的方式。从1950年到1956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前，国家逐渐利用其权力，对大众娱乐施加越来越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控制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娱乐是怎样在国家对传统娱乐方式的干预和控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

① 作者王笛，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乔曾希、李参化、白兆渝：《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1983年，第9~11页。

共产党对城市文化和文娱活动的深刻干预、改造传统文化、建立社会主义娱乐，是一个全面复杂的过程，但本文主要讨论1950~1956年间党和政府对成都大众娱乐控制三方面问题，首先考察共产党和新政权对成都戏曲场所和演出机构的"接管"过程，探索新政权怎样利用改造曲艺演唱之地曲艺书场，以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和建立"宣传教育的场所"；其次揭示政府为什么和怎样对自发的娱乐围鼓进行"围剿"；最后分析政府所进行的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调查，来对当时行业现状和政府政策进行进一步理解。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在1949年以后，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是并行不悖的。如果说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大众娱乐的干涉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那么，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深度来看，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便开始的国家干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

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国家机器第一次能够真正深入到人们日常娱乐生活的最基本的层面，并有力量改变其形式与内容，决定整个从事娱乐行业人们的生计、命运，控制人们从娱乐中所接受的思想和价值观。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大众文化对现代化的精英和国家的控制和打击进行了持续反抗，[②]50年代初的反抗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强大国家力量的打击下，显得是那样无能为力。例如从晚清便一直存在的围鼓，在1949年后很短时期内便消失了，虽然在1954~1956年间有一阵复苏，但在国家的强力打击下，很快又走向衰落。围鼓在1949年后的经历，代表着许多未能纳入革命文艺和宣传范畴的大众文化和大众娱乐的共同命运。

戏曲团体和场所的接管——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和建立"宣传教育的场所"

中国历史上任何改朝换代，都没有像共产党新政权那样能够对整个社会的娱乐和文艺活动进行全面的控制。这个控制是从军管开始的。在解放军进入成都仅三天之后，即1950年1月1日，便成立了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下设文艺、教育、新闻、出版等处，文艺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政

① 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大众娱乐的干涉和控制，见拙著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hap. 8。

② 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ap. 6. 中译本见李德英等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 － 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策，领导全市文化艺术工作”。①凡属民间戏院的悦来、永乐、锦屏等，以及各种曲艺书场、演清音、金钱板、竹琴、扬琴、荷叶、口技、大鼓、皮影等艺人，“不论其经营性质、思想倾向如何”，一律实行“归口管理”。②

1950年2月，中共川西党委和文艺处组成军事接管小组，派军事代表对正声京剧社进行接管，改名新声京剧社。同月，成立军事代管小组，派军事代表对三益公大戏院进行“代管”，改三益公为公私合营。3月，文艺处和川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成都市戏曲改革工作委员会（简称戏改会），戏改会把“三益公”（川戏）和“新声”（京戏）作为戏曲改革重点试验单位。先对已经接管的剧团进行“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即“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础知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与推陈出新的方针为中心，组织演职员工进行学习”。并组织演出“老区剧目”，包括《三打祝家庄》、《北京四十天》、《鱼腹山》、《逼上梁山》、《王桂与李香香》等，“不久前还占统治地位的《青城十九侠》、《玉狮带》等迷信怪诞的连台本戏被赶下了戏曲舞台”。三益公茶馆是最早进行改造的，以“先走一步，取得经验再广为推广”。先是“思想摸底”，然后每日两小时“讲解和讨论”，接着是“大报告”。不久，三益公便上演了《小二黑结婚》，永乐上演《穷人恨》、《九件衣》等新剧目。从三益公开始，对剧团管理也进行了改革，由各方面人员成立代表小组。1950年12月，市政府拨款500万元（旧币），以公私合营手段改三益公为成都市试验川剧院，任命了正副院长，“从根本上改变了剧院的性质”。剧院不久便上演了《皇帝与妓女》、《太平天国》等戏，为“戏曲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③

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度”的三改政策。艺人们“纷纷自动修改戏中的封建迷信部分”，④发掘、整理、改编、移植一批剧目，还组织艺人下乡演出，参加土改宣传工作。调查了在市区

---

①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文艺处内设宣传、戏剧、电影、出版、总务5科和秘书室，附设文工队、电影队各一。戏剧科下设旧剧组、话剧组、曲艺组。1950年5月17日，成立成都市文化教育局，1953年1月文教分开，分别成立文化局和教育局。

② 康明玉、李青：《建国初期成都市文化团体被接管与改造的经过》，《成都文史资料》第32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③ 康明玉、李青：《建国初期成都市文化团体被接管与改造的经过》，《成都文史资料》第32辑，第147~150页；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第400~401页。

④ 康明玉、李青：《建国初期成都市文化团体被接管与改造的经过》，《成都文史资料》第32辑，第151页。“三改”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关于上海的三改，见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3~484页。

⊙ 1951年5月5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度"的三改政策。这是改编后的京剧《将相和》。

145处演唱曲艺的500余艺人，"进行清理、登记，颁发了演唱证"。1950年曲改会筹备会成立，1952年正式建立了曲改会，所有曲艺从业人员都必须在会登记，成为会员。[①]这种要求艺人参加一个政府划定的组织，与民国时期全部茶馆都必须加入茶社业公会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国家不用直接应对这个庞大和复杂的群体，而是更有效地利用专业组织进行控制，为下一步改造奠定了基础。

在民国成都，所有演出曲艺的茶馆，都称为书场，包括讲评书（当时称"评话"）和各种曲艺演唱的场所。1949年，在共产党控制成都之前，四川省会警察局换发营业执照登记，当时成都共有24个茶社书场。[②]1949年12月27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后，共产党对都市文化施加影响的最早措施，便是由"川西地区一些地下党人和进步人士"，于1950年初成立的"五

① 《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第400~401页；《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1956年，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以下凡引档案，第一组数字为全宗号，第二组为目录号，第三组为案卷号）；《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5月8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39。

② 即东大街留芳书场：演唱竹琴；湖广馆街聚圣书场：音乐、滑稽、清唱；长胜街集贤书场：清唱、竹琴；下东大街正义书场：洋（扬）琴、竹琴、口技、双簧；交通路交通书场：竹琴、相书、洋琴；暑袜北一街云龙协记书场：洋琴、竹琴、口技；春熙路北段三益书场：竹琴、口技、双簧、魔术；春熙路北段凯歌书场：洋琴、竹琴、清音；转轮街新新书场：清音；城守东大街淘春书场：竹琴；东城根上街锦春茶楼书场：竹琴；西御街安澜书场：洋琴；长顺下街竹园书场：洋琴、竹琴；长顺中街六也茶社书场：洋琴、竹琴，双簧、口技；城隍庙门口德云书场：评话；东打铜街芳蓉书场：评话；城隍巷炳荣书场及爽一书场：评话；德盛书场：荷叶、金钱板；升平书场：评话（以上亦在城隍巷）：禅鹤书场：评话；清真茶社书场：口技；光余茶社书场：琴书（《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第324~325页。应为24家，但该资料仅列出22家）。实际数字应该比这个大得多，因为许多没有在警察局登记为书场的茶馆，亦都提供评书等娱乐活动。另据1950年8月4日的《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附营书场茶座组调查表》，当时成都有茶馆书场20家，其中1949年12月之前设立者10家，1950年设立8家，2家设立时间不详。其中演"平剧清唱"者4家，灯影3家，竹琴洋琴9家（其中一家也演灯影，也兼演金钱板、相声等），京剧清唱2家，木偶（傀儡戏）1家，音乐歌舞1家。最大者可容240人，最小仅70人。全部20个书场的座位加在一起共有2470个（《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附营书场茶座组调查表》，1950年8月4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各行各业同业公会档案：52-128-1）。其实可提供的座位应该超过此数，因为当然按照惯例，当观众多时，茶馆经常加位。

月文化服务社”。其目的是以“为群众服务之精神。配合政府，推广文化事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该会由川西军管会批准，成为成都“第一个发给许可证的社会群众文化服务团体”。该社位于成都最繁华地区之一的总府街，将过去的涨秋饭店、滔江茶社、三新浴室、豫园茶号等商号所有房地连起来，合而为一。最初的经费是由川西军管会、“社会进步人士”、有关商家三方面赞助的。①1951年5月1日，五月文化服务社正式对外开放。这个文化服务社的取名，便显示了其政治的意义，据一个早期组建者的回忆，当时人们习惯称“红五月”，因为该月有不少政治纪念日，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九国耻纪念日、五卅惨案等。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继承解放前南京五月文艺社的传统精神”。②

五月文化社虽然是民办，但实际上从民间的角度，“急政府所急，配合政府抓文化普及”，提供“革命的大众娱乐”。③该社最有影响的活动，便是1953年创办的五月社第一实验书场。成都曲艺界一些名家，竹琴贾树三、扬琴李德才、相声曾炳昆、清音李月秋、金钱板邹忠新、大鼓盖兰芳等，皆参与演出。节目既有民间传统历史故事，亦有反映现实的新内容，把民国时期老牌书场芙蓉亭、锦春楼的观众也吸引过来，“书场常常座无虚席，极一时之盛”。另外又开办五月剧院，上演话剧、京剧、川剧，演出的节目有《北京四十天》、《白求恩》等话剧，京剧有《玉堂春》、《挑滑车》、《拾玉镯》等。这些活动由官方支持，如该剧院是“与四川省文联合作办理”。该院的川剧演出也是由川西行署秘书长“从中支援促成”，甚至计划办个大众川剧院，“已请准行署，批了赞助费”，在总府街初步修建了砖房七幢，分别作演剧场、训练场、办公室、宿舍、贩卖部等，但不久因“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而停顿。同时创办五月文娱茶园，把其作为“宣传教育的场所”。该茶园由于茶好水好，每天可卖五千碗茶，进出一万人次左右，为“当时最红火的茶园”。同时，茶园内还设有书报阅览亭，订有各种报刊十余份，以供阅览。茶园提供了下棋最好

① 聘请熊倬云为经理。熊经营过有名的鹤鸣茶馆，与“袍哥、党、政、军”重要人物都有关系，人脉甚广，人称“熊半城”。

② 作者采访熊倬云，88岁，2001年8月9日于熊家；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1页。南京五月文艺社是1936年5月1日各省流亡南京的一些中共地下党人，“配合党中央抗战救亡的政策”，采取以文会友的形式，筹组建立的。以“团结同好，联络友谊，学习写作”为宗旨，参加者有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国立剧专、汇文中学、南京女中、男中等校读书会的进步青年，出版有《激流》杂志。见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2页。

③ 还开办了一所不收任何学杂费的“第一工农文化补习学校”。一批义务服务的教师分别担任语文、历史、会计、珠算等课程的教学。学员多是城市店员青年、郊区农民青年，每期300人，每班50人左右，前后接受补习的共有1800余人。见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3~204页。

的场所，于是开办五月业余棋艺组，把其作为一种体育活动，强调“健身性，禁止暗中赌博”，举办表演赛，“轰动一时”。[①]

虽然设立的目的是政治化的，但管理上还是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以至当时便有人把它视为一个“生意集团”。也有人主张更经济化和娱乐化，按上海“大世界”，或南京“夫子庙”的模式。最后还是决定结合成都实际，“突出地方特色”，着重在“文化服务”，经营上“以商养文，自负盈亏”。由社员大会推选出“社务委员会”，下分文教工作委员会、生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②]不过，在当时泛政治化的大气候下，这种与国家全面控制宗旨背离的“以商养文，自负盈亏”模式显然是难以持久的。1956年，成都市文化局“接收了”五月文化服务社，在其原址建立了成都市群众艺术馆，成为政府文化机构之一部分。五月文化服务社的经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即地方文化日益失去其独立性，而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之一部分，社会的娱乐文化逐渐被国家的政治文化所取代。按一个参与者但后来受革命话语影响所作回忆的说法，五月文化服务社是在“为成都市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广泛开展作出了贡献”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后而退出历史舞台的。[③]

除成都第一实验书场外，当时另一新宣传阵地是第二实验书场。据《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称，1950年1月“部分曲艺艺人自愿成立了新蓉书场，分别在春熙路北段三益公茶社及总府街濯江茶社演唱，1951年迁至华兴街。11月经成都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成都市实验书场，地址在下西顺城街人民商场内。同年划归东城区，1952年改为成都市第二实验书场”。[④]关于第二实验书场，所知不多，但我从成都市文化局档案中发现的1956年《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从新蓉评剧团的角度，对该书场有了进一步了解。新蓉评剧团前身为“书场”，1950年成立，经营性质为股东经理制。据调查称，筹组的股东“全是解放前妓院的老板”，成员主要是“改业的姐妹们”。显然，按这个调查的说法，演员多为1949年后“改业”（晚清民国时期称“从良”）的妓女。名誉负责人是一个“封建会道门头子”李胡子，李后

① 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3~207页。1955年成都市第一实验书场改为成都市曲艺场。见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第325页，《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此外还办了大众招待所、五月图书体育用品社、及理发社等。见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2~203、207~208页。

③ 邹趣涛：《成都五月文化服务社》，第208页。

④ 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第325页，《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来被“镇压”。实际负责人是高某，地点设在三益公茶社，名为“凯歌书场”，后转移到华兴街的颐之时茶社，后又到总府街的濯江茶社等地演出，后更名新蓉书场，经理由孔某担任。演出形式以清唱为主，有时“彩排几出京戏”。营业情况不好，靠“点戏”增加收入，演职员“很少拿到工薪”。调查称这段时间里，新蓉的演唱是“非常落后低级的”，演员的生活也“极其自由散漫”。[①]奇怪的是，这个《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完全没有提到第二实验书场，但其中所提到的新蓉评剧团的早期历史，与《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所述的第二实验书场几乎完全吻合，故应该是同一组织。

1951年10月剧团迁到华兴街新蓉茶社，但不久政府开始“强迫教养游民、妓女”，书场的“姐妹们”，在政府的教育下，据称是“初步认识到自己的前途，以及努力方向，都积极地加紧学习，钻研业务，克服了以往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1952年2月，由于评剧艺人加入，同时与新仙林书场合并，新蓉“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取消了清唱形式，改为京、评剧的演出。剧目方面也“较以往繁荣”，甚至还可以演出一些“大幕剧”，观众人数逐渐增加。1954年，新蓉书场在“政府扶持帮助下”，改为新蓉评剧团，“并派干部直接到剧团（当）领导”，帮助剧团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并贷款添置服装道具等（但同一调查又称是“由文化局购置”），并在人民商场改建剧场，由于政府“关怀”，派“住（驻）团干部”，剧团“调整了组织”，建立了必要的制度，作出演出计划，保证工薪，剧团有了“显著的改变”。这年，剧团在文化局帮助下，建立“团务委员会”，设立各业务部门，包括剧务股、总务股等，制定了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但剧团没有进行“改选”，负责人仍然是孔某，调查说“此人无工作能力，不能很好的领导剧团工作”，因此“一切制度都流于形式”。每次开会都因“人事纠纷”，而不能顺利进行，问题得不到解决。1955年10月，文化局派干部驻团“协助工作”，“改选了”各部门负责人和正副团长，之后工作、学习均“较以往正常”。[②]

根据这个调查，剧团共63人，1949年前从艺者20人，其余皆1949年后从业的。这63人中，艺人24%，学生16%，工人3%，自由职业4%，其他53%。在“其他”后面的括号称“包括妓女、老板”。另外，从政治历史背景看，有“封建会门清帮”5人，袍哥2人，“伪军人员”4人，占总数6%。该调查说该剧团情况“十分特殊”，演员90%以上是女性，与越剧类似，“各行角色都由女同志反串

① 《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1956年，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
② 《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

充当”。该调查称，观众对“反映现实剧中”的女扮男妆“颇有意见”，认为这是“剧团发展的严重问题”。全团共有“大幕戏”55出，折子戏21出。其中保留剧目9出。经常上演的大幕戏36出，折子戏5出，“反映现实剧”13出。古装戏有《杨八姐游春》、《西厢记》、《秦香莲》、《人面桃花》、《红葫芦》等，现实剧有《祥林嫂》、《擦亮眼睛》、《刘巧儿》等，“较为群众欢迎”。《祥林嫂》连续上演30场，《杨八姐游春》先后上演50场。剧团自1955年演《擦亮眼睛》起，逐步建立“较正规的排练制度”，每一新剧上演前，都要经过“讨论剧本、分析人物、对词、对腔、练腔、练乐、坐排、正式排练、彩排”等阶段。[①]从演出的剧目看，剧团处于新旧间杂的时代。应该说在传统戏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现实剧为观众带来了一些新奇东西，这里“较为群众欢迎”的说法应该有所根据。

政治、文化、业务学习是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工具。该调查认为，1954年前，剧团由于缺乏“学习领导”，所以未能很好开展。从1955年文化局干部进驻后，“由于忙于业务，政治学习仍未得到全面开展”。不过文化学习“开展较好”，大多数有“显著进步”，50%以上都能读报和写简单的便条与书信。但是“业务学习”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是无人教学，“学”和“练”没有得到正常开展。其次是剧团演员出身大约三分之二是“翻身姐妹”，因其“以往旧有习惯未得到很好的改变”，学习热情不高。[②]在传统的戏班子里，学戏有一套长期形成的程序，可能就是这里所称的“旧有习惯”，这种习惯当然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彻底改变的。

据普查情况报告，1953年前财务管理“非常混乱”，收支均未建立正式账目，直到1954年，凡经手者都有“任意拉（原文如此——引者注）用公款”现象。该年10月，文化局帮助该团建立账目，“经济制度初步走上正轨”。但由于“业务不振，收入极不平衡（这里指演员之间多少不均——引者注）”，不过负债不多，经

① 《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1956年《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称，每个书场经常都有八种曲艺演唱，平时演一场，星期天演两场。内容全都是“传统的优秀节目”和“反映现实生活与歌颂新人新事的节目”。在表演艺术方面有“比较显著改进和提高”。几年来共演唱了三百多个“新节目”，其中29个是“结合中心任务”，由艺人自己创作；有68个是“经过整理的传统优秀节目”。演出的剧目有：《秋江》、《讨学钱》、《祭塔》、《尼姑下山》、《一个青年》、《王三打鸟》、《报喜》、《男女一同前进》等。

② 《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

济上"勉强能维持"，但团员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①工薪采取的是"股账制"和"撇份制"，也有拿月薪者。演员中最高工资为51.57元，最低16.71元。职员最高31.74元，最低16.71元。全团平均27元。1954年在人民商场改建的剧场，全部经费由文化局补助，剧场所有权属文化局，使用权属剧团，每天租金10元，每月300元。由于剧场条件差（无化妆室、观众休息室、厕所等），座位仅有577个，剧团申请减低房租为每月200元。②政府的介入，使剧团从传统的戏班子家族式经营，发展到现代的企业管理。当然经营方式的改变过程，也是国家深入控制的过程，1951到1956年间这个过程逐渐完善。

根据1956年《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成都两个试验书场实际上在"行政业务"上由文化局"直接管理领导"，据报告称两个书场在曲艺界都起了"良好的示范影响作用"。如清音艺人"在自愿基础上"，组合成三个试验书场类似的"书馆"，与其他艺人合作，开始"试演曲艺剧"，改良过去"长期存在的不合理的点唱陋规"。③这两个试验书场的确在成都的娱乐界起到了不小的影响，在从民间文化娱乐向革命文艺的转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制止围鼓发展"——杜绝自发的娱乐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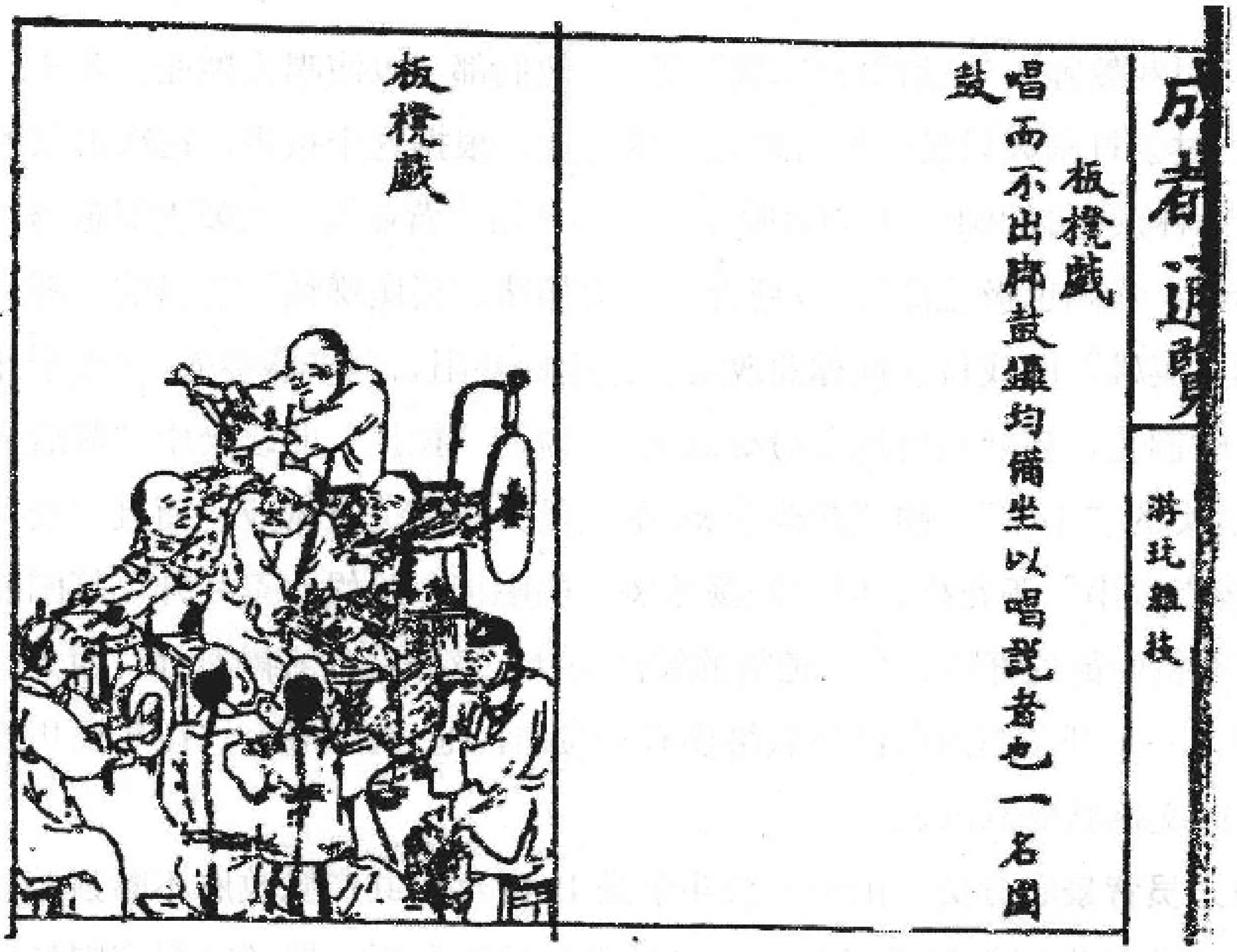
在晚清民国的成都，业余戏曲爱好者是茶馆中的另一类活跃分子，他们定期到茶馆聚会唱戏，俗谓"打围鼓"，亦称"板凳戏"，以参加者围坐打鼓唱戏而得名。参加者不用化妆，也不需行头，自由随意，既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晚清出版的《成都通览》里便有一幅插图具体描绘了这项活动。打围鼓经常会吸引一大群围观者欣赏免费表演，一些参加围鼓者后来甚至成为专业演员，这样非正式的茶馆练习，给他们卖艺生涯奠定了基础。④但是，共产党在接管成都后，认为这项活动是"旧社会袍哥会门中川戏玩友借茶馆场地清唱消遣的一种形式，实际等于

① 据《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1955年支出：税金，1 268.52元，5%；工薪，13 819.56元，52%；水电，1 866.19元，7%；房租，2 490.77元，9%；宣传费，1 076.59元，4%；演出费，575.31元，2%；购置，640.15元，2.5%；福利，71.84元，0.03%；折旧，1 693.24元，6%；其他，1 540.27元，12.47%。

② 《新蓉评剧团普查情况》。

③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④ 傅崇矩：《成都通览》（上），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第297页；文闻子：《四川风物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5页；静环、曾荣华：《锦城艺苑话天籁》，《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年，第133页。



⊙《打围鼓》①

帮会俱乐部的堂会”。这样的定义，当然不由分说地将这种传统娱乐活动判处了死刑，所以很快“与袍哥活动同时绝迹”。②1950 年曲改会筹备会成立时，由于围鼓没有得到政府承认，有一些“围鼓玩友”便以木偶戏、灯影戏演员身份登记人会，当时没有以“围鼓营业的情况”。③

但 1953 年 9 月，这个活动首先在人民南路茶馆开始复苏，不久又迁到纯化街的茶馆继续演唱，政府对这种“竟有不经合法手续擅自聚众”进行围鼓活动十分关注。根据 1954 年 1 月成都市文化局的调查报告，最初有 13 人参加，但他们“成分极端复杂”，有曲艺艺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员”、流氓、娼妓、“旧

① 资料来源：傅崇矩：《成都通览》第 3 卷，成都：成都通俗报社印，1909~1910 年，第 120 页。

② 1954 年 1 月的《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报告稿——为报告“围鼓”滋生情况请示处理》(1954 年 1 月 28 日，成都市档案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39)，较之 1955 年 5 月的《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基本观点和情况差不多，但有些描述更具体。不过，这个报告对围鼓的定义要稍微客观一些，“围鼓即清唱，是四川流行的一种群众业余娱乐形式”。原稿上还有“不属于曲艺范围内”一句，但用笔删去。该报告对围鼓的背景的解释也与上一个报告有所不同：“由于演唱围鼓专人较多，包括生、旦、净、末、丑各类角色，并且所用的全套乐器一般与戏班相同，个别爱好者往往无力购置，因此解放前围鼓组织大半附属于封建会门码头”，但不以营业为目的。但 50 年代初出现的围鼓，企图与曲艺的荷叶相“混淆”，以便取得“曲艺从业人员的身份”。荷叶座唱川戏为主，常唱七字句或十字句的韵文故事，使用铜荷叶子一片，板一付，竹签一根，单人演唱，因此围鼓与之“毫无共同之处”。见《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③《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日川戏玩友"、川戏教师、"反动军官家属"等。[1]他们都"以演唱为副业，并非一贯职业艺人"。过去打围鼓只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方法，根据这个报告，这次围鼓的复兴，却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每晚七八点钟开始"营业"，"大鼓大罗喧腾"，演唱"既不严肃，戏码也极芜乱"，以迎合"低级趣味，买座赚钱"为目的，甚至演唱"诬蔑历史英雄"的戏目。据称曲改会曾经出面劝阻，但未能奏效。"由于此处围鼓没有及时制止，各处袍哥玩友纷纷效尤"。他们"拉拢"曲改会中"落后艺人"，到处设这类的"书馆"，挂"曲改会xx组艺员"招牌进行营业。而且"变本加厉"，搞"客点客串"等花样，唱"淫荡猥亵"的唱词。除娱闲茶社外，打围鼓的茶馆还有青石桥中街的青园，东二道街的锦江茶社，荔枝巷的春融茶社，西大街的变通茶社等。一个开茶馆的居民还联络还有七位居民通过派出所，"以居民川剧组"的名义，向文化局申请备案。[2]

参加围鼓人员背景和分类 由于阶级斗争是1949年后共产党政府不断强调的主题，因此对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当然也首先是进行阶级分析。据《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称，到1955年5月止，全市发展围鼓12处，计有"从业者"86人，其中男60人，女26人，其成分大致分为5类：无业游民娼妓17人（占19.7%），失业川剧艺人8人（9.2%），城市贫民（包括家庭妇女、店员、手工工人、小贩、"迷信职业"者等）30人（34.86%），中小商人20人（23.25%），地主及"伪军警职员"等11人（12.8%）。报告称这些人的"历史政治情况极复杂"，其中国民党2人，三青团员1人，撤管特务10人，现管特务2人，袍哥大爷4人，一般袍哥19人，一贯道1人，撤管烟毒犯1人，甲长3人。他们的演唱"也较一般曲艺书馆混乱"，唱的内容都是"未经过整理的旧本"和"下流庸俗的表演"，说是在群众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他们在茶馆演唱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生意的好坏，而各处的成员也不固定，中间也有一些是"搞耍"的玩友，"偶尔唱两天"。[3]这个政治背景的分类法，很容易使当政者对此活动作出打击的决定，因为我们看到大多数参与者，都属于被新政权打击和控制的对象。

---

① 这个报告具体列出参加的姓名和职业（这里只给出姓）：严（负责人）：男，过去为灯影戏艺人；杨：男，手工业者；郑：男，小旅店主；许：男，自新人员，做临时工；罗：男，过去为灯影戏艺人；高：男，鞋业工人；何：男，川戏教师；杨：男，过去为木偶艺人；刘：男，小商店主；刘：男，川戏玩友；李：男，川戏玩友；陈：女，烫发工人；林：女，"反动军官家属，私生活极恶劣"。

② 《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报告稿——为报告"围鼓"滋生情况请示处理》。

③ 《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将这12处演唱情况大概分三类，第一类“在群众中反映最坏”，演唱内容、表演形象“极恶劣”，成员“成分复杂”。第二类是茶馆中荷叶川剧座唱，不过据报告，整个成都只有青年路的龙翔茶社和东御街的百老汇茶社，都是在1954年出现的，共有成员23人，但都不是“艺人成分”。①他们都是川剧玩友的自动组合，其演唱1955年前比较“混乱”，但由于报上对某些地方的围鼓批评后，“有了一些转变”，其营业方式改为挂牌。有些唱的内容“不健康”，“群众”以前“很不满意”，但最近“有些改进”。第三类属于挂牌演唱，派出所和“一般群众”不满的反映较少，共有4处茶馆，共有演唱人员40人。②他们演唱时唱词“很少乱加道白”。“据派出所所收集的群众反映”，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川剧座唱。每晚都是“大锣大鼓的唱”，在“群众”中未有坏的反映，但也“未有表示欢迎的意见”。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围鼓“不应成为一种职业化的戏曲形式在茶社内公开营业”，因为这是在“旧社会也是未有的现象”，而且大锣大鼓的演唱，“影响公共秩序”，所唱的内容“对人民有严重毒害”。另外，现有的从业人员，其中34人有副业，生活主要不靠此维持，因此应该采取“妥善的积极措施，逐步予以取缔”。③

但半年后，围鼓似乎还在发展。根据文化局的另一个报告，说是虽然提出了处理意见，但未“及时进行处理”，川剧围鼓从12处发展到14处，人员从95人（但根据上引调查报告为86人），增加到166人，“组织成员经常变动，演唱地点也不固定”。如过去的12处，有4处合并2处，有2处自动解散，实际上只留下8处，也就是说近半年来新设了6处（但该报告误为5处）。虽然仍然是座唱形式，但发展到化妆表演，内容“含有浓厚的封建毒素”，演唱时加了许多“淫秽下流的

① 报告说其中官僚地主2人，现管特务1人，撤管特务4人，袍哥4人，商人4人，失业艺人1人，失业工人2人，家庭妇女4人（其中1人是“反动军阀”的姨太太），旧职员1人。

② 即义学巷的裕记茶社、暑袜北一街的随园茶社、鼓楼街的芙蓉亭茶社、和人民南路茶社。这些人中有现管特务1人，撤管特务1人，国民党员1人，袍哥大爷3人，一般袍哥8人，失业艺人4人，“伪甲长”1人，“伪职员”2人，游民5人，商人5人，一贯道1人，家庭妇女7人。

③ 《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对话”。①报告指出“有些落后的观众说‘解放后要看这样的戏，只有到这些茶铺才看得到，又相因，又安逸’”，这里似乎透露出有观众欢迎围鼓。但另一个报告又称这些围鼓在“群众中的影响极其恶劣”，附近居民“纷纷向派出所提出‘赶他们走’，‘不准这些乌七八糟的在这里唱’”。这里似乎有矛盾之处，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观众对围鼓的不同的评价。据文化局调查，化妆围鼓的发展也是由于不少外县失业的川剧艺人“盲目流入城市”，如有参加川戏座唱者在“最近打击流氓盗匪运动中”被判处徒刑十年。说他们的演出方式也是“极不合理”的，因为采用的是“点唱形式”，把戏折子送到听众面前，点一折戏收一角至二角，送折子者“多是女的，她们就趁此机会给别人做怪相”，甚至还有“乱搞关系”。报告称东波茶社刘姓女演员“腐蚀”了一个唐姓建筑工人，便是从点戏“搞起来的”。但这里报告并没有说明“腐蚀”的具体情况，估计是他们发生了性关系。文化局还抱怨所在地派出所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②

根据文化局的调查，这些从业者组成了自己的剧团，有的与地方政府还有一定的联系，如一个称为“简阳县人民政府第四区工农剧团”（简阳为成都近郊）的班子，“农闲时拉人唱戏，农忙时解散”，通过区政府“滥发”所谓“离团证”，其中大半是“一贯‘跑滩’的旧艺人”。业主还以“收徒”的名义，“诱骗”“失学青年”，还被指责“引诱”农民“脱离生产”。其实，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农闲时干杂务，是四川农村长期形成的谋生方式。因此“农闲时拉人唱戏，农忙时解散”，无非是这种延续了多少年方式的继续。随着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干预，人们不能再保持这种生活方式。③

这个报告承认，参加此业的许多人是在剧团被解散或被处理离团时，“并没有

① 《围鼓现在的分布情况》，1955年12月，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39。如南门外西巷子大茶铺演《青梅配》，男人对他老婆说：“哈，看不出哩你土窑子还出广货啊！”当他看见一个老头子时，对老婆说：“你怎不借根线，把裤裆给他补好啊！”老婆回答：“那是一块腊肉在那里掉着……”，表演得“极其丑恶下流”。在芙蓉亭上演《欢娱楼》时，报告提到曾某的表演，后面括弧加注是“男妓”，说他故意做“淫荡丑恶的动作和声调”，以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另外的例子还有“穿起短衣乱扭”，包括表演1949年后从未唱过的本子如《调叔》和《龚裁缝裁衣》等。还把“比较好”的剧本“乱加乱唱”，使其变成了“坏剧本”。如外北小西天茶社唱《二堂释放》时，原词是“唯愿他夫妻二人百（白）头到老”，却被唱成“唯愿他两口子亲亲热热抱倒一头睡”。据称表演“更是丑恶下流”，举的例子无非是“挤眉弄眼”，观众称之为“眉毛跳舞”。见《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② 《围鼓现在的分布情况》；《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

③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1956年3月12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关于过去的这种生活方式，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章。

得到当地妥善有效的安排”。很多“不具备还乡劳动”条件的人回家后无以为生，“实际成为游民”，只好又回到成都，“继续其非法剧团活动”。因此许多人加入围鼓活动，看来也是无可奈何。他们以所谓“采（彩）排川剧书场”的形式以吸引观众，如张姓业主先在外北城隍巷小西天茶馆“采（彩）排”，又“广辟财源”，派“原系妓女”被“收容过”的女儿到牛市口诗清阁茶馆，“招纳来自各县的艺人”，组成“联艺书场”，出租“破旧”服装道具，收取“高额”租金，如一件“素女折子”，每晚收取租金 8 角。一些茶馆也“纷起效尤”，有的从外县拉角色摆书场，又“引诱”人投资买服装来“变相出租”，把这些“股东”分别以守门、售牌、管箱等职务，安置在书场“分账”，本人则以“经办人”、“代表”身份“袖手坐食其间”。由于“采（彩）排”能够吸引“落后群众”，所以茶馆老板“乐于接纳，并给予补贴”。这样租服装者可以“大赚其钱”，一般演唱者平均每天能挣 8 角至 1 元，以“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这样外县大批艺人和玩友“向成都集中”，从而“加重了围鼓处理工作的困难”。[①]从这个指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这些人仍然试图寻求途径谋生。从他们经营方式来看，并不存在任何违法或对社会有害的成分，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不允许的。

采取行动　1954 年 1 月 28 日文化局在其《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报告稿——为报告“围鼓”滋生情况请示处理》中，提出处理围鼓的意见。表示围鼓从其来源、性质、演唱方式、内容、营业情况等看，“可以认定这种形式既不是正当曲艺，没有发展前途，更不能作为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工具”。由于当时不承认纯粹的“娱乐”，如果不能作为宣传教育的工具，便被视为“不是正当曲艺”，因此当局以消极的眼光来看待围鼓也就不奇怪了。文化局认为这种形式逐渐向职业化发展，“如果听其流行，将会成为戏改政策推行的障碍，影响正当曲艺的演唱，并给以前搞过玩友的地主袍哥造成躲避劳动的机会”。其实，从后面的调查看，很多人都不是袍哥，但由于有旧袍哥身份者参加，为当局对这项活动进行打击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当局认为，这些人应该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改造，不该让他们有机会“躲避劳动”。根据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制止围鼓发展”的指示，成都文化局提出两条办法：一、由市政府通知纯化街及其他茶馆所属区人民政府，“制止该处围鼓演唱”，对其他围鼓性质艺人，在文化局和公安局进行“艺人登记时予以限制”；二、通知各公会，不得在茶馆及其他公共场所演唱围鼓，并“不得有营业行为”。[②]

①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② 《成都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报告稿——为报告“围鼓”滋生情况请示处理》。

在1955年5月8日《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中，文化局提出了三条更具体的处理意见：第一，市政府责成区委、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各有关部门，制止围鼓发展。第二，对现有的演唱人员，根据情况分别处理。失业艺人只准唱"好本"，一般失业人员无其他手段谋生者，暂时准唱，逐步让其"转业"，但如果家庭有副业和其他收入的"良家女子"，予以劝说"脱离此业，另就他业"；那些以围鼓为"掩护"，实际上"卖淫、敲诈或作其他不正当活动着，坚决予以取缔"。第三，加强对现有12处围鼓的"正面教育"，召开一次各围鼓"经办人"的会议，指出演唱中的问题，积极改进，同时"发动社会舆论"，对"乱唱乱演"的行为进行批评。[①]但是半年以后即1956年2月7日，市政府才开始了实际的行动，其拖延的原因并不清楚。由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对各区人民委员会、市文化局、公安局、民政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对现有川剧围鼓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根据文化局所提出的三条处理意见，指出："为了迅速制止目前川剧围鼓中不良现象的继续发展，文化局应即会同公安局、民政局及东城、西城区人民委员会分别指派专人抓紧时间共同办理，并于办理完结后，将办理情况汇报本会核备。"[②]

处理围鼓工作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月7日召开"围鼓经办人会"，对全体经办人"进行教育"，指出目前围鼓发展的"盲目性"，以及"乱说乱唱"在群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他们立即停止继续发展，将现有人员资料填报，改善演唱，"首先放弃化装"。本来围鼓由传统的比较随意的形式，发展到有化妆、服装的比较正规的表演，表明了由业余爱好到职业谋生的转化，由此可吸引更多观众，政府要求首先"放弃化装"，实际上即阻止其往专业化方向的发展。据报告称，以上决定宣布后，曾经遇到"普遍的抵触"。书场的经办人当时即"藉口有种种困难"，要求"暂缓执行"。报告称其目的在于"在混过春节以后，分散转移到郊区或外县继续活动"。但政府的"态度坚决"，当天即到各书场了解其执行情况，使大部分人"感到混不下去"，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出路"。2月9日，文化局又会同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集"茶馆经理会"，宣布今后未经许可，不得任意接纳围鼓，对现有围鼓，在统一处理之前，暂时维持现状。但报告透露，由于不准再化妆，茶馆感到"无利可图"，反而希望"及早结束处理"。[③]

① 《成都市围鼓座唱情况调查报告》。1955年底在《围鼓现在的分布情况》中，重申了这三条处理意见。

② 《成都市人民委员会通知》，1956年2月7日，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

③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工作组对演唱者进行“分类排队”，以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共分为六类。一、留唱33人，皆为“一贯艺人”而非新入业者，有相当演唱水平，无其他谋生手段，未犯过严重过失者。目前准许继续演唱，以后视各地剧团需要“酌情予以介绍”。二、暂唱43人，包括失业艺人，一般失业人员，目前无法还乡或从事其他职业者，准暂时演唱，材料转住地办事处掌握，逐步让其转业。三、暂唱转业24人，为原戏班的学员、年轻失业有劳力者，准暂时演唱，材料转住地办事处掌握，“优先协助就业劳动”。四、停唱61人，凡有其他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以演唱围鼓为副业者，通过“个别说服”动员其放弃演唱。五、还乡43人，在家乡有土地有亲人者，发给“处理还乡通知单”，“说服”回乡生产或其他劳动，如果有困难，由民政局补助旅费。六、收容21人，年老残废无生活能力者，予以“收容救济”和“改造”。另外，情况不明，尚需调查者17人。①

第二阶段，于2月18日召集部分围鼓演唱者和经理人30余人开会，在“较大范围内对他们进行教育”，即结合国家的“发展形势”，从围鼓演唱者的来源，演唱能力，节目内容各方面“分析围鼓的前途”。指明了演唱围鼓“不是一种正当的生活出路”，然后提出对围鼓人员的处理办法，“组织他们讨论”，据称“得到了一致拥护”。从这些与会者中吸收了八人成立“整顿小组”，布置他们立即开始在各书场动员说服能还乡者还乡，能停唱者停唱，并“逐日汇报工作情况”，他们在推动处理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一些人开始还乡。2月20日，召开“全体围鼓人员大会”，提出了各项处理办法，由“整顿小组”领导讨论，“收效很好”，当时便有人“认清前途”，表示“愿意放弃此业”。如有人说“我们仍旧愿意回去做家庭妇女”。另有妇女说，“以前参加书场，只当是找到了工作，免得在家受闲气，现在才晓得打错了主意。”从2月21日起，经过“整顿小组”通知还乡者办理手续，对不愿还乡或停唱者进行说服。2月23日~26日，整顿小组再度审查演唱者材料，对名单补充修改。到2月24日，全市已经有五处围鼓“无法营业”，“采（彩）排书场”还乡人员不断增加，留下演唱者不断减少。②当强大的国家机器动员起来向这些无靠无助的小民进行打击时，这里所谓的“一致拥护”，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们是否拥护，并不能改变他们被改造的结局。

第三阶段，为了保证围鼓书场“逐步缩小”，工作组于2月28日将全部处理停唱、暂唱、暂唱转业的人员的材料通过各区人民委员会转给街道办事处，“结合社

①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②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会救济，尽可能协助他们转业劳动”。3 月 1 日，召集处理停唱人员，进行最后动员。对以演唱围鼓为副业、“一直抱观望态度”者予以“揭露批评”。对一般家庭妇女则向她们指出演唱的“坏处”，“委婉加以说服”。据称，“大会收到了如期的效果，顺利地结束了全部处理工作”。3 月 4 日，整顿小组对留唱和暂唱者进行调整，分成“三大”（围鼓）和“三小”（荷叶）6 个组，选择牛市口的诗清阁、东御街的百老汇、南打金街的宝林轩、鼓楼北一街的芙蓉亭、天涯石东街的四明、上南大街的东波等茶馆，作为演唱场地。当天，文化局工作组通过市公安局、各有关派出所“停止了全市围鼓演唱”，宣布成立的 6 个组自 3 月 5 日起开始营业。如果以后由于转业“不能开锣演唱时”，应通知文化局撤销书场，剩余人员重新编组。①这也即是说，虽然打围鼓不能立即全面禁止，但利用政策限制的办法让其最后自生自灭。

文化局报告总结道，“这次处理围鼓工作，由于上级指示明确，各有关部门取得配合，并由于处理工作与正面教育相结合，工作中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因此进行得比较顺利，基本上完成了规定的任务。”从 1956 年 2 月 7 日到 3 月 4 日，所有被政府称为“非法组织”、“临时性质”的“流动剧团”都被解散。对分布在全市 17 家茶馆内的围鼓演唱者 242 人，“按其各个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予“适当的处理”，计“停唱”74 人，“还乡”50 人，“收容”1 人，以上三类共 125 人，占总数 51.7%；“留唱”36 人，“暂唱”55 人，“暂唱转业”26 人，以上三类共 117 人，占总数 48.3%。以上这些数字与上面提到的工作组分类的数字有所不同，说明在“分类排队”后进行具体处理时，根据情况进行了调整，其中“留唱”、“暂唱”、“暂唱转业”、“停唱”、“还乡”各类都有所增加，但只有“收容”一项由原来的 21 人，减为仅 1 人。文化局撤销了 11 处“围鼓书场”，把继续演唱的 117 人分为 6 个组，“安置在指定地点座唱”。②

但文化局认为整顿后仍然存在若干问题：首先，为了达到缩减演唱人数的目的，在分组时有意采取“唱角好坏兼搭的办法，使演唱者得不到丰厚的收入，从而刺激他们渐次转向正当劳动”。并把材料转到有关街道办事处，要求其尽可能协助他们转业。但各街道办事处对“围鼓演唱是否（是）正当职业”，与文化局“未取得一致认识”，有的对此事“不重视”，有的“置之不理”。因此有十余人“自行离开本市”到外县成立剧团。其次，由于就业困难，所以对“暂唱”和“暂唱转业”的都没有规定具体期限，“形成了围鼓演唱的稳定局面，使处理工作不能一气进行”。再

①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②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其次，处理围鼓时，曾经“考虑到如何使围鼓演唱转化为业余性质”，但由于上述两项的问题，“无法作出具体安排”。最后，处理围鼓工作结束后，各有关部门对围鼓演唱活动如何进行管理没有一致意见，最近发现在下北打金街又有一批“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围鼓”，但“未能有效制止”。针对上述情况，文化局提出三个办法：首先请省文化局通知各县文教部门，“有效地限制非法剧团的活动”，就地解决演唱人员的生活问题，“避免他们外流”。然后请市人民委员会通知各区人民委员会，“继续贯彻限制围鼓发展的决定”，协助现有演唱者“参加劳动”。最后加强对“群众业余围鼓”的“管理辅导”，保证其“演唱内容的健康”。在职业围鼓逐步缩小以后，将其中优秀的唱角，分别介绍为业余围鼓教师，由聘请单位发给津贴和生活费用。①

从改造围鼓后存在的问题和文化局提出的进一步建议看，政府发现对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围鼓，很难完全禁止，政府所特别关注的主要是那些以此为生者。所以退而求其次，力图对“群众业余围鼓”进行“管理辅导”，以保证其“演唱内容的健康”。这可以算是传统娱乐对国家权力反抗的一个妥协的结果。不少人进行围鼓活动，生计问题是主要因素。政府撤销许多剧团，使很多人失业，才促成围鼓发展。虽然政府不愿承认这点，但从报告中仍然暴露了这个问题。如第一类多是“脱离剧团”者，第三类，多是“原经动员转业的（剧团）学生”。所以即使在处理围鼓后，甚至许多人被送到乡下，由于不能解决艺人的生计问题，不少人只好返回城市，重操旧业。这种反复固然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生活所迫，但也未必不可以说是当时“弱者的反抗”的一种形式。

曲艺艺人调查——“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大众娱乐领域的全面实施

1955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根据中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总方针”，以及四川省文化局《1955年文化工作计划要点》，成都市文化局从8月到11月的四个月间，对全市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其目的是在普查的基础上作出规划，以便进一步“加强其政治思想领导”，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对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便使他们发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应有的作用”。这次调查也

① 《处理围鼓工作报告》。

是为了“掌握本市曲艺从业人员和演唱场所的基本情况”，以便于文化局“进一步加强领导管理”，而且“遏制曲艺从业人员中之演唱混乱与盲目发展现象”。这次调查范围包括全市民间职业剧团，如戏曲、杂技、木偶、皮影、书场等。还包括全部艺人，即清音、扬琴、荷叶、评书、金钱板、大鼓、竹琴、相声、花鼓、口技、幻术、猴戏等。①

调查的组织和步骤 这次调查由文化局戏曲科干部为主，抽调区文化科干部以及一些剧团干部，组成“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普查工作组”，由戏曲科负责人担任组长。在工作组下到剧团后，吸收该团“积极可靠”的负责人三五人参加工作。“为了更深入了解各剧团工作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还请市公安局派两三人参加调查。参加调查的干部先集中学习四天，明确普查的目的、方法、党和政府“对戏改良与民间职业剧团的方针政策”。调查者应尽量避免影响剧团和曲艺艺人的正常演出；如果“发现有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则会同有关机关处理。调查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团结剧团干部，依靠积极分子和老艺人，采取各种方式深入调查，防止“走马观花、简单急躁、包办代替”等问题。另外，对艺人的“思想作风”问题，不得开展“群众性的批评或自我批评”，不得“形成斗争”，而应该“积极热情的进行正面教育”。强调了集中领导，如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重大问题的处理决定，必须事先请示，并定期汇报研究工作。②这里所谓的“思想作风”，实际上应该是指“思想”和“生活作风”。当时共产党对艺人的基本估计是思想落后，生活作风不好。但这时政府避免激进政策，对这类问题不进行“斗争”，而是采取“正面教育”，较之以后的政策要温和得多。

调查分三个步骤 首先，“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具体办法是通过文化局负责人进行普查工作的动员报告，学习文化部的指示，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等形式，“交代普查意义，消除顾虑，发动群众”，使多数艺人能积极参加这个活动。另外，还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作为普查和今后工作的依靠，“抓紧对落后艺人的教育”。③同时还进行“摸底排队”，即“摸出剧团历史、业务、组织主要情况、主要

---

① 《成都市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调查工作计划》，1956 年，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成都市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调查工作计划》。

③ 学习文件包括三种：文化部和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指示》的有关章节；文化部《关于加强对民间职业剧团的领导和管理的指示》；夏衍在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为提高和发展新时代的戏曲艺术而奋斗》戏曲改革当前任务一部分。见《民间职业剧团调查提纲》，1956 年，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

问题，积极、中间、落后人数等”，然后进行研究。第二步，普查。在工作组的具体领导下，每个剧团成立业务、财务两个组，另外组织人员了解艺人历史、政治情况和学习情况，研究和总结1953年以来剧团的工作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步，总结普查工作，帮助剧团做好工作规划。在调查结束后，各种调查表格和文字材料一式三份，分别存区、市、省文化局。凡经过调查后的民间职业剧团由市文化局报请省文化局发给“演出证”，职业曲艺艺人由市文化局制发“演唱证”，并报省文化局备查。在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今后民间职业剧团及其曲艺艺人工作规划，将川剧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分别交由各区文化科领导。[①]宣传发动群众、摸底排队把人们分成左中右的方法，是共产党进行群众运动的一贯策略，从而可以依靠一部分人来控制另一部分人，经常是行之有效的。

调查内容 根据文化局所拟定的调查提纲，我们得知调查的问题主要有八大方面：即剧团沿革、组织、人员、演出、学习、经济、剧场、环境。关于剧团沿革的问题有：何时何地成立，经哪级政府批准，是否经过整顿，整顿后有哪些变化和改进？剧团组织：组织形式，设立哪些机构，各部门如何分工，有无一定的工作制度和会议制度，剧团内是否建立了党、团组织，党、团员是多少？人员情况：剧团组成人员的成份、出身、政治情况，原艺人多少，1949年后新参加的多少？现有人员中演员、音乐、舞台、职员、学徒人数，各占全团人数比例？各行角色有多少，哪些是主要演员，文化程度如何，专长哪几个戏？人员是否固定，近两年变动情况，是否报当地文教科批准，有无乱拉演员或变相收留其他剧团演员现象？演出情况：经常上演的剧目大幕戏、折子戏有多少，其中经过整理、改编多少，剧目自己整理、改编或创作多少，有多少保留剧目？剧团或团内演职员收藏有哪些传统剧目的原本，上演过哪些表现现代生活的剧本，剧目上演计划和送审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哪几个戏最受欢迎，连续上演次数最多是多少场，有无导演制度，如何排演，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等状况如何？ 1955年度在剧场演出、在农村巡回演出日期、场次、观众数？学习情况：政治学习是否经常进行，学过哪些文件，现在学习什么文件，是否进行过扫盲工作，现在有多少文盲，业务学习（练身段、嗓子、武功、业务理论等）如何组织进行，学生家庭出身工农成份比重，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经济情况：经济上如何管理，是否建立财务制度及执行情况，1953~1956年3年的收支情况，能否到达平衡，有无公积金，1955年全年支出有哪些项目，各占比例多

① 《成都市民间职业剧团和曲艺艺人调查工作计划》。

少，演职员工薪分配方式，工资是否固定，最高最低是多少，平均多少？剧场情况：有无固定剧场，剧场何年修建，有无培修或改建及经费来源，如果剧场属于政府或团体，月租金是多少？地方环境：经济条件及交通情况，本城市有无其他文娱场所？①可以看到，这是一次非常详细的调查，囊括了关于曲艺行业和艺人的几乎每一个方面。

调查结果与从业者概况 目前从档案中可以见到的《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总共调查了全市曲艺从业人员405人，以及东城、西城、望江三个区的105个曲艺演唱场所的情况。全市有13种曲艺形式：金钱板、荷叶、花鼓、评书、竹琴、扬琴、大鼓、相声、口技、清音、京戏清唱、木偶戏（调查中称“木人戏”）、皮影戏等。这405人中，其中219人为1949年前的“职业说唱者”，186人是之后进入本行的（1950年：42人；1951年：20人；1952年：49人；1953年：23人；1954年：32人）。这些新入业者分三类，一是生活困难，无固定职业，或失业的“城市贫民”、手工工人、店员、家庭妇女、自由职业者、学生等，共88人；二是1949年后“被斗争、被管制和失去地位的地主、伪军警、旧职员及反动党团分子等”，共61人；三是“旧有的社会渣滓、迷信职业者、游民、娼妓等”，共37人。这三类人中，虽然大部分从业时间不长，但有“相当业务水平，并以此为生”，但少数人从业不久，兼有副业和其他收入，“演唱水平低和以曲艺为掩护来混饭吃的”。②显然，第二和第三类都是属于有问题的人，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按照这个统计，他们所占的比例在行业中甚高，两类相加近百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从这个报告进一步提供的这些人的政治背景看，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比例实际上更高。根据派出所给文化局提供的资料，405人中有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9人，“撤管特务”17人，国民党校级军官6人，“封建会道门头子”9人，“烟毒犯”13人，“参加过暴乱组织的政治土匪分子”3人，“伪保长”1人，还有身兼若干身份的“一般党团分子”24人，“封建会道门分子”89人。因此该行业中，有171人即42%有“政治问题”。所以报告的总体估计是：“这些人大部分是解放后经过自新撤管的分子，混进曲艺界的，少部分是解放前的职业艺人。思想作风一般的不好和比较恶劣。他们从事曲艺演唱一般是为了维持生活，对人民的曲艺事业缺乏认识。个别人对党和政府心怀不满，有意借曲艺演唱散播不满情绪和进行隐蔽活

① 《民间职业剧团调查提纲》。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动。”报告中举了一个张姓相声演员的例子，说他系“伪职员出身”，1949年前与国民党高级军官“有密切联系”，利用军用飞机来往香港做走私生意，1952年“混进曲改会，伪装进步”，但1954年因“政治问题”被捕。[①]这个例子说明这个相声演员的主要麻烦是他的“历史问题”，而非在当时有什么违法行为。1949年以后，“历史问题”对个人命运影响甚巨，在同一行业内有如此多的人有“复杂”历史背景，显然对整个行业都是非常不利的，自然成为政府密切监视的对象。由于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使他们的生计和社会处境都更为艰难。

在405名从业人员中，以讲评书者为最多，计117人，占总数的28.9%，其中只有43人为1949年以后从业者，其余大多数艺龄比较长，“文化程度较高”，收入“普遍较好”。其次是清音艺人（包括京戏清唱），共113人，占总数的28.4%，其中女性占大多数，与评书不同的是，她们多是1949年后入业的，报告称“部分人生活作风恶劣，往往以演唱作掩护，进行卖淫诈骗等不正当的勾当”。他们收入情况不等，一般“可以维持生活”。再次为竹琴、扬琴艺人，共73人，占总数的18.2%，以盲人为主，艺龄年龄均较长，但“文化程度低”，生活比较困难，“部分人有时还不能维持生活”。第四为木偶、灯影戏，共46人，占总数的11.3%。其中多为1949年前的“玩友”，艺龄不长，但年龄较长。收入木偶不如灯影，但均可“勉强维持生活”。第五为金钱板、荷叶、花鼓艺人，共41人，占总数的16%，其中1949年前的“旧艺人”占多数，“形式简单，收入较多，生活不困难。”第六为大鼓、相声、口技艺人，共11人，占总数的2.7%，多为1949年前艺人，“收入情况较好，可以维持生活。”[②]从这个调查看出，除评书和清音外，其余曲艺艺人在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多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从业者。报告对他们生活状况的几种说法，“可以维持生活”、“勉强维持生活”、“不能维持生活”等，皆反映了这个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清音艺人 目前从档案中所看到的调查结果仅是一个囊括各曲艺形式的总报告，其实这个总报告应该是在各曲艺形式的分报告基础上完成的。在现存档案中，我没有发现这些分报告，不过根据稍后一点的《曲改会清音组艺人情况调查材料报告》，我们对清音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清音组有会员104人（上述调查为113人，这个调查的时间要晚几个月，故有不同），分清音一组（清音），清音二组（京戏清唱）。一组有会员72人，除19人流动于市区茶社演唱外，其余都在外北市场

①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三个书棚内演唱。二组有32人，除5人在外演出，其余都在春熙南段的益智茶楼和后子门的劳工茶社。该报告说清音组是曲改会中人数最多、“成分最复杂”、流动性大的一个组，所以文化局选定该组作为调查对象。根据组内的“积极分子的反映”和调查组“掌握的现有材料”，在组内选出“历史不够清楚、问题较多”的43名会员作为重点进行调查，以下是调查结果：艺人12人，家庭妇女5人，小商人1人，手工工人1人，旧职员1人，伪军官2人，兵痞1人，流氓1人，娼妓人18，出身不明1人。她们的收入（天）：6 000~8 000元（1955年颁发新版人民币之前）者有8人，4 000~6 000元20人，4 000元以下15人。报告对他们的“业务水平”判定称：一组内“无水平较高者”，二组“无一人能演唱四川清音或其他曲艺形式。仅能清唱京戏，水平均不甚高”。但在“业务分类”栏下，“以此为生，在本市有户口者”的艺人，“一贯从事曲艺工作，有相当水平”者2人；从业不久但有“培养前途”者1人，“非一贯从事曲艺工作，水平低”者12人。以曲艺为“掩护”，进行“秘密卖淫”或其他“不正当职业”者，据派出所的材料有5人，有4人有“卖淫嫌疑”，但尚无材料证实。①

前节提到的普查对清音微词颇多，并没有清楚说明有问题的“部分人”占多大比例，但是从这个关于清音的具体统计，在104人中，便有18人曾经是娼妓。但问题在于，在1950年对娼妓进行改造时，她们是作为“受害”的“姐妹”“解放”加入新行业的，但在对曲艺进行改造时，她们又成为一个“坏因素”，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关于清音艺人“生活作风恶劣”、“卖淫诈骗”等，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是基于社会上的行业歧视、偏见或流言飞语。

演唱场所 演唱场所分为三类共145处。第一类比较正规，即“带示范性质”的前面所提到的两处“试验书场”；第二类是供各种曲艺形式的茶馆132处（未包括郊区）；第三类是“书棚”11处。两个书场情况前面已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主要介绍后两类。这次调查说明成都曲艺演唱主要是在茶馆里，其中东城区59处，从业者共131人，每天演74场；西城区47处，从业者共105人，每天演61场；望江区26处，从业者35人，每天演30场。②这三个区每天演出总计达165场。可以看到，在50年代中期曲艺的演出场次还是很可观的。我们并不清楚每场一般有多少观众，但考虑到当时茶馆观看曲艺几乎是一般市民唯一的娱乐，可以估计数量应该不小。

① 《曲改会清音组艺人情况调查材料报告》，1956年，成都市档案馆馆藏成都市文化局档案：124-1-83。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茶馆演唱时间都在下午和晚上，其中以评书为最多，占54%；其次是金钱板、荷叶、竹琴、扬琴等，占33%；木偶、灯影戏最少，每天各一场。茶馆和艺人的关系一般是艺人得到茶馆同意，约定演唱时间，演出中“茶费、书费各自收取”，艺人和茶馆之间“尚未发现其他关系”。其他演员人数较多的形式，如灯影、曲艺剧等，艺人每天还要向茶馆交付房租电费等。关于所唱内容，调查报告认为这些演出多是“未经整理过”的“含有毒素的旧唱词”，因为他们演唱的目的是“招徕顾主，维持生活，因此不顾形式内容，乱说乱唱，甚至表现下流庸俗动作”。不过调查报告对曲艺也有正面评价，表示有部分艺人的说唱是“经过整理推荐的优秀传统节目”和“反映现代生活的新书词”，所举的例子包括学道街雨棚茶社、柳荫街的明远茶社、鼓楼北二街的不二楼茶社等的评书艺人，“经常讲一些好书，间或也讲一些反映新人新事的新书词”。报告说这种说新词者逐渐增多。①

书棚全部集中在外北市场，演唱形式有清音、金钱板、荷叶、花鼓、竹琴、灯影、木偶、曲艺剧、围鼓等，共有从业者98人，占行业总数四分之一。书棚是全天都有演出，调查报告称“乱说乱唱和下流表演比较普遍”，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最为不好”。报告还说他们演唱水平一般不高，流动性大，“生活作风不好”。甚至指责有少数艺人“与流氓盗窃分子有联系”。报告中列举若干人名，其中一个是金钱板、四个是清音艺人，“由于卖淫、偷窃、诈骗等均被拘捕劳改过和正在劳改中”。②书棚比茶馆演唱的条件更为简陋，所处的外北市场，可知观众多为乡场之农民，消费自然比城内更低廉，演唱当然更属下里巴人。在这里演出的艺人地位更为低下。虽然在乡场的演出在帝国晚期和民国历来比城内都较少受精英和政府的直接干预，但这时却无疑在新政府的严密观察之下了。

调查发现的问题　通过这次调查，文化局总结认为这个行业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是“组织混乱”。由于曲艺艺人分散，流动性大，加上“我局几年来对曲艺艺人放松了管理与教育”，因此造成了“盲目发展与组织混乱”的情况。报告称，全市艺人人数从1950年前的219人，到现在的405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未引起我们及早注意而采取有效办法加以适当限制”，对他们也未进行过“深入细致的了解与审查”。虽然1952年建立了曲改会，但“机构不健全”，不能起到“协助政府团结教育”艺人，以及“改正曲艺业务”的作用。在曲改会之下，全市曲艺艺人分编为六个大组，但缺少“按地区建立统一领导的组织”进行有效管理和教育，缺

①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乏全面、系统进行戏曲业务政策学习，仅限于作“大报告”，未能联系和解决实际问题。1956年4月文化局召开了第一次全市曲艺从业人员会议，进行比较系统的集中学习，“扭转了演唱中的混乱现象”，但对这两年发展的从业人员还未进行过管理教育。[①]这里报告所说的艺人人数“增加一倍”是缺乏根据的，不能因为现有219人是1950年前从业的，便称1949年时全成都只有219人从事曲艺演唱，实际上许多艺人1949年后改行。曲艺从业人员到底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还需要进一步资料证明。

第二是“乱说乱唱”与“下流表演”。调查报告认为艺人“成分复杂”，对“人民曲艺事业缺乏认识”，加上“未抓紧管理教育”，出现了全市曲艺演唱中的“严重混乱现象”。所谓的混乱现象，即集中在外北市场的书棚和部分分散的茶馆中，不少艺人经常“说唱淫乱、神怪、迷信”的内容，以评书、清音、金钱板三种曲艺形式最为严重。如评书、金钱板中的《双贵图》、《封神榜》、《大清传》等，清音说唱的《十八摸》等都是“含毒最重”的“坏书及淫词”。什么是“淫词”呢，我们可以看到报告中的例子：在唱《断桥》时，故意把原词中的“一把手拉官人桥上坐”，唱成“一把手拉奴的嫩东东的官人夫（扶）在怀中坐”，有些人还故意做出“种种丑恶表情”和“下流动作”来逗人嬉笑。报告认为这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起的“危害”极大，举例说一个小学生每晚到双栅子街的“上天梯茶楼”听“剑侠书”，但“听迷了心”，一天在街上见一辆汽车迎面开来，他不慌不忙卧倒在街心，嘴里念道：“我有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汽车也辗不死”。另一例子说由于人们到茶馆听“神怪迷信”故事，影响了“晚上开会学习”。[②]从上可见，关于“淫词”的指控，无非一些带有性暗示的搞笑语言而已。至于说人们晚上去茶馆听故事而不去开会学习，间接透露了大众文化对大众的魅力。小学生听了书受误以为“刀枪不入”，此类例子从义和团以来便屡见不鲜，“迷信”从晚清以来便是精英和国家打击大众文化的最好借口。

第三是“不良作风”。报告称少数艺人“生活作风恶劣”，具体的例子有“强迫观众点戏给钱”、“乱搞男女关系”、“敲诈别人钱财”等。还有个别艺人因为“侮辱妇女、强奸幼女、贩毒、诈骗、腐蚀干部青年”等行为，而受到“法律制裁”。一个金钱板艺人因“先后侮辱妇女卅余人”，在1956年的“打击流氓盗匪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个清音艺人唱“淫荡词调”和进行“不良表演”，曾一次与三个人

①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发生不正当关系”，“骗取”旧币9万元。还有“以点戏勾引观众”，一旦发现“某观众有钱，便勾搭别人去吃馆子，开旅馆，直到把别人的钱弄光为止”；还有个艺人“以色相勾引”一个皮鞋匠，骗了该工人100多双皮鞋，最后这个工匠只好靠拉板车为生。[①]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曲艺艺人的背景复杂，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一些人的不法行为也使整个行业的形象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

采取的措施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情况，市文化局的结论是成都曲艺艺人“在组织和演唱上的混乱现象是很严重的”。提出改变这种状况的三项措施。首先是“整顿组织”。以市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通知各区人民委员会，市公安局责成各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严格控制成都曲艺从业人员，不再“继续盲目发展”。对“个别”具体条件申请从事曲艺演唱者，必须经过区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并报文化局备查。根据调查情况，对曲艺人员进行整顿，对现有的曲艺人员“分别排队”，以“适当处理”。对有业务水平、有本市户口者，发给“曲艺演唱证”，准予进行演唱。对业务水平低，无发展前途，或兼有副业和其他收入，在本市有户口者，“分别劝说其转业”。如果生活有困难者，可允许继续演唱，但发给“临时演唱证”，以便逐步处理。对那些以曲艺为“掩护”，实际上“卖淫”、“乞讨”、或其他“不正当”活动者，不准继续演唱，另作安排处理。整顿成都市曲改会，按区在艺人中建立统一领导组织，使其“真正”成为在政府领导下，“团结教育艺人”，推动曲艺的“群众组织”。[②]

第二，“改进和丰富说唱内容”。停止说唱那些“含毒最重”的“坏（评）书”。什么是“含毒最重”的呢？文化局指出，即那些“十分色情淫秽”、“神怪迷信”以及“侮辱劳动人民”的节目和唱词，包括《济公传》、《十美图》、《思秀才》、《十八摸》等。如果是那些“含有毒素”但“危害不大”的节目，则允许继续演唱，“边唱边改”。文化局还要求对节目进行登记，通过“集体讨论，初步排队”，然后由“曲艺艺人编写组”，会同有关部门和政府干部“进行审查，决定取舍”。对决定停止的节目经“领导批准”后，将“正式宣布取缔”。报告称“此项工作现已进行”。同时推广说唱新书新词，发挥两个试验书场的“示范”作用，要求它们每月作一场

①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小型、每季作一场大型“示范演出”，组织全市曲艺艺人进行“观摩”。[①]另外，整顿“曲艺编写小组”，发动艺人挖掘整理传统节目和结合“中心任务”节目，由两个新书场上演。

第三，“加强曲艺艺人的政治和业务学习”。组织“中心学习组”，每周一次政治时事学习，一次业务政策学习。由中心学习组辅导各小组学习。政治学习按全市“戏曲艺人学习计划”统一安排。业务学习则包括“有关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和戏曲改革的政策。[②]政治学习是共产党进行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式，曲艺艺人由于其工作性质，是一个非常散漫的群体，政治学习无疑有助于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控制。

结　论

1950~1956年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传统娱乐与社会主义娱乐并存，但传统日益受到打击、控制、改造，社会主义娱乐日益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反映了传统娱乐与革命文艺间的冲突，在国家机器的干预下，传统大众娱乐活动逐渐衰落，为充分政治化的社会主义娱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在演出团体派遣干部、建立财务制度等这种管理结构的变化，既是由过去戏班子家庭性经营发展到现代的企业化管理，亦为党和国家权力成功地渗入地方文化基层组织的过程。从50年代开始，我们便看到了文艺演出必须结合“中心任务”，这个“中心任务”在各个时期是随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等。文艺演出因之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方式的兴起之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之所以致力于对大众娱乐进行干预，还在于其认为传统的大众娱乐不能成为宣传和正确引导人民思想的工具。这种看法并非共产党政府所独有的。曲艺演唱过去被社会作为下里巴人，艺人为生存当然必须以“媚俗”来吸引观众。这时文化局在报告中所用的词汇，诸如“恶劣”、“丑恶”、“下流”等，都是晚清以来精英和国家攻击大众文化时所反复使用的，是正统文化建立话语霸权的一部分，其效果是

①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观摩是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所谓“观摩”即是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种活动虽然主要是指文艺演出，但也经常用在学校教学、生产单位的示范等。到60年代，由于商业性演出基本上不存在了，一切演出都成为宣传的一部分，因而观摩成为人们观看文艺演出的主要形式。

② 《成都市曲艺从业人员及演唱场所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

屡试不爽。显然，至少从所举例子看，这些所谓的“危害性”被严重夸大了，共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这个传统，并将这种观念进一步推向极端。在1949年后的革命话语下，任何表现日常生活中打情骂俏、性爱等语言和动作都非常容易被纳入这个类别，定义为“有毒素”的娱乐，因此对他们的改造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从晚清、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和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对大众娱乐态度这个问题上，其政策的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①

打击围鼓便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政府对围鼓所持的否定态度，作为一种爱好和消闲的手段似乎基本成为不可能。其实围鼓的复苏有着复杂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国家对文化娱乐活动的严密控制，不仅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而且不少人失去了生计，唱围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府不承认唱围鼓为“正当职业”，竭力断绝他们的这个谋生之道，但是区一级的政府对属下的生计问题更有直接的责任，因此并不像上级领导那样主要思考建立革命娱乐或社会主义宣传阵地这样的大问题，在处理民间艺人的问题上比较消极，所以文化局对此颇有微词。这反映出在建立社会主义娱乐的初期，国家权力虽然已经强大到可以改变社会最基层的休闲活动，但这种努力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对曲艺的改造不仅造成了娱乐形式和内容的改变，而同时也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当时政府将许多在成都谋生的艺人强制“返乡”的政策，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城市生活的消极观念，即城市是不从事生产、养寄生虫、百弊丛生的地方，确信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送到乡下，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对他们的改造，也是共产党政权城市改造的一部分。但与这个观念矛盾的是，政府却给了城市和及其居民许多农民所不能享受的特权。后来户口制度的产生，更创造了城乡不可逾越的界限。迫使一些艺人“返乡”，实际上便是把他们驱逐出城市，当他们无法在农村生存时，不得不回到城市，重操旧业，并由此与国家的政策进行抗争。

在取消围鼓演唱过程中，许多妇女不得不回到使她们“受闲气”的家门。在革命的话语中，妇女解放、走出家门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而取消围鼓时有妇女表示“仍旧愿意回去做家庭妇女”，在政府的报告中却是以积极的口吻表达出来的。取消围鼓，把她们又赶回家门，并成功地说服她们认识到出来打围鼓，是“打错了主

① 姜进在研究1950年代上海的文艺改革时，从不同的角度涉及持续性的问题，指出“五十年代上海的社会政治转型多方面地继续了民国以来政治与文化现代化的走向”。她认为1949年政权交替并没有切断“文化现代化”的体制化、专业化、和国民意识建设。见《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第495页。

意”。这与共产党的妇女解放和独立的一贯主张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但这却是政府现阶段所竭力推行的政策。因此，对新政府来说，建立革命的娱乐问题比妇女走出家门更为重要。

50年代所作关于曲艺行业的若干调查，为新政府制定改造和控制政策奠定了基础。从晚清到民国，地方政府进行过很多次类似的调查，但没有任何一次是如此的事无巨细，这也反映出新政府的社会控制之能力，所提供的信息则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由此知道每个剧团的历史、现状、人员组成、政治背景、演唱形式和内容、营业状况、内部管理、财务、训练、学习、演出场地、工资等等。为我们了解50年代成都曲艺整个行业状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也成为这篇论文的基础。但是，应该意识到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调查都是由政府组织完成的，其打击、改造、控制的政治动机非常清楚，因此焦点放在这个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很难说是全面和公正的。

从50年代前期共产党政府对曲艺行业所采取的政策看，虽然带有强制的倾向，与随后的政策相比，应该说还是采用的是比较渐进的方式，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而非简单的“一锅端”。不过，无论方法怎样的不同，其改造和控制的基本目标是不变的。50年代是社会主义娱乐逐步形成时期，即从传统节目到完全革命文娱的转变。与60年代传统节目基本被禁止的情况不同，这个时期国家没有试图消灭传统戏曲，在鼓励新戏曲的同时，允许旧戏曲的存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时挖掘整理传统节目是整个文艺政策之一部分。但随着大跃进、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政治逐步按毛泽东的“左倾”激进主义发展，传统中国文化和大众娱乐被完全抛弃，成为所谓“革命文艺”的一统天下。

在1950年代初，戏曲团体和演出逐渐被纳入了国家控制的体制，这是建立国家主导的革命文化的重要过程。姜进关于1950年代上海的文艺改造的研究，是近年对人民共和国早期文艺转型的开拓性研究之一。她对这个时期国家的干预活动的结果，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指出“五十年代在体制化方面的努力虽然带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的烙印，却仍不失为超乎于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努力。“文革”后娱乐领域经历了非意识形态化和政治淡化的过程，但五十年代体制化建设在许多方面为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①]的确，当国家把演出团体纳入体制之

① 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第496页。

内，国家的包养使许多地方戏曲从某些方面得到发扬，纳入体制内的演唱艺人也不再有衣食之虞。但受包养是有很大代价的。一方面是得国家承认者才能生存下去，甚至可以一度繁荣，但没有纳入体制的民间文艺和艺人则快速消亡，有深刻社会和人文土壤的成都围鼓，便在国家的打击下迅速衰落。另一方面，任何文艺形式和艺人一旦被纳入体制之中，便成为宣传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具，一切演出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因此从形式上看可以说一些艺术形式是趋向繁荣了，但从内容上来说只能是走向高度的一体化，与真正艺术的繁荣正好背道而驰。

利用国家权力对文艺生活进行干预，对一个从艰苦斗争中取得政权的政党来说，是毫不奇怪的。通过“新文艺”和“社会主义娱乐”宣传革命和革命精神，以为新政权的巩固奠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也应该是逻辑的发展结果。不可否认的是，宣传英雄事迹、提倡爱国主义、发扬革命精神、灌输国家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刚刚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革命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的确使共产党和新政府在短时期内，控制了社会、思想、和日常生活。对不少过来人来说，1950年代留给他们的历史记忆是令人鼓舞、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受到鼓舞，以为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民族国家的锦绣前程添砖加瓦。但问题在于，当这种党和国家干预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对传统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荡之时，革命文艺完全排斥传统及其他性质的文艺，达到非我即诛的地步，对民族文化的摧毁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年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张　藜[①]

摘要：论文以中国科学院为考察对象，选择1949~1966年这一时段，立足于档案、日记、回忆等史料，对科学家包括工资、住房和福利待遇在内的经济生活状况与社会声望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科学家的阶级属性与科学家职业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杂地位和命运。他们依靠专业训练从事智力劳动，但其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均依附、取决于执政党的高层领导集团甚至个人对于科学、科学家的认识及所采取的相应政策，而不具有独立性、自主性。

关键词：科学家　经济生活　社会声望　华罗庚　中国科学院

“社会阶层”，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用以指称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在西方社会学中，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提出对社会成员进行阶层划分有三重标准，即经济标准（财富）、政治标准（权力）和社会标准（声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个标准的重要程度会发生变化，因此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确定优先的分层标准，即分层中轴。社会生活中的某一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一领域分层标准的重要性就会上升，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也就是分层的中轴。

在社会主义中国，尤其是在1949~1966年之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阶级”这一概念来划分，即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来划分社会群体。显然，诞生于西方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条件下的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不完全适用于这一时期的中

① 作者张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国社会。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某些西方社会学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解剖、分析中国社会，看一看中国社会结构的组成及其成员的地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迥异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成果的话题。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社会结构/阶层的问题，各种立足于现实的调查报告、引经据典的研究论著层出不穷，数不胜数；对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各有标准，莫衷一是。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已是不争的常识，此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从政治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各方面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且成果颇丰。然而，这一阶层如果按照教育背景、专业特征等加以细分的话，它的每一个群体又存在着也许并不细微的差别，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然科学家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其境遇就与社会科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这是其专业特征影响到政治地位的一个例证。此前社会学相关研究的视角，通常停留于知识分子阶层而缺乏对其组成群体作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与普适性。科学史研究则往往更多地注重科学家对社会、对科学本身的贡献，以及社会所给予科学的负面影响（如政治运动的冲击等），对科学——社会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关注不够。

鉴于此，本文选择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群体作为考察对象，立足于档案、日记、回忆等史料考据，借鉴西方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选择1949~1966年这一时段，对中国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这一此前学界少有关注的问题[①]进行探讨，以揭示科学——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也为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翔实的个案，丰富人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的认识，并以此反观中国共产党对于科学的认识及其相关的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的演变及其得失。

一、经济生活状况

经济标准，即财富，是马克斯·韦伯进行社会分层的判据之一。但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实行高度计划性经济，知识、劳动与财富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就不能简单地以财富的占有程度来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况且，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落后，中国人的衣食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何谈财富

① 陈明远在其《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2006年）、马嘶在《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中，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科学家的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略有涉及；王大明曾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作了简要分析（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第36~42页）。

的积累。因此，本节将针对这一时期的实际社会状况，以“经济生活”代替韦伯的“财富”标准，从工资、住房和福利待遇这三个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条件基本构成，来分析科学家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

1. 工资待遇

在此，首先简要地回顾新中国初期中国科学院确定、改善科学家工资待遇的过程。

建院之初，中国科学院的工资标准，是依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待遇政策执行的，实行薪给制。[①]1950年9月，拟定《中国科学院研究技术人员工资暂行标准》，规定所长工资为1 400斤小米/每月，而60岁以上的研究教授领取甲等工资，为1 600斤小米/每月，研究员则分为三等且各有三级，从1 300斤小米/每月到900斤小米/每月不等；在科学院工作的研究实习员分为两级，工资分别为350、300斤小米/每月。对于一般研究人员，评定工资主要依据研究成绩，而同等中的升级，“除研究成绩外，可考虑年资”。[②]1951年9月，科学院又开始实施新的《研究技术人员工资标准及调整办法》，在研究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工资中，增加交叉级数，并且研究系列的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和技术系列的技师、技佐[③]的工资最高额都增加了100斤。[④]1952年，根据政务院规定的各类人员工资、津贴标准，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工资级别评定，将研究人员共分为13个级别：

表1　195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薪级[⑤]

级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分　数(分)	820	760	700	650	600	550	500	450	410	370	330	290	260
研究员	—	—	—	—	—								
副研究员				—	—	—	—	—	—				
助理研究员								—	—	—	—	—	—

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薪给制与供给制并存。详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44~45页。

②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0年》第142~144页。

③ 这是技术系列的一级职称，并且是沿用了中央研究院时期的名称，后改为高工、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等称谓。

④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1年》第45~46页。

⑤ 《竺可桢全集》第12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39页。

但此次评定薪级，科学院研究人员的工资标准普遍较大学教授低，据竺可桢日记记载，这时大学校长的薪级分别为 1 100、1 020、960、880、820 五级。[①]1953 年 7 月，在原有基础上，科学院又略微提高了研究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

那么，科学家的这样一个工资标准，在这一时期是处于怎样的生活水平呢？表 2 列出了科研人员这时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对照。

表 2　抗战之前—1954 年研究人员工资对照表[②]

时　间	最高工资	折成 1954 年人民币(元)	购买面粉(袋)	最低工资	人民币(元)	购买面粉(袋)
抗战前	600 元	750	200	80 元	100	26.6
1949 年	1300 斤小米	130	13.5	300 斤小米	30	3.1
1952 年	820 分	202.8	22.5	170 分	42	4.6
1954 年	990 分	244.8	27.2	205 分	51	5.6

由此可知，与抗日战争开始前的工资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科研人员的工资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当然，这是与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后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的现状分不开的，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与国民经济水平，导致了整个国民收入都极其低下。

现在，再来看一看科学家生活状况的具体案例。

张肇骞（1900~1972 年），植物学家，主要从事亚热带植物分类及生态的研究。1934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科学院博士归国，先后担任广西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并从事植物学的基础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等，1955 年当选为学部委员。在 1954 年，其生活状况曾有记录如下：

> 工资 760 分，有小孩 7 个、爱人及本人共 9 口，其中除大儿子一个参军外，其余 8 口人完全依靠其工资生活，每月除去房租、水、电约 20 元，显然在生活方面有些困难。张本人为副所长，在应酬方面开支较多，有时候陪同国际友人参观，因无一套完整服装，曾向行政上借了一笔款买一套衣服，

① 《竺可桢全集》第 12 卷，第 739 页。

② 《竺可桢日记》第 III 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545 页。

在生活方面宿舍离所较远，中午没钱在所内包饭，每天自己带饭去吃，而带的菜饭最好的亦不过是鸡蛋炒饭，常常是一点素菜，小孩上学有时因需要一元买一本字典，因经济上不宽裕而作罢。[①]

1954年，科学院曾就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作调查，据统计，150名高级研究人员中有50名具有程度不同的困难，占36.6%。而像张肇骞这样因家庭人口较多、负担重而影响到生活者，占总人数的10.2%；另外，由于年老体弱及家属因病在医药方面开支较大，因而影响生活者，占总人数的15.4%，著名的植物学家、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1883~1965年，原中研院院士、科学院学部委员），物理学家、科学院应用物理所研究员钱临照（1906~1999年，科学院学部委员）等均在此列，钱崇澍当时工资为800斤小米，钱临照为700斤小米。真菌学家戴芳澜工资880分，另领报酬费240分，夫妻二人生活，因其夫人为富家出身，不善理家，故每月除医药开支占工资收入50%外，其余部分不足维持生活，据云戴先生在上半月发薪时情绪高，下半月钱用完后情绪低，同事间流传着“上半月与其谈工作时好解决，下半月谈工作时感到不耐烦”。像戴芳澜这样因生活方式特殊而造成生活困难的，在高级科学家中并非少数。[②]

为鼓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4年11月，经中央劳动部批准后，科学院颁布了专门为研究技术人员拟订的《中国科学院科学研究、技术人员工资标准》，较大幅度地提高研究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同时规定其他工作人员的待遇遵照政务院颁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包干费标准》、《国家机关汽车司机、技术人员、电话员工工资标准》和《编辑人员工资标准》统一执行。此次修订，使科研人员确实得到实惠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采取“上多增，下少增”的办法，即级别越高、工资增长越多、级差也逐步提高，使高级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二是将科学院的新标准与高等学校和国家机关技术人员工资标准取得一致，规定院内研究人员的最高工资为990分、技术人员最高为840分。[③]此次修订，进一步打破了工资待遇上的平均主义，使在科学上确有贡献的科学家能得到较高的薪金。

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③ 中国科学院档案：54-10-2、54-1-2。

劳动报酬，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加以提高；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其他日常生活方面有困难的，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应该积极地设法加以改善。对于一部分年老体弱的专家，应该给以特别的照顾。目前在物质待遇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以及机械地按照行政级别办事、只重视行政负责人而不重视专家的错误倾向，应该坚决地加以克服。"①出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彻底改变旧有分配制度的混乱，1956年6月1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工资改革，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改革，它奠定了此后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

《决定》规定了1956年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职工的平均工资提高14．5%，并针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国家工业化的政策以及现在的工资情况，在这次工资改革中，对于重工业部门、重点建设地区、高级技术工人和高级科学、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有较多的提高”，尤其是明确规定“对于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有重要贡献的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按照他们的工资标准发给工资以外，也应该加发特定津贴。"②因此，在此次工资改革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标准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对其中有重要贡献的，规定了加发特定津贴的制度。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1956年7月科学院公布了《中国科学院执行〈国务院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的实施办法》，此次颁布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对行政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标准，是依据科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如科学院的行政一级，相当于政府工资标准等级的行政四级；研究员分为1~4级，工资为345~207.5元，副研究员分为3~6级，工资为241.5~149.5元，助理研究员分为6~9级，工资为149.5~89.5元，研究实习员分为9~12级，工资为89.5~62.0元。而在院内从事出版、编辑、翻译、图书馆、卫生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司机、炊事员等技术工人，其工资标准完全采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一标准，未另行制订。③

这次全国工资改革，科学院有50%的职工升级，④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的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一级研究员月工资为345元，而1955年为

①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1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373~375页。

③ 《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261~271页。

④ 中国科学院档案：63-10-20。

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1955年月工资为45元，1956年工资调整后则为62元。[①]而这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均为行政二级）等国家领导人的月工资为581元，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马天水（行政七级）为322元，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行政八级）为287.5元。[②]另据资料记载，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全部收入，1957年为21.13元，1964年为20.29元；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支出，1957年为18.50元，1964年则为18.39元。[③]由此即可看出科学家工资的相对值及其相对生活水平。

竺可桢在1957年1月20日的日记里记有：

> 下午2点半至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2号晤钱琢如夫妇，他们移居到北京后，对现（住）屋甚满意，且以薪水加得很多，所以有余款可以购书籍，近以300多（元）购貉子皮衣一件……[④]

钱琢如，即钱宝琮（1892~1974年），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1908年赴英留学，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首任系主任等职，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员。这则日记反映出工资调整后高级科学家的物质生活是较为宽裕的。

至此，还必须提及两项给予"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的专门待遇。

早在1950年，科学院即针对少数资深研究人员设立了"特级研究员"制度，最初称为"研究教授"，其级别高于研究员，1950年规定工资为1 600斤小米／月。后在技术人员中也设立了"特级"，并规定特级研究人员的工资"根据其个人具体情况，提请国务院审查批准，分别予以确定"，[⑤]而不是由科学院认定。1952年，由政务院批准的科学院特级研究员为9位，他们是：秉志、赵忠尧、华罗庚、贝时璋、冯德培、赵承嘏、钱三强、范文澜、钱崇澍。[⑥]1955年11月26日，国务院人事局批准了科学院钱崇澍等12位特级研究员的标准工资一律定为270元，并同意

① 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191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6年》第263页。

②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83、80页。另，该书第80页关于马天水的职务，有"安徽省委副书记"一说，但实际上马天水并未担任过这一职务。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62页。

④ 《竺可桢日记》第IV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⑤ 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1949-1954》第111-112页、《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第191~192页。

⑥ 《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739页。

将严济慈定为特级研究员，[1]这已经高出了1955年一级研究员218元的工资标准不少。到1956年6月，科学院的特级研究员已有16人，他们是：

庄长恭（1894~1962年），有机化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崇澍（1883~1965年），植物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　志（1886~1965年），动物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承嘏（1885~1966年），药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何作霖（1900~1967年），矿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叔群（1902~1970年），微生物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戴芳澜（1893~1973年），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周　仁（1892~1973年），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杨钟健（1897~1979年），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华罗庚（1910~1985年），数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三强（1913~1992年），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德培（1907~1995年），生理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严济慈（1901~1996年），物理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赵忠尧（1902~1998年），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贝时璋（1903年~），实验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家，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学森（1911年~），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6。

按最初的方案，这16位特级研究员在1956年工资改革后的工资应在450元／月左右。[①]特级研究员的评定标准是什么？目前尚无史料可资说明。但实际上，1956年工资改革以后，科学院似未再进行过特级的评定，到1965年，赵忠尧、钱三强、贝时璋、杨钟健、秉志等都为一级研究员。[②]

特级研究员毕竟只占科研人员的极少数，同一时期，各大学也设有由政府特聘的特级教授，人数更少，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2年只有北京大学的叶企孙、周培源、翦伯赞和曹靖华，清华大学的张子高、梁思成，北京农业大学的戴芳澜。[③]而另一项待遇，即学部委员津贴，覆盖面稍广，到1957年，全国有学部委员共254人，学部委员津贴于1955年6月学部成立即始颁发，为每人100元／月。对于这200多位学部委员来说，100元的津贴大约要占其月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此可知，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党和政府对于高级科技人员所采取的倾斜政策，确是落实到了具体的措施上。

然而，这种相对宽裕、安逸的生活状况并未能持续下去。1957年4月，国务院决定相应降低国家机关中1~3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后又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定级工资，并决定1957年一律不再升级。[④]因此，1956年以后，有6年时间科学院都不曾进行过科研人员的晋级，到1962年仍是升级不加薪。[⑤]另一方面，全国工资改革被毛泽东主席指为"闹得乌烟瘴气"。随着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开展，极"左"思潮泛起，平均主义流行，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的收入状况受到很大影响。最初，有若干学部委员认为自己没做多少学术组织、领导工作，因而提出不领学部委员津贴。但很快，随着政治形势日益趋紧，尤其是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学部委员津贴成为群众批判的矛头所指，从1957年开始，先后有62位学部委员主动提出不再领取津贴（自然其中也不乏出于实际经济考虑反对者）。科学院根据本人要求予以停发。1964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个人收入情况：

> 我的薪水向来是第五级加上100元的院学部委员费共可得382+100=482

① 《竺可桢日记》第III集，第685页。
② 见中国科学院档案：65-10-2。
③ 《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739页。
④ 陈明远：《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⑤ 《竺可桢日记》1962年4月28日记有："院中六年以来未曾升级，近京中各所作了考试，应试的研究实习员，大部是1956年以前到院者700多人。60%通过答辩，可以升助理研究员，但因国家规定几年来薪水不能加，所以升级不增薪……"见《竺可桢日记》第IV集，第619页。

元。从今年 11 月起，除扣党费 2% 外又扣减薪 8%（限于党员），并自愿退学部委员费 100 元，实得 333 元云……①

日记所及"第五级"，为竺可桢的行政级别。这时，院长郭沫若为行政二级，竺可桢、华罗庚为行政二级，秘书长裴丽生、副秘书长杜润生为行政六级，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劲夫、副秘书长秦力生为行政七级；而吴有训、赵忠尧、钱三强、贝时璋、杨钟健、秉志等如前所述，都为一级研究员。②取消 100 元学部委员的津贴，是科学家们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象征，但对他们在生活上造成的影响却是不难想象的。

自 1957 年停止工资升级以后，几年来，各类职工的货币工资收入没有增加，而平价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在 1957~1962 年间平均上涨了 12.4%，③造成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而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据统计，从 1949~1962 年，全国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指数，以 1950 年价格为 100，1956 年为 123.4，1962 年涨到 155.3；同期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以 1952 年为 100，1956 年为 128，1962 年为 98.7；科学文教卫生系统职工的平均工资，1956 年为 548 元，1962 年为 542 元。④在科学院，1962 年还出现了由于升级不加薪，而造成职称、职务晋升后工资等级低于职务等级的现象。

到 1963 年，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国家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4 月下旬至 5 月底，劳动部召开了全国工资工作会议。7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 1963 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决定拿出 11 亿元，为 40% 的职工调整工资。要求工人和干部的升级面应当区别对待，工人一般都按 40% 升级，十八级和十八级以下的干部（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的行政干部、技术干部和经济干部）升级面可以同工人一样，国家机关十七级至十四级的行政干部升级面为 25%，十三级至十一级的行政干部升级面最大不得超过 5%，十级以上的行政干部一律不升级。企业、事业中工资或条件相当于十七级和十七级以上的行政干部，也应当比照办理。"对于相当于十七级和十七级以上的科学、技术干部和经济干部，不要完全按此限制，升级面可以稍大一些，其中相当于十级以上的，也

① 《竺可桢日记》第 IV 集，第 880 页。

② 见中国科学院档案：65-10-2。

③ 见"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 1963 年调整物价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276 页。

④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425、460、459 页。

可以个别的升级”。[①]

依据中央的精神，科学院对1963年度的工资调整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行政人员十级以上一律不动，十三至十一级升级面不超过5%，十七至十四级升级面为25%，十八级以下为40%；研究人员，三级以上一般不动，有特殊贡献者个别考虑，四至五级升级面不超过15%，六至八级不超过35%，九级以下不超过47%；技术人员二级一般不动，有特殊贡献的个别考虑，三至四级升级面不超过15%，五至七级不超过35%，八级以下不超过47%；在研究人员九级以下、技术人员八级以下的人员中，1957年参加工作的，升级面为60%，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升级面为40%，等等。按照劳动部规定，1963年科学院升级范围以内的人员基数为4万人，升级面不超过43%，用于升级工资的总额为83.9万元，转正定级8.6万元，提高奖金部分增加10.46万元。[②]

下表选列了在上述调整原则和经费总额下，该年度科学院若干机构的升级人数、增加工资的分配方案。

表3　中国科学院1963年度部分机构职工升级人数、增加工资的分配方案

单位	总人数	升级范围人数	升级人数	占升级范围人数%	级差	升级工资总额(元)	备注
总　计	44279	40248	18246	45.3	8.2	750 131	
院行政单位合计	1398	1336	542	40.0	8.0	21 682	包括厅局、各学部、幼儿园、学习班、待分配人员
数学研究所	174	157	77	49.0	9.8	3 785	
计算技术研究所	974	880	399	45.3	8.2	15 789	工厂工人级差按7.6元计算
物理研究所	711	647	285	44.0	8.5	12 112	
化学研究所	664	614	275	44.8	8.9	12 235	
半导体研究所	660	587	238	40.5	7.8	9 282	
力学研究所	910	826	332	40.2	7.7	12 782	
北京天文台	175	152	77	49.3	7.1	2 737	

① 1963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中发（63）489号），全文见：http://www.51labour.com/LawCenter/lawshow-36607.html。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63-10-20。

表 3　中国科学院 1963 年度部分机构职工升级人数、增加工资的分配方案（续表）

植物研究所	487	463	252	54.0	8.1	10 206	包括代管 9 人其中升级 4 人
生物物理研究所	349	313	150	48.0	8.5	6 375	
动物研究所	471	436	251	57.5	9.1	5 503	

此次工资调整的重点，国家的总方针是使各类职工的工资收入进一步平均化。而在科学院则具体表现为科研人员与行政干部和工人、高级职称与低级职称之间的工资差别大大缩小。

表 4　1952~1964 年中国科学院各年度平均工资①

年度	工资合计（元）	研究人员工资（元）		行政干部工资（元）	工厂职工工资（元）
		小计（元）	其中：副研究员以上（元）		
1952 年	711.69				
1953 年	739.28	1 099.60（为研究、技术、编辑人员总和）		722.64	
1954 年	765.52	1 077.92	2 082.10	760.24	
1955 年	794.67	1 089.09	2 275.54	771.59	
1956 年	852.62	1 184.77	2 599.48	856.46	
1957 年	849.56	1 127.15	2 668.15	874.32	
1958 年	783.74	1 053.72	2 789.81	896.43	
1959 年	663.36	989.49	2 055.59	903.25	530.00
1960 年	624.95	871.31（为研究、技术人员总和）			
1961 年	682.85	852.46（同上）			
1962 年	721.80	816.70（同上）			
1963 年	766.67	861.50（同上）			
1964 年	761.59	795.43（同上）			

上表显示了中国科学院全院职工在 1952~1964 年间年平均工资的变化情况。

① 本表各项数据根据一下资料整理而得：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各种事业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56 年》、《中国科学院各种事业统计资料汇编》1957~1964 年各册。

1960 年以后无专项数据可以显示高级研究人员的工资变化情况，只能根据全院所有研究、技术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数略知一二，即 1958 年之后，科学院高级研究人员的绝对工资在逐年降低，而且与全院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值也在逐年缩小。由上可知，科学家的生活水平自 1957 年之后大致是处于下降的状态，但与前文所述 1964 年 20.29 元 / 人 · 月的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收入、18.39 元 / 人 · 月的平均生活费支出相比，则还是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科学史家、院士席泽宗（1927~2008 年）从 1951 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的工资变化过程，为了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基本收入情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实例：

1951 年 8 月，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科学院编译局工作，工资为 300 斤小米 / 月；

1956 年 12 月，调至科学院历史二所工作，定为 9 级助理研究员，工资为 89.5 元 / 月；

1959 年 10 月，提升为 8 级助理研究员，工资为 106 元 / 月；

1978 年 3 月，提升为副研究员；

1980 年 3 月，工资提升为 126.5 元 / 月，"自 1959 年 10 月至今一直为 106 元"；

1987 年 6 月，基础工资从 160 元增至 170 元。①

总体来说，1949 年以后科学家的生活水平较之 1937 年抗战开始以前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所有中国人民的生活都不富裕，而科学家作为一个有特殊专业技能、可为国家建设出力的群体，在经济待遇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待，能够享有较一般百姓为高的工资收入，尤其是高级科学家，这一点尤为突出。到了 50 年代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日益激进，这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被视为阶级矛盾的一个表现而逐渐消灭。

2. 住房条件

与工资同样重要的另一项生活条件指标，是住房面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社会进入了指令性计划经济阶段，也就是政府保障阶段，住房、医疗、教育等都由政府保障，计划供应，住房由国家统一建设，统一分配。因此，各行各业、尤其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都制订了一系列住房分配标准。下表所列出的科学院北京区宿舍分配暂行标准，是 1955 年科学院参照国家事业单位的分配标准制订的。

---

① 《席泽宗自叙年谱 1927—2007 年》，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 年第 1、2 期。

表 5　中国科学院北京区宿舍分配暂行标准（1955 年 10 月修订）[1]

表 5–1 不同级别的家属宿舍分配标准

科学工作人员						翻译人员		行政工作人员		机关技工	
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		技工							
级别	面积 m2	级别	面积 m2	级别	面积 m2	级别	面积 m2	级别	面积 m2	级别	面积 m2
								5	58		
特	68							6	50		
1	55							7	44		
2	48	特	46			1	47	8	38		
3	43	1	43			2	40	9	34		
4	37	2	37			3	31	10	30		
5	31	3	31			4	23	11	26		
6	23	4	23			5	19	12	22		
7	20	5	20			6	17	13	19		
8	18	6	18			7	15	14	17		
9	16	7	16			8	14	15	15		
10	14	8	14	特种	14	9	12	16	13		
11	12	9	12	1	12	10	10	17	11		
12	10	10	10	2	10	11	8.5	18	9	1	9
13	8	11	8	3	8	12	7.6	19	8	2	8
14	6.5	12	6.5	4	6.5	13	7.5	20	7	3	7
15	5.5	13	5.5	5	5.5	14	5.5	21	5.5	4	5.5
16	5.0	14	4.5	6	4.5	15	4.5	22	4.5	5	4.5
		15	3.5	7	3.5	16	3.5	23	3.5	6	3.5
		16	2.5	8	2.5	17	2.5	24	2.5	7	2.5
		17	1.5	9	1.5	18	1.5	25	1.5	8	1.5
				10	1.0			26	1.0	9	1.0
				11	0.5			27	0.5	10	0.5

① 见中国科学院档案：56-1-49。

表 5-2 人口分配面积

人口	面积 m2	
本人及配偶	每人	5
直系亲属	每人	3
保姆	每人	2

表 5-3 单人宿舍分配标准

职别	人数	应用面积 m2
局、司、所级	1	16
研究员、副研究员、技正、技士、正副总编辑、编审、处长	1	12
助理研究员、技佐、编辑、科长	1	8
一般干部	1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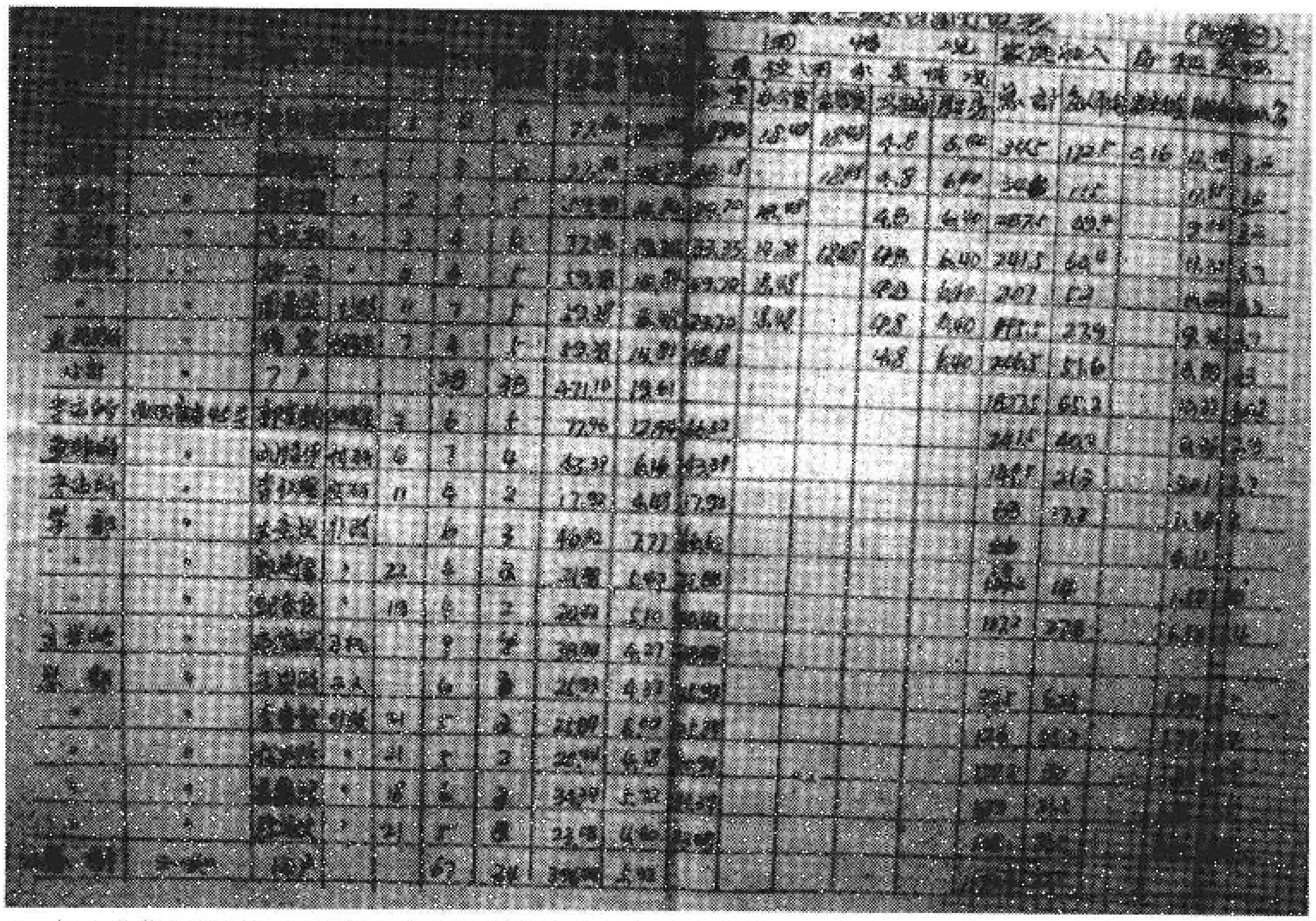
这样的住房分配标准，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但是，在当时物质条件普遍匮乏的国民经济形势下，它的执行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全院职工都能按此标准人人“安居乐业”，目前尚未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但根据一些口述史料，①仍可对这一时期不同层次的科研人员的实际住房情况有所了解：

科学院在北京的中关村宿舍区与实验室同时于 1953 年前后开始建设。到 1958 年，中关村北区已建起 30 栋宿舍楼。“十二年规划”以后，开始向今北四环南线、东线扩建。其中，在中关村北区，于 1955 年新建的 13 号、14 号和 15 号三幢楼，因基建标准较高，故称“特楼”，一批著名科学家如赵忠尧、贝时璋、钱学森、王淦昌入住（同时也有一部分所级领导、包括党员干部入住）。由此可知，这一时期至少高级科研人员的住房条件是得到较好保障的，其住房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从设施上来说，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属中上等水平。

留学回国人员基本上也能获得可容纳一家人的居室，面积大小不等，条件稍好的有独立卫生间、厨房，但大多数为数家共用卫生间与厨房。单身的青年科研人员则是居住在三四人合住的单身宿舍里，随其结婚、生子，可以得到新的调配，尽管并不宽敞。

1956 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之后，全国的科学事业都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① 杨小林：《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未刊稿，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典型住户用房情况租金负担综合调查表（1962 年 11 月）

人员迅速增加，机构不断扩大。仅以科学院为例，从 1955 年到 1956 年，研究机构由 44 个增加为 66 个，研究人员由 6 852 人增加至 12 703 人，而全院职工总人数从 8 148 人增加为 15 385 人。[①]如此急剧扩展的事业规模，以及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尤其是 1963~1965 年三年调整时期，国家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重工业建设之中，而用于住宅的投资均低于“一五时期”，[②]显然使全院的人均住房面积大大下降，但受其影响最大的，多是较低级的科研人员。到了“文革”之中，高级研究人员本来相对稍微宽敞的住房也被安插进了年轻科研人员或行政干部，即所谓的“掺沙子”，住房条件严重恶化，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已是后话。

上图为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于 1962 年 11 月所做的一次住房情况调查。[③] 1955 年，科学院成立了 4 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全国科学发展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下辖各学科的相关

① 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各种事业统计资料汇编 1949-1956》。

② “一五”时期国家用于住宅建设的投资为 53.79 亿元，“二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分别为 49.56 亿元和 29.09 亿元。不但绝对额少，其在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中的比重也大大下降，三个时期分别为 9.1%、4.1% 和 6.9%。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304 页。

③ 此为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的淘汰档案，原卷号为 11-4-5。本文作者购于北京潘家园。

研究所，因此，各研究所的住房分配情况均统一执行科学院的有关规定。这份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住房调查表，虽不能直接反映自然科学家的相关情况，但为这一时期科学院各类工作人员的实际住房状况，尤其是各级研究员的差别，以及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工人、司机之间的差别，提供了有趣的、直接的佐证。

3. **福利待遇**

福利待遇，也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其类型非常复杂，既有单位为本单位全体职工“谋”的，也有政府或单位给予某些特殊人群的“照顾”。因此，福利待遇的发放，既有纯经济的考虑，即在当时物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一定程度地改善职工的生活状况，同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也体现出了政治上的考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于所属的事业单位，都有着福利费这一项独立的财政预算，用于补助生活极其困难、或因重大变故而使生活出现困难者。福利费的获得，则需要由本人提出申请，由工会小组讨论通过，经行政领导批准。①

建院以来，科学院一直对生活困难的高级科研人员给予一定的补贴，但这种补贴多根据事业单位的一般福利费补助办法来进行，真正解决困难不多。一方面，由于高级研究人员的工资收入已较一般工作人员为高，其生活水平也较一般职工高，因而在提倡平均主义和缩小生活差距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风气指向之下，他们的困难补助申请在讨论时往往不易获得通过。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出于自尊、清高，即便发生严重困难，也多不愿告人，更不愿申请补助。同时，作为一个科研事业单位，科学院的福利费预算收入数额有限，补助高级研究人员所需的大额款项，难以用一般的福利费来支付。

为此，1954年初科学院决定另拨专款，对院内高级研究技术人员的特殊困难给予补助。在对科学家的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之后，于1955年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特殊困难补助暂行办法》，经国务院批准实行。1954年对北京区高级研究、技术人员61人给予定期或临时特殊困难补助，占北京区高级研究、技术人员总数的39.8%，用款11 258.46元。其中，动物研究室研究员张春霖临时补助了两次共440元；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张肇骞1954年7月至12月临时补助共440元。1955年科学院再次进行定级与工薪调整工作，②工资标准提高，

---

① 见政务院1954年3月12日（54）政财习字第22号《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

② 见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第12~13页；以及《中国科学院各类工作任何员工资标准表及各单位所在地区物价津贴表》，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5年》第191~196页。

高级研究人员平均增加工资 20% 左右，此外部分科学家被聘为学部委员和当选人大代表，得以增加一部分津贴收入，因此到 1955 年高级研究人员中生活困难者有所减少，北京区自 1955 年 1 月到 12 月为止，共补助了 29 人，用款 5 650 元，占北京区高级研究技术人员 203 人的 14.2%。另外对一些日常生活较为困难和因家属疾病而发生特殊困难的也分别给予了补助，如地球物理所研究员吕炯，因爱人生病住医院，曾先后 4 次获得临时补助共 500 元。[①]对于月收入 200 余元的科学家来说，500 元的补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1956 年工资制度改革以后，科研人员的生活水平总体有了较大幅度提高，而与此同时，对研究人员中的特殊困难者给予特别补贴的政策也仍在继续执行，到 1956 年 11 月，针对工资改革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如仍有部分多子女的职工以及低薪的职工家庭负担较重生活仍有一定困难，科学院再次修订了《中国科学院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暂行办法（草案）》，强调福利费仍应以解决工作人员的生活困难、特别是多子女教养费和家属患病医药费的困难为主。[②]

福利待遇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即钱、物。在设立专项经费补助高级科研人员的同时，科学院还投入财力、人力，增加职工的福利，兴建各种服务、卫生及娱乐设施，如学校、医院、新华书店、粮店、操场、礼堂、餐厅、茶点部等等。[③]中关村的露天游泳池，则是院长郭沫若捐出自己的稿费修建的。1950、60 年代中关村科学城内各种福利设施的建设，使广大科研人员的生活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因而也稳定了人心，稳定了工作情绪。

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院党组也在想方设法通过请求北京市政府特拨副食品、开展生产自救等方式，尽力地保证科学家们的生活所需，免除其后顾之忧而安心于研究工作。1959 年 7 月 12 日，张劲夫以院长名义在中关村福利大楼食堂宴请科学家，王震（时任农垦部部长）出席并当场表示自己愿意给科学家当司务长，将来按月由农场供给肉蛋等伙食品。[④]1960 年，科学院成立劳动生产办公室，直接领导清河、乐亭两个农场，主要供给高研人员和司局级以上干部。1964 年，经济状况恢复后该办公室撤销。[⑤]1962 年初，副总理邓小平指示，为了稳定科学家的情

① 见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② 见中国科学院档案：56-10-7。

③ 杨小林：《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未刊稿，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④ 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413 页；及《竺可桢日记》第 IV 集，第 327 页。

⑤ 张明远：《我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 年，第 413~419 页。

绪，调动其积极性，搞出成果，宁可到自由市场以高价买副食品，也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①

竺可桢在1959年12月31日记有：

……但从8月起，科学院优待高级研究人员，再给肉3至4斤半，分3次，此外有蛋20枚，鸡1只……布每人1丈6尺……②

对于那些有过欧美留学、工作经历的高级科学家来说，这样的生活水平远比不上在国外的条件，如1954年9月毛汉礼回国在科学院青岛海洋所任副研究员，而此前在美国的7年，始终在La Jolla海洋所并任副研究员，每月薪金为400多美金。③但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远远高于了当时国内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准。在那个各种物资严重紧缺的年代，除了特殊人群之外，我们很难想象普通的市民或职工也能得到党、政府或单位领导这样的"照顾"。在《竺可桢日记》里，一直记有每年夏天高级科学家至青岛等地疗养时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科学家们相互间的日常交往与学术交往。

据研究者对相关资料的分析计算，1957年，中国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国民收入的9.2%，相当于西德国民收入的78.3%；到1965年中国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8.9%，西德的54.3%。④这些潜心于科学研究的人们，当初回国时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落差无疑是清楚的，但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较为宽裕的经济生活水平，使科学家们对其物质生活拥有一定的优越感、满足感，甚至会衍生出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感激。真菌学家戴芳澜因家庭生活困难，冬天没有大衣，有些正式活动如宴会等无法出席，科学院补助其500元做了件皮大衣。对此，1955年12月底科学院知识分子问题调查小组做了这样一段汇报：……他高兴极了，他的学生也很满意这件事，感觉党是真的无微不至地关心他，这次周总理报告了知识分子问题后，他又和其他科学家提起这件事。⑤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重视荣誉、"知恩图报"的感激之情，以及礼遇之下的愧疚与因此而生的自勉，在此历历可鉴。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不被信任的压

① 张明远：《我的回忆》，第416页。
② 《竺可桢日记》第IV集，第373~374页。
③ 《竺可桢全集》第13卷，第555页。
④ 参见庞松主编：《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
⑤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抑、苦闷之中，依然能作出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由此或可得到某种解释。

关心科学家的生活，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不仅是要使其更能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创造出科研成果服务于国家建设，而且也成为执政党处理同科学家关系的政策措施之一，也因此而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

二、社会声望

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主要表现在其职业地位、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社会学研究表明，在常态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一直是比较高且稳定的，那么，在1949年至“文革”前的中国社会里，情况又将如何？

1. “向科学进军”

1956年1月21日下午，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于前一天刚刚闭幕，科学院各学部四位负责人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潘梓年，由郭沫若院长带领至中南海怀仁堂，分别就物理学、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化学的发展现状，生物学、地学和农学的发展状况，技术科学的发展状况，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向参加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代表演讲。陈毅副总理主持报告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到会，还有各部各省负责人共一千三百余人参加。竺可桢曾在日记中写下了对这次讲演的感受：

> ……今天大会极为庄严，料不到人民政府看科学如此重要。[①]

这段日记无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当时的真实感受——他们得到了来自执政党、政府的极高礼遇，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他们，需要他们的一技之长。演讲2个月后，即3月29日，中共中央将4个演讲稿转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直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军委总政。文件指出：此讲稿有助于党的干部了解世界和中国科学发展的简要状况及中国科学工作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求发给各系统中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阅读。[②]“向科学进军”的大幕由此拉开。

正是由于有重要的一技之长，科学家作为社会贤达、精英，被赋予了参与议政、讨论国是的资格和权力。历年科学院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名单即体现了这一

① 见《竺可桢日记》第Ⅲ集，第641页。
② 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点。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代表总人数为1226人，其中科学院代表41人：

郭沫若、李四光、刘崇乐、竺可桢、钱崇澍、罗常培、贝时璋、秉　志、彭桓武、秦仁昌、严济慈、俞平伯、吴有训、赵中尧、童第周、华罗庚、陶孟和、张劲夫、范文澜、潘梓年、钱三强、尹　达、刘导生、杨钟健、戴芳澜、侯外庐、吕振羽、狄超白、潘　菽、刘慎愕、虞宏正、张大煜、王家楫、冯德培、周　仁、赵承嘏、庄长恭、陈焕镛、斯行健、盛彤笙、沈志远。

这个名单中，只有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是非科学家出身的职业科研管理者。院长郭沫若为本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院长竺可桢为常委。两年后，即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补选华罗庚、茅以升（时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两位科学家、技术专家为常委。

此后，每一届人大代表中，科学院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基本上都名列其中，1965年科学院的人大代表为64人，[①]而这一年，全国的人大代表共有3040人。诚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构成，是要考虑地区、部门、行业、党派、民族、宗教、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平衡，但对于选出来的代表，无疑表示党和政府承认了他们在本单位、本行业中的权威性以及对社会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力。

1956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李先念作为国家领导人讲话，李富春致闭幕词。大会代表共约5800人，属于全国教育工会系统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科学院三个部门共有250人参加，其中科学院根据分配名额选出了40位代表。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65-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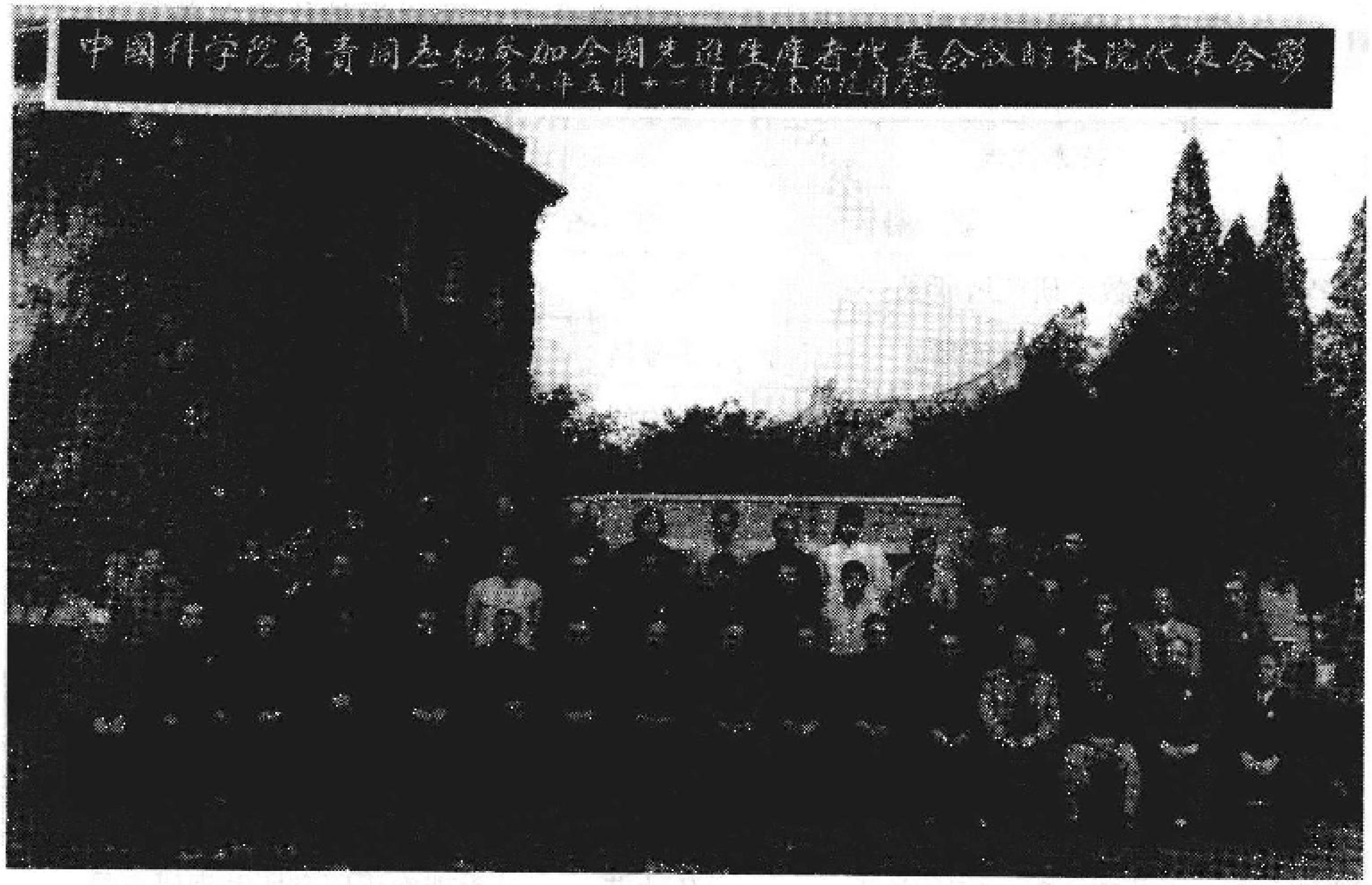
表6　1956年5月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中国科学院代表名单[①]

特邀代表		青年科学工作者代表	
姓　名	职　务	姓　名	职　务
华罗庚	数学研究所所长	孙　超	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钱学森	力学研究所所长	胡海昌	力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钟健	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张均如	语言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张肇骞	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陆祖荫	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熊　毅	土壤研究所研究员	何重仁	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助理研究员
夏　鼐	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张金淡	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朱　洗	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赵燕生	图书馆采访组组长
王大珩	仪器馆副馆长代馆长	王大琛	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王应睐	生理生化研究所副所长	陈念贻	冶金陶瓷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朱葆琳	石油研究所研究员	伍钦荣	生理生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作梅	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孙树门	有机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邹元爔	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	唐锡华	植物生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澄中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王德铭	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闵乃大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江宜进	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方　俊	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于传瑾	机械电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龚惠人	徐家汇观象台技师	王纯善	地理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李　朴	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兴星	石油研究所技佐
陶诗言	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罗来兴	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金成忠	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家祥	紫金山天文台技术员
嵇汝运	药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清涛	林业土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代表的条件是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优秀成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先进工作者，这与其他行业的选拔标准一致。但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在科学院的40名代表中，有20位为高级科研人员，是经科学院提名后由大会直接聘请为特邀代表的。[②]其次，会议上，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主题报告中，号召我国工人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6-8-1。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56-8-1。



⊙ 中国科学院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合影

阶级要成为有高度文化的、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阶级，改变我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状况；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钱俊瑞代表文化、教育界发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作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大会发言。这无疑是承认科学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享有同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暗含着执政党和政府承认在向科学进军的过程中，科学家、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生产者的精英性质。

另一个事例则反映出科学家角色在国家政治、社会事务中所担当的特殊作用，以及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在国家高层领导认识中的重要地位。1956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进一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除准备吸收一批非党的民主人士参加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工作外，还计划吸收一批著名科学家担任中央有关各部的副部长职务，并列出了十余人的名单，征询科学院党组的意见。由于考虑到一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的调离，将会使科研工作受到巨大损失，科学院党组致函陈毅、陆定一并周恩来，力陈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请求不要将科学家调离科学研究岗位，并提出继续注意提高科学家物质待遇、在学术上尊重他们并且给予应有的荣誉和一定的奖励，对于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和作用，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甚至会起到

比行政安置更大、更好的作用。这个意见得到周恩来的赞同，调任计划被撤销。[①]

在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家高度重视和礼遇的同时，社会也给予了科学家相当高的尊重，尤其是在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在社会上掀起了人人热爱科学、钻研科学的高潮，使科学家成为这一时期公众心目中的明星。

在中央的要求下，科学院曾就科学家的社会兼职和社会活动情况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这次调查本是为制订有关的政策和措施以保障科学家的有效工作时间而做，但调查结果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社会对科学家的尊重和需求。其中，华罗庚（时任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社会兼职情况即为典型：

（1）全国人大代表
（2）北京市人民代表
（3）全国数学会主席
（4）政协特约委员
（5）全国民盟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6）民盟北京市宣传部长
（7）《数学学报》总编辑
（8）《数学通报》编辑
（9）北京大学教务委员
（10）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11）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科学大众》编委
（12）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国际联络部部长[②]

其任职的既有学术团体，也有社会性团体。同时，他还要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包括各种会议、报告、约稿、迎来送往、宴会等等。下表列出了1955年11月华罗庚的社会活动情况：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6-1-22。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表7　华罗庚1955年11月社会活动情况表[①]

时　间		活　动
11月4日	上午	去机场欢迎德国数学家格雷尔(未接到)
	下午	再次到机场迎接(又未接到)
	晚上	参加科学院召开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座谈会
11月7日(星期日)	上午	参加民盟会议
	晚上	参加苏联展览馆庆祝十月革命节招待会(6~11时)
11月8日	上午	访问格雷尔
11月9日	上午	在科学院拍电影
11月10日	下午	在科学院开会,招待英国科学家
	晚上	继续招待英国科学家(6~10时)
11月11日	上午	布置接待格雷尔的准备工作
11月12日	上午	为中学生写文章
	下午	在科学院听格雷尔报告
	晚上	参加数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
	晚上	招待格雷尔
11月14日(星期日)	上午	在《新观察》拍照(10~12时)
11月15日	上午	夏所长来访
	下午	写文章
	晚上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邀请观看《天鹅湖》
11月16日	全天	写文章
11月17日	上午	参加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学部讨论电子机
11月19日	下午	在科学院听格雷尔演讲
11月20日	下午	参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会议
11月21日(星期日)	上午	参加《数学通报》编委会会议
11月26日	上午	参观苏联展览馆的计算器,后到科学院开会
	下午	主持格雷尔报告会
	晚上	参加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晚会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5-10-16。

表7　华罗庚1955年11月社会活动情况表（续表）

11月27日	下午	报社和《新观察》来人请写文章
	晚上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开会（6:30~9:30），后吴志达来访（9:30~11:30）
11月28日（星期日）	上午	民盟开会
	下午	《新观察》来人谈写文章事
11月29日	上午	在科学院开会
	晚上	参加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10周年晚会
11月30日	上午	《人民画报》拍照
	下午	欢迎格雷尔参观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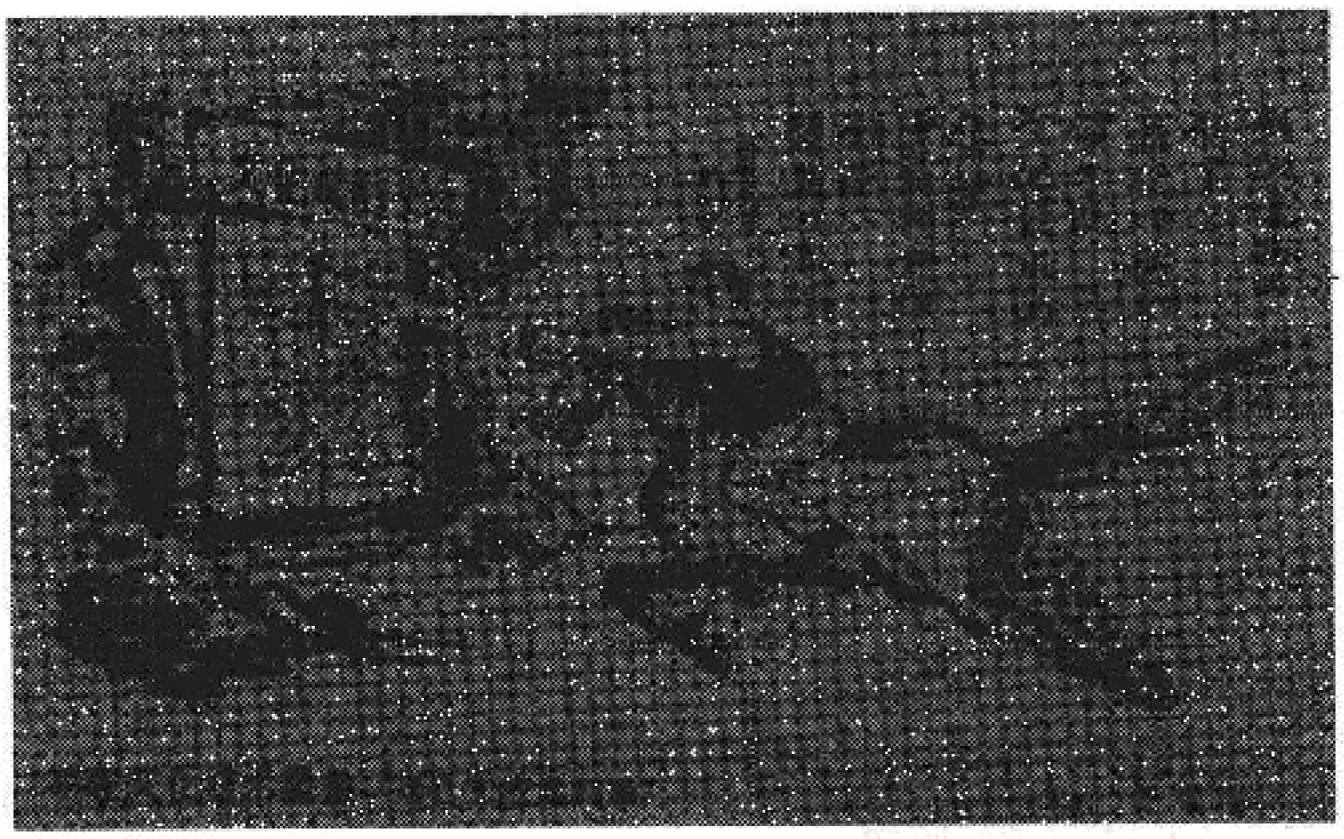
一个月内，有16天忙于社会活动。凡此种种，既有在学术上得其领导、指导的需求，也有来自政治的、尤其是统战的需要，亦不乏视科学家为万能的社会心理，表达了对这一职业价值的社会认同。这些社会兼职与社会活动，一方面是出于利用科学家社会声望、提高团体自身权威性的目的，而同时这种方式又给科学家们带来了更多、更大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

由上可以看出，在1956年前后，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处于巅峰期，而这起源于形势的需要，即科学技术作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受到了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并得到了政策上的倾斜。

然而，正如本节开头所述，只有在一个常态的社会中，科学家的社会声望才是高且稳定的。1949~1966年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常态的社会，而且科学家的社会声望与政治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57年以后历史的突然转折说明了这一点。

2.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尽管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科学家的职业特征，使其在普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显然大大异于从事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更远离一般民众、令人敬畏的一种职业、一个群体。19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大发展，但另一方面，从那以后，科学家、科研活动逐渐公众化，尤其是这一时期所提倡的科研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更是降低了社会民众对这一职业的神秘感，进而随着日益激进的政治形势，掀起了对科学权威性的盲目挑战和批判。



⊙《红旗》1958年第13期刊登的漫画

1958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说成是“三面红旗”。超越常规的“大跃进”，本质上是一个反科学和反常识的过程，势必受到科学和常识的质疑与拷问。因此，对于发动者来说，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便成为必须突破的“障碍”。如果说“反右”已经从政治上将知识分子归入另类，那么，“大跃进”则要从业务和技术上矮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破除迷信”、“打破旧的规章制度”，作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实际上成了破除科学、蔑视专家的流行观念。毛泽东别解历史上有成就的青年的事例，由此断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反智运动。

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党刊《红旗》发表署名文章《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称赞陕西省礼泉县烽火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只上过两年小学的丰产能手和育种家、27岁的王保京，称赞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新型的科学家”，指出他帮助人们打破了对科学的神秘观念，打破了对科学家的迷信。①1958年5月22日，党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鼓舞劳动人民打掉自卑感，振奋大无畏精神》为总标题，报道三位样板人物的事迹，同时配发了题为《科学并不神秘》的社论，号召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和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②两个月后，三位样板人物之一、36岁的李始美，这位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防治白蚁土专家，获得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名义颁发的研究员聘书。聘请土专家为专职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院史上从未有过，李始美成为全国土专家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但这个受聘的过程并不顺畅，成为一场学术标准与政治方向道路问题之争。李始美此

① 惠庶昌：《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载《红旗》，1958年第4期，第16~19页。

② 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2日。

后并无新建树。①

另一方面，就在党报党刊大力宣传破除迷信、“科学并不神秘”的时候，《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中国科学院四位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致科学院院党组的信，这四位科学界代表人物表示，要“把心交给党”、“努力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②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八届候补中委范文澜，在《红旗》上发表题为《破除迷信》的文章，提出“破除迷信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打破科学难学的错误看法。我们既要学习社会科学，也要学习自然科学……现在学习自然科学，更是具备着许多优越的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中，科学往往被少数人垄断，好似术士金丹，难以捉摸；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为广大群众所共有，好似家常煮饭，谁都可以学会。”③

科学家与工农大众两个社会阶层的融合，在1960年4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大会，得到更为具体的体现。这次学部大会，除有自然科学方面学部委员131人出席之外，还邀请了各地研究机关、产业部门、高等院校的代表和“卓有成就”的工农专家，出席会议的总人数达400余人。对此，《竺可桢日记》里有更详细的记载：

> 通过主席团，其中21人为过去两次大会主席团旧人，加王仲良、武衡、杜润生、周培源、苏步青、金善宝、黄鸣龙、程茂兰、杨石先及化学所女青年李芬、天津人民公社姜德玉、湖北工业劳模马学礼、兰州地质所徐永昌、有色冶金所长孙鸿儒14人，共35人……④

学部是科学家的组织，其任务是从学术上领导全国的科学研究工作。学部委员是根据科学家的学术成就、政治标准等经过选举而产生，并由政府批准。学部大会是科学家共同体进行学术讨论、就中国科学未来发展方向发表意见的场所。但在这次学部大会上，“工农劳动模范、技术革新家代表和老科学家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被视为此次大会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接触是劳动人民知识化和知识分

① 详见薛攀皋：《对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反思》，载《薛攀皋文集》，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编印，2008年，第161~167页。

② 《鼓起干劲，多快好省，一心一德，又红又专，重视劳动，服从组织，加强合作，实现规划，中国科学院四位副院长致院党组的一封信》，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4日。

③ 详见范文澜：破除迷信，《红旗》，1958年第2期，第1-4页。

④ 《竺可桢日记》第Ⅳ集，第425页。

子劳动化的一道桥梁”；大会共宣布学术报告和论文 69 项，其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有 10 项，劳动模范有 13 项，共占报告总数的三分之一；郭沫若院长在大会总结报告里“号召科学家们要老老实实服从党的领导，不断改造思想，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①]这次学部大会，反映出科学共同体和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被打破。

自 1958 年 3 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即下发《关于在各省、自治区和专区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队伍的意见》，要求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科学院分院。到 1960 年底，除西藏外，已有 26 个省建立了省、市、自治区分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建立了 242 个地方研究所，分院和地方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人员共达 23 342 人。[②]大多数研究所甚至没有中、高级研究人员，如四川分院 1958 年成立，到 1960 年共有 14 个研究所，人员 2 400 人，但正、副研究员仅 10 人；而贵州分院各研究所则是高中毕业生居多。[③]

在土专家、工人、农民、中学生走进科研院所大门的同时，科学家们也不得不离开了他们的实验室，走向原野，走进田间。按照 1957、1958 年中央关于干部下放进行劳动锻炼、参加体力劳动的要求，到 1959 年 12 月底，仅科学院北京地区，就先后下放了两批干部共 1 400 余人到农村参加一年左右的劳动锻炼，[④]一些青年科研人员由此反省以前“自己太空虚了，脱离了生产实际的理论，再多也没有用处！”[⑤]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四清”运动的号召和统一部署，自 1964 年下半年起，科学院抽调了相当一批力量投入运动之中。除机关干部外，还先后派出两批、共 10 062 名研究技术人员，由机关党员干部带队，参加农村“四清”。第一批 3 907 人于 1964 年 10 月赴山西、安徽、河南、吉林、辽宁、四川、上海市郊各省市参加农村四清，翌年六七月陆续返回；第二批 6 155 人于 1965 年下半年赴安徽、山西、河南等地农村，1966 年初返回；第三批拟于 1966 年中旬派出，因“文革”开始而停止。在第一批赴农村参加“四清”的 3 907 名科技人员中，有研究员 20 人，副研究员 38 人，助理研究员 406 人，研究实习员 2 286 人；总工程师 2 人，副总工

① 《学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胜利闭幕》，载《科学报》1960 年 4 月 30 日。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60-3-51。
③ 《竺可桢日记》第 IV 集，第 485、542 页。
④ 中国科学院档案：60-1-29。
⑤ 李兰桂、任振华：《在劳动化的道路上——中国科学院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纪实》，载《人民日报》1960 年 12 月 10 日。

程师8人，工程师16人，技术员346人；应届大学毕业生750人，研究生35人。与此同时，还相继组织了几批以郭沫若、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等为首的高级科研人员去山西、上海市郊等地参观农村“四清”，每批为期近一个月，让这些“身份高、年纪大、体质差”的科学家们“参加阶级斗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改造”。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院有近三分之一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参加了农村“四清”。①

这样的事例无需一一列举。自“反右”、“大跃进”以后，随着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专家、学术权威甚嚣尘上的无情批判，科学家的社会声望每况愈下，“文革”时则达到了极致，被彻底摧毁。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接受着“思想改造”，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接受劳动改造——体力劳动被当作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道路之一。这是一种政治身份的改造，目的是要从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上使知识阶层接近或同化于工农，根除其作为知识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优越感，并对自己的个人经历、政治理念、生活境遇产生羞耻心理和原罪意识，将其改造成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有研究指出，“文革”前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制度的形成与实践，其后果之一，是造成了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的群体自卑和身份认同危机。②

但是，也必须注意到的是，这一时期，尽管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在接受着思想与身体上的双重改造，而自然科学家——这个知识分子阶层中特殊的群体，因其专业技能的实用性与特殊性，一些科学家个人尚能在风暴中获得一个容身之所，或甚至在政治运动中幸免于难。1959年底，在干部下放劳动的高潮中，科学院党组向主管科学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央请求，在最近三年内，暂不将尖端科学方面的研究技术人员下放到农村劳动，以便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尖端项目。而这批科研人员的劳动锻炼，改为就近在院内各研究所办的中间工厂内参加劳动，以及农忙时参加附近人民公社的一些突击性劳动，每年劳动时间仅为1~3个月即可。③1957年9月，正值“反右”高潮之中，毛泽东与中央接受科学院党组的请求，于9月8日下发《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这是一份“只在内部掌握，不向外公开传达”的内部文件，特别指出在社会科学方面和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情况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65-1-49。
② 王扬宗：《不当专家做农民——“文革”前科研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与实践》，载《科学文化评论》，2009年第1期。
③ 中国科学院档案：60-1-29。

不尽相同，“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反右派斗争，策略上要更加细致，应当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并对高级自然科学家中的右派言行类别、应怎样处理对待，作了具体的划分和说明。[①]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保护。到 1958 年 2 月止，在科学院所属京区 55 个单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 167 人中，有研究员 8 名、副研究员 3 名；而 11 位“右派”学部委员，在科学院工作的仅有 2 位。[②]国家利益尤其是国防、军工科研的迫切需要，使一小部分科学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和保护，但这无法改变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整体地位的急剧跌落。1962 年的广州会议，虽然在物理学家马大猷“一马当先”的吁求下，陈毅副总理宣布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但科学家这种短暂的“抬头”，也同样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群体多舛的命运。

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 1949~1966 年这一历史时段内，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既有作为社会贤达、精英而获得礼遇、优待和保护，也有在激进的政治形势下作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反动分子而成为社会的敌人。在某一时期，这两种身份甚至共存，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即是一例，在领导着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同时遭受着批判。在以党治国的体制下，一旦失去了政治地位，其社会声望也就不复存在。

3. 从华罗庚看科学家的社会声望

华罗庚（1910~1985 年），江苏省金坛县人。早年依靠自学成才，于 1931 年被破格邀请至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后相继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到西南联大执教、访问苏联科学院、担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访问研究员以及任伊力诺依大学教授等，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其在数论、有限域上的方程论、典型群与域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已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数学家，被认为“在其早期数学生涯中，就已是居主流地位的数学家了。”[③]

1950 年 2 月，华罗庚在携全家由美国归来的途中，发表了一封给中国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号召留美学生回国为伟大的祖国建设和发展而努力。3 月 11 日，新

---

① 见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 年》，第 303~305 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科学院（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第 88 页。

③ P. Batman, Review on Selected Papers of Loo-keng Hua, Math. Monthly, 1, 1986. 转引自王元：“华罗庚”，见《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组编辑：《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一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年，第 40 页。

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3月16日，华罗庚到京，任清华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1年1月即经政务院批准被任命为数学所所长。）[①]3月26日，新华社为其归来发表电讯。[②]

华氏是当时国内在数学研究上最有成绩的人之一，同时在政治上也表现积极。[③]1951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④]批判从前帝国主义者在经济、政治尤其是文化上的侵略，歌颂中国人民在人类史上的伟大智慧。在1951年底开始、约持续了半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华罗庚在数学界首当其冲，他需要在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与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联合大会上屡次做检查，[⑤]接受情绪高昂的年青教师与学生的质问。回国不久便受到这样的冲击，使华罗庚对清华大学、科学院的党组织产生了很大抱怨。[⑥]但在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尤其是1956年成为人大常委之后，又使他感觉到自己为党所重视，[⑦]尽管仍然"在背后说怪话"，但在公开场合表现进步。1955年3月1日，华罗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4千余字的长文《我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文章结尾处强调"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对科学研究工作最有用的文章。任何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必须精读此文，这不但目前，并且将来，在科学研究的一生中都会得益匪浅的。"[⑧]

除了在政治上不断表现进步之外，华罗庚也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与社会活动之中。关于其在研究所建设、数学研究与教育方面的成就，已有学者详述，[⑨]本文不赘。在社会活动方面，由其倡导、于1956年开始举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成为典型事例。

1956年的第一次数学竞赛，分别在北京、上海、天津与武汉四大城市举行，仅北京赛区就有62所中学、622名高三学生参赛。华罗庚的倡导，得到中国数学界的热烈支持，一批最有威望的数学家参与其中，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数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等校教师负责出试题、监考、改卷子，著名数学家接见名列前茅的参赛选手，并将他们免试送入自己志愿的大学数学系深造。1957年，这个活

---

① 袁向东：《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成立》，载《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92年第4期，第77~78页。

②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自美返国》，载《人民日报》1950年3月27日。

③ 中国科学院档案：57-11-4。

④ 载《人民日报》1951年2月10日。

⑤ 王元：《华罗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⑥ 华罗庚：《我坚决和党一条心》，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

⑦ 中国科学院档案：57-11-4。

⑧ 载《人民日报》1955年3月1日。

⑨ 详见王元：《华罗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动进一步扩展到南京等城市。但正当要推向全国的时候，"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等人祸天灾接连而至，竞赛活动被迫中断。1962 年全国形势好转，北京市恢复竞赛，后又举行了 1963、1964 年两届，终因"四清"运动和"文革"开始而停止。①

中学生数学竞赛的举办，成为华罗庚从事科学普及工作的开端，使其以数学家的身份走进了公众，成为广为人知的科学明星。而 1956 年前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所形成的公众热爱科学、追求科学的社会氛围，也为华罗庚提供了成为公众人物的机遇。这一时期，他花了不少时间撰写文章，发表在《人民日表》、《中国青年报》②以及《数学通报》③等报纸杂志上，介绍自己的政治、业务学习的经验与体会。

学术上的成就、政治上的积极进步以及社会活动的热情参与，使华罗庚迅速成为科学界的一个样板。图 3 通过对 1950~1970 年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所有与华氏有关的文章篇数、其本人撰写的文章篇数进行频度统计，即可大致看出这一点。在提及华罗庚的各种文章、报道中，有对其科研工作的大力褒奖和宣传，④也有对其广泛、频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的报道。⑤而这期间，由华罗庚本人署名发表在《人民日表》上的文章共 41 篇，可大致分为三类内容，一类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苏联科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赞美；⑥第二类是歌颂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以及 1957、1958 年以后其本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自我批判与表忠心；⑦第三类则是与其科研工作相关的，有学习、科研经验的介绍，也有科学知识的普及（此类在后文将略加详述），有一定学术性。因而一度在公众中

① 王元：《华罗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221~224 页。

② 如《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载《中国青年报》1956 年 1 月 20 日。

③ 如《自然科学工作者不应忽视政治》，载《数学通报》195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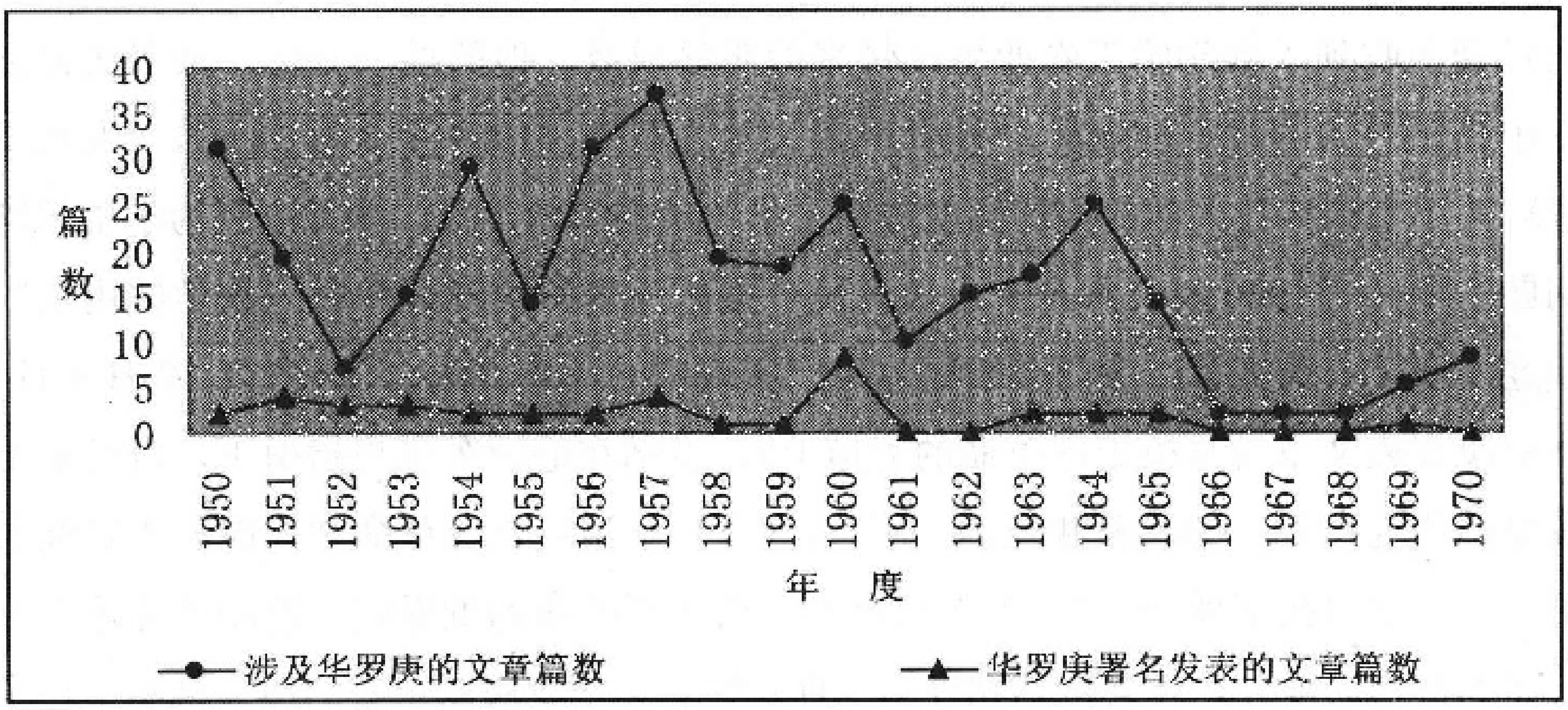
④ 见《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培养了一批青年数学家》，载《人民日报》1956 年 2 月 5 日。文中介绍在华罗庚的指导下，王元、龚升等青年研究人员取得出色的研究成果，以及为青年人开设"数论导引"讲习班等。又见《让科学之花遍地盛开——首都自然科学工作者解放思想，业务跃进》，载《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22 日。文中报道："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提出在十二项数学问题上要在十年内赶上美国……"

⑤ 如 1956 年 2 月 6 日关于华氏在数学通俗演讲会上给学生解答数学问题的报道和照片，10 月 23 日刊登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名单》，12 月 13 日关于在西安动力学院视察的报道和照片，等等。均见《人民日报》相应各期。

⑥ 如《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7 日《美帝是怎样对待科学家的?》，1951 年 11 月 4 日《十月革命与科学事业》，1951 年 2 月 10 日《数学是我国人民所擅长的学科》等。

⑦ 如《人民日报》1951 年 7 月 2 日《在共产党的生日向党保证》，1958 年 6 月 12 日《我坚决和党一条心》等。

树立起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红色专家”的形象，加之其早年自学成才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成为令人崇拜的科学家偶像。①



⊙ 1950~1970 年间《人民日报》华罗庚出现频度图

这样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声望，恐怕是华罗庚本人始料未及的，也一度使科学院党组的工作受到困扰。档案资料显示，院党组认为华罗庚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声望与其实际的个人品质、在数学界的威望以及政治态度是不吻合的，是由于过分宣传所造成，因此提出要尽可能减少其各种社会活动及兼职，报章、杂志、电影也应避免对其个人作突出的宣传报告，以消除已在群众中形成的不恰当的威信。②

尽管如此，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华罗庚的社会声望、尤其是国际声望，终使他免于厄运。当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③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遭到批判时，署名的 5 位科学家，曾昭抡、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 3 人只是被定性为“被右派分子利用”，而且由于科学院党组的极力保护并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华罗庚因其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造诣较高”而免遭其难，④仅仅是作了几次公开“检讨”。⑤到 1958 年，在“大跃进”时短暂的“插红旗、拔白

① 中国科学院档案：57-11-4。
② 中国科学院档案：57-11-4。
③ 载《光明日报》1957 年 6 月 9 日。
④ 见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7 年》，第 303 页。
⑤ 见《几点平常的道理》，载《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23 日；《我愿以这件事作为教训》，载《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4 日。另外，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三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联合发言，以《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 年 6 月 26 日。

旗”运动中，华罗庚又一度被当作具有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白旗”，在数学所内受到批判。从此，他放弃了纯粹数学研究，而将研究方向和全部精力，转向了应用数学和数学普及工作，到工农业生产实践中去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简称“双法”），而且确实收到了数学给工农业生产带来的明显成效。他的这一变化，又多次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和表彰，[①]社会声誉又随之而来，1959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华罗庚的教学工作，并配有其为学生解答问题的照片，[②]1960年2月至9月《人民日报》为华罗庚开辟专栏“数学的用场”，接连发表了6篇文章，专门介绍具体生产实践中的计算方法。[③]1965年12月4日，华罗庚发表文章《坚决走在革命的大道上》，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自己从事统筹法研究与推广的经验和教训；同日，《人民日报》以《革命和才能》为题配发短评，高度赞扬华罗庚：“一个人只有真正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他的才能才有可能用到恰当的地方，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数学家华罗庚以亲身的体会说明了这个道理。”[④]巧合的是，这篇《坚决走在革命的大道》，成为“文革”前华罗庚最后一次在党报上署名发表的文章，也成为对回国后20年来如何按照党的要求改造自己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文革”初期，华罗庚也遭到抄家和批斗，但1967年以后，由于受到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特别保护，他可以安静地待在家里，甚至可以到工业部门去普及数学方法。[⑤]华罗庚从纯粹数学走向应用与推广，是“大跃进”之后，科学家在“理论联系实际”、“面向工农”等压力下而转向的一个典型事例。

华罗庚的数度沉浮，展示了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于1950~1966年间社会风云中的起伏，它揭示出这个群体的社会声望是不由自主的，而与其在执政党认识中的地位即政治地位密切关联。作为一个个体，华罗庚无疑是科学家中的幸运者。历史的因缘际遇，使这位在纯粹数学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1950年代中期成为公众人物；而他所选择的生存方式，在诡谲多变的政治形势下，为他的社会地位乃至个人命运，换得了一角荫庇。

---

① 详见王元：《华罗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66~302页。

② 《为学习尖端科学打好基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基础理论教学成绩优良》，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28日。

③ 即《人民日报》1960年2月28日《怎样计算叶面积》，3月27日《怎样开木料做成横梁》，4月10日《算水库容积》，4月14日《水库容积计算的补充》，5月15日《斜坡面积怎样算》，9月27日《怎样预估产量》。

④ 详见：《坚决走在革命的大道上》、《革命和才能》，载《人民日报》1965年12月4日。

⑤ 王元：《华罗庚》，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余 论

1960年4月28日，竺可桢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 ……这次孟和可以不死，他当初决定不参加上海学部会议，因一则10多年未出远门；二则这次是自然科学的学部会议，但以形势所迫，不得不随大众跃进。再加16日参观闵行时间局促，形势紧张，又逼得要快速参观，以致旧病复发。如不去沪，当可多活几年。但是若不解放、党历年来予以十分照顾，在反动政府之下则他也已寿终正寝。所以他活到73随高龄仍是受党之赐。①

陶孟和（1887~1960年），1960年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大会期间于4月17日在上海去世。前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后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开创了中国的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科学院成立伊始，即担任副院长等职，但由于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否定，也由此严重影响了对其公正评价和合理使用。在“反右”斗争的高潮中，因发表过“解放以来知识分子遭了浩劫”等言论，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并在京区科学家座谈会上被郭沫若点名批判。但副院长的地位使他受到了保护，没有受到多少冲击。

这段日记，反映出了竺可桢对老友猝然身亡的悲痛，同时还有隐隐的愤懑与无奈，更反映了陶孟和要努力改变自己政治落后形象、而最终以生命为代价的可悲处境。但最后一句也并非违心之言，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执政党和政府给予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照顾，的确使科学家们享有了远高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条件。因此，从这一则日记中，我们可以读出老一代科学家对于现行社会制度的一种矛盾心理，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不满于在体制下个人自由、自尊、自爱的沦丧，但同时他们又是这种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1949~1966年间，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个专业群体，在经济上，他们依靠其专业训练为特征的智力劳动来换取工资收入，依靠党的政策来获得高于普通民众的福利待遇，即一切经济生活的保障都由国家给予，但前提是他们要为党、为

① 《竺可桢日记》第IV集，第429页。

人民服务，要为完成改善社会经济、建设国家、建设国防的任务而贡献他们的专长和技能。在社会地位上，从 50 年代中期对科学的倡导、对科学家的宣传，到 50 年代末至“文革”开始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足以说明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乃依附、取决于执政党的高层领导集团甚至个人对于科学、科学家的认识及所采取的相应政策。因此，无论是在经济生活中，还是在社会地位上，科学家群体都不具有独立性、自主性，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所形成的桎梏。

在政治上，科学家及其所属的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没有摆脱其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尽管有过短期的“脱帽加冕”。而这一阶级属性决定了它被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也决定了它在政治上始终被视为“异己”，成为每一次政治运动、思想斗争的对象。

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既有在物质、技术层面上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作用，也有政治意义上的，即向全世界昭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所带给中国的日益强大。

这样，科学家的阶级属性与科学家职业的重要性，决定了科学家这一社会群体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复杂地位和命运。

在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下，一旦没有了政治地位、政治权力，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也就无从谈起。短短的 10 多年间，科学家的经济生活、社会声望以及个人命运，就随着其政治命运的改变，经历了一次次的剧变。而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威性的分离，使科学家失去了自由的思想与学术自主性，也使中国的科学活动成为实现国家利益、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不能正常地发展。

从社会制度来看，1949~1966 年间的中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上倡导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群众路线的反权威性以及集体主义的工作方式，而这些是与科学活动的职业特征与需求不相吻合的，这使科学家作为一个社会精英集团，始终处于一种自身价值观与社会需求不断矛盾、冲突的境地，个人的自信与尊严、知识的价值以及职业的规范都备遭扭曲和摧残。

（致谢：王扬宗研究员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并提供资料线索，刘钝研究员对本文的发表给予了宽容和鼓励，沈鸾音同学制作了文中《人民日报》频度图。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割瘤"：1950年代初期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与改造①

——以哈尔滨大楼的清理为例

阮清华②

提要： 哈尔滨大楼原来是旧上海一座臭名昭著的"游民窟"，上海市人民政府对大楼内的"游民"进行突击收容，并将其加以整修后设立了专门用来改造上海无业游民的新人习艺场，使之成为一座改造人的"学校"，成为展示人民上海的新窗口。而哈尔滨大楼的清理和改造只是建国初期整个上海城市基层社会清理和改造的一个缩影，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游民改造等一系列的运动，将都市基层社会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理，并建立起符合新政权要求的基层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和巩固了新生政权。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哈尔滨大楼　游民改造　基层社会　清理与改造

1951年2月20日凌晨3点，位于上海市虹口、提篮桥、北四川路三区交界处的哈尔滨大楼里除了地下室几个赌徒还在"鏖战"之外，刚刚度过元宵佳节的人们大多已进入梦乡。突然，大楼对面食品工会内意外地响起了声音洪亮的广播，把正处睡眠中的居民都惊醒了。人们纷纷探头张望，却很快被眼前情景惊呆了：偌大个哈尔滨大楼被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和武装警察围了个水泄不通，探照灯、聚光灯

---

① 本文获上海市重点学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405，并曾提交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举办的"冷战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2月14~18日），感谢姜进教授及与会专家学者对论文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② 作者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等各种灯光从四面八方一齐对准哈尔滨大楼，把整个大楼照耀得如同白昼；同时，还有许多身着便装的人们在跑来跑去。①为了抓几个赌徒用得着兴师动众出动这么多解放军战士和武装警察吗？难道这个大楼成了反革命的大本营，所以人民政府要大力剿灭？或者是这里发生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吗？欲知究竟，我们得先从哈尔滨大楼本身说起。

一、"特殊王国"——哈尔滨大楼

哈尔滨大楼位于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区和北四川路区三区交界的哈尔滨路溧阳路口（门牌号为哈尔滨路169号），基本是二层结构，东面靠马路，有一小部分是三层；西面靠河，有小半有地下室。楼基与广场占地约十二亩，原系美国商人开设的汇芳锯木公司，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时，大楼遭到炮弹袭击，部分房屋受损，美国人丢下工厂回国了，大楼从此无人管理。日占时期及后来的汪精卫政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市政当局都未过问过这座大楼。这栋无主之楼及其地盘因而成为不断涌入上海的灾民、难民以及无业游民的天堂，人数由最初的几十人逐渐增加到三千多人；②若加上住在广场上的棚户居民，人数一度多达六七千人。③住到哈尔滨大楼的居民，早期主要是那些在上海无家可归或者付不起或不愿意付房租的小商小贩和灾难民，以及四处流浪、随时随地"工作"的小偷、乞丐、流氓、地痞、无业游民，真可谓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使得哈尔滨大楼成为上海滩远近闻名的"游民窟"和"罪恶之所"。④而解放军占领安徽、苏北等地以后，大量"地主"、"恶霸"以及国民党溃散官兵逃亡来沪，其中有很多人就挤入哈尔滨大楼，有些甚至拖家带口、三妻四妾一起进驻大楼，并在其中"安居乐业"；更多的人在此策划、教唆偷窃、绑架、拐骗等罪恶勾当，成为名副其实的罪恶的渊薮。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估计哈尔滨大楼附近三个区的偷窃案件，约有80%是属于大楼"居

①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1951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沪档）：B168-1-930。

② 《哈尔滨大楼装修计划》，1951年5月3日，沪档：B168-1-930；《上海游民改造工作概况》，沪档：B168-1-932；《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沪档：B168-1-931；《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四)；王捷：《哈尔滨大楼难民收容纪实》，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448~451页。

③ 陶隐昌：《哈尔滨大楼翻身记》，载《文汇报》1951年8月27日，第3版。

④ 《哈尔滨大楼》，载《文汇报》，1951年8月27日，第3版。

民”所为。[①]

1949年5月上海市军管会成立以后，立即组织疏散上海灾难民回乡生产，是年底发动第一次小偷、乞丐大收容，同时开始关注闻名遐迩的哈尔滨大楼。当年冬上海市民政局派出工作组进入哈尔滨大楼，对大楼内部居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初步组织工作。调查结果相当惊人：哈尔滨大楼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王国”！

居住在哈尔滨大楼的灾民、难民、乞丐、小偷、无业游民以及逃亡地主、溃散官兵等虽然都是陆陆续续从各地进来的，但是入住哈尔滨大楼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是自由之地，而是一个帮派纠结、无比复杂的地方。原来随着大楼自由入住人口的增加，大楼内部慢慢形成了几大帮派，有些“强人”甚至在里面建立起了“统治秩序”。大楼内部主要派系有安徽帮和山东帮，安徽省五河县人张文典是安徽帮的头子，此人以前是“土匪”，做过国民党还乡团中队长，曾拥有几百支步枪；解放军进入五河后，张文典逃到上海进入哈尔滨大楼，招收徒弟，培植党羽，强迫妇女为妻，甚至在大楼内明目张胆地征收“户口捐”，每户三、五百元不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②]张文典为首的安徽帮以讨饭、拾荒者为多，他们以大楼底层为自己的地盘，以地下室（地洞）为“活动中心”，里面设赌局，牌九、麻将、扑克、宝局等，应有尽有。该地洞道路弯曲，不见光线，内有一条小沟，直接通至河浜。如有人与张文典一伙为难或敢于闹事，该人就有生命危险，随时可能被从地洞掀进河浜，随潮水冲到黄浦江中去。山东帮以小贩为多，经济上相对较为宽裕，他们以二楼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二楼上半层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在那召开秘密会议，计划抢劫、偷盗、谋财害命等勾当，陌生人涉足该处，同样有生命危险。[③]随着解放战争脚步的加快，后来的大楼居民身份更加复杂了。山东帮中就增加了许多逃亡地主，拥有妻妾两三人者大有人在，拥有妻妾三人的唐某就是在沂水拥有八十公顷土地的大地主。而整个大楼内拥有土地三四十顷的有几十人，拥有妻妾两三人的也有五十多个。[④]甚至还有22口人的大家庭堂而皇之地在大楼割据

① 《上海市新人习艺所成立前后的一个写照》，沪档：B168-1-930。另一说占40%（陶隐昌：《哈尔滨大楼翻身记》，载《文汇报》，1951年8月27日，第3版；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第291~293页）。估计相差甚大，可能因为只是凭感觉认为这些地区的偷盗案件应该主要是大楼居民所为，而并无较有力之证据。

②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1951年2月20日，沪档：B168-1-930。

③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沪档：B168-1-930。

④ 陶隐昌：《哈尔滨大楼翻身记》，《文汇报》1951年8月27日，第3版。

自雄，独成一派，怡然安居。①

民政局工作人员虽然也被大楼内部的情况弄得眼花缭乱，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居然也开始在“游民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他们根据大楼内“居民”的籍贯、职业或者“兴趣”、“爱好”建立了21个小组，推选出各组小组长，并逐步掌握了这些小组长，这对了解和最终清理大楼内部居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公安局、民政局以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等，从1950年11月开始，会同附近三个区政府，进一步深入调查情况，为彻底收容做准备。③1951年春节前，市民政局先后接到虹口、提篮桥和北四川路三区人民代表会议要求处理哈尔滨大楼的提案。④由于有了对大楼先期的调查和组织，民政局在报请市府同意以后，决定立即彻底清理哈尔滨大楼。

1951年2月20日深夜，经过周密安排，上海市公安局调动武装警察100多人，并请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遣一个连队160多名武装人员，加上公安局、民政局以及救济分会工作人员70多人联合行动，一举包围了哈尔滨大楼，并在大楼对面上海市食品工会内设立了临时清理指挥部，同时封锁了附近奉天路、溧阳路和哈尔滨路交通。⑤因而出现了本文开头显示的一幕。

二、“割瘤手术”——突击收容与清理

凌晨3点开始，临时清理指挥部不断对着大楼进行广播，说明政府收容意图“在于救济灾民”，要求大楼“住户”自觉接受“收容”。由警察、民政干部和救济分会干部组成的七个工作组随后进入大楼，在各处悬挂了30多盏汽油灯，将整栋大楼内部照亮；同时每个组负责将三个小组长找来开会，要求各组长配合动员各自小组成员主动接受收容。⑥外面突然地喧哗惊动了正在地下室聚赌的张文典等人，他们立即纠集了三十余人，伺机而动；等被政府工作人员招去开会的小组长回去报

① 《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② 《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③ 《提篮桥区人民政府报告》，1950年11月9日，沪档：B168-1-930。
④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沪档：B168-1-930；《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⑤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沪档：B168-1-930；《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⑥ 光橱、子仁：《人民政府割治都市毒瘤——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告情况以后，这伙人知道政府收容决心已定，哈尔滨大楼将不再属于他们，于是张文典决定率众“突围”。但其探风的手下再次报告说楼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警察，张知突围无望，只好放弃抵抗，跟着灾难民上车，假装接受收容。

临时指挥部调动了17辆大卡车和红十字会救护车到现场参加收容。到凌晨6点左右，在工作组的努力下，大楼“居民”开始携带行李拖家带口走出大楼。居民出来之后，立即检查证件，有证件的摊贩四五百人被当场释放，自找住所，其他分乘大卡车和救护车，被送往此前已经准备好的四明公所、锡金公所和通州路第二教养所，前后共运送95卡车之多。

⊙ 人民政府收容人员正把街头乞丐、游民等送往教养院。

此次被送到民政局各游民教养所和同乡会馆等地的哈尔滨大楼“居民”共计2 901人，经过审查，共发现游民96人，[①]散兵11人，职工116人，地主16人，摊贩22人，残疾9人，其余大部分作为灾民遣送回乡。[②]其中“罪大恶极”的张文典在收容所趁看守疏忽再次逃走，不过很快又被逮捕，送交原籍公安机关处理，同时送去的尚有同属五河县的蔡金华、汤杰彬、王贵宣、丁树庭等“土匪头子”、“逃亡地主”和“三青团分子”。另外，审查中发现安徽省灵璧县的胡万宝（原名张有保）为“匪首”，马德纯为“惯匪”，在乡抢劫杀人，缉捕数次未获，逃

①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报告处理哈尔滨大楼内灾游民坏分子经过》，1951年5月19日，沪档：B168-1-930。另外《新民晚报》载此次收容游民900余人，灾民2 000多。（《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不过，另一说法为“游民111人，灾难民2 390人，散兵游勇11人，逃亡地主16人，恶霸反革命分子10人，其他流浪者264人。”见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第292页。

② 清理过程根据以下资料叙述：《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报告处理哈尔滨大楼内灾游民坏分子经过》，1951年5月19日，《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上海市新人习艺所成立前后的一个写照》，沪档：B168-1-930；《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陶隐昌：《哈尔滨大楼翻身记》，载《文汇报》1951年8月27日，第3版；王捷：《哈尔滨大楼难民收容纪实》，《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第448~451页。

窜到上海，被收容后由当地公安机关提回。[1]

哈尔滨大楼三面靠河，易于管理。[2]正在为寻找游民劳动场所而发愁[3]的民政局迅速决定在此兴建一个专门用于游民劳动改造的工场。因此哈尔滨大楼的“居民”被收容处理以后，民政局很快从游民教养所调来正在改造中的“游民”34人清理大楼垃圾，并不断增加人手，最多达到120人，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前后清除垃圾100余卡车，500多吨。然而清理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因为长期无人管理维护，大楼到处渗水漏雨，有些支柱有倾塌危险，至于门窗、梁柱等能拆卸的东西更是大部分都被偷拆偷卖了，整栋大楼实际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经估算，整个大楼修整费用将高达12.8亿元人民币（旧币）。[4]

民政局各游民收容教养所此时已收容上万人，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正愁找不到劳动改造的场所，因此民政局从各教养所中抽调了有绘图、设计、油漆、建筑等各种专门技术技能的收容人员100多名，并大量调用其他青壮年劳力，自己动手维修大楼，经过几个月的修理，整个大楼面貌一新，而且比原计划光工料费就节省达3.7亿元，至于人工费则完全省掉了。[5]

三、从“游民窟”到“新人习艺场”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上海以后，上海市军管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开始着手收容散兵游勇，到6月26日，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全市共计收容国民党流散官兵7 832名。[6]此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收容遣送灾难民回乡生产，并专门成立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委员会（简称疏委会）统一领导该工作。8月份上海市军管会制订疏散方案，计划疏散难民200万还乡生产，其中包括无业游民17万人。该方案规定：“对长期以偷盗、抢劫、欺骗、敲诈、乞食、贩卖违禁品、赌博（等）维持生活的游民，强制其离开上海市，到农村中劳动生产，在生产中教育改造他们成为劳动人民。今年下半年可在离上海市较远的农

① 《处理哈尔滨大楼工作报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报告处理哈尔滨大楼内灾游民坏分子经过》，沪档：B168-1-930。
② 《哈尔滨大楼装修计划》，1951年4月，沪档：B168-1-930。
③ 《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1年4月，沪档：B168-1-932。
④ 《哈尔滨大楼装修计划》，1951年4月，沪档：B168-1-930。
⑤ 《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1年，沪档：B168-1-931。
⑥ 《为建立革命秩序，收容流散兵勇近八千》，载《解放日报》1949年6月26日，第1版。

村，成立专门的教养机关，对被遣送的游民进行强迫的生产教育。”[①]从7月初开始疏散难民还乡生产，到10月底上海已有难民99 666人还乡；连同经宣传动员而自动还乡者约50万人。[②]

该年秋冬苏北发生水灾，大量难民逃亡上海，刚刚疏散的难民再次倒流，使得上海疏散工作难以进行。在此情形下，1949年12月第二届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民政局提出的《冬令救济与疏散难民方案》，[③]该方案规定：“以动员与强制相结合的方式，于今冬大量收容长期以乞食偷盗为生的乞丐与扒手，严格管制，组织生产，改造成为劳动人民。达到减少乞丐与尽可能消灭扒手，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④]会后，上海市民政局与公安局联合，出动大批军警和民政工作人员，会同各区接管会，于1949年12月14日开始在全市三十个区同时行动，集中“收容”乞丐、扒手，两天之内即收容了4 200多人。[⑤]此后，各区继续零星收容，另有一部分乞丐、扒手鉴于形势，自请收容。这次行动，前后共计收容5 000多人。[⑥]从那以后，上海市就将收容改造小偷、乞丐等无业游民作为清理基层社会、减少城市消费性人口的重要举措。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调查，1950年前后“流浪时间在三年以上”的上海无业游民大概有12万～15万之多，[⑦]要将这些人全部加以清理，收容改造场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虽然从1949年6月开始，上海市军管会民政接管委员会民政处就接管了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所属的游民习艺所、儿童收容所、妇女所和残废所，并将其加以整顿，分别改名为劳动生产教养所、儿童生产教养所、妇女生产教养所和残废生产教养所，作为收容处理无业游民的机构；[⑧]但几个教养所场地都比较小，而收容的人数非常之多，难以开展劳动改造工作。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给上海造成了巨大破坏，民政局利用“二·六”大轰炸造成的紧张气氛，在照顾收容人员“安全”的口号下，将已经收容在所的7 000多“游民”

① 《上海市军管会制定方案疏散二百万人回乡生产》，载《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第2版。

② 周子芹：《上海市疏散难民还乡生产是怎样进行的？》，载《人民日报》1949年11月8日，第2版。

③ 《沪二届代表会议决议》，载《解放日报》1949年12月16日，第1版。

④ 《疏散难民回乡生产与冬令救济问题——民政局局长曹漫之在第二届代表会上的补充报告》，载《解放日报》1949年12月15日，第1版。

⑤ 《上海市人民政府通告：为收容改造长期以乞食偷盗卫生的乞丐和扒手事》，沪档：B168-1-923。

⑥ 《集中教育逐渐改造，乞丐扒手获妥善安置》，载《解放日报》1949年12月18日，第2版。

⑦ 《游民收容教育改造工作总结》，沪档：B168-1-926。

⑧ 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第297页。

遣送到江苏台北县（现大丰市），建立了苏北垦区。[①]但1950年民政局又收容了4 000多游民，[②]游民的劳动场所依然是一个严重困扰游民改造工作的问题。1950年底游民改造工作总结中，各教养所都提出了为游民寻找工作场所的问题，寄希望于找到大片荒地让游民从事农业生产，但“经过近一个月的奔跑无望，又决定从手工业着眼继续努力”。[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政局收容处理了哈尔滨大楼的闲杂人员，并集中清理整修哈尔滨大楼，决定在此设立专门用于改造游民的新人习艺场。

哈尔滨大楼的维修采取了边修边用的原则，民政局在利用收容人员中原有技术力量进行大楼修整的同时，开始着手调查各教养所中收容人员的职业技能，并将另外一些有机械修理、制鞋、缝纫等技能的收容人员逐渐调到哈尔滨大楼，开设了机械修理厂、缝纫工厂和制鞋工厂。大楼修整完成以后，又利用原班人马成立了营造工场，并将哈尔滨大楼内的四个工场统一命名为上海市新人习艺场，成为上海市最重要的游民改造场所，同时也是教授游民技艺的学校。[④]

新人习艺场成立以后，四个工场都有较大的发展。到1951年8月份，营造部就有绘图、设计、泥水、木工、漆工等各类技术工人达285人，并承建了民政局一幢四层楼的宿舍和第三劳动教养所一幢游民宿舍，“技术水平和施工进度与营建厂商相比亦不逊色，刻正同工务局洽办登记领照手续，以便向外承包修建工程，推广业务。”[⑤]到1952年4月，承接土木工程大小16处，新建与改建修理等工程面积近2 000平方米。[⑥]缝纫工厂设立之初仅有46部旧缝纫机，后来添购新机器80多部，调用技工147人，到1952年4月已经制成衣被65 263件；而且开始大规模向外承接加工订货，如承制三野后勤部及各机关大批服装等。缝纫部每部机器除了由一个有技术的收容人员操作外，还配备一名学徒，随时训练，以便有技术游民出所后接替工作，防止生产中断。[⑦]制鞋工厂开设以后，调用68名鞋匠，为民政局各教养所收容人员生产布鞋，到1951年底已经制成布鞋31 000多双，同时为干部制作皮鞋395双；后来皮鞋专门向华东和上海百货公司供货，每月订货达六七百双。汽

① 参见拙文：《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年）》，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5月。

② 《1949~1955年收容游民分类统计表》，沪档：B168-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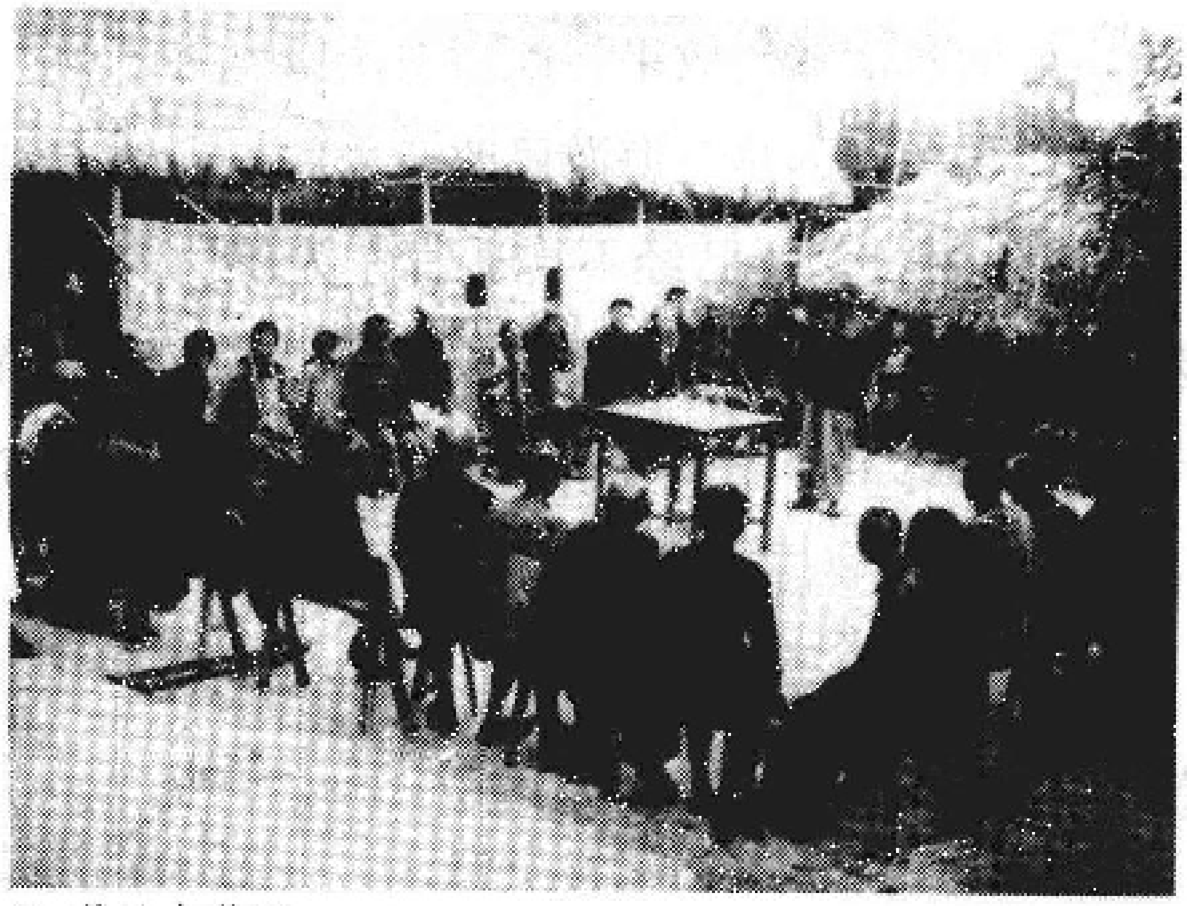
③ 《修建哈尔滨大楼设立劳动生产习艺场计划书》，1951年，沪档：B168-1-930。

④ 《呈请设立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劳动生产习艺场》，1951年4月29日，沪档：B168-1-930；《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沪档：B168-1-931。

⑤ 《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1年，沪档：B168-1-931。

⑥ 《各劳动教养所生产情况》，1952年，沪档：B168-1-938。

⑦ 《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1年，沪档：B168-1-931。



⊙ 游民在学习。

车修理厂的成立本是专门为了修理民政局5辆收容车，后来不断充实力量并开始对外营业，先后调用有技术的游民90人，到1952年4月就修好各类大小汽车54辆，船舶3艘，并开始自己制作和加工零部件，甚至可以制作车床了。[①]

新人习艺场每个工场除了从民政局各教养所收容的游民中抽调有相应技术的游民以外，还从各所抽调年轻力壮的游民充作学徒，以便学习技术和接替工作，前后共计改造游民几千人。[②]经济方面，新人习艺场从少量破旧工具开始，到1952年4月已经有固定资金7亿多元人民币（旧币）；[③]1954年新人习艺场全年生产收入297亿多元，净利润50多亿元。[④]从政治方面来看，哈尔滨大楼清理以后，附近居民“普遍认为小瘪三被收容，治安就有保障了”，使人“放心了”；附近棚户区居民也认为“方便多了”。[⑤]新人习艺场成立以后，甚至成为上海市新的城市坐标，以前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游民窟”，现在成了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考察的场所，一年之内居然接待各类游客1 500多人，[⑥]甚至还有许多外国人前来参观。[⑦]上海主要的新闻媒体如《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对哈尔滨大楼的清理和改造都有很多报道；英文报纸《上海新闻》专门撰写了《哈尔滨大楼的故事》向国际社会宣传人民政府的此一德政。[⑧]哈尔滨大楼从一座“人间地狱”转变成为“新社会人民敬爱的新大楼”（记者语），而且在清理和翻修中全部使用游民劳动力，并在翻修后开设新人习艺场作为改造游民的场所，整个过程的确令

① 《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1951年，沪档：B168-1-931；《各劳动教养所生产情况》，1952年，沪档：B168-1-938。

② 新人习艺场与1953年成立的生产教养院一共改造了6 000人左右。见《两块新招牌显示新变化——新人习艺场和生产教养院改名称》，载《新民晚报》1957年9月25日，第4版。

③ 《各劳动教养所生产情况》，1952年，沪档：B168-1-938。

④ 《1954年各生产教养单位收支情况统计》，沪档：B168-1-511。

⑤ 光榭、子仁：《哈尔滨大楼清理记》，载《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第4版。

⑥ 《各劳动教养所生产情况》，1952年，沪档：B168-1-938。

⑦ 《维尔高尔夫妇和毛罗离沪》，载《文汇报》1953年10月19日，第1版；《罗、捷、波、德文化代表团昨续在本市参观》，载《文汇报》1953年10月23日，第4版。

⑧ 《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沪档：B168-1-931。

上海市民耳目一新，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宣传效果。此后由于新人习艺场不断扩展，工艺技术水平等要求越来越高，更关键的是上海游民改造采取了到外省建造大规模农场的安置方式，因而民政局认为习艺场已经不再适宜作为游民改造机构。①1957年9月30日，新人习艺场改名为上海市新力机器制造厂，成为社会福利性质的生产机构，原有在场工作的收容人员全部改变游民身份，正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②

四、游民改造与上海都市基层社会重建

哈尔滨大楼的清理和改造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③的一个插曲，也是上海都市基层社会清理和改造④的一个缩影。1949年中国共产党新政权建立以后，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国支持国民党蒋介石，并协助国民党军队对上海实行封锁。为了打破封锁、巩固和稳定新生政权，人民政府决定将上海从消费性城市改造为生产性城市，⑤从而开始对上海都市基层社会进行大清理，尽可能减少上海"消费性人口"，将那些在上海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或者没有任何固定生活来源的人清理出上海。⑥因此，1949年上海市军管会成立以后立即开始执行市

① 《上海市关于收容人员安置处理初步计划草案》，1956年，沪档：B168-1-956。

② 《两块新招牌显示新变化——新人习艺场和生产教养院将改名称》，载《新民晚报》1957年9月25日，第4版。

③ 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游民改造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吕晨曦在叙述了建国初期城市中的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方式中涉及了游民改造问题，但仅一笔带过（吕晨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主要城市问题及其处理》，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5）；王谠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上海游民改造的经过和游民的教育与安置等问题，但主要是介绍情况，缺乏深入分析（王谠康：《上海解放初期对游民的教育改造》，《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第235~257页）；汤水清论述了上海游民改造和安置情况，认为游民改造为建国初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恢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④ 关于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和改造，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比较多。熊月之主编的多卷本《上海通史》之第11卷（《当代政治》，陈祖恩、叶斌、李天纲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卷（《当代社会》，承载著）都有论述；张济顺教授独辟蹊径，对上海里弄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社会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郭圣莉则对上海居委会有较多论述（郭圣莉、高民政：《建国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考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郭圣莉：《1952~1957：上海市居民委员会调整与完善的历史考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郭圣莉：《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上海市个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但这些研究大多还是比较宏观的观察，对具体政策措施的考察比较少，因而尚留下了诸多研究空白。

⑤ 《1950年游民改造工作总结》，沪档：B168-1-926。

⑥ 《粉碎敌人封锁，为建设新上海而斗争》，载《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第1版。

委建设新上海的“六大任务”，发动大规模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运动，但由于苏北水灾导致疏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于是在1949年底人民政府开始实行游民收容改造计划。

上海游民改造运动从1949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58年将这一工作转为劳动教养为止，前后共计收容各类“游民”7万人左右。①游民收容主要采取突击收容和经常收容两大类，突击收容一般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或者是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前夕进行，先由民政局出台游民收容政策，上报市政府通过以后，再会同公安局布置任务，要求各基层单位如办事处、派出所、接管委员会以及后来的里弄居委会等以“改善居民福利”的名义进行调查研究，将本辖区内可以当作游民加以收容者进行分类统计，上报名册；再由民政局和公安局决定某日在全市或是几个重点区域进行突击收容。届时公安局、民政局派出大量警察和工作人员会同里弄干部共同进行收容工作，有时候还会请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兵协助，如哈尔滨大楼的收容就属于突击收容之列。经常收容则是由户籍警、交通警随时发现街头流浪者、乞丐、娼妓等，随时加以收容，将其送民政局所属专门用于改造游民的四个教养所及其附属的工场进行教育改造。②

上海游民改造持续将近十年，但其前后收容重点所有不同，前期主要以收容街头的小偷、扒手、乞丐以及无业游民等为主，后期收容的则主要是具有各种所谓“反动身份”的人，如前国民党军政警宪特务人员以及参加过会道门的人群，这些人群在新社会很难找到工作或者被从各种留任的工作岗位上清理开革出来以后难以再就业，由于他们具有那些“反动身份”因而具有“威胁社会治安可能”，从而成为人民政府重点收容改造的对象。③正如张济顺教授指出的那样，新政权对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分为两大部分：即单位人和非单位人（社会人）。④通过各种各样的单位能够有效管理各自所属人群，但对于社会人的管理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并逐渐形成了居委会这种制度。⑤但早期的居委会并不符合新政权的政治期望，因为委员中很多都是非工人阶级，大量各种各样的“无业游民”、甚至有

① 详见拙文：《上海游民改造研究（1949~1958年）》，第80页。

② 参见拙文：《上海游民改造研究》，第67~81页。

③ 参加拙文：《归位：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对象分析》，载《史林》2008年第1期。

④ 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⑤ 郭圣莉、高民政：《建国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考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各种“反动劣迹”或“历史污点”的人进入了居委会，存在严重的“组织不纯”的问题。经过市政法委员会里弄工作委员会的大力整顿，最终将居委会中大部分“不纯洁”的成分清理出来，居委会得以成为以工人阶级及其家属为主的都市基层社会组织。①

上海居委会的整顿对游民改造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这次整顿将大量已经进入居委会的无业人员驱逐出居委会，并将他们的历史情况调查清楚，“在整顿中清洗了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和违纪分子 11 000 多人”②，这些人很多被当作游民加以收容改造。其次，整顿以后的居委会成为国家统合社会的重要工具，在贯彻国家意志上更加驯服，因而在游民的调查、收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居委会在民政局、公安局、派出所等的安排下，对本街道里弄的居民进行再三的访问、盘查、检举，几乎可以穷尽居民的所有个人信息和社会信息，任何与人民政府收容标准沾边的人都可能被检举成游民而成为收容对象；有时候为了完成任务，甚至根本不符合政策标准的人也会被当作游民而成为收容对象。④一次次的游民大收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民政府对上海街道里弄的一次次清理和整顿，并逐步将新政权的政治控制深入到城市最基层社会。

上海前后共计收容了 7 万左右的“游民”，民政局针对不同情况给予了不同安置。其中被家属领回或者被遣送回农村老家的有 23 417 人，约占全部安置人员的 34%。另外，上海市专门开辟了苏北垦区和皖南白茅岭农场两个大型的游民改造安置基地，共计安置了 21 551 人，约占总数的 31%。在上海市内就业的 7 693 人，约占总数的 11%，这些人主要在民政局各教养所组织的工程队或附属工场等机构工作，后来这些机构转制从而他们也改变身份成为工人阶级，如开设在哈尔滨大楼的新人习艺场转制为新力机器制造厂时，所有在场游民全部转变身份成为新工厂的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有 3 336 名被收容的妓女、流浪儿童和知识分子

① 张济顺：《上海里弄：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 － 1955）》，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郭圣莉：《1952 － 1957：上海市居民委员会调整与完善的历史考察》，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里弄工委办公室：《关于目前里弄工作情况的报告》，1955 年 11 月，沪档：B2-1-22。

③ 民政局报告明确指出，市区里弄组织和郊区乡镇组织建立以后，“平素不事生产，游荡度日的流氓都挤了出来，居民纷纷报告里弄或乡镇组织，转达人民政府予以收容改造。”见《上海市游民改造工作概况》，沪档：B168-1-931。

④ 1956 年民政局对各教养所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在第一所 682 名游民中，审查出不符合收容标准的有 40 名，占总数的 5.87%；联合收容站的 914 名收容人员中，审查出有 69 名不符合收容标准，占总数的 7.5%；妇女所在一个分队 73 人中审查出 9 人不符合标准，占总数的 12.3%。见《半年来社会游民收容工作报告》（原件未标注时间，推测为 1956 年 7 月）沪档：B168-1-962。

被遣送到新疆、甘肃、青海等地“参加建设”；剩下的小部分参加了文工团或是进入各地的其他单位参加工作。其他人或进入养老院或残疾救济院，或是在镇反及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法院当作“坏分子”法办了。[①]这些没有单位或是被单位开革而失业的“游民”被收容起来以来被重新安置到各地各种单位之中，从而使得每个人有了一个新的归属。

“游民”的安置，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人的“单位化”过程：将那些没有单位的人安插进各种单位——主要是在农村的合作社或生产队，或者建立新的单位，如新人习艺场转制成的新力机器厂和新建的苏北上海农场和皖南白茅岭农场等。游民的单位化或社会人的单位化，一方面完成了对上海都市基层社会的清理，给那些在新政权的政治理念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群安排了新的位置，并将其置于各种“单位”的有效管辖之下；[②]另一方面也将人民政府认为可能威胁到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的不可靠人群驱逐出共产党新的统治中心——大城市，从而改造和重建都市基层社会秩序。

哈尔滨大楼的清理和改造，既是收容改造其内部众多“游民”的需要，也是人民政府兴建和发展游民改造机构的需要。新人习艺场的成立，不仅将臭名昭著的“游民窟”变成了一个改造人的学校，而且成为一个城市的新地标。因此，游民改造既是对人的改造，同时也是对城市的改造；既是政治改造、思想改造，也是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游民的收容是对城市基层社会的大清理，游民的安置则为社会人的单位化提供了一条新路径，二者相辅相成，既重建了都市基层社会秩序，同时也将新政权的政治控制深入到那些因流动而不易控制的人群，从而稳定和巩固新生政权。

① 详见拙文：《上海游民改造研究》，第98~99页。
② 参见拙文：《归位：建国初期上海游民改造对象分析》，载《史林》2008年第1期。

1950年中苏联合上海防空保卫战

刘 统[①]

摘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利用其海、空军优势，以舟山为基地，封锁长江口，并对上海市区进行空袭。1950年2月6日对杨树浦发电厂等要害单位的轰炸，使上海电力损失严重，经济陷于瘫痪。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利用刚刚建立的中苏军事同盟，请求苏联派出防空部队协助上海防空。苏联方面派出巴基斯基部队，配备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秘密进驻上海，与解放军协同建立防空体系。几次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扭转了局面，并迫使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退。这是中苏军事同盟的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合作，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计划，保障了新中国的东南沿海安全。

关键词： 上海　防空　中苏军事同盟

一、国民党军封锁长江口

194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在金门登陆战遭受失败。蒋介石激动地说："这是我们革命转败为胜的开始。"[②]

几天后，三野攻击舟山的部队又在登步岛战斗再次失利，蒋经国在日记中兴奋地写到："登步岛登陆之共军已于上午9时全部肃清。此为我军继金门大捷后之又一胜利，不仅有利定海防务，且对全军士气将更为振作矣。"[③]

金门、登步战斗虽然只是师级规模的作战，但对一再败退的国民党军却犹如注

① 作者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② 胡琏：《泛述古宁头之战》，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5期，第47页。

③ 《蒋经国自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1页。

射了强心针，稳定了军心，振作了士气。登步战斗后解放军方面暂时停止了进攻，国民党军则转守为攻，依靠海军和空军优势，向大陆发动了反扑。11月19日，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制定了以反攻大陆为目标的《台湾保卫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是：

基本精神与目标：巩固台湾为复兴基地，预期半年整训，一年反攻，三年成功。作战原则：1. 战略上采取持久消耗，广领沿海地区，如遭遇强有力匪军之进攻，不得已时，则确保各卫星岛屿，为尔后反攻之前进据点。2. 战术上以攻为守，积极开展敌后游击，并对匪沿海实施登陆奇袭，以争取主动。

指导要领方面，“应确保舟山、马祖、金门各岛，使成为坚强之卫星岛屿，以消耗并牵制匪军，不使台湾陷于孤立。”“充分运用谍报组织，绵密注视匪军动态，并利用陆海空军之协同，先期摧毁匪之运输工具，以破坏匪军渡海攻击之准备。”“部队之训练，除一般战斗技能外，应熟练陆海空军协同海岸攻防作战，及陆军登陆作战。”为此，陆军应充实12至15个军之战力，海军应维持3个舰队之充分活动力，空军应维持8个大队之充分活动力。[①]

依据这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国民党军以舟山为基地，对大陆实施海上封锁和空袭。采取的措施是：1. 在渤海、长江口、华东及华南沿海布放水雷，以其封锁中共经由海上对外的联络；2. 查缉前往大陆的各国商轮，先后没收了3艘运送喷射机燃油的苏联及波兰籍商用油轮；3. 运输补给各外岛：大陈、南麂山、马祖、金门、澎湖及东南沙群岛，并巡逻台湾海峡。[②]

从1949年6月23日起，国民党当局宣布对长江口及其以北直至山东半岛的沿海实行封锁。执行封锁长江口任务的是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舰队司令刘广凯指挥“太和”、“太康”、“太昭”、“太平”4艘驱逐舰及“永丰”、“永泰”等炮舰，从舟山出动百余次，拦截过往的美、英籍货轮41艘，捕获汽船25艘、机帆船200余艘。11月27日，英国驱逐舰4艘掩护多艘英国商船进至长江口，遭到国民党海军4艘驱逐舰的拦截。英军指挥官与刘广凯谈判，表示他们所载物品全是商品和工业用品，并非军用品，可以上船检查。他们是按合同到上海经商，对国民党海军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表示抗议。双方在海上僵持了三天，这期间有一艘美籍商船“富兰克林”号强行闯关，国民党海军开炮射击。该轮中弹多处，仍勉力驶进上海港。英国

① 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北：向阳文化出版，远足文化发行，2005年，第165页。

② 狄纵横：《国共海峡战争的实力检讨》，载香港《明报月刊》第12卷2期，1977年2月，第21页。

船队见国民党海军如此野蛮，被迫驶向外海。为了彻底遏制外轮进入上海港，国民党海军奉蒋介石电令，于12月24日在长江口布雷。水雷深度为低潮水面下一米，雷区设计为两排，错综敷设。25日完成。①

旧中国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使当时上海重要的工业生产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上海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等。依赖进口的还有其他生产和消费用品，而上海的产品也需要国外的市场。国民党海军封锁长江口使上海经济陷入困境。②上海解放时，全市的存煤只有5 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 000万斤，只够上海市民半个月用的。国民党搬走了工厂设备，拖走了轮船，并破坏了大批带不走的船只和机器。上海市军管会为了维持上海人民生活和恢复经济运转，组织工人开展反封锁斗争。

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原来使用燃油锅炉，每月消耗燃油3万吨，全部依靠进口。进口来源断绝后，燃油储备很快陷入匮乏。在北方煤炭源源不断运到上海后，上海的几家发电厂都改造锅炉，从烧油改为烧煤，使发电厂对进口燃油的依赖大大降低。公共汽车原来都是烧进口汽油的，由于汽油紧缺，公司号召职工想办法，使用代用品，将汽油、柴油和火油按比例混合使用，减少汽油的消耗。职工还制造出烧木炭的锅炉，拖在汽车后面。木炭能效不好，又改为烧煤。这样改装的40多辆公共汽车走在路上，颇为别致，也反映了解放初期国民党封锁给上海造成的困难。军管会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恢复生产，减少依赖进口，能用代用品就用代用品，能用国货就不用洋货。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的企业基本上恢复了生产，市民的生活供应也基本正常。③

⊙ 改装锅炉的上海公交车

① 《刘广凯将军报国忆往》，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61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③ 《上海工人阶级半年奋斗，反封锁斗争取得重大成果》，载《解放日报》1950年1月22日。

二、上海"二·六大轰炸"

金门、登步之战后，蒋介石认为解放军无海空军，一个时期内不可能对台湾和沿海国民党军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转守为攻。在他亲自督促下，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

上海解放后，为了尽快建立人民海军，解放军共接管、征用江南造船所等大小修造船厂 8 家，修理和改造国民党海军起义的舰艇和缴获的破旧舰艇。国民党溃退之前，海军司令桂永清下达手令给江南造船所马所长："造船所一时不需要及贵重材料，着先疏散，以免招致意外损失。着派中字舰两艘担任本军运输用，永清当另派得力人员至基隆准备设立分厂。"①拉走主要设备和材料后，国民党炸毁江南造船所船坞闸门、厂房设备多处，破坏无法搬运的机器设备、工具、材料，留下一片萧条景象。在解放军军代表的领导下，江南造船所职工积极恢复生产。1949 年 8 月 3 日，国民党 6 架 B-24 型轰炸机轮番轰炸江南造船所，投下 500 磅以上炸弹 34 枚，给停泊在码头上修理的海军舰船和厂房设备造成严重的破坏。为避开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江南造船所将设备和职工分散到武昌路、汇山码头、杨树浦、复兴岛、浦东陆家嘴等地，职工全部改作夜班，坚持生产。自 1949 年 9 月至 1950 年 5 月，共抢修改装舰艇一百多艘。②

1949 年 9 月 19 日凌晨，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在长江口外起义，于拂晓 5 时驶抵上海外滩武昌路码头，受到华东军区领导人的慰问和热烈欢迎。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轰炸，当天下午"长治"舰就离开上海，溯江而上开往南京。到达南京后，华东军区派干部和起义海军人员上舰协助起义人员。舟山国民党军闻讯后，即出动飞机搜索，并于 22、23 日连续轰炸停泊在燕子矶江面的"长治"舰。舰上发动机、锅炉遭轰炸损坏，舰上人员日夜防空，精神疲惫，情绪波动。在危急情况下，上级决定"弃舰保人"，命令将舰上器材和弹药卸下，人员离开，于 24 日晨将"长治"舰自沉于长江江底。③

上海解放后，市军管会空军部沪北办事处即派出人员接管大场机场，调查、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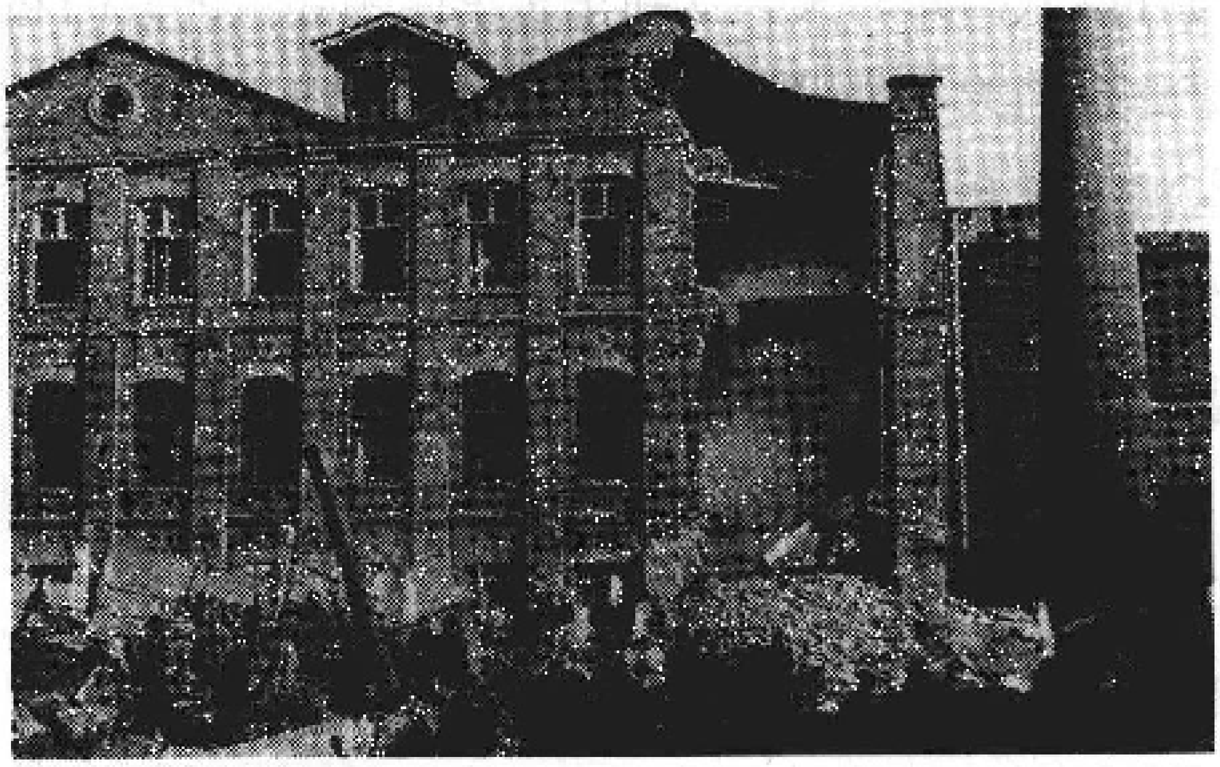
① 上海市档案馆存件（上海市档案馆展厅陈列件）。

② 王树春主编：《上海船舶工业志·大事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年，第 728 页。

理厂房设备和器材等物资。国民党空军在撤离时，对不易搬走的笨重之物都进行了破坏，能拆卸的各种设备都已运走，只遗留下破旧的棚厂、房屋，以及几架残破的飞机和少数破旧的机器设备。当时江湾机场还遗留有破旧的C-46运输机、蚊式机、教练机，军管会派出17名技术人员和工人到江湾机场，克服缺少零件等困难，修复1架C-46运输机，命名为“上海解放号”。9月中旬，在大场机场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十一厂，从事飞机、发动机修理。10月10日，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两架飞临机场上空，投下炸弹16枚，炸毁棚厂两座，炸塌办公楼，水电设备被毁，幸无人员伤亡。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将一些工种疏散至机场四周，办公也改在晚上进行。将发动机、螺旋桨、金工、电器等重要工种搬迁至上海市区霍山路300号仓库，继续坚持工作。①

1950年初，台湾国民党当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对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发电厂、码头、仓库、船只、车站、铁路、桥梁等进行广泛轰炸。意图是全面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造成上海经济和生活的瘫痪。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空袭更为频繁，轰炸规模不断升级。1月25日中午，国民党空军从舟山出动美制B-24轰炸机12架，以江南造船厂为主要目标，同时沿黄浦江对十六铺、高昌店、杨树浦、杨家渡等处投掷重磅炸弹52枚，江南造船厂中弹21枚，厂房和机器设备遭受重大损失。华东海军停泊修理的“万寿花”、“常州”等26艘舰船被炸毁，码头被毁1 000米；市区小东门、陆家嘴、杨树浦等地400余间民房被毁，炸死炸伤市民370余人，江南造船厂一度被迫停产。为了避免再遭轰炸，2月初将能开动的13艘舰艇调离上海和南京，溯长江而上疏散到武汉。②



⊙ 1950年1月11日，上海杨树浦沿江一带工厂区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书称为“二·六大轰炸”。官方记载的情况是：“1950年2月6日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飞机出动4批17架（机种：B-24型12架、B-25型2架、P-38型1架、P-51型2架）投弹约48枚，对上海市区进行狂轰滥炸。杨树

① 卞济和主编：《上海航空工业志》第1章第3节，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

② 南京军区《当代中国》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工作大事记》，1987年，第40页。

浦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今杨树浦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炸伤该电力公司职工30人，死亡26人，炸伤解放军战士21人，死亡2人，炸毁房屋40余间，发电厂锅炉大部分损坏。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今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2枚，损坏电厂变压器一部分，炸伤该公司职工4人，死亡2人，损坏民房120间，炸伤警卫战士3人，伤连长1人，炸伤市民77人，死70人，失踪战士1人、市民4人。重庆南路法商电力公司（原是柴油机发电厂，后并入南市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13枚，炸伤市民700人，死亡470人，毁坏房屋1 000多间。闸北英商电力公司（今闸北发电厂）及其附近落弹8枚，1号锅炉全部炸毁。吴淞镇落弹3枚，炸伤市民24人，死亡13人，毁坏房屋20多间。以上总计:5处发电厂及其附近被轰炸，供电量从25万千瓦下降到4千千瓦；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 448人（其中伤860人，亡583人，失踪5人）；毁坏房屋共1 180多间。财产损失未统计数字。"[①]

这次轰炸的重点是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当时属于美国商人经营的上海电力公司，早期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民国初年，工部局在杨树浦路黄浦江边建造新电厂。占地三百余亩，安装了汽轮发电机及锅炉设备。1925年杨树浦电厂装机容量达到12万千瓦，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29年，工部局电气处将其全部资产及经营权以8 100万银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商，更名为上海电力公司。到30年代，杨树浦电厂已拥有锅炉30台，汽轮发电机15部，发电量约19万千瓦，占上海总发电量的80%。上海解放后，由于经济封锁，燃油的进口断绝，造成发电困难。上海市人民政府命令当时仍属美商的上海电力公司将燃油锅炉进行改造，恢复烧煤发电，以维持上海工业和民用所需用电。[②]

2月6日的轰炸使杨树浦发电厂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据英国籍管理人员、行政副总裁亨脱（Willam Hunter）、厂长顾问帕礼司（Clifford Please）和行政助理退脱（George Tate）3月向上海市政府提交的《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陈述，我们看到轰炸造成的具体结果。

《报告书》称：

> 下列事项可说明，此次杨树浦发电厂之被炸确系蓄意及有预谋之行为：
>
> 1. 空袭时气候及视线极佳，来攻击之飞机由地上可用人目清楚见到。

① 宋元鹏主编：《上海民防志》第2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8卷，第213页。

2. 至少有飞机两架参与发电厂之轰炸。

3. 杨树浦发电厂有15架高烟囱，集中在一较小地区上，其中一具高达350英尺，此外电厂之西贴邻有5座能容11万桶燃油之油箱，可以作为无可错误之轰炸目标。

……

6. 在共约14枚炸弹中，有10枚系投掷在上海电力公司之资产上，其余投掷在发电厂南北之50码距离内。

根据事后的调查和《报告书》中附录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培卡、李嘉杰、曼敦、麦克莱及中国管理人员冯国祥的证词，杨树浦发电厂的损失为：

被炸房屋建筑：1、2、3、5号锅炉间，涡轮机间及给水泵间、办公室、循环排水渠、铁匠间和围墙。

被炸机器设备：8、9、11、14、15号涡轮发电机，12、14、17、18、19、20号锅炉，6 600伏辅助配电板，运煤及运灰驳船，燃油加热器，照明及示热线路，运煤皮带。

电厂开列的罹难职工名单：死亡24人，为首的是机械金工领班张来发，63岁，工龄32年，家属7人依靠其生活。失踪的有电器漆工舒富才、电器金工孙根堂等4人。受伤的有锅炉间服务员胡骏之等31人，其中10人伤重住院。

《报告书》说："杨树浦发电厂被炸之损失，根据目前所能确知之情形，按恢复被炸前之原状及死伤职工赔偿费计算，估计约需450万美金。"①

国民党军的空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的。此前一天，国民党空军飞机在上海市区上空撒下了中英文对照的传单："各同胞注意：凡居于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天津、北平、汉口、福州、厦门、广州各地之造船厂、发电厂、码头、车站、工厂、仓库、兵营及其他一切军事目标附近之居民，请即刻离开，以免遭受轰炸之损害。"②国民党空军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欺负解放军没有空军和防空体系，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① 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B1-2-390。

② 《上海电力公司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之报告书》附件，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B1-2-390。

三、上海的防空与困境

轰炸后第二天，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心情沉重地来到杨树浦发电厂，视察被炸情况，慰问受难群众，指示电厂争取在48小时内部分恢复发电。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连夜开会，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防空和善后措施。大家痛苦地感到，我们没有防空能力，目前无法遏制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害。2月11日，《解放日报》社论《上海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反对美蒋轰炸》传达了华东局和市军管会的七条指示：

1．加强电力管制和分配，保证主要的生产和公用事业用电。

2．各家各户准备贮水的水缸水桶，以防自来水设施被破坏。修复或挖掘水井以备需要。

3．加强防空。电力设施、车站、仓库等重点应予以伪装，居民挖掘防空壕和地下室。

4．加强防火工作，组织消防队伍，准备灭火工具和用水。

5．加强救护工作，医院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救助伤员，街道和单位组织救护队。

6．加强治安工作，组织纠察队，严厉惩处乘空袭之机抢劫破坏的罪犯。

7．加强疏散工作，组织居民迁移到乡下或外地，减少民众不必要的损失。

“二·六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80%，给上海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轰炸导致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没有电力供应，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市场萧条，物价波动。由于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则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郊区也发现少数武装特务搞暗杀抢劫。为了打击国民党特务破坏，稳定社会治安，上海市军管会于2月12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布七条禁令：

1．不准以各种信号指示匪机轰炸目标；

2．不准以各种通讯方法向匪方供给情报；

3．不准聚众骚动，扰乱治安；

4．不准散布谣言，淆惑人心；

5．不准纵火爆破劫盗或损毁国家财物；

6．不准乘机伤害人民生命或抢劫人民财产；

7．不准破坏交通及通讯设备。

违犯上述任何一条，均按情节轻重，处以徒刑或死刑。在潘汉年副市长主持下，上海公安干部日夜奋战，破获了一批国民党特务案，狠狠打击了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

上海市军管会于2月8日发布节省电力和限制用电的紧急通告。规定：

1．现有电力供应维持公用事业（路灯、交通、邮电、下水道、医院等）与必要之照明及唧水设备为限。

2．凡广告灯、橱窗灯及装饰灯一律禁止用电。

3．电热设备一律严禁使用。

4．凡电力可以达到的电灯用户，应减低用电量，以一户一灯或一楼一灯为原则。①

在遭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十里洋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明亮的商店橱窗广告风光不再，灯火管制下的居民区一片漆黑，每家只允许开一只电灯，照明半小时。街上也少有行人，萧条的气氛使人更感觉到初春的寒冷。

上海遭受的轰炸在全国影响极大。2月21日，中央军委向各大军区下达了防空问题的指示："中国大陆解放后，残匪负隅东南诸岛，仍图苟延残喘。近月以来曾连续对上海、南京及广东滨海地区施行轰炸、破坏。窥其目的，一在破坏我之经济建设，二为破坏我渡海作战各项准备，以推延我攻台时间。这是蒋匪穷途末路中对我进行斗争的唯一手段。""我各区在进军胜利发展下，对防空组织极不重视。据山东防空处长最近汇报，华东防空哨站过去多由驻军临时担任，部队移防即行废弛。少数设有防空情报台者，或则人手不齐，或则缺少机件，亦不能执行任务。似此情况，如不及早加强整理，一旦遭受突袭必将蒙受大的损失。为此军委决定：1.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应尽先建立防空监视哨网，利用有线电话网及专设之无线电台传

① 载《解放日报》1950年2月9日。

递空袭情报。各邻接区自行沟通情报通报统一办法，责成华北负责统一编定防空情报地图及代语、讯号，电台由军委三局统一编号。2. 各主要城市及工业区应设立防空司令部，负责警报、灯火管制及积极防空之指挥，执行情形报军委备案。"①

根据军委指示，北京、南京和沿海城市都成立了防空委员会，组织民众防备轰炸。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3月6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召集各单位商讨防空委员会任务以外各单位应筹备事项：1. 撤特展物品；2. 陈列室特殊收藏入库；3. 库房以延禧宫下层为较安全地库，特殊品应收入此库；4. 各宫殿大玻璃即糊纸帛。"故宫也进入了战备状态，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②

从杨树浦发电厂提供的厂房破坏示意图看，10枚炸弹准确地命中锅炉和发电机等重要设施，说明国民党飞机投弹很从容，并未受到地面防空火力的阻击。上海解放后，担任城市警备任务的是三野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三军，前身是渤海纵队。三十三军要承担市区500多个地点的警戒，力量明显不足。1949年7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并与上海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防空治安委员会。为了侦察和掌握国民党飞机的动向，从接收国民党遗留的十几部破旧雷达中，挑选了两部较好的，稍加整修后，架设在提篮桥附近安国路的一幢六层楼上，成立了一个雷达队负责对空警戒。在浦东和市区建立了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观察国民党飞机动向。但是警备部队当时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江南造船厂和杨树浦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点企业，由连队集中轻、重机枪，白天到高楼和厂房顶上值班，对空警戒。解放军基本上是陆军，没有防空作战的经验。当国民党飞机到来时，战士们用眼睛寻找目标，然后对空中射击。机枪的射程仅为1 000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③

1949年8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江南造船厂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求援。10月，军委命令华东军区组建五个高射炮团，然后赴沈阳接收苏联援助的高射炮并进行突击训练。每个团配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高射炮24门。其中第十一、第十四团负责保卫上海，11月底到达。在"二·六"轰炸时，国民党飞机仗着暂时的空中优势，连续轰炸。B-24型轰炸机作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543页。

② 《马衡日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18页。

③ 佐光：《建立上海地区雷达情报系统》，载《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7页。

水平投弹，其余飞机均环绕目标进行俯冲投弹。这次空袭，由于雷达发现不了飞机，目力观察哨观测距离过近，轰炸机飞临市区上空，我方才施放空袭警报，市民都来不及疏散隐蔽。另外，高炮部队组建不久，数量少，且缺乏雷达预警，无法提前发现目标。技术生疏，指挥不熟练，射击混乱，高炮射手不会环绕目标射击。虽然进行集中火力射击，但射击时机过晚，所以一架飞机也没有击落。当天，淞沪警备司令部调整高射炮部署，集中两个团保卫发电厂，并向中央军委紧急求援。军委于2月8日急调在沈阳接收装备并训练的华北军区高射炮第十七、第十八团加强上海地区防空，部队于2月18日到达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①

上海防空最大的问题是雷达发现不了飞机。主要原因是接收的人员技术水平低，修不好雷达的故障。"二·六"大轰炸后，防空处经陈毅司令员批准，2月16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将要毕业的学生中借来21人帮助工作。这些学生来自电机系，虽然学了不少无线电方面的理论，但都没接触过雷达。开始工作并不顺利，国民党飞机来袭击，地面观察哨用眼睛都看到了，但雷达仍未发现飞机。上级领导和学生们都很着急。团支部书记林学昌提议请专家来会诊。先请来交大的蒋大宗老师，他虽然在抗战期间接触过雷达，但也没有解决问题。他建议把上海市无线电技术水平最高的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请来帮助调试，钱总准确判断出问题出在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工作频率不一致。经过调试，雷达在3月20日9时第一次发现了飞机。华东局、上海市委有关部门与交大联系，让学校动员这批学生参军。交通大学的21名学生除1人外都参军了，这批学生后来成为解放军防空部队雷达技术的骨干。②

2月21日中午，国民党飞机B-24五架、B-25两架、P-51两架分批进入上海市区，轮番轰炸闸北水电公司，投弹12枚，造成10余人死伤，发电设备严重损坏，这是"二·六"大轰炸的余波。由于轰炸以及封锁和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1950年上半年的上海处境极为艰难。上海的工厂约有1.2万家，1～5月期间停工的达1 454家，占10%以上。上海的商店约有十万余家，在这五个月间歇业的达6 000多家，占6%左右。因为停电，上海的多数纺织厂无法开工，投机商人囤积纱布，市场物价又出现波动。当时在上海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2月10日写信给聂荣臻并转朱德、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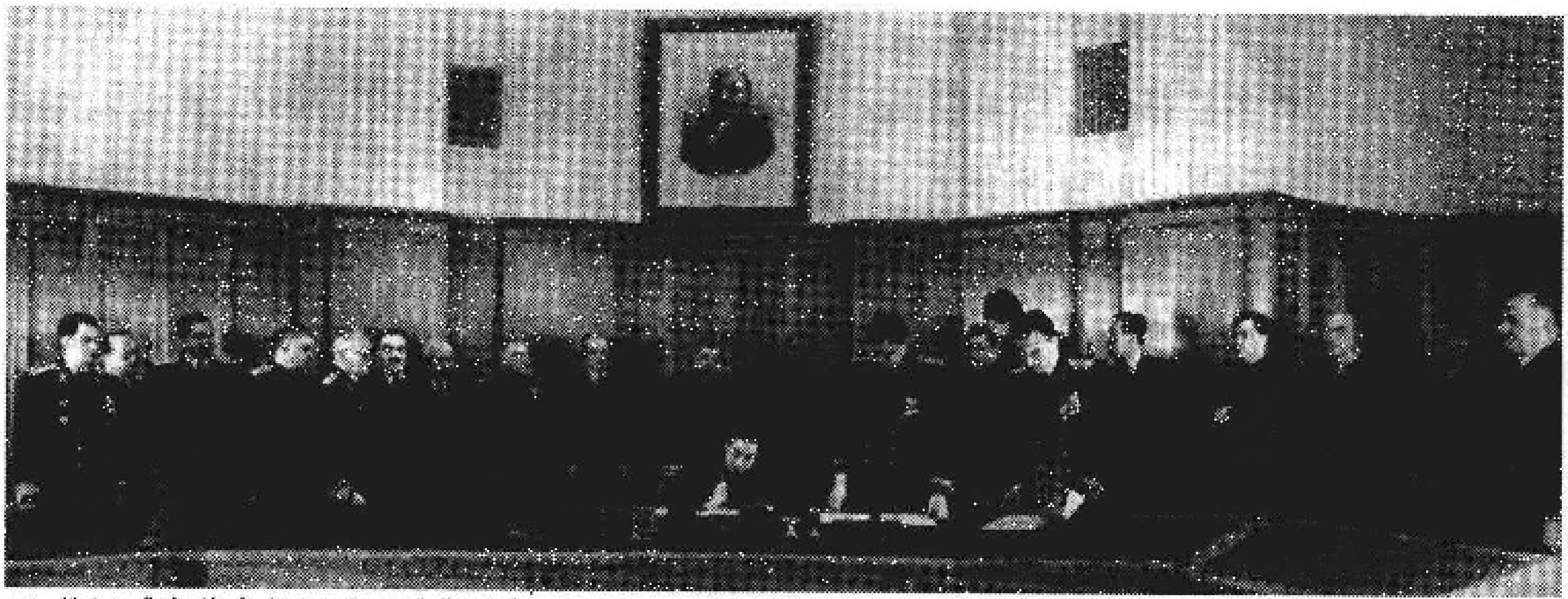
① 《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42页。
② 林学昌：《在我军第一个雷达队的战斗生活》，载《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49页。

少奇，汇报了上海被炸的严重后果。信中说："上海纱布生产量占全国纱布生产量的一半。这次轰炸，上海纱厂停工，从电力恢复到纱厂恢复生产需一个半月时间。这一个半月停工减产纱布的结果，纱布必成投机囤积的对象，这三天上海情况已经明显。因此，我们提议：军队只发两套单衣（取消一套衬衣，且第二套单衣要求延迟些发，使我们能赶产纱布），地方则只发一套单衣，时间也推迟。"①朱德总司令批准了陈云的请求，全军当年每人减少一套单衣。

四、苏联防空部队来华

严峻的形势使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和上海市长陈毅感到压力极大，看到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内战胜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党和政府没有能力保卫大上海的安全，只能寻求躲避轰炸的策略，心情沉重。华东局连续召集会议，商量市民疏散和工厂迁移的问题。2月23日，《解放日报》头条新闻是《面向内地前途无限光明，内迁各厂先后开工，原料便利产品畅销》，介绍1949年底迁到天津的四个卷烟、针织内衣工厂先后开工生产的情况，以为进一步内迁工厂造舆论。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都是不足百人的私营小企业，如果要将造船、电力、钢铁等大企业迁往内地，谈何容易。所以2月6日，饶漱石将情况电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称：今日敌机第二次轰炸上海，规模仅次于上月25日，但损失远较25日严重。2月7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转呈华东局电报。②

得知上海连续遭到轰炸的消息，远在苏联的毛泽东也十分焦急。中苏谈判到了



⊙ 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3页。

②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

关键时刻，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第一条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一条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希望在解放台湾时，得到苏联海空军的支持，这就确立了中苏两国军事联盟的基础。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都随周恩来到了苏联，商谈筹建中国空军和海军购买设备和派遣顾问，建立技术学校等具体问题。条约签订前，毛泽东收到刘少奇转来饶漱石的电报。中国领导人紧急约见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苏联方面答应了中国的请求。17 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

少奇同志即转饶漱石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①]

毛泽东所说的"妥善可靠办法"，是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团军，由巴基斯基中将指挥，来上海协助防空。2 月 12 日傍晚，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上将紧急召集军区参谋长巴基斯基中将交代任务。赴上海的苏军防空集群由最精锐的莫斯科防空部队组成，巴基斯基出任司令，斯柳萨列夫将军任副司令，亚库申上校任歼击机部队指挥官，米罗诺夫上校为后勤部长，斯皮里多诺夫上校为第五十二高炮师师长。

巴维尔·费多洛维奇·巴基斯基，1924 年参加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方面军中任步兵第七十三、第五十和第一二八军军长，参与了解放波兰、歼灭东普鲁士德军重兵集团、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战役，建立了卓越功绩。1948 ~ 1950 年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1950 ~ 1953 年任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1954 ~ 1965 年任莫斯科防空区司令，1966 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土防空军总司令。1968 年授予苏联元帅军衔。[②]

2 月 16 日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机场，巴基斯基与各部队指挥员登上飞机。沿莫斯科——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赤塔——哈尔滨——北京的路线飞往中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第 76 页。
② 编审委员会编：《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 7 卷《人物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第 54 页。

国。2月17日上午，他们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了中国方面非常热烈的欢迎。抵达北京当天，苏军将领拜会了朱德、周恩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中国领导人向他们介绍了上海的防空形势和任务，他们也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苏军来华防空部队的基本情况。

得知苏联防空部队即将来上海的消息，上海党政军负责人极其振奋，他们立即部署准备工作。上海警备司令部命令第九十七、第九十九和第一〇〇师官兵，并动员上万民工，连夜突击扩建江湾、大场、龙华三个飞机场，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3月1日，华东军区决定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由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上海市防空的各项工作，包括健全各级组织、调整兵力部署、建立空中情况警报系统、沟通指挥通讯，并配合苏军为其提供一切保障。上海军民昼夜在机场施工，国民党方面似乎感觉到了什么。3月14日，国民党舟山基地轰炸机18架、战斗机8架分批对修复的龙华机场进行轰炸，投弹194枚，将机场跑道炸了许多大坑，造成军民17人伤亡。江南造船厂也再次遭到空袭，驻守该厂的高炮第十一团猛烈对空射击，击伤B-24轰炸机和P-51歼击机各一架，迫使国民党飞机升至5 000米高空，匆忙投弹后返回。[①]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的疯狂了。上海军民共同努力，终于在苏联防空集团军到达之前，将三个机场全部抢修完毕。

为了给来上海的苏军部队创造良好的作战、生活条件，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华东军区航空处、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部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班子，进行准备工作。接待办事处设在虹桥，负责苏军的物资供应、住房设备、生活用品和保卫工作。市电讯局还调拨了大量的市、县线路，架通了所需要的电话线路。当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第四警备区通信科长的佐光回忆：1950年2月中旬的一天，他奉命到淮海中路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领受任务。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王智涛传达了军委的指示，交给佐光的任务是：组织一部分干部，在省、市、县政府的帮助下，2月底以前，在上海南汇县、苏北的启东县、苏州市、浙江的海盐县建设雷达阵地，安排前来工作的苏军人员的住宿、生活保障、阵地警戒等。在虹桥机场、江湾机场建设引导雷达阵地的任务由航空处的同志负责。安国路雷达队由防空处情报科负责。这是为苏联空军的到来预先做好对空侦察、警戒和引导飞机作战所需要的准备。领受任务后大家分头到各地，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配合下，经过近20天的紧张工作，到3月初，几个雷达阵地都建起来了。通往阵地的公路修通了，桥梁架起来了，电源

① 《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第545页。

接通了，人员住房、中西餐厅也都修建好了。在雷达站周围部署一个步兵连，担任雷达站的地面警卫。3 月中旬，苏军混合集团军的部队陆续到达上海。苏军独立雷达营带来 10 部П-3A 型警戒兼引导雷达，20 余部 500W 发报机，数十部收报机，20 余部汽油发电车，还有一套雷达营情报站收集处理、报知雷达情报的设备。营长是斯林卡克中校，营部、营情报站设在虹桥路接待站内。独立雷达营到达上海后，用三天时间了解上海周围情况。由于各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苏军雷达技术人员到达阵地后，当天就架起雷达、电台，开始担负战备值班任务。到 3 月 10 日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由 5 个雷达站组成的地区性雷达情报系统已经形成。距上海 250 公里的高空飞机、150 公里的中空飞机都可以及时发现、连续跟踪了。安国路的防空处雷达队经过加强技术力量，请国际电台总工程师钱尚平先生帮助调试后，也可在 300 公里有效范围内发现飞机。江湾、虹桥两个机场的雷达站也开始执行引导苏军飞机的任务。①

2 月 17 日，巴基斯基等将领到达南京，受到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的迎接。粟裕向苏军将领详细剖析了蒋介石军队的现状，人员编制及战斗力，以及美国的军事援助。并介绍了华东野战军部队的战斗力和训练情况，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果，以及准备渡海攻打台湾的设想。

2 月 19 日 15 时，苏军指挥班子抵达上海，与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会晤。陈毅着重介绍华东军区保卫上海兵力和装备，上海这座城市有哪些特点，最需要保护的重要工业区和运输枢纽的分布情况，使苏军指挥员尽快熟悉和掌握情况。

随后，苏联防空部队混合集团军各个梯队 3500 余人，自 2 月底至 3 月 27 日陆续到达上海。2 月 25 日，第一趟运载空军地勤营专列驶入上海。陈毅司令员亲自到车站迎接。马卡罗夫上校的歼击机团有 45 架拉 -11 歼击机，他们从大连机场起飞，飞越渤海湾，经青岛抵达徐州，在短暂停留后到达上海。谢苗诺夫上校指挥一个有 30 架图 -2 和 30 架伊尔 -10 的混成轰炸机团，也沿上述飞行路线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帕什科夫上校的米格 -15 飞行团也从莫斯科经铁路抵达徐州。当时苏联空军刚刚开始配备喷气机，帕什科夫团是苏联首个投入实战的部队。②

巴基斯基的指挥所设在上海市虹桥路，与上海防空司令部建立了协同作战关系。根据中苏双方政府的协议，巴基斯基部队负责担任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以上海虹桥机场为中心、150 公里半径（但向东不得超出海岸线）以内地区的防空任

① 佐光：《建立上海地区雷达情报系统》，载《防空军 · 回忆史料、大事记》，第 58 页。

② 斯皮里多诺夫：《苏军保卫上海的天空》，彭华编译，引自“天涯论坛”。

务。苏军部队有两个歼击机团（一个米格-15团，一个拉-11团）、一个混合轰炸冲击机团，共99架飞机，先后分别进驻虹桥、江湾、大场机场。一个探照灯团，以排为单位，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区、市郊和浦东。一个雷达营，以连（站）为单位，分别部署在上海市及其外围，如南汇、苏州、海盐、启东、镇海各点。为了严格保密和维护苏军的安全，虹桥、江湾、大场机场由上海警备司令部分别派第九十七师第二九〇团、第九十九师第二九七团和第一〇〇师第三〇〇团担任警戒，分散各地的探照灯、雷达部队驻地也都派出部队警戒。

米格-15（МиГ-15）歼击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亚音速飞机，最大速度1 070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高度15 200米，航程1782公里。机上装有一门37毫米、两门23毫米机关炮，备有200发炮弹。1948年底才交付苏联空军使用。巴基斯基部队来上海的一个飞行团拥有米格-15歼击机38架，飞行员多数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经验，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飞行部队。而国民党空军当时使用的最好的战斗机是美制P-51歼击机，为二次大战期间研制的活塞式螺旋桨飞机，最大飞行速度704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高度12 800米，航程3 700公里，配备12毫米机枪6挺，炸弹450公斤。执行轰炸任务的B-25轰炸机最大飞行速度467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高度8 540米，航程5 960公里，配备12毫米机枪10挺，炸弹4 000公斤。[①]对比这些参数可以看出，苏联喷气式战斗机在高空、高速性能方面比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都要优越得多。

五、上海防空保卫战的胜利

了解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严峻形势，巴基斯基部队这次调动采取了临战非常措施，空中梯队在转场过程中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地面梯队则要求随到随展开随参战。3月13日，米格-15飞行团第一梯队到达徐州机场时，突然遭遇国民党P-51战斗机空袭，苏军米格战机立即起飞迎战，当即将其击落。次日，国民党空军又派一架B-25轰炸机临空侦察情况，苏军飞机又起飞予以迎击，将其击伤后迫使其降落在徐州东大湖车站附近，除一名射击员在空中被击毙外，国民党空军分队长孙希文上尉等6名机组人员全被俘获。

3月20日，巴基斯基部队歼击机团先遣队刚到上海，立即领受了随时起飞作

① 编审委员会编：《空军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第449页。

战的任务。23日国民党飞机入侵上海，苏军战机迅即起飞，将正在轰炸扫射的一架P-51飞机击落，首战告捷。

4月1日，上海防空司令部于淮海中路1189号建立起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要地防空合成指挥所。至此，上海完成了有诸军兵种参加的现代化要地防空配系——空中设防。

上海空中设防后，苏军巴基斯基防空集团与人民解放军地面高炮部队密切配合，在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中连续取得重大战绩。4月2日国民党空军派出P-51型战斗攻击机两架袭扰上海市区，轰炸扫射。苏军歼击机立即起飞迎战，在追击过程中精确攻击，将其中一架击落于杭州湾海中，又将另一架击成重伤，坠毁于浙东四明山区。4月18日国民党P-38飞机两架从海上进入上海地区，长机未及投弹即被击落于横沙，飞行员王宝翔毙命。僚机亦被击伤，机身冒烟发动机起火，最后坠落于国民党空军岱山机场海边，飞行员李长泰跳伞落于岱山岛以西海面。两次空战连续击落国民党飞机4架，引起了国民党军将领的震惊，他们难以想象共产党军队怎么一下具备了先进的空军和防空装备。因此，国民党空军一改以白天轰炸为主的空袭方式，转为夜间偷袭。[①]

5月11日夜21时，国民党空军B-24轰炸机4架，分三批携带重磅炸弹企图乘黑夜轰炸上海，被地面雷达发现之后，上海的防空部队全部进入一等战斗准备，严阵以待。第一批飞机遭到防空部队高射炮射击掉头逃跑，当第二批一架飞机刚进入上海市区，就被苏军探照灯照中和不间断地跟踪。苏军拉-11战机起飞迎战，地面高射炮紧密协同，交替轮番射击，一架轰炸机被击中，坠落于浦东塘桥，机组人员全部丧命。另一架B-24飞机未进入到上海境内即仓促投弹，然后调头逃窜。上海市民目睹了这场空战，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血债必须血还，一架匪机被击落》的大标题，报道了国民党轰炸机被击落的消息和飞机残骸的照片，其中一块碎片上印着“美国加利福尼

⊙ 被击落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残骸

① 相守荣主编：《上海军事志》第8编《战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87页。

亚州”的字样。这个消息使被空袭轰炸压抑多日的上海军民感到振奋，但为了保密，不能暴露苏军的行动。报纸只笼统地说国民党飞机“被我防空部队击落”。在陈毅市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问是用什么武器击落飞机的，陈毅说是用高射炮打下来的。有的记者问：“高射炮能打这么高吗？”陈毅风趣地说：“它能飞多高我们就能打多高！”①

上海空中设防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苏军巴基斯基部队在上海警备部队配合下，四战四捷，先后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各型飞机6架，制止了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的轰炸破坏。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避免深入”的方针，明确国民党空军的任务应转为防守。

国民党将领百思不得其解，解放军怎么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具备防空和空中打击力量？驻舟山的空军将领劳声寰回忆：“我们的空军确实掌握了空中和海上的情况。不仅经常攻击对岸结集的船只，还深入内陆，远至上海杭州一带侦察共军的活动状况。我特别建议注意共军的空军情报。当时很多人都以为短时期内共军还不会有空军参战，因为他们没有飞行员和飞机。我则认为苏联极有可能以飞机和飞行员直接介入。最初我们的侦察机经常执行空中照相，各机场上都未发现飞机。不料没有多久，就有一架P-51在杭州附近被敌机击落。接着是飞往上海准备轰炸共军的一架B-24被击落。空军负责掩护的八架P-51曾与敌机发生空战。这就说明共军已有空军了。但究竟是何种飞机还不清楚。于是空军派了一架P-38照相侦察机前往侦察，落地后将照片冲印出来，无不惊吓。原来共军的飞机竟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射战斗机米格-15，仅虹桥机场上就停了数十架。这种飞机的性能比我们的P-51好得太多。我不幸而言中，苏联果然直接介入了。这一张空中照相决定了舟山群岛的命运：没有制空权，不能防守。”②

与此同时，四野部队大举登陆海南岛。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被迫作出从海南岛和舟山撤军的命令，全面收缩以保卫台湾。国民党军队撤退后，东南沿海地区只有大陈、金门、马祖等少量岛屿为国民党军控制，无力再封锁和袭扰大陆。中苏军事同盟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大大增强了中共中央解放台湾的信心。虽然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未能实施，但随着中苏同盟的日益巩固，新中国的军事力量逐渐强于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比发生了转化。

---

① 郭化若：《警备大上海》，引自李晓黎主编：《从渤海到大上海——渤海纵队、33军征战纪实》，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

② 劳声寰：《古宁头战役前后的军事生涯回顾》，摘自析世鉴网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对比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illegible]

以十號共

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

——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 年①

杰瑞米 · 布朗②

（Jeremy Brown）

摘要：1949 年底人民解放军向贵州与西南其他地区进军，其对西南地区的占领并不一帆风顺。为保障军队供给而采取的过度征粮和征税政策，导致了这一地区的农民的不满，一部分人甚至参与了对新政权和人民解放军的武装抵抗。武装抵抗者的成分包括原政权执掌者、国民党军队、少数民族和部分农民。新政权对这种抵抗实施了武力镇压，解除抵抗者武装，并将其中一部分人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送往朝鲜战争前线。在那里，这些反抗共产党人的农民转而卷入了反抗美国军队的战争。这个过程，后来对西南地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关键词：西南地区　内战　朝鲜战争

1952 年年末，在南朝鲜的一所军营里，战俘李华国（音译）向美国军事情报官员和盘托出了他的秘密。③李华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士兵，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由一百多万男女组成的部队，被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派来

① Jeremy Brown, "From Resisting Communists to Resisting America: Civil War and Korean War in Southwest China, 1950-51", in Jeremy Brown, Paul Pickwicz (eds.), *Dilemma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5~129.

② 作者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

③ 所有关于李华国的信息来自于军情处第 511 班审讯官报告第 KG1342 号，1952 年 11 月；联合翻译与解释处（Allied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Service，以下简称 ATIS）审讯官报告，950054 卷，336 盒；情报文件出版物（950000 卷）1947 － 62；联席参谋长助理，G-2（情报）；陆军参谋部记录，1903 － 92，319 记录组；马里兰州柯律治公园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以下简称 NACP）。

进行“抗美援朝”的。当李华国与他的审讯官面对面坐在一张桌子前时，他一定对他在过去三年的奇特经历感到十分诧异。31岁的李华国原来本是一名农民，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贵州省西南角一个村庄里，而那里距离朝鲜有一千六百多英里。一直到1949年末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贵州省兴义县，李华国从事的工作就是在家乡的田地里种地。但是到1950年1月，已经对新政权感到厌恶的李华国放弃了农业耕种，转而参加了抵抗中国共产党部队的一支游击队。

那些关于1949年11月贵州被成功“解放”的报导至少是十分不成熟的。在贵州全境和中国西南的其他地区，有许多像李华国这样的人拿起武器抵抗前来占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一些当地人参加了各种农村民兵组织，而其他人则与国民党部队建立了各种联系。对共产党的抵抗曾一度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1950年3月，贵州的新领导人不得不从包括兴义在内的28个县撤回了他们被包围的士兵和干部。[①]争夺贵州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51年。

李华国的抵抗在1951年1月结束，共产党的士兵在一个山地藏身地抓获了他和他的142名同志。12名游击队领袖被枪毙，而其他人则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一个月后编入人民解放军。李华国接受了政治训练并在兴义的军队建设项目中工作了一年，随后他被派遣参加了中国人称为“抗美援朝”的朝鲜战争。1952年2月，李华国越过了鸭绿江并前进到位于朝鲜半岛中部的前线。在那里他接受了步兵训练，并建造了各种掩体。在5月的一天，李华国将挂在碉堡墙壁上一颗手雷的撞针拔掉，所引发的爆炸杀死了他的两名战友并导致另一名战友严重受伤。在此事故之后，李华国被看押，但是两天之后他成功逃跑并向南朝鲜一支海军部队投降。

李告诉美国陆军审讯官木薮（kiyabu）先生，他是“不小心”引爆了那颗手雷。他还把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统治兴义县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木薮。李画了一个兴义地图，十分有用地标明了监狱、安全部队营房、共产党司令部、学校、桥梁、一个邮局和一个牲畜市场。在对其上司的报告中，木薮认为李华国“缺乏常识”，因为他“不能理解问题”，他“需要讲特别多的话才能表达他的思想”；但是李看起来非常合作，“拥有大量的信息”，“非常友好”，“并具有幽默感”。木薮认为李华国的情报信息相当可靠，并注意到李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战俘交换时“将会拒绝返回他的故乡”。考虑到李华国的态度，在1953年7月朝鲜停火后，他极有可能拒绝遣返回

① 何长风等编：《贵州当代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中国大陆，从而成为去了台湾的 14 000 名中国战俘中的一员。[①]

从木薮的评论来看，对于那些改变了他 1949 年之后生活的重大事件过程，李华国并不了解。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李华国从贵州到朝鲜、从抵抗共产主义到抵抗美国这一旋风般的历程？如果将西南地区人民的经历作为分析的中心，那么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历史，看起来截然不同于那些标准的叙述——共产党迅速取得了胜利并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之后是内容丰富的“蜜月时期”。[②]当我们从贵州的角度、而不是从北京或者中国北部“老解放区”的角度来考虑共产党夺取政权，那么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关于新政权“十分容易地被人民接受、并令人吃惊地几乎没有遇到积极抵抗”的看法就值得重新考虑。[③]在中国西南，对共产党军事占领的武装抵抗在若干年内都是主要问题。

在地势崎岖的贵州，内战并没有随着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获得干净利落的结束。1950 年与 1951 年内战仍在延续，并与中国卷入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美国的陆军档案和最近公布的中国材料说明，数千名像李华国这样的人在代表中国出战朝鲜之前都曾在西南地区与人民解放军作战。而更多的人是人民解放军各个部队的成员，负责征收赋税、建立地方政权、镇压反共造反，但在朝鲜却与他们之前的对手成为战友。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从贵州到朝鲜的历程解释了这是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人们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速度转换着。在中共对西南地区军事占领后不久，人们就发生转变并十分容易地被贴上了像“土匪”、“英雄”、“烈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这样的标签。但是这也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时期，一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为“土匪”后，他的家人与社团的生死就被掌握在革命的政党国家手中。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本卷相关章节（第 2 章）的文章，与詹姆斯·高（James Gao）对杭州的研究，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在占领江南地区前进行了细致的策

---

① 在 21 000 名中国战俘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选择去台湾。见 Philip West 和 Li Zhihua，“Interior Stories of the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in Philip West and Ji-moon Suh, eds.，*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The Korean War through Literature and Art* (Armonk, N.Y. : M.E. Sharpe，2001)，152~186.

② Cheng 和 Selden 将 20 世纪 50 年代初称为“人民共和国的蜜月期”。Tiejun Cheng and Mark Selden,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 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September 1994): 26.

③ Joseph W. Esherick, “War and Revolution: Chinese Society during the 1940s,”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27.1 (November 2002): 26.

划。[①]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人在接管西南地区时毫无准备。像邓小平与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低估了当地人民拒绝接受一个距离遥远的北京新政府的程度。在解放军进军经过贵州时投降或者仅仅是被忽视了的旧掌权者、少数民族成员、农民和国民党士兵，都对解放军的占领提出了挑战。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由于新政权在夺取权力之后立刻派出武装征粮队，从而破坏了让人们建立良好第一印象的机会。在一些地区，1950 年初对 1949 年收获粮食的征收也许令原来倾向于支持新政权的穷苦农民奋起激烈抵抗，因为国民党政府已经对这一粮食收获征收过赋税。

在中共于 1950 年春开征粮食税收之后，贵州的造反变得非常明显——10 个县丢失（数字似不确。连主动撤离的，有 31 个县在叛乱者手里——编者），上千名干部和士兵被杀，新政权的回应手段是军事上的包围和朱丽娅·斯特劳斯（Julia Strauss）所谓的"家长制恐怖"。[②]在贵州，这一恐怖采取了解放军与地方民兵将抵抗者的家庭成员关进监狱并公示被打死"土匪"尸体的形式。这一点之所以是家长制的，是因为允许抵抗者悔罪并允许其到朝鲜与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作战。总的来说，共产党对西南地区抵抗的反应是成功的。到 1951 年末，解放军已经击败了绝大多数游击组织。但是在西南地区一开始出现的严重问题、随后又采取恐怖主义军事占领所产生的后果却影响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之后的时期。

这一章详细阐述最初几年中国共产党对贵州及其临近的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的统治。我将讨论什么人反对新的政权，他们为什么要抵抗。我将探究中共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军事占领与朝鲜战争之间的联系。本研究基于两个资料来源。第一，我利用了来自美国陆军审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战俘的记录。这些档案保存在马里兰州柯律治公园（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并按中国战俘的生活史进行了编年，对了解 1949 到 1952 年间中国的变化提供了详细的地方材料。我搜集了 147 份对战俘的审讯记录，这些战俘都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统治西南地区——包括贵州、湘西、四川、广西、云南——的最初几年。第二，我利用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政府文件，还有最近出版的中国资料文献，其中包括了县志和回忆录。

每一组资料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在最初，我预计审讯记录将会将共产党政权妖魔化。同样，我假设中国的资料会美化对西南地区的接管。令人吃惊的是，出现了

---

①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② Julia C. Strauss, "Paternalist Terror: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3,"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January 2002): 80-105.

截然相反的情况。军事审讯一直都反映了审讯者与战俘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在南朝鲜，许多战俘确定无疑地撒了谎或者夸大了他们在抵抗新政权中的作用，因此来讨好其监管者。但是，许多战俘对共产党人十分忠诚。总的来说，审讯报告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关切，甚至关心到贵州学校的位置。有趣的是，汉语材料在对待占领初期的错误以及大规模抵抗方面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当然，中国大陆的资料宣称，像李华国这样的农民是“被迫”参加由地主领导的武装抵抗。但是为了恰当地赞扬1950年和1951年间的剿匪，地方志公开说明了共产党人面对了多少敌人，以及这些敌人是如何被处置的。将这些材料集合起来，它们说明了普通民众如何被卷入了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

一、对西南的占领

对于毛泽东来说，1949年中国国家的重新统一作为一种现实可能性，其到来的速度要比他预料的要快。到1949年中，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面对的情况是要突然掌控中国北方农村以外的广大地区。在中国北方农村，中国共产党通过经年累月的审判与恐怖已经赢得了普遍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迫切的寻找那些既可靠又对西南地区十分了解的人。

1949年8月，贵州籍共产党干部方士新正在向中国东北城市长春前进。党中央命令驻扎在东北的华南籍与西南籍党干部到长春集中，准备接管其家乡地区的政权。与方士新一起参加贵州干部队中的一些官员是在1934年底、1935年初红军长征穿越贵州时参加了红军。而其他一些人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到达延安，还有一些人是贵州的地下党成员。[①]贵州干部队被派遣到南京向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四川籍，在5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报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是194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11月在湖南常德正式建立的——编者）。

在1949年9月20日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告诉方士新和他的同志们，第二野战军将要解放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在内的西南地区。邓说西南的未来是光明的，但是提醒干部们要注意他们将要遇到的封建势力。邓小平还颇具预见性地说，部队在西南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如何找到足够的粮食——“第一关

① 方士新：《忆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走向大西南》编委会：《走向大西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25页。感谢 James Gao 让我分享了这一资料。

是吃饭关"。[①]二野命令一些来自最近建立的西南服务团的热情的年轻人加入到贵州干部队中。西南服务团主要由一万多名上海浙江地区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跟随解放军并帮助进行宣传工作与征税。

在接到邓小平命令一星期后，这一组大约 1 400 名干部和学生起程赶赴湖南，向那里的杨勇和苏振华司令员报到。[②]这两位将军在湖南已经建立了一个贵州省影子政府，杨勇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和贵州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为党书记，徐运北为副书记。[③]最新被任命的贵州领导人计划在突进到农村地区之前占领像贵阳、遵义这样的大城市。从 11 月 1 日开始，解放军战士们，以及尾随的贵州干部队和西南服务团的成员们，从湖南进入了贵州。他们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前锋部队与地下工作者劝说了许多国民党官员和秘密会社领导者投降。11 月 15 日，解放军占领了贵州的省会。

受到沿贵州主要交通动脉进展迅速的激励，贵州省的新领导人执行了一项合作政策。很明显邓小平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政策。但是邓小平、毛泽东、杨勇或者苏振华并未怀疑他们的宽大仁慈会在几个月后招致麻烦。1949 年 11 月 12 日，邓小平给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在接管过程中接收国民党人。所有省、地区和县政府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都为非共产党人员保留。邓写道，这一策略将"一定比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邓要求贵州领导人不要树敌过多，在处理武装群体、特别是少数民族武装时，"要防止过急的毛病"。[④]毛泽东十分欣赏这种对忍耐性接收的强调。11 月 19 日他将邓小平的电报转发给全国各地的党领导人，要求他们向下级单位散发这一电报的复印件。[⑤]

就贵州而言，毛泽东和邓小平除了宽大并无其他选择。解放军只掌握了贵阳、安顺、遵义以及连接贵州与四川、湖南公路沿途的城镇。而这一多山省份的其他地区仍然未被占领，许多部队都在 1949 年底离开贵州进入四川和云南。[⑥]沿滇西——

---

① 方士新：《忆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第 26~27 页。

② 何长风等编：《贵州当代史》，第 6 页。

③ 方士新：《忆进军大西南的贵州干部队》，第 29、3 页。

④ 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邓小平文选，1938 － 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42~144 页。

⑤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工作策略问题电报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年，第 1 册，第 143~144 页。

⑥ 徐运北：《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见《贵州文史资料选编》第 14 辑（1983），第 4 页；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见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 2 卷，石家庄：群众出版社，1992 年，第 551 页。

贵阳公路居住的人们并不愿意放弃权力而服从共产党人，例如当地的掌权者杨凤池、魏德茂，只是在表面上投降解放军并被授予了官职。从1935年到1949年一直是贵州省岑巩县国民党政府保安局局长的杨凤池，在1949年11月立刻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他在两个新成立的县组织中获得了职务："支前委员会副会长"和剿匪司令部副司令。①魏德茂是一个真正的匪首，他在他的家乡镇远县曲意逢迎解放军，因此在当地区政府获得了一个职位。②杨和魏都在等待机会来反抗占领此地的中共军队。

而中共占领者不加歧视给予各种职位的政策，在几个月后招致了相反的结果。但是产生最大损害影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拿走的东西、而不是交出的东西。过度的粮食征收最终将许多人推向了像杨凤池和魏德茂这样的反叛领导。正如邓小平所预见的那样，1949年末、1950年初士兵、干部和学生的首要活动就是寻找食物。西南服务团成员任希文记得1951年1月重庆的一名共产党财政官员传达的讯息："在进入一个地区后，要抓紧时间处理好粮食和征税工作。"三个星期之后，任希文到达了贵州西南部。在那里，云南省委书记与二野副政委（应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编者）宋任穷告诉一群准备进入云南的干部，"你们必须把粮食掌握在手里"。③

早在1949年12月27日，宋任穷已经向他的部下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在抵达云南后立刻对1949年收获的粮食进行征收。④由于国民党人已经在1949年秋对这一收获进行过征收，因此这一政策成为引发整个西南地区产生愤怒的一个来源。根据曾在成都附近生活过的史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研究，1950年2月与3月成都地区的征粮率"比国民党人前一个秋天对同样谷物进行征税高出四分之一强"。⑤邓小平在1950年2月所写的一份报告说明，史坚雅的数字是保守的。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新政府在四川已经征收到100万吨粮食，是国民党征收粮食总量的两倍多。（邓小平的报告称，国民党在四川最高征粮数为1 200万担，中共这次征粮2 000万担，还注明2 000万担为30亿斤。据此，中共

① 贵州省岑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岑巩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84页。

② 贵州省镇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镇远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9页；葛仁经（音译）：《"猫科"就擒记》，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2卷，第631~633页。

③ 任希文：《艰苦的战斗——回忆1949年至1950年公粮征收工作的历程》，《走向大西南》编委会：《走向大西南》，第636页。

④ 任希文：《艰苦的战斗——回忆1949年至1950年公粮征收工作的历程》，第637页。

⑤ G. William Skinner, "Aftermath of Communist Liberation in the Chengtu Plain," *Pacific Affair*, 24.1 (March 1951): 64.

征粮数应为150万吨，而不是100万吨；应是国民党最高征粮数的1.67倍，而不是两倍多——编者）邓承认干部们忽视了负担过重的四川“小地主们”的恳求，也不相信他们已经向国民党交过税。即使是这样，对两次征收粮食的普遍抵抗导致共产党征粮目标的60%未能完成。①

史坚雅认为，对富裕的成都平原进行狂热的征收粮食是为了向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提供粮食。但是有证据显示，即使是云贵高原的丘陵山地地区也面临着沉重的征粮负担，而那里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得鸦片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要比粮食更加有利可图。②很明显在整个西南地区的共产党部队——不仅仅是那些进入西藏的部队，所需的粮食要大于西南地区实际能够提供的数量。这一问题也不仅限于西南。正如詹姆斯·高所展示的那样，解放军部队由于未能在新疆获得充分的粮食补给，而不得不进行起当时唯一的军垦。

西南地区的额外粮食征收负担已经将人民逼至绝境。在贵州思南县，孙修和（音译）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五倍。作为朝鲜战争一名战俘，孙修和向他的美国陆军审讯官抱怨说，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孙说，在整个司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孙修和说，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在1950年10月加入人民解放军，因为他家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孙在1951年被送往朝鲜战场，他很快就开小差并向美国军队投降。③

我们已经看到了贵州的共产党占领者在几个方面估计错误。首先，共产党的士兵和干部很快就离开该省，共产党依靠的是许多国民党投降部队。除了极少数人民解放军仍然占据优势的地区，之前的掌权者被允许渗透到新政府中。而沉重的税收比以前还要严重。这一问题，加上征收粮食问题，摧毁了穷苦农民与他们表面上看

---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给刘少奇、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剿匪斗争：西南地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93页。

② Dorothy J. Solinger,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71.

③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797, October 2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Theater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cords of the U.S. Army Military District of Washington, 1942-1991, Record Group 554, Entry 17A (General Headquarters, Far East Command, Supreme Command for Allied Powers, and United Nations Command); NACP.

似的解放者之间的第一次互动。反抗在枪口下征收重税是有钱的当地权力拥有者与穷苦农民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这一同盟，加上许多投诚国民党部队心存异志，都在1950年春为贵州的新政权制造了麻烦。

二、对占领的抵抗

1949年11月，解放军进入了一个在过去十五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省份。抗日战争使得贵州有了新的公路和交通体系。但正如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所说，贵州省在1949年之前并未真正地整合进中国。在整个40年代，当地人对外来人十分猜忌。各种秘密会社组织了各种抵抗来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税。[①]1942年贵州东部爆发了一场反对国民党的暴力起义——黔东事变，该起义提出了三个简单扼要的要求："不当兵、不纳粮、要种洋烟。"[②]当地农民十分讨厌对从外地来的部队的压榨行为，而从国民党统治中获得好处的那些人特别感到了了来自共产党人的威胁。

1949年1月，国民政府贵州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焕飞赴南京，接受了将贵州当作西南地区反共抵抗的最后堡垒的命令。他们返回后除了加强反攻宣传之外，谷和韩还在贵阳建立了一个"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在那里他们武装并训练了1 600多名贵州居民，随后将这些受训者派出去联系其他同情者。在8月末，谷与韩计划逃离，但是首先向国民党特工人员散发了无线电台，并打开贵阳监狱释放了超过800名的"惯匪和小偷"。[③]

这一网络在1949年末隐闭起来，并利用了新政权的宽宏大量。不过司令员杨勇回忆说，解放军部队离开贵州前往四川和云南这一事实鼓励了共产党的敌对者。1950年3月，1949年末投降的国民党部队突然间叛乱。几乎同时，各种农村武装团体"一个接一个"地起而反对新政权，[④]估计有13万人、超过460个武装团体开始反抗共产党人。贵州高级军事官员潘焱（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写道，叛乱者"抢劫、破坏、杀人、领导暴乱、打劫商旅、围攻军车、伤害政府工作人

---

① Solinger, 79.

② 周春元、何长凤、张祥光：《贵州近代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③ 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2卷，第550~551页；潘焱：《回顾贵州剿匪斗争》，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1页。

④ 杨勇：《回顾贵州解放》，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4页。

员”。[①]到1950年中期，“土匪”占据了贵州79个县中的31个。根据新政权自己的数字，4万多名政府人员与“群众”被杀，包括了几个新配置的县级领导。[②]征粮队最受打击，甚至是贵州省领导在前往重庆与其上级会面时也不得不防备各种埋伏。[③]在一份秘密报告中，贵州省领导人说明了驻地解放军对局势是如此悲观，以至于一些士兵在6月听到朝鲜战争爆发后十分高兴。部队希望朝鲜战争能让他们找到借口离开贵州。[④]这并不是一个蜜月，而是一场内战。

对中共占领西南地区的抵抗产生了一个由各个组织构成的复杂联合，包括了当地的掌权者，国民党部队，农民，少数民族。许多个人的经历说明，尽管内战仍在继续，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这样的标签并不必然地就是人们思想中最前沿的问题。生存、恐惧和家庭压倒了政治标签与意识形态。

1. 当地掌权者

毫不奇怪，原来的地方官员、地主、秘密会社领导人都害怕革命政权。这些人中许多都在新政府中获得了职位。秘密会社的领导人也鼓励其成员加入由共产党人组织的地方民兵。

四川西部的干部抱怨说民兵“不纯洁”，注意到在一个区大约40%的民兵都是袍哥会成员。[⑤]当外来的军队宣布要对社会最富有的部分征收重税时，各种逃避税收的手段演变成了公开的反抗。在国民党保安队队长杨凤池接到了岑巩县政府的几个职位后，他采取了行动。1950年3月10日，杨离开了县政府所在地，向他的同事们说他准备去农村“劝说匪首投降”。事实却恰恰相反，他劝说了一个自卫队转而反抗新的地方政府。造反者立刻杀死了9个干部，其中包括了区党委书记。杨随后与邻县玉屏和江口的前国民党县官员一起组织了“湘黔边区反共国民救亡军”。在3月末与4月初，杨凤池率领3 000名武装分子两次围攻岑巩县政府，但是未能击败驻守此处的解放军士兵。在这次失败之后，杨和他的追随者仍然在农村地区活动，并继续组织反抗。他的部队夺取了1 000吨粮食，并杀死20多名干部与农民

① 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2卷，第552页。
② 何长风等编：《贵州当代史》，第20页。
③ 《走向大西南》编委会：《走向大西南》，第2页；何长风等编：《贵州当代史》，第20页。
④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召开各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会议的报告》，见《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补编》第1卷，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1954年，第403页。感谢Michael Schoenlas让我使用这一资料。
⑤ 《川西军区关于集训人民自卫武装骨干向西南军区的报告》，见《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补编》第1卷，第546页。

委员会成员。①

在临近的镇远县，匪首魏德茂也在新地方政府中获得了一个职位，但是他仍然继续组织他的武装追随者。在1950年初，魏德茂公开宣布对共产党作战。他宣布向这一地区一支国民党抵抗部队效忠，并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围攻。在6月杀死3名解放军士兵后，他举行了一次宴会来庆祝他的胜利，并发誓“在三个月内将共产党从镇远赶出去”。②

当地的掌权者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而战斗，但是也认识到斗争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对1949年收获粮食的两次征收已经足以令许多农民反对共产党人，但是魏德茂却不得不与关于即将进行减租和土地改革的诱人流言作斗争。一名打击魏德茂匪帮的解放军士兵记述说，土匪尝试自己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纪律运动。③在提出物质好处和强调纪律方面，魏其实是在仿效共产党。他并不是唯一宣称他的方法要好于共产党方法的人。杨勇回忆说，在贵州的各种反抗组织贴出了这样的标语——“抗粮”、“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④邓小平在1950年2月的报告中承认，这些标语再加上一个“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的口号，已经让许多“穷人”加入到抵抗中。⑤地方的掌权者将自己打扮成贵州真正的保护者。

在1949年末之前与贵州国民党政府有各种关系的人，到了1950年变成了反抗共产党统治的典型抵抗者。但几个月前放下武器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如果没有拿起他们的枪的话，1950年初的造反就远没有那么严重。

2. 国民党军队的反抗

胡振明（音译）是美国情报官员在朝鲜发现的一个宝贝——他被至少审讯了4次。⑥胡是一个非常现成的情报来源。他的审讯官满意地称他为“激烈的反共主义者”并且“十分聪明”。胡出生在四川，上过两年小学，并在14岁的时候应征加入国民党的一支青年部队。他在随后的9年中通过努力而不断升迁，并在抗战期间在江西完成了一项中美联合训练课程。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四川并负责管理四川省毗邻贵州和云南的古蔺县地方保安队。当解放军进军整个西南时，他已经准备作战。

① 《岑巩县志》，第884~885页。

② 葛仁经（音译）：《“猫科”就擒记》，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2卷，第631~633页。

③ 王珏：《黎明之初话镇远》，见《镇远文史资料》第四辑，1990年，第5页。

④ 杨勇：《回顾贵州解放》，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5页。

⑤ 《剿匪斗争：西南地区》，第93页。

⑥ 下列数字来自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西南地区许多国民党军队在1949年末全体投降，而其他一些部队则被完全忽略。由田东运（音译）将军率领的一支8 000人的国民党部队毫发无损并退入到川滇黔交界地区。胡振明说，田与台湾的上司保持无线电联系，并在边界地区协助游击队的反抗。胡与田建立了联系并在古蔺地区率领1 500名士兵与共产党作战。胡的部队在1950年末控制了整个地区，只有县政府所在地仍为解放军控制。胡声称他的部队打死打伤解放军2 000人。他的部队的主要活动是骚扰新政府，破坏交通线和仓库，伏击解放军部队，阻止共产党征税。

而征粮问题又一次成为抵抗的原因。胡领导的游击队中的许多人都是前国民党士兵、地方保安队成员或当地掌权者。但是在解放军开始征税后，胡振明说许多“愤怒的农民”加入了。胡告诉审讯官，新政权在古蔺全县征收的地税份额超过以前份额的七倍。在整个西南的国民党部队残余通过集中攻击收税者和仓库而加强了他们与农民的联盟。在1950年4月，一个在贵州与广西之间活动的游击队制服了一支把守新征收上来粮食的约50人共产党部队。主要由国民党部队组成的各种游击队迅速抢夺了大米并立刻分给了当地的农民。[①]

3. 武装的农民

考虑到新政权从农民那里强力征收粮食、而游击队又将粮食还给农民，我们就不会奇怪像李华国这样来自贵州、滔滔不绝、并会拔掉手雷撞针的当地农民所做出的选择。在中国西南地区，农民们加入了由国民党部队领导的反抗组织。在贵州以南的广西省，18岁的李玉（音译）1951年1月之前一直在家种地，之后为了避免被解放军征召而逃入深山。在那里他遇到了一支由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组成的部队。在这支部队的425名武装分子中，李玉估计大约40%是前国民党士兵，剩下的都是平民同情者。[②]李玉的反抗只持续了一个月。1951年3月，他的部队与解放军遭遇，但发现自己人数太少。在战斗中李玉和其他70人被俘，并立刻被补充到这支与他们作战的解放军部队中。

其他的农民组织了小型的地方抵抗组织，与国民党军队没有直接联系。唐翰林（音译）是一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并会制造剃刀，在解放军于1951年抓到他之前

①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 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24, July 31,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②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193, June 30,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5;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NACP.

并没有怎么离开他的居住地。在南朝鲜，他告诉他的美国审讯官，除了去过邻近的几个镇子，1951 年之前他从未离开过他的家乡。审讯官吴（Ng）先生写道，“因此唐缺乏一般知识，看起来是那种乡下佬。他讲一种很特别的口音，既不会写也不会读。”[①]但是唐认为加入一个小的游击队并袭击驻扎在他村子里的解放军是有意义的。他说，在 1949 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都使得当地人改变了看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反抗。[②]李治邦（音译）是一名地方精英并是唐翰林的一个熟人，要求镇民们要为了他们的不满采取行动。对于李来说，进行这一造反行动有其个人原因。他的儿子是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在内战中被打死。[③]李和唐一起策划了一次袭击。在 1950 年 3 月，他们组建了一支 60 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当地解放军整整一天直到增援的解放军赶到。唐声称造反者在撤离前杀死了 10 名解放军军人，但是之后不久李治邦和唐翰林的叔叔就被抓住并被枪毙。

4. 少数民族

当共产党的占领威胁到人们的地位和生存，地方掌权者与贫穷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跨阶级联盟来反对新的政权。一些当地人与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力量结合起来，另一些人组织了自己的武装。1949 年末之后一个类似的动力机制在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群体里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领袖害怕他们的地位受到共产党统治的威胁，鼓励他们部落的人们与国民党游击队进行合作来抵抗共产党的占领。这种联盟恰恰是邓小平希望能够防止的。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长征期间曾经经过贵州和川西的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的传说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那就是刘伯承曾经喝过一碗鸡血（即“血酒”——编者）而与一位彝族首领结成兄弟，这位彝族首领允许红军安全通过。但是长征的红军仍然被少数民族袭击而代价惨重。刘伯承和邓小平知道，与少数民族首领的合作对于顺利接管西南是十分重要的。官方政策要求十分谨慎地对待西南地区的少数民

①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409,December 6,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7;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② Solinger, 85.

③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53, November 13,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6;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族。除了要求在与少数民族武装团体打交道时要有耐心，邓小平痛斥了大汉族主义，并命令干部们只在少数民族自己希望改变时才执行变革。在1950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邓谈到需要避免在少数民族地区鲁莽行动。邓说，“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①]

这种谨慎的方式防止了少数民族爆发大规模的叛乱。但是，这并未全部消除抵抗。杨勇回忆说，贵州的抵抗者“说服了少数民族一些上层人士来反对我们”。[②]胡振明证实了杨勇的话。胡在南朝鲜告诉审讯官，有大约20名彝族首领害怕共产党的干涉，决定与国民党将军田东运合作。每个彝族首领率领数百名战士。彝族首领还向山地边区的抵抗者提供粮食。[③]

在中国西南持续的内战使得少数民族群体、地方掌权者、农民、国民党部队都与人民解放军作对。人民解放军最初的战略是快速军事推进、宽宏大量、大规模征收粮食，但这事实上是引发抵抗的原因。邓小平对此并不满意。他在1950年6月的一个讲话中说，“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④]邓的讲话预见了事实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新政权结束了抵抗。中国在1950年10月介入朝鲜战争将被证明是解决西南战斗的一个十分方便的安全阀门。将国内的抵抗者送往朝鲜来抵抗美国是新政权让其敌对者中立化的一个办法。而在国内对他们采取恐怖措施是另一个办法。

三、镇压西南的反抗

军事力量、放松税收政策与恐怖措施的结合使用，使得共产党新政权于1950、1951年在西南地区取得了优势。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战略将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并将国内敌人与国外威胁融合在一起。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见《邓小平文选，1938 － 1965》，第164页。
② 杨勇：《回顾贵州解放》，见《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5页。
③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④ 邓小平：《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见《邓小平文选，1938 － 1965》，第159页。

1950年初将干部和士兵从贵州大约三十个县撤走，这标志着中共高层认识到共产党的占领力量过于分散。从那些放弃了的贵州各县撤出的解放军士兵被编入从四川和云南派来的支援部队中，并展开了一个在战术上进行“铁壁合围”的战役来打击反抗者。解放军集中兵力，封锁游击地区，然后一股一股地消灭其敌人。[①]根据解放军自己对贵州战斗的统计，到1950年底，在超过四千次的战斗中，有447股、125 515名土匪被消灭。[②]

⊙ 195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在西南剿匪运动中设立的土匪自新登记处

伪装的侦察部队承担了首先进入地区寻找反抗组织的艰巨任务。李书林（音译）是安徽人，在1950年战斗期间先后驻扎在贵州和四川。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效力三年，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李所在的解放军团派出侦察部队、伪装成平民进入反抗游击队活动的区域来搜集情报。侦察人员装作小盐贩或农具小贩，秘密与由共产党掌握的农会领导进行联系，了解当地抵抗组织的情况。李描述了在贵州四川边界地区发生的一次战斗。他所在的解放军团包围了一个地区来打击100名游击人员。反抗者发现自己被逼到一处悬崖而无路可逃。李估计从1950年6月到12月期间，他所在的团以这种方式抓获了大约1 000名反共分子。12月之后，李和他的同志们开往重庆，并登上火车前往汉口。从那里他们坐火车到达河北，又到达辽东，最后进入朝鲜，并在1951年3月到达朝鲜南部。这是西南地区许多解放军士兵与前反抗者前往朝鲜的一条普通路线。很明显，士兵们只被告知他们被转运至河北进入“预备状态”，离“毛泽东所在地很近”。[③]当他们离开西南时，像李书林这样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将很快在外国战斗。在进入朝鲜几个月后，李得了痢疾，在一次战斗后不

① 邓德礼：《建国初期贵州剿匪斗争中的铁壁合围》，载《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第104页。
② 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事，1949 － 195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③ 刘朗（音译）：《流血到天明》，香港：亚洲出版社，第10页。

能跟上他撤退了的部队。他藏在一个村庄里，被南朝鲜部队俘虏。①

有时，在中国西南部进行伪装侦察要比在朝鲜得痢疾还要危险。薛玉超（音译）是一个浙江农民和前国民党士兵，在被解放军俘虏并加入解放军后，他在川黔边区与反共游击队作战。薛所在的团派出了好几支由12个人组成的小分队，伪装成伐木工人或者小贩来搜集反抗者的情报。1950年6月，三支侦察部队的伪装被识破，这些人在对敌人活动地区进行的一次袭击中被当地反共游击队打死。但是薛的团最终消灭了这一地区的抵抗。10个月之后的1950年11月，薛被船只运往汉口，之后乘坐火车向北进发，在1951年3月进入朝鲜。他的美国陆军审讯官写道，“因为不愿意战斗，薛玉超开小差”并被美国部队俘虏。②

在被运往朝鲜之前，解放军士兵最重要的工作仍然是征收西南地区的剩余粮食。但是，新政权对巨大粮食征收份额的强调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迫使该政权在后来采取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措施。史坚雅观察到，到1950年中期，共产党的工作者已经开始在税收问题上妥协，包括地主在内每个人的税率都得到了减少。贫困地区的粮食征收被推后至春季收获之后，人们可以用小麦来代替大米缴税。史坚雅说，这对即将到来的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所进行的宣传工作十分有利。史坚雅在1951年初写到，他注意到“普通农民现在对共产党的感觉要比刚解放时要好得多”。③

暂停过度征税的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如果新政权没有减少它征粮的份额，农民可能将会继续支持反抗力量。国民党官员胡振明（音译）告诉美国审讯官，到1950年中期已经软化了的粮食征收政策已经减弱了他的抵抗努力。胡和他的游击队也需要吃东西。通过延后征粮并向一些地方提供救济粮食，解放军让胡走投无路，不得不从当地农民那里强行征收粮食。对胡抵抗的公众支持已经消退，他的抵抗组织变得更容易被包围。④

灵活的粮食征收政策并不是被统一执行的。在一些情况下，士兵和干部把夺取

---

①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695, September 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②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922, January 5,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2;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③ Skinner, 66, 68.

④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粮食当作一个武器来对付那些抵抗特别激烈的地方。两个1950年在四川服役的解放军士兵提到将反抗游击地区的剩余粮食都征收走了。[1]把反抗者饿出来是包围战略的内在一部分。这一战略让反抗组织失去了持续战斗的希望。

一个士兵朱代全（音译）说，未能交出粮食被作为与土匪勾结的证据。1950年下半年朱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在贵州西北地区从事征收粮食的工作。朱曾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服役，但是1949年末被俘后加入解放军。在贵州，朱作为征粮队一员每天都到各个村庄里去。他所在的征粮队有村庄各个家庭的名册，对富人征收的数量要比穷人多十倍。但是无论贫富，当农民不能或不愿完税时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对待他们。如果一个家庭在武装收税员三四次上门后还交不出任何粮食，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被当作是土匪并被抓捕。朱估计，他在贵州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团抓捕了大约700名未能完税的农民。1951年2月，他被送往朝鲜。他离开了他的队伍并在朝鲜的山里藏了一个月，后来向美国军队投降。[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朱在看到贵州农民一看到他们的征粮队就逃往山里之后的几个月，他自己就逃到了朝鲜的山里。朱代全提到的大规模抓捕，是新政权将抵抗者转变成服从者的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恐怖措施成为西南地区一个致命的有效武器，特别是在中国于1950年10月介入朝鲜战争之后。朱丽娅·斯特劳斯认为这一战略来自于中国领导层的最高层，并说明像彭真这样的中共领导人在1950年末开始、1951年春夏升级的镇反运动中清楚地采取了“震动、恐慌”政策。斯特劳斯注意到，对所谓国内敌人的镇压与中国在朝鲜战争的军事行动十分合拍，并会定期地激发起中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3]处理国内抵抗者与进行朝鲜战争之间的联系在西南地区特别明显。

1950年11月，毛泽东十分热情地支持了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提出的两个提议：首先，将士兵从西南地区送到朝鲜战斗，第二，杀死匪首。毛泽东称赞邓小平关于

---

①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831, November 2,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779-KG 0902, File 461.01, Box 60;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与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067, April 14, 1952;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s, File 950054, Box 333;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Publications (“950000” File) 1947-1962;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319; NACP.

②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572, September 14,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③ Strauss, 83.

⊙ 被解放军剿匪部队缉捕归案的川东匪首黄云卿等

将西南地区六个军送往朝鲜的建议，并将邓小平的报告转给其他大区的领导人。[①] 毛泽东也十分喜欢邓在处理西南地区反抗者问题上的坚定。西南局 11 月 10 日的一份报告批评了对待反革命的宽大处理，并批评没有足够的监狱空间和食物而“要偶尔释放犯人”。邓提出了一个更加强硬的手段：“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他还建议处死“罪大恶极的恶霸”，并处死“一些烟贩和会门头子”。邓甚至提出了特定的数字。他写到在四川西部关押的 4 210 名罪犯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二十人需要被处死”，并命令每个县都提出一个“不超过二十或者三十个”人的名单，在即将到来中的镇反运动中处死。[②]毛泽东认为这一计划“很好”，并将邓的观点广为散发。[③]

各大区领导人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一讯息。在湖南西部，就在与贵州接壤的边界地区（但并不受邓小平的西南局管辖），被处死的人数达到了数千人。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并要求枪毙更多的人。毛泽东在 1951 年 1 月给各大区党领导人的一封电报中写道：“在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第四十七军——引者注）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为了让人明确他的意图，他下令说“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

① 《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61~662 页。

②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情况和今后计划的报告》，见《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补编》第 1 卷，第 377~378 页。

③ 《中央关于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63~664 页。

杀几批。"[1]

接受了政府职务、随后又造反并杀死解放军士兵和干部的贵州反共游击队领导人杨凤池和魏德茂，可能是这种严厉处罚的候选人。土匪首领魏德茂感觉到了1950年末镇远与三穗县被包围起来的压力。他从一个被包围的地区逃跑，但最终于1950年12月在一个封闭的山村被抓获。他进入这个山村是为了问当地人要食物。魏几个月后在三穗县被处死。[2]杨凤池支撑的时间稍长。1951年2月之前杨都成功躲过了追捕者，之后他被追捕到一个洞穴中，被岑巩县民兵放火窒息而死。他的尸体被运往县政府并在当地主桥的亭子里示众三天，"目的是为了平息民愤"。[3]

公开处死和尸体示众在1951年的整个西南到处都是。领导反抗组织的国民党军官们是最有可能被处死的。陈凌云（音译）是一名来自广东的国民党士兵，在贵州作为一个游击战士与解放军作战。1950年12月，解放军在松桃县抓住了陈和他大约300名反抗者。陈在南朝鲜告诉审讯官，他们这群人中的60个国民党军官被处死，大约100名小于14岁的反抗者被释放，而陈和其他人则被送往成都接受政治训练，最终被编入解放军。陈所在部队1951年3月进入朝鲜。5月，在到达前线后几天，陈和两个同伴离开了他的部队并被美军俘虏。[4]

一个曾与四川反抗武装作战的解放军士兵证实说，前国民党军队营级或以上军官在被抓获后都被处死。[5]反抗武装的领导人很清楚这一点，并在被抓捕时想方设法隐瞒这一点。在放宽了的粮食征收政策和军事包围削弱了国民党军官胡振明在川黔边区领导的反抗力量后，他就是这样做的。1951年1月解放军抓获了胡振明。胡在南朝鲜告诉审讯官，他假装是抵抗组织的低级追随者而逃脱了死刑。他的方法奏效了。胡被编入了二野一个非全建制班中，他在解放军短暂服役期间其军衔从未被提升到士兵之上。他在1952年5月离开了他在朝鲜的部队，向美国军队投降。[6]

关于大规模枪毙反抗者的谣言也到处流传。战俘刘泽高（音译）的审讯官注意

---

①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6~37页。

② 《镇远县志》，第579页；葛仁经（音译）：《"猫科"就擒记》，见《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2卷，第631~633页。

③ 《岑巩县志》，第884页。

④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554, n.d.;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480-KG 0640, File 461.01, Box 58;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⑤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831, November 2, 1951;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⑥ 511th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93, September 19, 1952 RG 319; NACP.

到，刘声称大约在1951年7月，他听说有40 600名前国民党人在贵阳被处死。还有某人告诉刘，在重庆和成都有大约40万人被处死。刘的审讯官也许错译或者夸大了刘的陈述，但刘的数字与剿匪和镇反运动中的死亡数字相当一致。西方学者根据中国领导人的声明或是中国媒体关于公开处决的报道，估计全国死亡数字在70万到1 400万之间。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大约有200~300万人死亡。①

比听说的大规模处决更令人震惊的是亲眼看到家庭成员被逮捕并处死。在1948年被解放军俘虏后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士兵沈建勋（音译），回忆了解放军如何让镇压反抗变成了一个家庭事件。沈所在部队在1950年末与贵州的造反者作战。解放军士兵搜查了怀疑是反共游击分子的家庭，并对其亲戚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反抗者未能在十天之内投降，一名家庭成员将会被扣押、审讯并接受政治教育。如果这一方式在十天后还未能生效，那么这个亲属将被关押并作为反抗者对待。沈告诉美国陆军的审讯官，对家庭成员的威胁甚至比军事包围还要管用。在1951年初，他被从西南地区送往朝鲜，在那里他后来被南朝鲜军队俘虏。②

村民们知道反抗的代价，因为死亡直接威胁到他们。1950年末廖泽远（音译）的父亲、哥哥、祖父和叔父被处死时，廖只有19岁。廖是湖南西部的名门望族，家里有四十英亩土地。他在亲属被处死后逃跑，并承认用假名加入解放军让他获得了逃生的机会。在经过基本训练之后，廖被派往朝鲜，在那里他参与建设了一个飞机场。他的部队随后到前线参加战斗，遭到了对手的激烈炮击。在被包围两日后，廖再也无法忍受。他脱离队伍并向美国一个坦克纵队投降。③在湘西，廖刚刚从一场摧毁了他的家族的内战中躲过死亡。但是在躲避家乡的恐怖时，廖并未躲过恐怖。中国西南地区内战的灾难在朝鲜的恐怖战斗中继续。

---

① 斯特劳斯提到在镇反运动中大约有最少70万或80万人、最高200万人被杀；Strauss, 87. Jurgen Domes认为被杀人数超过300万人，见*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1949-1972*, trans. Rudiger Machetzki (New York: Praeger, 1973), 52. Meisner估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三年有200万人被处死。Maurice Meisner, *Mao's C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72。Richard L. Walker令人吃惊地提出有1 400万人死亡，见*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219.

②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710, October 6,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641-KG 0778, File 461.01, Box 59;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③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0201, August 2,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G 0155-KG 0318, File 461.01, Box 56;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四、内战、朝鲜战争

新政权利用朝鲜战争来稳固其自西南地区的统治。对美国的谩骂将国内反抗者与国际威胁等同起来。在中国西南地区官方发动的后方支持抗美援朝运动中，剿匪与镇反运动是其核心部分。在1950年12月贵阳的一次庆祝省抗美援朝协调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中，市委书记伍嘉谟（伍当时不是市委书记，时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是秦天真——编者）宣布了三个专门任务。①前两个是扩大爱国宣传、鼓励青年参加军事干校，这与全国政策一样。但是第三个任务是组织慰问队向打击当地反抗者的解放军部队表示慰问，这却是只有西南地区才有的。

《新黔日报》一篇评论文章解释了抗美与支援在贵州镇压土匪的解放军部队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省对土匪的胜利与中国的和平事业和反对美国侵略密不可分。剿匪极大加强了我们的内地，拔掉了美国侵略者的爪牙，推翻了万恶的反动政权，扩大和加强了我国力量。因此，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镇压土匪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实际行动。"②通过在语言上将土匪与美国侵略者联系起来，省级官员尝试让贵州的老百姓了解朝鲜战争。就像我们已经从李华国、胡振明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事中看到的那样，国内反抗与朝鲜战争的这一联系不仅仅是纯语言上的。

贵州出版的各种回忆录证明，朝鲜战争使得新政权能够将国内的敌对势力中立化。1951年3月，驻扎在贵州镇远县、与魏德茂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的解放军部队，在一所小学建立了"土匪训练班"。王觉（音译）回忆说，他所在的解放军部队命令周围农村的农民协会将所有参加过大范围反抗活动——包括武力造反、阻碍军车、反对新政府或"在农村胡作非为、压迫普通群众"——的人集合起来。所有的参与者带上自己的食物和物品在两天内到学校报到。③由于公开处决和威胁所产生的影响，308名年纪从17岁到54岁的"土匪"出现在训练班上。在三个星期的政治课程、讨论、批评、唱歌、打篮球之后，这一训练结束。一些参与者返回家里，而25人加入了解放军并前往朝鲜作战，9人被处死。④

一个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湖南西部的山区，那里有1万多名"经过改造和教育

① 《新黔日报》，1950年12月20日，第1版。

② 《新黔日报》，1950年12月20日，第1版。在这一声明发布不久，慰问队就开始慰问解放军镇匪部队，并向他们赠送香烟、丝织旗帜等礼物；《新黔日报》，1950年12月29日，第2版。

③ 王珏：《黎明之初话镇远》，见《镇远文史资料》第四辑，第6页。

④ 王珏：《黎明之初话镇远》，见《镇远文史资料》第四辑，第7~8页。

的土匪”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并到朝鲜作战。[①]这些战士中的一些最后成为美国战俘，但是至少两人作为官方战斗英雄返回中国，其中就包括了麻阳县的陈起要（音译）。似乎是为了避免被征召进国民党的军队，他在1946年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陈在1949年末投降解放军后参加了一个训练班，并在1951年2月进入朝鲜。

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之前，陈在朝鲜犯过几个纪律问题。首先，他与另一支部队的中国士兵斗殴后被关过禁闭。这一冲突的发生是因为陈在午饭时间发现撤退下来的部队吃的是白米饭，而他的部队吃的是高粱和玉米这样的粗粮。当陈指出这一不平等时，一个吃米饭的士兵讥讽陈所在的部队是由“土匪改编过来的杂牌军”，只能吃杂粮。[②]其他士兵将陈的部队看做改造的土匪说明，即使是在朝鲜，土匪的称呼也没有消失。

美国陆军审讯官关于中国战俘的报告也说明，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前反抗者部队仍然未被改编。梁力源（音译）与陈起要一样，是来自湖南西部的前抵抗者，后来成为四十七军的一员。梁曾经参加了袭击解放军的游击队，直到1950年中期他被抓获为止。他告诉他的审讯官，他在朝鲜的连队士气很低，因为大约80%的士兵之前都是反共游击队员。梁说，许多人的家人都在1950年被杀，他们的悲惨境遇在朝鲜仍然继续。梁所在连队11名士兵被空袭或炮火打死，而1951年中期有11人逃跑。梁是这些逃兵中的一个。[③]但陈起要不是逃兵。

在面对吃米饭士兵的讥讽时起而捍卫他的吃杂粮同志的荣誉后，陈起要的问题仍在继续。陈在一次篮球比赛中打了另一名士兵，后来他在玩弄他的枪支时不慎走火而令一位中国士兵严重受伤。但在1951年9月美军发起的一次反攻中，陈在头部被榴弹炮击伤的情况下不停向敌人掷出手雷，帮助部队守住了阵地。至此他所犯过的所有错误都被原谅了。陈的首长要求对他的战绩进行正式承认。[④]1953年陈返回中国，并在回家前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元帅的接见。当贺龙注意到陈发抖的左手使得他进食困难后，他送给陈一副银筷子。但是这位受伤的老兵在返回湖

① 田兴华：《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纪实》，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② 田兴华：《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纪实》，第198页。

③ ATIS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397, September 17, 1951; Interrogation Reports, KT 1377-KT 1750, File 461.01, Box 65;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51; Assistant Chief of Staff, G-2 (Intelligence); RG 554, Entry 17A; NACP.

④ 官方报道声称陈所取得的成绩是：他“抵挡住敌人的三次进攻，扔出了二百零七个手雷，杀死六十七名敌人，杀伤无数”。见田兴华：《走向光明：湘西匪首四十年改造纪实》，第203页。

南后却生活困难。他的妻子在他离开时改嫁，1953年底他被送往长沙的一家精神病院。

中国国内的内战和恐怖，加上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和受伤，这些都令陈难以承受。学者们展示了许多其他朝鲜战争老兵，特别是那些选择返回大陆的前战俘，有着同样的困苦经历。[①]对于那些迅速地经历了内战和国际战争的个人来说，身份的快速转换以及伴随着各种标签的现实威胁实在太过沉重。

五、战争与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

受伤，担心，为生存而战斗，这些都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西南地区的各种人群。在一些情况下，即使是前“土匪”和土匪镇压者发现自己在朝鲜肩并肩作战，斗争仍在继续。许多分析性框架与描述未能公平对待这些人的故事：善谈的贵州农民李华国，受伤的英雄陈起要，或者是其他在战争中被俘虏的、被从中国西南送往朝鲜的无足轻重的人。聚焦贵州，意味着我们不能将中国20世纪50年初这一时期简化成为政权的顺利交接时期或蜜月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出现的内战和朝鲜战争意味着不可能出现田园诗式的蜜月。

对于我们理解贵州所发生的事情来说，极权主义概念、未预料到的后果和比较革命研究这些研究思路都是有用的，但是却不能解释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极权模式对20世纪50年代初镇压活动的强调，使我们不会忘记国家发动的恐怖所引发的毫无生气的反弹。[②]但我们知道，共产党对西南的控制在1950年和1951年还远远没有达到极权的程度。共产党的统治是单薄的，并受到威胁，在征粮的例子中很难感受到共产党的统治。在此，尼尔·迪亚芒特（Neil Diamant）提出的受制于其政策未预料后果的“笨拙”共产党政党国家这一概念，看起来要比极权模式要更加适合。[③]

但是，尽管新政权在最初阶段比较笨拙，但是它基本上占领了西南地区并镇压

① 大鹰：《志愿军战俘纪事》，北京：昆仑出版社，1987年；Neil J. Diamant, “Between Martyrdom and Mischie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dicament of CCP War Widows and Veterans, 1949-1966”, in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1), 162-185.

② Walk 的 *China under Communism* 是极权主义研究学派关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研究的一个例子。

③ Neil J. Diamant, *Revolutionizing the Family: Politics, Love, and Diverse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1949-19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1, 47.

了武装反抗。在这样做时，新政权依靠了军队、地方民兵和公安机构。在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将恐怖看作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还注意到国民党人也不反对使用恐怖手段。[①]事实上，在中国西南地区新政权并没有垄断了恐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领导人承诺要从根本上改变既有的地方权力关系，贵州的精英们，特别是那些卷入秘密会社和鸦片贸易的人，十分激烈地依靠恐怖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刺杀共产党干部和征粮队，是地方掌权者转变成造反领导者的具体手段。西南地区的武装反抗组织行动的原则与邓小平一样，邓要求"坚决"处死敌人，不要有"姑息犹豫"。一支在黔桂边区活动的反抗组织的一个通信人回忆说，1950年6月发生了一次战斗，他所在的1 000人部队包围了150名被隔离了的解放军战士。反抗游击队俘虏了70名解放军，在三天之后将他们全部杀死。[②]

如果不能严厉摧毁在1950年初控制了贵州一部分地区的反抗者，政党国家就不能统治这个省，也不能推进它重新分配的计划。反抗组织虽然依靠的是恐惧和对生存的担心，但是他们并不能提供其他内在一致的替代前景。但是新政权通过威胁家属、尸体示众、将人们运往朝鲜的方法来回击反叛者时，它只是在西南地区获得了一个内容空泛的胜利。根据在西南所发生的事件来判断，恐惧的确是"内在于革命政权根基之中"，就像朱丽娅·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③]当中国西南地区最后一名反抗战士投降或者朝鲜的战斗停止之后，恐惧不会就这么简单地消失。恐怖和战争在西南地区留下的遗产将会在未来几年产生回响。

姚昱　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Meisner, 72-73.

② 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 Group/Far East, Interrogation Report No. KG 1224, July 31, 1951; RG 319; NACP.

③ Strauss, 99.

征粮、民变与“匪乱”

——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贵州为中心

王海光①

摘要： 中共接收西南后，为解决自身财政问题和配合中央统一全国财经的工作，新政权一成立即在当地开征高额粮税。新政权的重税政策、货币政策和禁烟等项政策，齐头并进，且急且激，做法简单粗糙，使之与当地民众和地方传统政治势力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各地相继发生以“反征粮、反禁银”为中心口号的武装暴动，以致形成大面积的“匪乱”。贵州是西南“匪乱”最严重的省份，比较全面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过程。新政权“剿”、“抚”并举，平定“匪乱”；调整政策，缓和矛盾；分化敌人，争取群众。通过军事剿匪和削减粮税任务，不仅使1950年粮税征收得以顺利完成，而且沉重打击了西南地方传统政治势力的反抗，组织起了民众，使中共新政权在西南土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基。

关键词： 新区建政　财政　征粮　匪乱　剿匪

1950年初，中共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和反抗新政权的情况。当时舆论统称之为“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之为“剿匪”。在“匪乱”严重的地区，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对新政权威胁极大。西南地区因其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曾经是全国“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贵州省又是西南“匪乱”最为严重的省份。

---

① 作者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在大陆有关中共新接管地区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区农村"匪乱"突发的原因，多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反对共产革命的阶级对抗，却多少忽略了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乱普遍发生的时间，是在1950年初。这时，国民党的正规军团在大陆范围内，除沿海岛屿和极少数偏远地区外，都已被消灭殆尽。各地政权易手过程一般都比较平稳，新政权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际上，中苏两国刚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华政策尚在摇摆之中，刚逃到台湾岛上去的国民党政权还惊魂未定，朝鲜战争也还未爆发。尤其是，考虑到自己在新占领区的民众基础严重不足，中共这时明确反对马上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特别是像西南农村这样民情复杂的地区，中共西南局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连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反霸"口号也主张暂时不提。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笼统地用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地主封建势力的阶级反抗来解释当时各地"匪乱"发生的原因，显然有些简单化了。要了解当时各地新区"匪乱"，特别是西南地区"匪乱"何以会一哄而起，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具体考察当时究竟有哪些情况刺激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拟以贵州及西南几省"匪乱"发生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情况略作分析说明。

一、贵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共立即将筹谋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计划付诸实施。11月1日，解放军开始西南战役，首先直插贵州，横断国民党守军西南防线。国民党贵州守军斗志全无。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在贵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势如破竹，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14天就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国民党贵州军政机构和军队退缩到黔西南一带，陷入"战无力、逃无地"的境地。

①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合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重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①]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坏，投向光明，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区，也包括贵州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中共的疑惧。中共西南局这时关于在贵州新区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都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②]也大大地减少了新政权接收贵州的种种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与解放军暗通款曲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新任军长张涛、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等一批驻黔西南的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和平转入解放军之手。一批国民党的专员、县长等旧政权头面人物主动向新政权投诚。虽有少数顽固分子企图拉上地方保安武装准备打游击，但眼看大势已去，也先后都放弃了抵抗的打算。如国民党瓮安县县长，在解放军到达前，曾拖着全县地方武装躲到乡下准备打游击。当得知云南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率部全体倒戈投共的消息后，彻底失望，立刻派人与新政权联系投降事宜。[③]许多边远县份纷纷来省城联系，要求新政权派员去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旧官吏们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权当作一个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客籍政权来看待，许多人加入“解放委员会”，转而帮助解放军办粮办差了。

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组建起来的，随着军事的胜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接管贵州。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也只有7 000多人，[④]因此，接管工作刚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况就突显出来了。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⑤]

①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5页。

② 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33页。

③ 孙汉章：《贵阳地区的解放》，见《回顾贵州解放》（4），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④ 1949年底，贵州干部总数7 303人。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第5卷，第3编第51章。另据徐运北回忆：接管贵州的干部共计8 000多人，其中冀鲁豫南下干部3 000多人，二野五兵团（冀鲁豫子弟兵团）先后转到地方的2 400多人，其余为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见徐运北：《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见《回顾贵州解放》（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

⑤ 秦天真：《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纪事》，见《回顾贵州解放》（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个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则10多人，多则亦不过50多人。①县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区一级。在一时顾及不上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在贵州省的接管步骤上，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全面接管地区、相机接管地区、暂不接管地区。全面接管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周围的县份。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县份和偏僻山区，暂不接管，责令当地旧政权人物临时维持。其他为相机接管地区。中共贵州省委决定首批接管的县是56个。但在解放军声威震慑下，包括那些暂不接管的偏远县份，也相继主动归降了新政权。1949年12月底，贵州全省79个县（市）全部宣告易帜，其中16个县是和平易帜的。②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报告中称：各地先后向新政权投诚起义的，有47名县长，5万名地方保安武装。③

中共接管贵州的工作步骤，先集中力量于城市，再向农村逐步铺开，进展相当顺利。在接收过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统接收，暂时维持现状（政权与武装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稳重方针；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做法，从而缩短了新旧政权交替时的政治“真空”过程，“避免了破坏和紊乱，保证了接管的比较完整和顺利”。据当时统计，贵州省、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 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 520人，占原有人数67%。逃散的人员只有33%。④

贵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个缩影。整个西南战役，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政权接管工作也非常顺利。此可见证于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明确讲：“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

① 如接管锦屏县的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讯员、炊事员在内，共51人；接管沿河县的新老干部连同勤杂人员，还不到50人。接管赤水县的干部只有24人。参见《回顾贵州解放》（4），第328、314页；《回顾贵州解放》（1），第193页。

②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第405页。其中一些县份先是名义上归顺中共，然后新政权才正式派员接管的。

③ 1950年2月6日，苏振华在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内部资料），黔新出（2000）内资准字第166号，第282页。

④ 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

害”。[①]在解放者眼里，西南民众已然承认了新政权为国家正朔的合法地位。可以看出，外来的解放者与当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南“匪乱”却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积地爆发起来了。大批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对新政权，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又复叛为匪，表现也转为顽强。这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二、粮食问题

1950年初，中共新政权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货币发行过猛，财政赤字严重，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投机资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势必加剧对农村粮食的需求与征发。[②]因为当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征收的公粮（农业税），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彻底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是，老区农村粮食征收任务已经过重，华北老区因灾情缺粮；一些沿江沿海地区又受灾减产，粮食调运不出来。由于粮食求过于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粮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了23%，存粮只有8 000万～9 000万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③]中央政府因此估计春节前后更会有一次大的涨价风。为打击投机资本、抑制涨价危机和应付粮荒，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济沪。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此时压力极大，曾发下狠话：“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④]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刚刚占领的产粮较多的四川等省区上。西南战事硝烟未散，中财委就已要求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⑤]

在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邓小平当时对困难的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军

① 邓小平：《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1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9页。

② 1949年12月12日，陈云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称：“明年民粮供应是大困难。”12月26日，陈云再次报告，明年“市场粮价突出是必然的”。见《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卷，第45、4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0、67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第670、671页。

⑤ 《陈云传》，第670页，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1950年1月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①]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指接收下来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相当于供养120万军队（供养1个旧政府人员等于供养3个军队人员）。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大大超过了邓小平预先的估计。在西南战役大体结束时，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中说明了刚接收下来的摊子之庞大：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人。另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这都是按政策必须“包下来”的。再加上解放军70万，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②]这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将近一倍。

中共此时已取得全国政权，不能再采取遣散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旧办法了。中共西南局据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③]的政策。邓小平说：“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④]

但是，西南各省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库存粮食却微乎其微。当时，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仓库粮食2.243亿斤。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3天需用。四川全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3.5亿斤，尚不足四川半个月的消费。云南接管时，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⑤]

鉴于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缓，邓小平督令各地党委及各所属部队，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迅速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

① 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1949年9月20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5页。

② 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78页。另一说：中共部队60万。邓小平在以后的讲话中，一般采用供养200万人的说法。另外。国民党军队虚数很大，实际数目较此要低许多。

③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90页。

④ 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78页。

⑤ 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见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3、186页。

食”。[①]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担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各地新政权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马到农村征收公粮。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粮食就是此时中共西南新政权得以立足的关键所在了。

三、征粮任务

1949年，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西南各省区的农业收成均不如过去年份。四川号称是盛产粮食的“天府之国”，1949年全省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民国时期最高年的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水稻为360斤，小麦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农民生产的1 494.5万吨粮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粮税和留种后，农民的口粮仅有500多万吨混合粮，平均每人200斤。[②]另有研究者的估计更少于上述数量，认为四川1949年度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211斤。[③]贵州田少山多，粮食生产水平甚低，属于缺粮省份。1949年贵州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17斤。[④]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转种了更有利可图的鸦片，粮田数量锐减，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过去又有降低。贵州农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许多地方的一般农户连米都吃不上。

对于西南各省产粮的多少以及民间实际贮存粮食的情况，中共西南局开始也是心中无数的，征收公粮的政策和办法一时难以确定。在开始征粮时，各地一般都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征粮册籍下达的征粮任务，征粮办法是征借结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西南的粮食税为20亿斤，连同其他各项税收合计折粮为32亿斤。[⑤]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邓小平在1950年1月2日复电中央报告中说：“1949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②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四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1、254页。

③ 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见《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86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贵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59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1952（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他所担心的问题只是征粮干部少，“主观能力太弱”，但表示“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①

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西南接收的摊子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很清楚，所以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 1950 年 2 月，邓小平已全然了解财政形势的严峻性了。

1950 年 2 月 6 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人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他承认这个征粮“数目极大”，但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②

西南不仅征粮负担是相当重的，而且征粮方法也问题多多。首先是许多地区 1949 年国民党已经征过粮，重复征收对农户的生活势将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征粮的季节已过，许多农户即使有存粮也已经卖了，现在又需再去买粮交公粮，贱卖贵买，农户更难承担。再次是西南各地征粮这时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政府的“赋元”办法，③虽简单易行，但田主交公粮，佃户不交，纳粮的负担面过小，征粮的 70% 左右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粮工作对地主的真实困难又不予考虑和照顾，自然更易造成过分挤压地主的局面。

1950 年 1 月中旬，中共西南各省区相继颁布了《1949 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1949 年农业负担改征公粮，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严禁乡镇保甲擅自附加或摊派，在田粮制度未彻底整理前，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④中共贵州省政府于 1950 年 1 月 10 日正式向各地县下达了征收任务，要求完全控制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必须在春节前完成，其他地区在 3 月底前完成。⑤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新区，这个征粮任务的难度很大。

中共新政权刚建立，就立刻开征比过去旧政权时期沉重得多的赋税，对此，新区大多数民众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解放”意味着更自由的生存环境。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征粮数目一下子压下去，不仅地主要叫喊交纳不起，一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 年 1 月 2 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 45 页。

②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 年 2 月 6 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 91 页。

③ “赋元”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每元约合粮谷 1 000 斤。

④ 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川新出内（2001）字第 34 号，第 18 页。

⑤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2 页。

般农户也是叫苦不迭的。

贵州省修文县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来得及征收1949年田赋的县份，应该是较易完成公粮任务。中共修文县委于1950年1月17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想要说服与会的农民、工人等基本群众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但是，代表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征粮任务重，群众负担不起，请求省政府减轻。"①

修文县代表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农民相当普遍的愿望。在四川、云南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都有同样的呼声。包括一些征粮干部，对完成征粮任务也多有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据当时的报告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用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②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③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经注意到各地征粮中的上述问题，发出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征粮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未曾发动群众，主观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注意掌握两条原则。即：(一)负担面力求扩大到70～80%。(二)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百分之10～15%，贫农不超过5%。《指示》强调指出："凡是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适当的但是坚决

① 《中共贵阳地委关于修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0年3月8日。

② 《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1950年5月。

③ 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01页。

的调整，切不可一错再错，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不但会失去同情，脱离群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指示》还提出，对地主的负担也要入情入理，要修正国民党征粮的赋元办法。认为该方法虽然简单，但“负担面极窄，且极不合理，一般佃富农及佃中农都没有负担，应予调整。将地主及有地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乃至佃贫农身上。”①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诺的任务，又要保证西南的财政正常运转，邓小平不遗余力地在党内外做解释说服工作。2 月 27 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一面坦率地承认征粮过重“是事实”，一面解释为什么要征这么多粮。强调说不征这样多不行，会天下大乱。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②

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议上严厉批驳“合理负担”的观点，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③

3 月 6 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申明：对西南来讲，征收 82 亿斤大米的任务（农村收 40 亿斤米，城市收 25 亿斤米，盐税和其他税 17 亿斤米）一定要完成，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④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关政策要求，各省区相继召开会议，对各地的征粮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 40 多亿斤。在 1950 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公粮占 53%，4.35 亿斤米；税收占 24%，2 亿斤米。这只能养 10 万人到 15 万人。但当时贵州吃财政饭的有 20 多万人，其中仅需要“养起来”的国民党军人和公教人员就

①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50 年 2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 - 1952（财政卷）》，第 77 页。另据《邓小平与大西南》一书，该指示是 2 月 23 日发。

② 邓小平：《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0 年 2 月 27 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 105、106 页。

③ 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见《邓小平与大西南》，第 155、156 页。

④ 邓小平：《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1950 年 3 月 6 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 111、113 页。

有 11 万多。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经费，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需要人民币 200 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 200 万元）。① 而据贵州省政府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接收的物资，其中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仓库物质，约值人民币 300 余亿元（旧币），折米 480 余万斤。②在 1950 年初贵州省政府的财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标为 6.5 亿多斤米，支出 8.2 亿多斤米，赤字有 1.7 亿多斤米的差额。③

1950 年 2 月 27 日到 3 月 4 日，贵州省召开首届财政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贵州全省的公粮负担是 4.35 亿斤，一般占收获量的 15.2%，加上柴草折米为 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 1 100 万计算，平均每人 43 斤。④按一般收获量算，这比四川轻，较中原 18% 的负担要轻。即使有些畸轻畸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在完成任务中酌量解决，力争合理。会议要求干部掌握的征粮方针是：粮户的负担量不超过收获量的 50%，负担面要达到 70%~80%。并鼓励干部要坚定完成征粮任务的信心，不能听信盲目喊重的声音。并可以通过“挤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农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⑤

1950 年 3 月 20 日，中共西南财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完成 1949 年公粮任务的决定。全区 1949 年度的公粮任务总数为 40.56 亿斤。分配给各省区数目为：四川 30 余亿斤（包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市），云南 6 亿斤、贵州 4.35 亿斤。此外，各省区还可征收不超过正税 15% 的地方公粮。⑥

在 1950 年 2 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

① 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 1950 年难关》，1950 年 2 月 27 日，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 295 页。

② 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 年 9 月 15 日。

③ 边裕昆、张萍、王平：《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见《回顾贵州解放》（2），第 94 页。

④ 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 1950 年难关》，1950 年 2 月 27 日，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 296 页。按照 1 100 万人口和 4.35 亿斤公粮计算，应为人均 39.55 斤；如果加上 16.2% 的柴草，应为人均 42.15 斤。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贵州 1949 年底的总人口实际为 1 416.2 万，按照这个数据，人均负担则会更少些。另据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 年 9 月 15 日，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量约为 47.8 亿斤，征收布置稻谷 7.2643 亿斤，约占总产量 15.2%（还不包括柴草折米在内）。

⑤ 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 1950 年难关》，1950 年 2 月 27 日。

⑥ 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 年 3 月 20 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 – 1952（财政卷）》，第 79 页。

四、“三股水一起流”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①]实际上省委当时又何尝有先见之明。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上，省委也检讨说：在接管初期对贵州封建敌人估计不足，对形势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组织力量缺乏重点，军事斗争开始时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处暴动。党内思想一度混乱，自己处于被动。[②]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③]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④]

邓小平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② 《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报告》，1950年9月20日。
③ 周士第：《关于西南区军事工作的报告》，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④ 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0、101页。

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小平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1]

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对贵州1950~1951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战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2]他们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

① 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1页。

② 转引自杰瑞米·布朗：《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年》，姚昱译，见本书第177页。

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①]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②]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③]

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银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米。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 200斤米。[④]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民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⑤]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21日，贵阳市政府召开拒用银元动员大会。25日、27日和3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 849枚。[⑥]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跟进，实行禁银。但是，贵州民众使用银元的历史很长，少数民族历来有用银的传统，要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银元驱逐出市场，各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且不说民众的用币习惯和心理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适过来，也不说刚刚建立的国营商业是否有相应的物资准备，就是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工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

① 何仁仲、史铭林、张开生：《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经济工作》，见《回顾贵州解放》（2），第113页。
② 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见《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0页。
③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
④ 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
⑤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19页。
⑥ 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历史大事记，1934－200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55页。

(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①]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

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省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据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②] 1950年西南全区新收鸦片可达5 000万两。其中，贵州的存量3 000余万两，云南1 000余万两，其他各区合计1 000余万两。[③]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铲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④]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也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 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⑤]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值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

贵州的禁烟禁毒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西南少数民族

①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② 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月30日，载《西南政报》第1期，1950年9月。

③ 《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3日。

④ 《贵州省人民政府为禁绝鸦片告全省民众书》，1950年1月30日，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68页。

⑤ 《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3日。

地区是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贵州的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①]国民党前政权时期，就曾为政府禁烟发生过多次民变，使当时的政府非常头疼。中共在初进贵州时，非常重视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政策相当慎重，并携带大量食盐等物品以笼络他们，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②]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五、匪患与“匪乱”

西南匪患由来已久，贵州历来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区。1950年初新区各地匪乱大起，也以贵州最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贵州省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关。

贵州因地理关系一向较为封闭，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是自成系统的化外之地。一些穷乡僻壤，匪风很盛。农民持锄为农，荷枪为匪，农忙为农，农闲为匪。他们有自己的“自然领袖”，并不把政府放在眼里。这种被称为“匪窝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贵州为多。由于匪患猖獗，民间枪械很多。实际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质的游杂武装，也是亦兵亦匪的队伍。

民国以来，贵州长期由土著军阀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才对贵州实施直接统治。鉴于贵州特殊复杂的地理民情，地方治理不易。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48年对贵州省实行“黔人治黔”的政策，由贵籍人士出任贵州各级官吏。直到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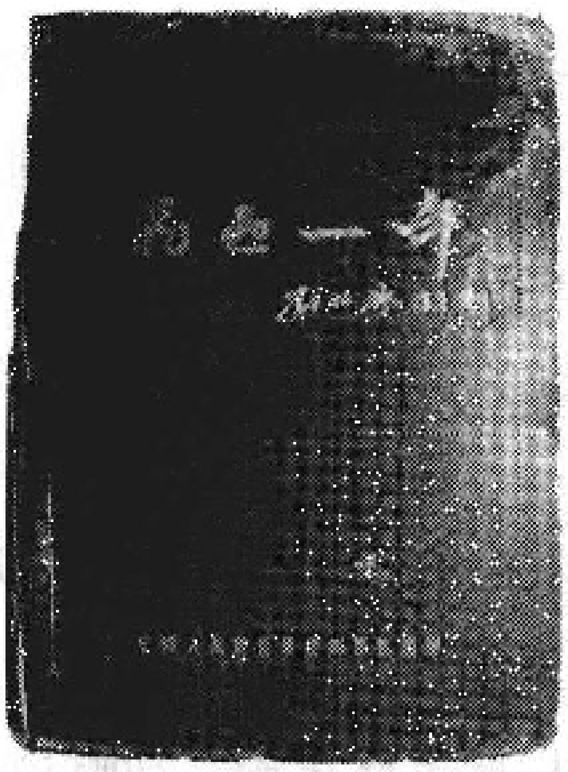
① 陈曾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1950年11月25日，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312页。

② 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页。

仍是比较有限的。[①]

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即使是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武装反抗政府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直接参加暴动的各族民众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九座。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县镇政府官吏。黔东一带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政府抚剿并举，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②]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贵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惯匪。他们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但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吏也照样劫杀。 如国民党独山专区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案即是一例。车祖瑜是一个坚决反共的政客，曾于1949年11月下令将北平来独山的学生58人以“共嫌”罪名在火车站集体枪杀。[③]解放军进军独山时，车祖瑜携家眷及部属数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带，准备打游击。当他们行至克独时，新民乡乡长杨开学觊觎他们的钱财和枪械，勾结惯匪杨仁术等人，设局将车祖瑜等50余人杀害，将钱财物品洗劫一空。[④]


⊙ 贵州军区编印、刘伯承题词的《剿匪一年》书影

中共在贵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办法是凡进据之区，马上收缴民枪，改编旧政权的乡保武装，组织地方自卫队，以结束旧政权的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由于接管初期贵州局势相对平稳，新政权最初的中心任务是筹粮和改造国民党旧部队。[⑤]此时各地虽有少数散匪，扰乱社会，但对新政权构不成威胁。1950年1月中旬全省征粮工作开展之后，开始出现较大股的土匪，但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故许多干部对剿灭当地的土匪抱有轻视态度，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

① 时至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准备进军贵州时，国民党贵州地方当局仍拒绝调外省军队入黔驻防。
② 贵州通史编委会：《民国时期的贵州》，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71、172页。
③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页。
④ 黄长和、吴龙章：《国民党独山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始末》，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6年，期刊登记证051号（内部发行）。
⑤ 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军区：《对起义部队改造工作指示》，1950年1月30日，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70页。

被消灭了，剩下的这点“毛毛匪”算不了什么。①

从邓小平1950年1月8日的指示中，也可以看出最初西南的匪患问题不甚严重。邓小平在给川南党委的这一指示中不无乐观地认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时隔10天，邓小平在1月18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却已经提到西南“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又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说法就全变了，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小平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地讲：当前西南“到处土匪蜂起”。②短短40天的时间里，西南土匪从“不多”，到“开始抬头”，到“普遍发展”，再到“到处土匪蜂起”，可见匪乱蔓延的速度多么惊人。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③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强。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损失就约4个连的兵力。④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2 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

① 贵州省军区政治部编印：《剿匪一年》，1951年，第46页。

②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0、70、92、100页。

③ 1950年1月初，贵州省麻江县叛匪武装攻打了地处偏僻的平畴乡政府、镇远县的叛匪武装攻打了羊场区政府，是公然攻打各级政府的首例。但形成全省叛乱规模，是在春节之后。

④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①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②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因为中共占领贵州之初，策略谨慎，政策宽大，地方政治势力基本上不曾受到伤害，因而对新政权亦表现臣服。大部分旧政府各级军政人员、基层区乡政权和地方保安武装，先后都归顺了新政权。在解放军驻黔部队紧急驰援云南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他们也没有乘机叛乱。但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人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号和组织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这也表明了这场叛乱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当然，从新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无论这一波武装叛乱中农民群众卷入的程度如何，组织策划和参与叛乱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分子，毕竟多为国民党时代基层政权的政治精英、传统社会的自然领袖和地方豪强势力。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政府的旧官吏、国民党地方党团骨干、“国大代表”、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少数民族头领、保甲长、地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他们原本就是旧时代贵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面。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

① 参见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见《回顾贵州解放》（1）。

② 汪乃贵：《剿灭土匪，肃清特务，保卫人民政权》，见《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156页。

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暴乱。①铲除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及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共产革命“消灭封建势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六、剿匪与抚民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这些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十分猖獗”，同时也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指示》向各地党委提出了剿抚并用的平乱要求：一方面，“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②

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逐渐对各地抢粮暴动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即：很多情况是自己干部执行政策不当而激起的。4月27日，中央公安部发出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指示说：近月来“由于少数干部思想麻痹，产生某些违犯政策的恶劣作风。加以某些地区灾情严重，则被逼死人，使得敌人钻了空子。各地都有发生煽动抢粮暴动事件，使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指示更加强调了平叛必先“抚民”要求，指出：根据各地经验，首先必须堵塞漏洞，事先防止问题的发生，即应深入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只有把主观上的漏洞堵塞，方能巩固阵地和敌人斗争。一旦问题发生，必须详细分析事件性质，如系反革命暴动捣乱，对策动分子予以镇压，但严禁乱打、乱杀的偏向，对胁从的群众不得无故伤害。③

西南叛乱量大面宽，参加叛乱者成分复杂，卷入的民众甚多，民、匪的界线非常模糊，剿匪行动与对付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强。为此，中共西南局明确提出了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要求在各军区、军分区至地、县、区、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把军事剿匪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新政权的群

① 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月30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1、142页。

③ 《中央公安部关于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众基础。同时并重申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批评了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上过分宽容而自行乱杀的现象”，强调在剿匪中“不可不杀更不可多杀”。[①]

要达成剿匪目的，分化敌对势力，特别是把不满的民众争取过来，就必须要纠正此前的各种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如3月23日，西南财委即就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请示说：西南收存的烟土量极大，采取严禁政策，因我工作未深入，使我脱离了群众，甚至引起了暴动。鉴于这种情况，西南当局决定改变策略，要求中央批准在西南地区暂不禁种，目前只着重于宣传禁烟，查禁烟土买卖，同时不收烟捐，照收公粮，在经济上加以限制，争取到冬天逐步做到禁种（少数民族地区待定）。中财委很快批准了西南的意见。[②]据此，中共贵州省委发布了相应的指示，明确提出：“强迫铲除烟苗则是根本错误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力宣传禁烟。”[③]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決定
統一國家公糧收支保管調度
保障軍需民食，調節市場供求，實現本年財政收支概算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3月24日通过《关于统一国家公粮收支、保管、调度的决定》。图为《人民日报》的报道。

同样，对禁银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进行了修正，即在继续禁止买卖的基础上，规定在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中，予人民币的使用以优惠政策；允许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并予以九八折的优待。[④]贵州方面亦针对当地情况，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并积极发行人民币与食盐下乡。[⑤]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

① 《中共西南局对切实执行中央三月十八日的指示给各省区党委的指示》，1950年3月25日。
② 《中财委对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请示的批复》，1950年3月30日。
③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④ 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见《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1页。
⑤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上有了些许改进和调整。主要有：一是扩大征收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社会动员的力度。二是增加缴纳方式，提高金银抵缴公粮的比例，原来规定可以桐油、棉花、五倍子、盐、糖等实物折收的种类也有所增加。从4月份起，为照顾某些地区纳粮户的困难，黄金每两折粮的比例，由最高不能超过1 200斤，提高到1 500～1 700斤，银元一元折粮15～20斤。在公粮完成70%以后，各省区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①

但仅仅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政策的改进和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七、征粮的僵局

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已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②其中，贵州的情况更为严重。如镇远专区12个县，在三、四月间，就有10个县的仓库被抢劫。③再加上时值春荒，川北、川东等地因去年歉收、兵灾等原因，春荒非常严重。有几个县已经发生颇多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④

一方面农民手中无粮，一方面西南局坚持必须完成征粮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了对地主的惩罚和挤榨。据邓小平5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⑤这比他2月18日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所说的40%～50%的说法高出了许多。实际上，地主的负担往往更重。如四川简阳县的征粮，地主负担有超过90%～200%者。⑥据中共云南省委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⑦不少地主因无力负担，告借无门。各地都有因

① 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80、89页。

② 《中央公安部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③ 《黔东南州志·粮食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④ 《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1950年3月15日。

⑤ 邓小平：《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1页。

⑥ 邓小平：《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1950年6月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4页。

⑦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纳粮不起而自杀者。[①]

不仅如此，因为尚未土改，地亩和土地租赁情况都不很清楚，地主的标准其实也混乱不堪。再加上兵荒马乱之际，许多田主都收不上来租子。所以，新政权在征粮中实现“力求合理”的办法是扩大粮税的负担面。粮户不仅有田主，还有大批转租土地的“二地主”，包括经营土地的佃富农和佃中农。所以，加重地主负担的涉及范围是很大的，甚至中农和贫农的利益都一同受到影响。如川南区反映：“在征粮中，由于成分不纯，不少地方伤害了中贫农的利益，把农民的余粮收集起来，为地主交粮。”[②]而多数地方，征粮干部迫于时间紧、任务重，不熟悉当地情况，又不懂地方语言，无法与农民沟通，为完成任务只是采用激烈手段强制征粮，乱扣乱押，打人骂人，绑人吊人，滥施惩罚。据川西区反映，有几个县扣人很多，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成都亦扣十余人。区党委不得不约束下面干部，要求他们“先理后兵”，在把道理讲清楚的基础上再惩罚个别顽固分子。[③]云南的逼粮情况也十分严重。5 月 8 日，中共云南省委给各地的指示中说：“目前发现各地的强迫命令主义相当严重，而普遍为完成征粮任务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办法，如不经政府随便扣人，甚至有吊打人，更严重的是将不缴粮的中农、地主一律扣起来，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送饭吃，游街罚跪”。[④]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地主举家逃亡。纵使对于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也往往挤不出粮食来。如四川广汉县扣起 20 多户大地主，威逼斗争，结果还是一粒粮食也未搞出来。[⑤]

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的强横做法，使新政权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再度变得非常紧张，一些愤怒的民众加入了抗粮抗税的行列。在这一轮征粮工作的强力推行中，许多地方又相继爆发了抗粮抗税的武装暴动。暴动者抢劫粮食，杀害征粮干部，使西南的匪乱又有蔓延之势。一些经过剿匪平乱，已经安定下来的地区，在强征粮食的刺激下，又再度出现了动乱。4 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暴动。暴动从很快从一个区蔓延到各区。叛乱分子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围攻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害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 130 余人。5 月上半月，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 5 次叛乱，杀害干部 60 余人，并

① 《川西财委关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 年 5 月 7 日。
② 《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顿农村领导成分的指示》，1950 年 8 月 20 日。
③ 《李井泉给刘、贺、邓的综合报告》，1950 年 5 月 23 日。
④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 年 5 月 8 日。
⑤ 《川西财委关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 年 5 月 7 日。

纵火焚烧川北行署大楼。[①]这些暴乱地区，都是征粮工作非常强硬的地区。如射洪县在暴动事件发生前，征粮工作队普遍发生吊打逼粮的事情。[②]由征粮激起的民怨，成为这些地方发生暴乱的导火索。特别是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曾在2月份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是解放军大力镇压过的叛乱地区，并且在平叛后还做了半个月的群众工作，收缴了民枪。此次是该地区第二次发生叛乱。

云南是西南接管较晚的省份，1949年公粮到4月份才开始征收，5月份全省铺开。云南征粮是在区乡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军队官兵、南下干部、西南工作团、地下党和大批当地青年学生组成了5 000人的庞大征粮工作队。为完成征收任务，工作队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有的做法很不近情理。如在征粮中有逼死人的，有卖子纳粮的。征税中，有交易就收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在禁用银元时，以人民币低价强迫兑换，农民痛哭流涕。[③]在征粮征税全面开展后，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抗粮的暴动。到5月底，叛乱者已达10余万人。云南与外省的交通亦被隔绝，征粮干部牺牲1 000余人，公粮损失425万斤。[④]全省粮食主产地之一的玉溪专区，所辖12个县中有9个县相继发生暴乱，参加暴乱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征粮工作难以进行。

川南专署简阳县的暴动事件，给中共西南局以极大震动，使他们看到了征粮工作已导致民众与新政权发生了严重对立。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6月专门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阴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都已经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作为挑拨煽动群众向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但是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觉悟到。"短评提出：要用简阳事件血的教训来教育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群众积极分子，切实纠正"只要任务，不讲政策"的错误，认真做好群众工作。[⑤]

---

① 《西南军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1日。

② 《川北区党委关于纠正征粮偏向问题给遂宁并各地委的指示》，1950年6月。

③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④ 《当代中国的云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84、87页；宁志一等：《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见《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99页。

⑤ 《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1950年6月，载《西南工作》第6期。

还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各地基层干部在执行任务中态度蛮横、命令主义盛行的情况，并据此发出了整党指示，要求各地纠正党员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的作风”。[①]5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西南公粮任务完成差的原因，也明确承认：“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他断言，征粮任务完成不好，这是一个根本原因。[②]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在随后的总结中，也强调了这一说法。总结认为：征粮任务所以不能完成，“除客观上的政治土匪破坏及地主有意逃粮而外，主观上我们的政策水平太低、作风不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总结自责说：“由于我们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不够，经征人员的政策观点模糊，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各地在征粮中都曾发生了过左的关门主义与强迫命令的毛病，以致不少地方对粮户捆绑、吊打、处罚、搜家（如川南发生杀猪抵粮）、封门以及个别的逼死人，不让群众插秧等。而这些个别现象为某些地方特务匪徒利用来大事宣传，甚至组织反动力量来对付我们，使征粮工作陷于孤立。”这些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③]

八、征粮任务的调减

无论西南地区的情况出现了怎样大的动荡，邓小平始终坚持，征粮工作必须百分之百地完成。一方面他确信，即使加上国民党已征部分，40亿斤的征粮数量仍未超过人民粮食总收获量的20%，比之国民党时代各种苛杂的总和，还是要轻得多。[④]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如果新政权大张旗鼓开展的1949年度公粮征收工作，到最后不能如数收齐，则很难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确立威信，以后其他事情将会更难办。[⑤]

然而，到5月上旬，西南全区公粮只征到40%左右，税收只征到11%～12%。邓小平虽要求各级干部采取灵活办法解决问题，但到6月中旬，全西南40亿斤公

①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7页。

② 邓小平：《现阶段西南党的三项任务》，1950年5月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31、135页。

③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1950年7月20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83页。

④ 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载《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⑤ 邓小平：《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8页。

粮任务，只收到十七八亿斤。这比邓小平在5月14日向毛泽东报告的已收40%的数字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①

入春以来，由于“匪乱”和自然灾害，亦由于征粮的负面影响，西南部分地区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和夏荒。先是川东万县地区报告发生严重春荒，继而川北、川南、贵州、云南又相继上报出现了严重夏荒。受灾地区有166个县，受灾人口300万人。②有些地方，老百姓已陷入缺粮绝境，不少人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度日，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灾情发生后，中共西南局紧急指示当地政府，马上调集人粮组织救灾。③7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本着有灾必救的精神，组织赈灾和生产自救，保证不饿死人。④

另一个虽然没有救灾紧急，但也相当重要的情况是，征粮已经对全区其他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西南区为照顾纳粮户缺粮的困难，曾规定各省区在完成公粮70%左右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材等实物。在上级催逼下，下面为完成任务，则大量征收这些杂粮、土产等物抵交公粮，造成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如川南区征起的杂粮两年也吃不完。有的县折合杂粮达40多种，数量占入库粮食的99.3%。有的县征收了许多废旧物资，如旧表、裙子、大皮包、狐皮、铁器等，甚至还有各种咸菜，把粮库变成了杂货摊。有不少地区还征收了大量红糖，处理不出去，堆积在仓库，日久而化成了浆水。而因为收糖顶粮，对四川糖业又有冲击，致生产萎缩。征粮中的滥收，既干扰了其他经济活动，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浪费，更是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另外，公粮保管、运输中的问题也很多，损耗很大。⑤这种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即使在数量上完成了任务，但完成的质量很差，更是得不偿失。

7月，中共西南局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将西南区的征粮目标缩减为30亿斤，较前减少了10亿斤。这相当于调减前的四川全省的征粮任务。西南区的税收任务，中财委也允减原数的30%，即由25亿减至17.5亿。

---

① 邓小平：《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7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8页。

② 西南民政部：《西南区1950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6次行政会议1951年3月3日批准，载《西南政报》1951年第6期。

③ 邓小平：《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1950年7月22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08页。

④ 《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53页。

⑤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1（财政卷）》，第84页。

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西南地区1950年夏收不再另收公粮，所有1949年未缴纳的公粮，准在夏收以后缴纳完毕。[①]西南财委、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据此分别指示各省区：凡已完成原任务70%以上者，欠粮户确为赤贫无法，得斟酌减免；应纳而现在困难者，准秋收补交；应纳而有力量缴纳但采取拖赖态度者，则加紧催征，以期完成30亿斤任务。[②]

另外，鉴于上海等大城市已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物价上涨风已经回落，考虑到西南自身粮食困难和长途运输不便等因素，1950年6月，政务院电令西南停止向中央调运粮食。当年上半年，四川的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共外调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大米7.5万吨。[③]西南向中央调粮的任务停止执行，对减轻西南财政负担也是一个额外的福音。

粮税任务调减后，西南征粮工作进入以清理尾欠和调整负担为中心的后期阶段。

西南征粮任务调减，并大力纠正强迫命令等若干错误，使征粮的政策环境大为改善，征粮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到6月底，西南全区征收公粮已达20.2亿斤，比当月中旬又增加了2亿～3亿斤，达到全区总任务（41亿斤）的49%强。到7月20日止，据全区正式会计报告，公粮入库24.55亿斤，合原定任务的60%；全区税款入库合米5.38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21.5%；盐税收入共合米2.033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35.3%。[④]

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向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认为：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四川各区公粮难关大体已过。按原派任务，川东已达80%以上，川西可达80%，川南已达72%，川北已达60%，大部分县公粮工作可告一段落，转入清理阶段。云南因接管较晚，只征起三分之一。贵州因匪乱猖獗，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只完成四分之一。邓小平说：按减征公粮25%，即减至30亿斤计，只要川东、川西完成80%，川南完成75%，川北、云南完成70%，贵州完成60%（均包括留待秋后补交的尾欠部分，

① 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夏季不另增派公粮的布告》，1950年6月7日，见《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47页。

② 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1（财政卷）》，第8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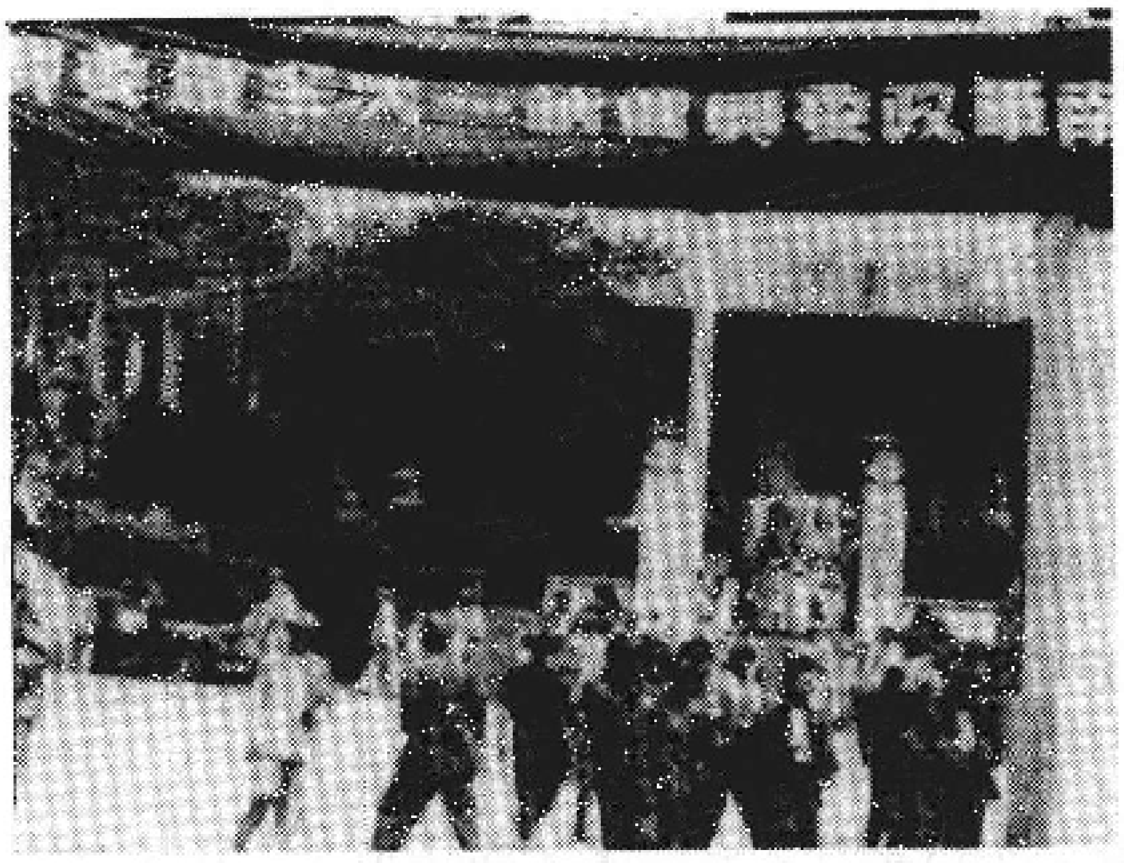
③ 《当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④ 刘岱峰：《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1950年7月31日通过。

俱为数不得过百分之七八），即可全部结束。[①]

九、征粮任务的完成

对于新政权初到西南，不顾利害冲突，一定坚持征收1949年度粮税的问题，邓小平7月31日在新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有过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在征粮中确有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部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伯承）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把它发现出来，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就是因为负担太重，我们听到一些人强调说，地主的负担达百分之百至二百。这些情况是有的，因为开始来的时候，是用的国民党的赋元办法，当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二百多万人要饭吃，明知道办法不好，又不能不用，所以个别地主负担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绝不会是普遍的。"邓小平认为：全西南平均地主占有土地70%左右，地主收入有83.5亿斤米。负担公粮按平均40%计算，地主应拿出30亿斤米；按平均30%计算，也应该拿出25亿斤米。现在西南只收到24亿斤米，实际上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地主隐瞒的黑地是很多的。所以地主负担100%或200%，只是个别的，不可能是普遍的。实际上地主并没有交到40%，甚至还不到30%。他的结论依旧是："这证明地主负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是由此产生的"。[②]



⊙ 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场外景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因剿匪形势已经全面好

① 《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1950年7月22日，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的《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一文。

② 《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载《西南政报》1950年第1期。

转，会议确定了减租反霸为西南区新的斗争任务。会后，“清匪、反霸、减租、征粮、退押”的斗争在各省区相继展开。由于把这几项工作联系在一起，同时鼓励农民查“黑地”，检举有功者可获其追缴数额的一半，让普通农民感受到切身的利益所在，新一轮的征粮工作明显地开始取得了进展。

据贵州省政府9月15日报告说：截至9月5日，贵州全省已征收公粮1.6308亿斤，达到原任务4.375亿斤（原文如此——笔者注）的37.5%，占新核减征最低任务2亿斤的81.4%。在治安较好的县份，如龙里、炉山、开阳、三穗、黄平等县，以县为单位计，均完成原任务70%以上。征粮的负担面，按征收办法以赋元为计算标准，以户为征收对象，赋额在3角5分以下之户免交（每赋额0.0125元，折合稻谷0.5公斤——笔者注），佃农不担负。征收的结果，负担面县单位以人计达60%～70%，因佃农未负担，不能达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负担面之80%～90%。负担比例，从典型调查看，地主负担占其收入的30%～50%，富农20%～30%，中农10%左右，贫农9%以下，一般合乎中央规定精神。同时，报告承认，由于在新区更合理的征收办法难以实施，征粮负担中畸轻畸重的现象难以避免。①

从上述贵州6月底已完粮1.28亿斤，为总任务30%的情况看，贵州这两个月的征粮只多了7.5个百分点。但这已是竭尽全力了。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自征粮以来，至6月间，西南全区共伤亡干部2 581人（川北、西康未统计），计云南200多人，川东760人，川南418人，川西253人，贵州牺牲人数最多，有1 150人。②至9月时，贵州还有21个县在叛乱者控制下。此外，贵州公粮的起征点也是比较高的。如云南的免征点是赋元1元以下，而贵州的免征点是赋元3角5分以下。③这种情况下，征粮要再有更大的进展，也实难办到。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未完成的部分，地主打欠条，农民减免。

同期的四川征粮进展比较顺利，补足了云贵等地的所欠份额。四川规定“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以“合理负担”的口号发动群众，使拖欠地主陷于孤立，不得不按率纳粮。据川东行署财政厅统计，全区征粮任务完成后，人均负担的情况是，贫农15斤，中农45斤，富裕中农92斤，富农223斤，地主780斤。④以四川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计，地富的负担显然是不轻的。由此

① 陈曾固：《贵州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总结》，1950年9月15日。

② 西南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另说，贵州征粮牺牲2 000多人。

③ 1950年10月，贵州省政府颁布的《公粮征收实施细则》，将免征点提高到赋额0.6元。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可见征粮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成效显著。

到9月，西南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按调整以后30亿斤的任务，完成了95%，即28.5亿斤。[①]但实际尾欠的数额还是不小的。如川南区1949年的公粮，到8月底，各地县平均只征到75%。[②]在秋粮征收前，各省区曾下达通令限期清理1949年度公粮尾欠。但直到1950年度的秋粮完成后，1949年度的尾欠大都还没有清完。有的地方，如贵州，1949年度的公粮尾欠一直拖到1951年春，最后还是承认现实，不了了之。

贵州这种拖到底的情况，在新区可能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及早完粮农民心理的不平衡，对政府很有些抱怨。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题目为《新区农业税收中的几个问题》的署名文章说："不少地区的农民，对1949年拖欠不交有意见。他们说，'早交的受苦，迟交的受罪，不交的便罢'，'早交不如迟交，迟交不如不交'。"文章说，必须打破带头缴纳吃亏的顾虑。[③]这也算是1949年度征粮的一个尴尬的结尾吧。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与政策调整，到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正式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④]对于最终能够取得这样一种结果，邓小平认为这是中共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⑤]

在1950年度的公粮征收中，中央根据西南实际，决定只派一次秋征，总任务为26亿斤。这比1949年的40亿斤公粮任务大大减少了。1950年9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以常年产量为计征标准，做好田亩、产量和人口的调查评议，以揭发黑地为重心推动征粮任

① 刘岱峰：《把西南财经工作推进一步》，载《西南政报》1950年第2期。
② 《川南区第一届农税会议汇报》，载《川南行政公报》1950年第16期。
③ 左春台：《新区农业税征收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1951年1月9日。
④ 邓小平：《开国一年在西南》，1950年10月1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4页。
⑤ 邓小平：《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2月25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00页。

务的完成。[①]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有了明确的征粮原则，征粮政策也较为成熟，征粮技术得到了完善；一方面是匪乱已逐渐平息下来，群众已经初步组织起来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得到纠正，政策观念有了提高。由此，西南的征粮进入了一个有序的轨道。1950年秋粮征收的情况非常顺利。这表明，西南民众已经完全接受了新政权的统治，从而为彻底肃清西南匪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过去一年的征粮工作总结说："1949年度公粮，经过半年到八个月的艰苦奋斗，调整减免达四分之一，曾纠正过若干错误和缺点，才宣告完成。但却给1950年度公粮作了非常有益的准备。1950年度公粮大体两个月时间，顺利的超额完成了。这是由于农民有了组织，干部熟悉了情况，正确的执行了中央农业税收政策的结果。"[②]

西南秋粮征收的情况，也是全国新区征粮情况的一个缩影。由于政府方针明确，政策适当，各地干部熟悉了本地情况，动员了群众，查清了过去旧政权一直没能搞清楚的农民隐瞒地亩的问题，所以在1950年秋征粮税比例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全国各新区实际征收的粮税反而比1949年度征收的都多出了许多。新区的征粮工作几经曲折，终于进入正常轨道，取得了粮食征收的主动权。

结 语

中共挟军事胜利在西南建立的新政权，无疑是具有共产革命性质和外来客籍性质双重特征的政权。新政权主体是北方干部，且"量少质弱"，人地两生；而西南地僻民杂，土著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历来难及其里，土客籍之间本来就难免龃龉。这种矛盾又因新政权政策失当、干部行为简单粗暴而加剧。这使得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骤然激化起来。作为这些矛盾激化结果的"匪乱"，也因此呈现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新与旧，共与国，民与匪，贫与富，政府与民众，客籍与土著，现代与传统，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政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都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之中相互交错并激烈地碰撞着。

在1950年的西南历史中，征粮与匪乱无疑是一条历史演进的中轴线。在中共

① 《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73、74页。

② 刘岱峰：《西南区一年来财经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51年的工作任务》，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月29日大会通过。

新政权的各项政策和社会改造中，征粮是贯穿整个工作的中心工作。在“匪乱”发生的民变因素中，征粮又是诸因素中最具社会性的中心因素。中共新政权与西南地方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正是在征粮问题上集中爆发起来了。也是在征粮问题上，民变和“匪乱”在广大新区农村普遍爆发起来，使国共军事战争在社会层面上又延续了两年多时间。从中共由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看，西南及其他新区急如星火的征粮，是以血的代价，支持了中央政府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支持了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

西南新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即以霹雳手段重征1949年度的税粮，固然有其草率鲁莽的一面，成为爆发大面积民变和匪乱的导火索。但是从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的政治社会内容来看，叛乱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集中了旧时代的基层社会政治精英，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国民党降军，也大都是与地方保安武装性质相似的土著军队。这些都属于共产革命必须要消灭的前政权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匪乱的发生使中共把要以政治运动消灭的对象，转移到了剿匪的战场上。通过大规模的剿匪和清匪，旧时代基层政治精英的主要力量基本丧失殆尽。正如邓小平说：“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①因而，剿匪和征粮就有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西南粮食征收任务的完成，绝不仅仅是一个财经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西南当局通过坚持征粮，在西南民众中确立起了自己的政治权威。这也正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要把1949年度公粮进行到底的理由。邓小平是把征粮作为一场与西南地主阶级较量的阶级斗争，配合剿匪行动的开展，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新政权在广大农村的社会基础。随着征粮进入轨道和剿匪军事的进展，1950年秋，中共西南当局又不失时机地在西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西南各省区在迅速完成征粮后，先后在11月份转入了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贯穿于整个运动过程，目的是打垮那些敢于公开抗粮，破坏减租退押的地主当权派恶霸分子。邓小平评论这场运动说：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②这说明，西南的传统地方势力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了，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扫平了道路。

同时，随着征粮政策的调整，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把因“匪乱”而一度缓行的“禁银”、“禁毒”等政策再度推出，更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并

① 邓小平：《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1951年2月20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45页。
② 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8日，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4页。

不再有是否会引发当地民众附匪的顾虑。为配合清匪、反霸，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会门组织。这表明，新政权已有足够的力量，来铲除在西南社会根基深厚的秘密会社了。从而为10月份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准备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自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莫之奈何的西南地方土著政治势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统治下，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历史上长期为祸的西南匪患，已然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中共新政权经过征粮、剿匪的血与火，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在西南社会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基。

史实讨论

当代中国史研究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illegible]

1950年代初关于是否允许农民劳动发财的争论

林蕴晖[1]

摘要： 1950年代初，关于中国农村在实行土地改革以后的发展道路，中共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刘少奇认为不应担忧农村富农经济的发展，那种以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把农民组织起来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则支持党内一种担心农民自发走向资本主义，主张通过互助合作对农民的个体私有制进行削弱、动摇和否定，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场争论的结果，对尔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允许富农经济发展　互助合作　消灭个体私有制　农业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反复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他不只一般地说，这“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2]而且强调：“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3]刘少奇是完全赞同这些看法的。但是，当土改以后农村开始出现贫富差距，以至个别富裕中农发展成富农的情况时，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现实资本主义问题，刘少奇、毛泽东形成了各自的思路。

---

① 作者林蕴晖，解放军国防大学退休教授。

②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年4月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00~101页。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89~190页。

土改后农民要单干发财怎么办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相当一部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抗日民主联军解放的地区，在 1947 年 12 月 ~1948 年 2 月就根据《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动群众开展了平分土地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从 1948 年 11 月 ~1949 年 1 月，东北的新解放区也先后开展土地改革，并于 3 月以前基本结束。少数开始得较迟的地区，在 1949 年春耕前也完成了土地分配。按人口每人分得 3~5 亩土地。

土地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他们起早贪黑，精心耕作，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东北农村的面貌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一般农民的经济生活普遍有所上升，绝大多数（约占农户总数的 70% 左右）开始过上了以往中农的生活，家中有了余粮，“糠菜半年粮”的穷日子变成了“早晨金皇后（玉米疙瘩），中午一六九（白面），晚上玻璃秀（小米稀饭）”的好时光；生产必需的牲畜、大车、衣物、房子也均有增加。一小部分农民，除了添车买马之外，已开始雇用长工，并发生了“单干情绪高，发了财没用处”的苦闷。一部分（约占 20% 左右）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大体属保持原状。另一小部分（不到 10%）或因缺乏劳动力或因疾病灾害，或因缺乏生产资料和马力，或者好吃懒做，经济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出卖土地或出租土地，开始借贷，开始去做雇工了。当然，出卖、出租土地和借贷的农民，并不都是经济下降的，但确有一些是出于经济下降的原因。①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变，农民的思想状况也发生变化。少数上升比较快的要求买马拴车，其中许多人要求“单干”，对单干、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要求他们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侍弄”好地，单干才能发财。因而，认为国家把他们编进互助组，是为了“拉帮”穷人，是因为他们发展太快了要他们“等一等”。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发了财有啥用？”于是，少数人进城吃“坛白肉”要“再来一壶”；有的买了狐皮帽子，不将资金投入扩大生产；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心怀苦闷，不如生产不积蓄，够吃够喝就行了。

① 参见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部编：《东北农村调查汇集（1950 － 1952 年）》（内刊），第 30 页；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江苏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内刊），第 6 页。

那些经济虽然上升，但因车马不够拴一付犁杖的农民，虽然对某些换工插犋违反自愿两利的缺点有意见，但他们仍愿意参加变工，因为不参加变工就种不上地。他们希望通过变工使自己发展起来，将来买马拴车，实行单干。

有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民，则抱有农业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有的欠了别人的粮食，却说我欠了你的粮食，但过不了几年，还不是一同和你进入“共产社会”；看到别人买马，则说将来走入社会主义，你不是一样没有马吗？！

在农村党员及村干部中，不少党员经济发展很快，有些党员开始雇了长工，要求退党；有的党员因马多想雇工扩大经营，但又觉得党员不应剥削人，结果把马分散，参加互助组，说自己好好工作，生产上自己不准备发展了；有的党员到县里受训，听了党员不应剥削别人的党课后，回家准备出卖牲口，解雇长工，感到没有前途；许多党员不了解共产党允许不允许群众雇工，许不许党员雇工。

对农村在发展中提出的这些新问题，领导农村工作的县区干部思想上也不明确。有的问：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什么样？农民应该经过怎样的道路走向富裕？什么叫组织起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于是，农民有了独立生产能力以后，是否允许单干？允不允许富裕中农冒尖，上升为新富农？党提倡组织起来的方向与农民向往单干的现实在农村工作中如何统一？党员成为富农怎么办？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提到了党的面前。对此，在中共领导人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并作出了各自的回答。

1. 张闻天：要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最早看到农村变化并提出明确对策的是时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

1949 年 5 月 17 日、22 日、23 日张闻天分三次致电东北局并毛泽东，报告了他对农村工作的意见。①张闻天认为，东北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多数农民生活有改善；开始出现阶级分化；农业人口向城市工矿转移；土地的所有和使用有趋于更加合理的新调整。“这些趋势是农村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要求向上发展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据此，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发展供销合作与劳动互助，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改善大多数农民的生活，为农村集体化准备有利条件；对农村已出现的阶级分化的情况，既不要粗心大意，熟视无睹，也不要过分夸大阶级分化的危险，表示恐慌，或采取不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以限制；凡有利于土地的合

① 《张闻天选集》第 4 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年，第 83~89 页。

理使用、有利于工矿副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分业发展的租佃关系及土地买卖，不应反对；继续在各方面帮助贫雇农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并保护他们不受新富农的过分剥削。

对于农村的劳动互助，要反对强迫命令与放任自流两种偏向。承认农民自发的插犋换工是组织起来的初级形态，并应帮助没有参加的农民组织起来，但组织形式可以各不相同，不能千篇一律到处生搬硬套。同时应该承认，有足够牛犋与劳动力的农民，有不参加插犋换工而独立耕种的权利；他们土地不够耕种时，可以租入土地或出卖牲口农具。党在农村的工作，不是强迫命令农民组织起来，而是着眼于农业技术上的改良与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以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组织起来。

党在农村中一方面允许少数新富农的产生与某种程度内的发展，同时必须为农村的合作化而奋斗，以争取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因此，应教育农村的共产党员成为合作运动的先锋与骨干，新富农的道路与共产党员是不相容的，农民党员如有向新富农转化的趋势，应事先予以警告，否则可自由退党，或开除其出党。

张闻天的意思很明确，已经出现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对于有利于农村分工分业和生产力发展的土地租佃和买卖关系，不要反对更不要采用行政干预；党应帮助贫苦农民通过劳动互助组织起来，但不应强迫命令，也不要千篇一律地到处搬用，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农业技术的改良和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2. 高岗：把互助合作提高一步。

身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高岗，另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1949年12月上旬，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长和县委书记参加的大型农村工作座谈会，对土改后农村情况的新变化，生产变工互助等问题进行讨论。12月10日，高岗在会上做总结发言。①他说：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使绝大多数的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则需要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为此，他在批评农民中存在的各种各样平均主义思想的同时，着重批评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

① 《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第949~952页。

本主义的路线”；他在承认要允许单干、允许雇工、允许借贷、允许土地买卖的同时，着重强调要在资金贷款、农具和良种供应、劳模评比等方面给变工互助组织以“优先”和“优待”；他在承认现时的变工互助必须是小型的，并且仍以农民个体经济为基础，与苏联的集体农庄不同的同时，又提出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根据当地农业与副业生产的需要，根据当地群众的要求与干部的强弱，依据群众自愿的原则，“逐步提高为联组”。他指出，原则上不允许党员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

无疑，高岗在这里两方面都讲到了，但强调的重点是组织起来；他提出的各种措施，都旨在极力扶持互助合作的发展，遏制农民单干向往富裕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

12 月 31 日，东北局组织部形成了一个主要反映高岗主张的《农村支部工作指示》。

3. 刘少奇：不要限制有三马一犁的富裕农民发展。

1950 年 1 月，东北局将上述精神向中央作了报告。1 月 4 日高岗在东北局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在《东北日报》全文发表。同时对共产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向中央组织部进行请示。

中央组织部根据党当前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根据东北地区土改后农民的具体思想状况，从如何有利于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出发，提出了一个对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的意见。认为，农村党员雇工或不雇工、是否参加变工组织，应该有他自己的自由，党组织不要强制，他们的党籍也不能因为雇工或不参加变工组而加以停止或开除。其理由是，如果在今天就过分强调党员不准剥削别人，以及党员必须参加变工组织，并要求起带头作用，那势必使部分党员对生产消极，这种现象在松江省和黑龙江省的某些地方已经发生。并认为，各地的经验已经证明党员不雇工，群众就不敢雇工，党员对生产消极，群众中的生产热情就绝不可能发动起来。据此，中组部的意见指出，对党员进行教育，当然要指出组织起来的好处，但同时更要明确说明“单干”与“雇工”也是党的政策所允许的。要告诉各级干部：“在今天农村的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地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①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398~399 页。

1月23日，经刘少奇签发，中央组织部将这个意见发给了东北局，希望他们进行讨论。

就在这一天晚上，刘少奇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话，[①]对怎样区分中农与富农，农民能单干是好还是不好，个体农民走向集体化的条件，现阶段对富农经济的政策，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怎样划清中农与富农的界限？刘少奇认为，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现在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现在这种农户在东北大概不会超过10%。其中真正够得上富农的，所占比例必然更少。这种有三马一犁一车的较为富裕的农户，几年之后，可能并应该发展到80%，其中能发展成富农的可能有10%，其余20%的农户是缺少车马的贫农。所以，现在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

如何看待今天农民要求变工互助？刘少奇认为，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他说，据说东北有7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参加变工互助的农户所以会有这么多，主要是因为个体经济的破产，农民不得不变工。将来经济发展了，个体农民都能独立地生产，变工互助势必要缩小。他认为，这是好现象。它表明经济发展了，农民成为中农的更多了，能够单干了，这是应有的现象，70%的农户有了三匹马，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因此，现在既要宣传变工互助的好处，又要允许他单干。他还说，农民发展生产有了三匹马，还是可以变工的。只有这种情况下，他还参加变工，才表明是真正自愿了。

有一种主张，就是通过变工互助以便将来发展成集体农庄。刘少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一个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是巩固不了的。苏联开始集体化也没有机器，但是在国家计划生产之下，各农场已定了货，一二年内机器工具一定会来，因此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住了。没有这种条件，只有马和犁，坚持几年也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意见是，我们现在的变工互助，供销合作社，具有教育农民的集体观念的作用，将来加上机器工具的条件，才能够领导实行集体农庄。

那么，对现实的富农剥削和农村出现两极分化怎么办呢？刘少奇针对当时工人失业，农村经济凋敝的现实，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39~340页。

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里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过去每年有一百多万劳动力到东北去，若富农不剥削便不能生活。所以，现在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去限制。这不是自流。要等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三五年之后，将来再限制，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交公粮等。但现在不要限制，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如果说，这就是放任自流，那么在现时多流出一些富农来也很好。对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马一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对于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党员成为富农后党籍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首先是，凡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而且，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农庄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但是，一般的不会都能这样。他说，即使将来东北有 1 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 100 万党员，这 1 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 1 万人中可能会有 5 000 是愿意留在党内的。现在才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党规党纪上允许党员单干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但能单干与应该单干是两回事，我们并不是鼓励党员去单干。

很明显，刘少奇在这里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严格的区分，把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与党的现行政策作了严格的区分，把政策是否允许与共产党员是否应该又作了区分，特别是把多数农民还不能单干的现实与若干年后才能发展成为富农的可能作了区分，其根本着眼点在于：尽可能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就是党在农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在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的情况下，就担心农民富了怎么办，党员富了怎么办？显然是过早了。即使真的出现了富农党员，也宜于“冷”处理，而不要“热”处理。

毛泽东批评绝对平均主义

早在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过程中，就曾出现过平分城镇工商业等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为此，1948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

种思想”。①

什么叫“农业社会主义”，这对广大中共党员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为使广大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弄清楚这个政治理论问题，当年7月27日，新华社专就这个问题，以通俗易懂的问答形式，发表了题为《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②的长篇文章。

首先，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外延作了界定，指出：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全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

随后，分析了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平均主义思想的两重性。指出：从农民平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这方面来说，有其革命的方面，正确的方面。因为封建的土地财产关系，已经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平分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就使广大农民获得了改善生产条件的基础，使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并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共产党人赞成并帮助农民实行平分地主土地财产的土地革命运动。然而，农民的平均主义，仅仅在平分封建的土地财产上是革命的。如果超出反对封建这个界限，还要平分社会上其他一切阶级、农民一切阶层（例如中农和新式富农）和其他一切人等的土地财产，还要平分工商业，并把这种平分称为“共产”，或称为“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这就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因为，它要求破坏工商业及一部分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土地和财产，这就打击了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向上积极性。这样，就不独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必然要使社会生产力大大下降和后退。这是违反社会历史的发展、违反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使之后退的。

由此进而阐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农村的经济竞争和阶级分化。明确地说明，土地改革只是废除封建阶级的私有财产，并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还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所以，土改以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发展，并使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阶级分化，而绝不能永远保持平均

① 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北平：解放社，1949年，第88~89页。文中“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句，收入1960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时被删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312页。

② 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第138~145页。

的小农经济。肯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这种竞争与新的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是被允许的，而且是不可怕的。强调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允许这种竞争，才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私有经济基础上的竞争，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并尖锐指出，看不见这种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以为可以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中及土地改革后，就能够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与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否认或者反对这种竞争和分化，结果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成为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空想。

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只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得到进一步的解放。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设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生产，首先是工业的大生产来从事建设。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制造大批供给农民使用的农业机器，并由此将农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转变为集体农场经济之后，才有可能。舍此而采取搞绝对平均的冒险办法，“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

这篇在经过毛泽东亲自审改过的批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讲的是何等的好啊！

山西省委的意见

但是，三年前正是人民解放战争处于大决战的阶段，人们的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全力支援前线，争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上面。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这篇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除了对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发生作用以外，就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批评来说，并未在党员和干部思想中留下多少印象。

如前所述，在如何看待农村中农化的发展趋势和已经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怎样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以及现阶段农村互助合作的性质等问题上，党内的认识是不尽一致的。

东北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在 1949 年 12 月 10 日结束，《东北日报》随即把高岗总结发言的精神以《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为题发了社论。东北农村的互助合作工作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倾向。据《东北日报》1950 年 5 月 19 日报道，在辽西、辽东两省新解放区和吉林、松江两省的一些老解放区，有关

部门采取各种方法排斥单干农民。如单干户出门不给开路条，开荒时不准先占场子。松江省有的提出对单干户"三不贷"、"一不卖"，即不给贷款、贷粮、贷农具；供销社不卖给任何东西。有的地方甚至提出，单干户没有公民权，不和他来往，使单干农民"不仅在生产上步步感到困难，而且在人权上受到歧视"。不少地方在组织互助合作中盲目追求数量，要求组织起来的农户越多越好。有的地区采用挑战竞赛的方法；有的连续开会对单干农民进行"说服"，不服不散会。据吉林省检查了解，靠这种强迫方式组织起来的互助组织占总数的70%~80%。有的干部把"提高一步"理解为互助组越大越好。辽西省兴城县一下子就搞了1 125个大型联组。有的地方规定，互助组员要求退组，第一次给予批评，批评后仍要求退，只能"车马留下，净身出组"。

当时，持这种主张的，除东北局的高岗外，还有华北地区的山西省委。

山西省的大部地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根据地。这里的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抵御灾荒，坚持抗战，早就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经历。在山西南部的长治地区，大部分农村组织起来的农户都在50%以上，有的达到70%~80%，个别村子有90%的。①1947年到1948年，相继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生产逐步恢复到抗战以前的水平，农民对组织起来的兴趣逐渐淡漠，以至使原有互助组织处于消沉、涣散、解体状态。中共长治地委和山西省委对此十分重视，1950年分别派出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写出了《老区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基本观点是：为避免农村两极分化，阻止互助组织涣散解体，要加强领导，进一步将农民组织起来。省委认为，调查组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

1951年2月，中共山西省第二次代表会议对农村问题经过讨论认为，老区农村，在继续改良生产技术、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必须稳健、积极地提高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只有如此，才能基本扭转涣散的趋势。"据此决定：在长治地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合作社，采取按土地和劳动两个标准进行分配，征集公积金和积累公共财产。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长治地委随即召集全区互助组代表会议，落实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并将有关规定具体化，主要有：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分配标准，土地分红不得超过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50%，公积金10%，公益金5%，教育基金5%；社内统一计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社员退社，不带公积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土地及

① 吴平汉、宋子勤、孔金良：《长治地委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由来、构想和结果》，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年第2期封一。

其他投资可全部带走。根据会上报名的情况，长治地委批准试办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①

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的意见和做法，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研究了山西的报告，并对比研究了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农业集体化的经验，认为有必要对山西提出的问题作一次实地调查。经华北局领导批准，政策研究室的调查组于3月下旬到达山西平顺县农村。通过对各方面情况的了解，调查组对办社中的若干问题，如：公积金的性质，社员退社应不应该将公积金带走；土地和劳动分红的比例，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办合作社的作用等，提出了不同看法。调查组认为，互助组织仍是私有基础，公积金退社可以带走。山西省委明确表示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指出分歧的实质是："如何对待农村经济发展方向 、如何对待农民私有基础的问题"。省委认为，退社不带走公积金，虽然还不能根本改变农民的私有经济基础，但是对这一基础的一个否定因素，适当地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是可以的。②

4月17日，山西省委正式向华北局写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③报告说：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畜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

接着，报告指出，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不是说目前已发展了多少富农，而是指富农已经是农民自发的一个趋势）。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另一方面的情形是，也有"不少"的互助组织，产生了新的因素。

于是，报告断言：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办法是：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

① 吴平汉 、宋子勤 、孔金良：《长治地委试办初级农业社的由来 、构想和结果》，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年第2期，第2~3页。

② 石英：《回忆两次小白楼会议》，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6年（试刊），第34~35页；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③ 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化编辑室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42~43页。

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

那么，依靠什么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呢？报告提出，最根本的问题有二：一是征集公积金，增强公共积累（按土地应产量征集，为全组成员所有，出组不带）。二是采取按劳动力和土地两个方面进行分配，但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劳动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

报告在阐述公积金出组不带的理由时强调指出：增强公共积累，按成员享用，这一原则在互助组内的实践，虽然没有能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所以公积金应当是出组不带。

最后，报告总结说：总之，我们认为，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的因素，在互助组织逐步地增强，它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

华北局小白楼会议

本来，华北局对于农村工作已有布置。3月17日，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了《华北春耕中应当注意的八件事》，明确指出了：乘春耕开始的时机，抓紧整顿和广泛发展劳动互助的组织；在已有互助基础的地区，则应在农副业结合的基础上，与采用新农具等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相结合，以巩固与扩大互助组，至于在互助组内新出现的积义仓和伙买公共农具等现象，可在农民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较高的地区，适当予以提倡，但还不能普遍号召推广，更不可强迫一般互助组照办。

现在，山西省委不只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写来了正式报告。由于问题涉及党的农村工作方针，华北局主要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认为有必要请示党中央分管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在薄一波等汇报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后，刘少奇明确指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认为，农村两极分化不可怕，农村还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组织贫农向富农斗争，待有了机器再实行集体化。目前应当巩固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

薄一波等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意见，本来就与刘少奇是一致的，现在再得到他的支持，更坚定了说服山西省委的态度。为此，华北局于4月下旬召集华北五省互助合作会议，以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会议在北京交道口菊花胡同华北局招待所的一

栋白色小楼内举行，后来被称为“小白楼会议”。会议由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直接领导，到会的有：山西、河北、内蒙古、绥远、平原五省区代表，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山东分局、北京市委、天津市委的负责干部，政务院农政司负责人及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部分工作人员。山西省委派了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 、兴县地委书记黄志刚 、省农业厅厅长武光汤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绣锦 4 人参加会议。

会上就山西省委提出的意见展开了剧烈的争论。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将华北局负责人传达的刘少奇的讲话精神，以个人意见作了发言。指出，土地改革以后，应当巩固私有基础，现在就开始逐步动摇私有基础是错误的，在没有机械的情况下，不可能实行集体化和合作化。

山西代表作了针锋相对的发言，指出：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正确的，应当防止农村两极分化，克服农民自发势力，积极试办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王谦发言说，在老区提高互助组的问题，实际上是提高农民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带领农民前进的问题。农村中发展生产实际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农民曾经千百次走过而失败了的富农道路，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正确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日益明显，现在的问题是对农民的自发富农路线持何态度的问题，是任其自由发展呢？还是领导组织起来去战胜它呢？他自我回答说，在共产党人来说，领导农民生产不仅是为了发展生产而发展生产，而且在发展生产中还有其远大的政治目的，要在发展生产中团结与改造小生产者，逐步地把农民带向社会主义。

黄志刚的发言，以兴县老区在建国以前办的贾宝直合作社为例，论证了长治地委意见的正确性。

会议讨论了四五天，尽管其他各省代表也不同意山西的意见，但认识并未达到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华北局不得已，只得根据自己的意见作了结论，否定了山西的意见。山西代表宣称，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一个下级组织对上级组织的最后结论，明确表示保留意见，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山西省委态度之坚决。①

为了使会议精神得到贯彻，会后，刘澜涛又对王谦等人说，“刘少奇同志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报告，你们回去告诉省委不要再坚持报告的错误观点了，要读点有关

① 《中国农业合作史料》1986 年（试刊），第 34~35 页。

的书，向华北局表个态，意思是要山西省委为试办初级社作检讨。"[①]

5月4日，华北局对4月17日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正式批复。华北局首先肯定了山西省委抓紧对互助组的领导，注意研究新发生的问题"是对的"。然后严肃指出，省委提出的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批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革命阶段的任务，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只动摇封建私有，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一般的动摇私有财产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目前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的问题。希望山西的同志对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华北局表示同意可试办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全省研究，展览和教育农民之用。同时指出，即便试办，也要出于农民自愿，不能强行试办，更不宜推广。[②]

华北局除将这个批复下达山西省委外，同时上报了党中央。

刘少奇的谆谆告诫

王谦回到太原，向省委汇报了五省会议精神和刘澜涛的指示，山西省委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华北局5月4日的批复，认为不能同意华北局的意见，决定进行申述。《关于互助会议的几个问题》的申述报告由省委书记赖若愚亲自起草，经省委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由省委第二副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部长陶鲁笳呈送华北局。[③]刘澜涛为此专门找陶谈话，陶鲁笳明确表态：山西省委没有错，在这个问题上，省委不能作检查。5月6日，赖若愚和省委第一副书记解学恭以个人名义致电华北局，对华北局的批评进行申述，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明确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之一，我们试办这种初级社，不存在违背《共同纲领》精神的问题。[④]

刘少奇对山西省委这种急于否定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倾向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

---

①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72页。

② 《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42页。

③ 陶鲁笳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华北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

④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72页。

一种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对正在进行的经济恢复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极为不利，必须引起全党注意，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视。因此，从5月7日到7月5日的近两个月时间里，他在多种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阐明，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将来才能搞社会主义；必须先搞工业化，然后才能搞农业集体化的道理。

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对中国农村何时和怎样实行农业集体化问题作了专门阐述。他说：

> 三年准备之后，我们要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经过十年建设，中国的面貌就会改变。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但有浩大的农业，而且有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现在不能提这个问题。有人现在就要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当然，做宣传工作来说，还是要讲的，但作为实践来说，十年之内是讲不到搞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十年之后，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可能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的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些步骤，还要等几年。
>
> 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践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现在提出要在农村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十家、八家、二十家、三十家把土地、牲畜、农具组织起来，大家使用。这种合作社，当然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单用这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是不能使中国的农业走到社会主义去的。毛主席说的，经过合作社的道路，农业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列宁也讲过，经过合作社走上社会主义。但他们讲的不是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现有生产力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想单靠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直接到社会主义去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的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注意纠正。农业的社会化要依靠工业。现在我们讲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心里就不那么痛快，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自己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帮助下，有了国家的工业化，能给农业提供大量的机器，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现在那种农业合作社，个别的可以组织，但要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如果农民自己很热心，搞起来了，也有一些好处，不要去反对。但以为这种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

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到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如果认为这样就叫社会主义，并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①

5月13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向民主人士讲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其中也讲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区别。他说，将来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10%，要发展到40%、50%，哪怕你跑得怎么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现在这10%的工业中，又有两部分，一部分国有，一部分私有。因此，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把工业收起来，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对人民没有利益。在农村里面，我们曾经宣传过劳动致富。什么叫劳动致富？就是劳动发财，农民是喜欢发财的，如果要动摇私有观念，农民就会不放心，生产积极性就不高。所以，现在伤害私人工业家和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会起破坏作用，这是反动的，就是所谓“左”的错误。因为它破坏生产积极性，妨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说过：空想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错误的。我们曾经反对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下过这样一个结论，说它的性质是反动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以现在过早的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是违背进步的。②

7月5日，刘少奇将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讲授题为《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的课程。为使已经出现的急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倾向，引起党内高级干部的注意，从理论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他决定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马列学院的学员，并为此写了批评农业社会主义的著名批语（后来被史家称之为“山西批语”）。③刘少奇指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82~183页。
②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45.8 - 1957.12）》，北京：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印，1967年，第402~403页。
③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27~528页。

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

3日，他在写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说：“五号下午二时，马列学院学生一班来春耦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各中委和中央局。”①

5日下午，一班学员按时来到中南海春耦斋听课。刘少奇开门见山地向大家说，今天我想讲一讲我们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他谦虚地申明：这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见，中央没有讨论，不是定见。并要大家研究补充。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关于通过新民主主义建设，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实行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等严重社会主义步骤所要具备的条件和基本途径等问题。最后，话锋转向了党内的思想倾向。刘少奇首先分析了土改以后农村发展情况，指出农民的自发力量有好处也有害处：一方面它使农业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会使农村重新出现阶级分化，少数人成为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成了贫雇农。他说，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应有这种精神准备。不要因为产生一两家富农就奇怪。一个村有几个大富，雇五六个人，神气十足，钻进政权，变成恶霸，有这个可能，这是小生产者自发力量的必然结果。

随后，他提出问题说，这个自发力量是不是能阻止呢？山西省委想战胜它，阻止它，避免它，这是不可能的。不能阻止，不能避免。是不是可怕呢？山西省委表现出害怕。我认为是不可怕的，怕也没有用。危险吗？头脑清醒就不危险，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的脑袋，有糊涂思想，不想办法。他深表忧虑地指出，党内有人对农民的自发势力表示害怕，企图去阻止，这要走上错误的道路。山西省委的报告就是一个例子。

他又举了河北的例子说，河北省委从远大利益着想来组织合作社，想避免一部分人破产，想消灭富农。现在就有了这样的目的来组织合作社，也是不对的。农民组织互助组的目的是要多打粮食，买便宜东西，我们要从群众直接的切身利益出发，用合作社互助组的显著成绩教育农民，使农民赞成集体经济，从而把农民的当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第527页。

前利益和远大利益结合起来，而不是直接实现党的远大目标。他指出，合作社不能为集体化准备经济条件，经济条件是重工业，拖拉机，没有这个条件，即使思想条件准备好了，大家要求集体化，也是不可能组织好的。

刘少奇说，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逐步走向集体化，就是逐步准备，先东北，后华北，再其他地区，是这样逐步地搞集体化，不是逐步地消灭富农、消灭阶级。农业集体化是个大的运动，不是一个村子先几十户再几十户，而是一片片地搞。

那么，对农民的自发势力是不是就让它自流呢？刘少奇明确回答：不是，而是要加以适当的领导，适当的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贸易政策和税收政策，而不是互助组。因此，在农村中既不是阻止、避免自发趋势，也不是让其自流，而是要加以领导，实行控制，进行教育，使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这就是农村发展的方向以及我们的政策。他谆谆告诫说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政策，适当照顾农民生活，照顾农民要求，教育农民，这就不会破坏工农联盟。到一切条件准备好了，再实行集体化。不谨慎的政策是冒险的政策。想把互助组提高到集体农庄，来战胜自发趋势是危险的。①

对比三年前经毛泽东审阅过的新华社信箱的问答来说，刘少奇在这里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不仅没有超出当年的基调，就用词的尖锐程度来说，大概还有所逊色。

刘少奇在春藕斋向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不久，又对华北局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即第一次小白楼会议）向中央的报告进行了修改，尤其是对不同意见的争论部分。这个报告于 7 月 25 日定稿。

华北局的报告，陈述了 4 月会议及以后的一些情况、争论和解决的问题。在介绍了山西省委的意见之后，报告说："会议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这种意见，认为目前的互助组织是以个体经济（私有的）为基础的，在自愿两利下的集体劳动组织，故不能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直接地发展到集体农场。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便无法改变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而达到农业集体化。将来在这些条件下普遍组织起来的集体农场，对于目前的农业劳动互助组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组织。在集体农场组织之后，目前形式的互助组就没有必要了。因此，山西省委在目前提出在互助组内对私有财产不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 218~222 页。

是巩固，而是逐渐动摇、削弱以至否定，并企图由此走上集体化的方针，是错误的，是根本违反互助组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等价原则的。这就直接破坏了互助组。富农已开始发展，但并不可怕，到将来适当时期可予以限制，如实行农业累进税等；现在即提出限制富农政策来阻止和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不但不可能，而且对发展农业生产是有害的，所以也是不对的。上述错误思想的实质，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①

刘少奇在报告中讲到巩固互助组主要依靠充实生产内容一段，加了这样一句话："在长时期内，在农民中就进行了一种实际上的集体主义教育，是将来组织集体农场必需的思想基础。"②

毛泽东一锤定音

山西省委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并不接受。陶鲁笳回忆说，山西省委此时专门派人驻京，准备检查。但省里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长治地区的干部从心里并不认为搞初级社试点是错误的，也不认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提法。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没办法了，王谦等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时间应该是在刘少奇公开批评山西省委以后。这封信可能还附了 1950 年至 1951 年上半年《中共长治地委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几个报告，以及王谦从华北局五省互助会议回来后写的《关于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问题》，全面介绍了长治地区试办农业初级社的情况。③

毛泽东在得知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不同意见后，即要杨尚昆通知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到他住处谈话。毛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以及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90~191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 191 页 。

③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08 年第 5 期，第 73 页。

和政协《共同纲领》关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①

于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评，从此也不再提及，以至在此后的近三十年中，“农业社会主义”这一词汇，也成了政治上的禁区。

薄一波后来回顾这件事情时说：他（指毛）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样，经少奇同志修改的华北局报告当然也就没有发出了，但原件刊登在华北局内部刊物《建设》上（因事先已排印）。少奇同志还通过范若愚同志向马列学院一班学员收回7月5日下午在春藕斋发给他们的材料。②

当时赖若愚因身体不好，压力也比较大，经中央批准到北京养病，由解学恭代理山西省委书记。在毛泽东表态以后，华北局负责人到北京医院看望赖若愚，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赖若愚随即打电话告诉省委派农工部部长来京，心情很激动地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③

据说，毛这段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形成新生产力的谈话，是他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查了《资本论》后为他提供的。④实践证明，陈伯达在这里为毛出的是一个馊主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手工工场比独立的手工业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手工工场实行了分工或分工的深化，工人反复进行同一操作，动作熟练，从而加速；由于劳动的方法不断得到完善，节约了变换劳动工具和移动工作地点的时间；为适应单一操作，工具不断得到改进，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具的改进、简化和多样化，又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而农业则不同于工业。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同类作物甚至多种作物，在同一时

---

①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合作制》（上），第138页；《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1期，第9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1页。

③ 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第73页。

④ 杜润生回忆说，关于手工业合作社分工问题，1953年他曾与陈伯达有过一次对话。陈伯达提出这是马克思关于所有制作用的理论发展。杜说马克思说的是工业，我们面对的是农业。农业和工业是不同的。工业生产是聚集在一个场地上，同一个空间、同一时间进行操作。农业是在展开的土地上进行，又有客观存在自然气候的制约，既是经济生产，又是自然生产，自然生产带季节性，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进行操作。因此，农业的工作，如耕田、播种、锄草、收割等，每一个农民都得学会，不能一个季节换一批人。在田间作业，很少采取工业流水线的方式。将来的分工是把林业、牧业、水产从家庭副业分解出去，形成产业化，但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分工，不是劳动程序分工。陈伯达当时说：“这是唯生产力论，第二国际的主张。”我就把问题放下，再没有理会。见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187页。

期基本上是处在同一生长阶段上，需要进行同一种操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由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操作，也不可能由一个劳动者不断进行同一种操作。因此，农业劳动者基本上都要完成农业生产全过程的各种主要操作，即从播种、施肥、浇水、锄草到收割。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的这种特点，即便是实行集体劳动，也无法实现类似手工业工场中那样全面的专业分工。农业生产，确有一部分农事活动，靠个人或一家一户的力量难以独立完成，需要进行互助协作。但这只是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个别环节。因此，简单协作并不可能产生新生产力。把马克思工场手工业的原理简单地照搬到农业中来，是不准确也是不科学的。

毛泽东在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后，指派陈伯达去主持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负责为中央起草决议。

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出台

陈伯达奉命来到华北局刘澜涛的办公室，他向华北局的负责同志和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对于《共同纲领》中“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的规定，毛泽东认为，一边保护，一边也可以动摇。现在保护它就是为了逐步动摇它。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不能动摇私有？保护之，就不能动摇之？对于华北局批评山西省委设想通过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办法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质问：为什么不能直接过渡，还要经过什么？以及关于起草一个互助合作决议，准备召开一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意见。陈伯达委托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具体筹备这次会议，会址仍旧在华北局招待所的小白楼。并要求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为他起草决议提供资料和具体意见。①

据当年参与其事的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人员回忆，陈伯达在起草决议期间，在他的宿舍原中央党校（即自得园，今中央党校南院）的“孤岛”上，连续召开了三四次座谈会。参加第一次座谈的有张磐石、李哲人，一直参加到底的有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每次座谈都是午夜十点以后开始，凌晨两三点结束。座谈的方式，是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草拟的一个决议提纲，一面念，一面要大家发表补充意见。他叫这种方式是“挤牛奶”。开始，李哲人提出没有机械化能否实行集体化。陈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例子解释，并且说农业生产合作社相当于工场手工业阶

① 杜润生主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第138、140页。

段。张磐石对此还进一步提出疑问，陈仍然坚持这种解释，说农民合作与资本家雇工虽有不同，但在手工业基础上仍可分工分业集体劳动，发挥协作的优越性。

9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小白楼正式开始，30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和河北省委、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和河南省委、东北局和东北局政策研究室、西北局、华东局和山东分局派来的人。西南局当时正在全面进行土地改革，没有派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开头也有人参加了会议。另外，农民作家赵树理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华北局负责人刘澜涛、全国供销总社负责人程子华也到过会。

会议由陈伯达主持，开得很简单。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后，就讨论他起草的决议。他读一段，让大家讨论一段。开始大家很不习惯这种开法，要求汇报一下各地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和问题。陈伯达坚持他的开法。尽管陈伯达传达了毛的意见，会上讨论仍很热烈，有些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赵树理，总是以他的家乡某哥、某嫂为例，讲农民如何不愿互助劳动和合作经营的情况。陈伯达很不耐烦，总是用他的福建普通话顶赵。赵树理听不太懂他的福建话，常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对决议草案一开头讲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两方面的积极性，有人不同意这种写法，说"决议怎么一开头就写农民有两个积极性呢？"主张先对形势作个分析。有些同志对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提出疑问。在讨论农民究竟哪种积极性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一再强调互助的积极性，赵树理一再以他家乡的实例说明农民最热心的还是单干发家。争论了几个回合，最后，还是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写在了前面。并且说明：农民在土改后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提出不能忽视和粗暴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然后再讲如何逐步发展互助合作。会议每天只开六小时，每天都要写一个几百字的简报，当晚报送毛泽东。讨论结果，一致同意决议草案精神，对陈伯达起草的决议草案作了不多的修改，算是通过了。①

过了两个多月，这个决议草案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又作了一些修改，经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批准，由毛写了"中央批示"，于12月15日下发各中央局和省委，要求把它印发到全国各县委、区委。并强调指出："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②

紧接着土地改革以后（这时全国大陆的土改尚未全部完成），就要"趁热打铁"，

① 《中国农业合作史料》（试刊），1986年，第36~3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78页。

通过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实际上否定了允许私有经济在农村有一个发展的新民主主义政策。

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

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广大农村是小生产的一片汪洋大海，小生产者既想发财又担心破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全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这种思想也不能不反映到长期战斗在农村环境、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共产党内来。为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刘少奇强调，一要认清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有利的，要教育全党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对待雇工剥削；二要懂得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在思想上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农业社会主义的界限。中心是要以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判断是非得失。这就是刘少奇 1950 年 1 月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1951 年的“山西批语”的基本精神。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本思想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私有权，鼓励农民劳动发家，允许富农经济长期存在，通过供销合作等多种合作经济形式，把农民的个体经济同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联系起来，在国家工业化的支援下，再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使中国农村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的这个思路，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的路线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具体化。

遗憾的是，刘少奇的思路在党中央的最高层没有取得共识，甚至错误地被认为是“右倾”；以山西省委为代表的思路在党内占了上风。在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批评说：“必须在农村中提出爱国的口号，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当时以为，通过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这种简单协作就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加上实行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等办法，就能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于是立即把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批判成了不能触及的禁区。这样，中国农村，由合作化运动侵犯中农利益，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刮“共产风”，一直到把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曲折。人们看到的后果，正如当年《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中所说，企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办法搞社会主义，“所得的结果，一定仍然是大家的一场贫困”。

外稿选译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当代中国史研究

花間[illegible][illegible]

资本家选择共产党中国

——1948~1956 年的上海刘氏家族①

高家龙②

(Sherman Cochran)

摘要：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许多与国民党人关系密切的资本家家族之所以决定在 1949 年后留在中国，是因为这些家族都有爱国主义情感。但高家龙在对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家族之一刘鸿生家族进行了详细研究以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挑战。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两方面求索甚急，刘鸿生不得不于 1949 年春逃到香港。但是在 11 月他就返回上海并竭尽全力让他在海外的儿子们返回上海，甚至不惜用欺骗的手段将一个儿子从香港骗回上海。回国的刘鸿生不仅受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接待，而且有着外国买办与官僚资本家经历的刘鸿生还被周恩来称为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得到共产党领袖保证其财产与生活方式后，刘鸿生为新政权努力工作，并在一段时间内因为其技术为共产党政权所急需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是刘氏家族与其他资本家一样在五反运动中遭到打击，并在 1953 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丧失了其全部企业。

关键词：刘鸿生 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 跨国主义

在 1949 年共产党革命胜利的前夕，有条件逃出中国的中国精英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离开。许多人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选择了从海外回来，其中包括了工程

---

① Sherman Cochran, "Capitalists Choosing Communist China: The Liu Family of Shanghai, 1948-56,"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59-386.

② 作者高家龙（Sherman Cochran），康乃尔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师、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甚至许多原国民党政府外交官也返回祖国。为什么这些有条件迁往海外的人选择留在或返回中国？所有面对这一问题而选择移居国外或回国的这些精英，他们的动机都是值得探讨的，因为他们具有成为领袖者的潜力、并很容易获得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本章主要关注这些精英的一个部分——中国的资本家，并特别关注一个领导性家族——上海的刘氏家族。随着革命的来临，作为资本家的他们为何要选择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

已研究过中国资本家为何留在中国这一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资本家这样做的动机或是因为民族主义或者因为跨国主义。那些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各种解释一般都谈到了毛泽东。在中国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的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预言，在他的共产党军队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夺取政权后，“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将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作出贡献。[①]之后不到两年毛泽东宣布革命胜利并建立起一个新政府，随后共产党开始利用毛泽东的术语将资本家划分为两类：被认为是爱国的并鼓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留下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被认为与外国帝国主义和腐朽官僚结盟而不享有公民权利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从那时起，中国的学者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这种区分，并互相争论在现代史的所有时期，中国资本家究竟是被当作民族资产阶级来加以赞扬，还是被当作买办和官僚而进行谴责。[②]

中国以外的学者是从跨国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释 1949 年中国资本家为何决定留在或返回祖国。黄绍伦（Siu-lun Wong）在恰如其名的《移居国外的企业家》一书中，分析了 1949 年共产党革命期间中国实业家被迫放弃了上海棉纺厂而迁往香港的各种动机。他还提到了“比较常见的是，一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因此走上了各自的道路”，一个或几个留在中国，而其他人到了海外。[③]最近柯博文（Parks Coble）采用了黄绍伦的观点，并增加了一些细微的历史差别。在柯博文看来，1949 年中国资本家决定离开或者是留在中国的根本原因，与他们在 1937~1945 年中日战争开始时期进行决策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这正是柯博文一书的主题）。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外语出版社，1969 年，第 167~169 页。

② 相关历史写作和有用的历史编年分析的相关例子，见 Tim Wright, ed., *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ecent Studies* (New York: St. Marin’s, 1992); and Tim Wright, “The Spiritual Herit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Using the Past to Serve the Present* (Armonk, N.Y.: Me. E. Sharper, 1993),pp. 205-238.

③ Siu-lun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 28.

"商人在1949年的反应与1937、1938年的反应一样：分散家族和资源，分散风险"，这意味着在1949年，资本家家族通过在中国国内保留几个成员而将其他成员派到香港、东南亚或者西方国家，从而为每个家族和家族企业形成了一个跨民族网络。①

选择留在中国的资本家是民族主义者抑或是跨国主义者？这两个看似互相对立的假设都经不起实证研究的推敲，充其量这两个假设或是通过回溯来重构中国资本家的民族主义，或是不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只是简单参照这些资本家的跨国家"海外联系"。②本章的目标是，主要以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的档案为基础，对中国资本家留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跨国主义以及其他动机进行考察衡量。③在这一家庭的资料汇集中所有的私人信件、回忆录和其他文件，都是由刘氏家族成员所写，其中包含了重要的线索，揭示了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共产党革命期间他们为什么离开、停留或者返回中国。

一、离开中国

从1948年到1949年，就整个家族是否应当继续生活在中国这一问题，刘氏家族的领袖刘鸿生（1888~1956年）多次改变主意。当时已年届六十的刘鸿生是中国实业家的领袖之一，其投资集中在火柴、毛纺、水泥和煤饼工厂中。④当刘鸿生在是否将家族和大笔资产迁走这一问题上苦思冥想时，当时正在1946~1949年这一中国内战的最后阶段进行殊死搏斗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与毛泽东的共产党部队都向他大力拉拢。直到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年，刘鸿生仍然与蒋介石和国民党保持联盟。

1. 对国民党的幻灭

①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8.

② 关于荣氏与郭氏家族例子的简短介绍，见 Wong, pp. 28-31; and Lynn T. White III, "Leadership in Shanghai, 1955-69," in Robert A. Scalapino, ed., *Elit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p.306.

③ 刘氏家族档案保存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企业史研究中心。在刘鸿生死后两年的1958年，刘鸿生四子刘念智将这些档案作为《刘鸿生文集》的一部分存放在那里。一些刘氏家族的信件已经出版，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当本文注释引用刘氏家族已公开的信件，都来自于《刘鸿生企业史料》，而未公开的信件，来自于《刘鸿生文集》。

④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chapter 7; Coble, pp.182-194.

⊙ 刘鸿生墓地碑文

⊙ 刘鸿生像

1948 年秋，共产党发起了决定性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国南方撤退并随后逃往台湾。即使是在此时，刘鸿生看起来准备继续追随蒋介石。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刘鸿生就把蒋介石当作他的宁波老乡，他自己也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几个职位。1932~1934 年间刘鸿生曾出任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1936~1937 年间又担任国家扶持的垄断企业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总社的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刘鸿生从沿海的上海移居到位于中国西部的蒋介石战时首都重庆，在那里刘鸿生开设了新的工业企业生产毛织品和火柴，并负责主持由财政部领导的政府烟草火柴专卖局。[①]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于 1945 年返回上海，担任了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既然 20 世纪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刘鸿生跟随蒋介石前往重庆、随后又在 40 年代中期返回上海，为什么 1948 年和 1949 年刘鸿生没有继续跟随蒋介石到台湾去？

1948 年刘鸿生采取了看似不可动摇的步骤，确定了他和他的家族要前往台湾的想法。他首先访问了台湾和美国，随后又派他的四子刘念智（抗战时期刘念智是刘鸿生在重庆的左膀右臂）到台湾去打开“一条后路”。在出行前，四子刘念智从父母、弟兄姐妹那里搜集了金银珠宝，通过一艘属于中兴轮船公司的船只将这些值钱的东西运往台湾。一到了台湾，刘念智立刻将家族的财富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并为开设两个新厂——一个是在台北的糖果厂、一个是在高雄的化工厂——作好了准

① 《一九四五年父亲刘鸿生致妻子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刘鸿生致刘吉生函》，见《刘鸿生文集》；Cochran, pp.167-174; Coble, 187-189;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Co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 399.

备。在返回上海之前，他将管理这些资产的责任留给了当时居住在台湾的两个兄弟——受过美国教育的五子刘念孝和受过日本教育的七子刘念忠。①

刚进行了这些在台湾的实质性投资之后，刘鸿生就开始重新考虑是否要迁移到台湾的问题。他在1948年秋国民党货币改革中的经历令他产生了很大的疑虑。为了尝试控制失控了的通货膨胀并提高税收，蒋介石命令他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进行这一改革。从1948年8月19日到10月31日这两个半月中，蒋经国冻结了物价，并号召上海的资本家交出他们的旧货币和金银外汇来换取新的中国货币——金圆券。

在一开始，为了以和缓出售的方式来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曾尝试得到刘鸿生的支持。他邀请刘鸿生到上海中心区南京路的汇中饭店座谈，尊称刘鸿生为“老伯”，劝说他自愿交出金银外汇来帮助恢复经济稳定、并资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在刘鸿生并未服从命令的一两天后，蒋经国采取了一条强硬路线。他声称知道刘鸿生收藏的是什么，并威胁如果刘不在三天之内将他的贵重金属和外汇交给中国银行，他就要用军法来惩罚刘鸿生。同时，蒋经国公开攻击上海的大资本家，他说他们是“叛变商人”。就像他对资本家进行讨伐的第三天所说的，“那些扰乱金融市场的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他与刘鸿生和其他上海资本家进行了会面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当着他的面对他很友好，“但是他们转过身去就敢做任何坏事。”②

蒋经国的威胁让刘鸿生惊恐不已，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开始执行这些威胁之后。在随后几个星期里，几个不合作的资本家被逮捕，每个人的保释金高达30万~100万美金，其中的一个还被判处死刑。根据刘鸿生四子刘念智的描述，刘鸿生由于害怕而用800根金条、几千个银元和230万美元兑换了中国银行的金圆券。但几个星期之后，刘鸿生和上海其他的资本家震惊于金圆券改革的结果——金圆券一钱不值。③

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承认金圆券改革失败，并重新开始了两个半月之前进行的价格管制。蒋经国向上海人民进行了公开道歉，但即使是此时他还不

① 《一九四八年二月九日八子刘念信致父母函》、《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八子刘念信致兄长函》、《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刘念信致长子刘念仁函》，见《刘鸿生文集》，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回忆我的父亲》，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② 本段引自 Lloyd E.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82-183.

③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08~109页。

忘给资本家一记回马枪，他希望人们不要再“允许背叛的商人投机者、官僚政客、恶棍无赖回到上海并控制上海”。[1]

刘鸿生十分不满金圆券改革的失败以及蒋经国对待中国资本家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并非他一人如此。根据易劳逸（Lloyd Eastman）的研究，“从那以后，许多人都对经济恢复放弃了希望；改革的失败说明国民党政府完全没有资源来控制通货膨胀。”[2]刘鸿生也持这种看法，他不再预想他和他的家族成员能在台湾起到何种作用。在一次家族会议上，他严肃地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台湾也不是好地方”。[3]

2. 对共产主义的怀疑

如果不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刘氏家族会留在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吗？当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从东北向南方横扫并进攻上海时，刘鸿生和他的家族开始收到了来自共产党的保证。他们被告知，如果刘氏家族留在上海，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之后将会保障他们的安全并保护他们的工厂。刘氏家族第一次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一次会议上从刘鸿生六子刘公诚那里知道的。

刘公诚坚持所有家族成员都应当留在上海并支持共产主义事业。早在十多年前的1936年，刘公诚就到了毛的延安根据地并成为共产党员，此后秘密作为一名地下党员与国民党作斗争。[4]看起来一开始刘公诚是整个家族中唯一提议家族留在上海等待共产党统治的人。1949年3月，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带来了一位同学，解释说这位同学是共产党员，可以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计划进行权威的讲解。

刘氏家族一开始只知道这个人姓王，但他的真实姓名是戴德。在刘公诚说明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戴德详细地解释了共产党关于“促进生产、实现经济繁荣、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他要求所有刘氏家族成员留在上海，他许诺说人民解放军一旦接管上海，就会确保刘氏家族及其工厂的安全。他随后三次拜访了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要求他与共产党员合作、保护刘氏工厂不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在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之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共产党人不断通过无线电台呼吁刘氏家族留在上海。[5]

除了刘鸿生的六子，刘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对共产党的话持怀疑态度。抗战期间

---

① 引自 Eastman, p.192.

② Eastman，pp.196-197.

③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0~111页。

④ 刘公诚的共产党员身份直到“四人帮”倒台时才公开，见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98页。

⑤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2~113页。

刘鸿生在重庆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见过两次面并谈过话，他对他们的印象很好，认为他们是平易近人和十分自信的领导人，但是他仍然担心共产党及其对资本家的政策。1949年春，在听了六子刘公诚与戴德以有利于共产党统治的方式介绍了情况之后，刘鸿生告诉他的家族说："共产党决不会和我们真正交朋友。"①

3. 飞往香港

1949年春，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的前夕，刘鸿生作出了他的选择。考虑到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革的糟糕后果，他排除了迁往台湾的可能性，同时，尽管有六子的保证，他仍然对将整个家族及其资产都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心怀疑虑。作为第三条选择，他提议将一部分家族和生意迁往香港，让剩下的人和生意留在上海。根据四子刘念智的说法，除了六子以外，所有家族成员都接受了这一决定，他们都接受了父亲最喜爱的一句英语格言："不要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②

当刘鸿生与他的家人讨论谁走谁留时，他们正受到了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严密监视，后者怀疑他们不会离开上海。1949年3月，蒋介石命令上海市政府建立上海防御委员会，刘鸿生被任命为其中一员。根据刘念智的回忆，从那时起刘鸿生就被上海社会局局长陈保泰严密监视。1949年5月，就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的最后几天，刘鸿生每天中的每个小时都会接到陈宝泰的电话。就在1949年5月22日——三天后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刘鸿生被命令与蒋介石一起出席一个在广州举行的紧急会议。在没有得到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刘鸿生被陈保泰和其他三个武装人员胁持带往机场，并将他送到一架进行这次飞行的私人飞机上。根据刘念智的回忆，这一系列事件就像国民党秘密警察进行的"一次绑票"。在被强迫飞离上海并被强制留在广州之后，刘鸿生设法躲过了国民党人逃到了香港。③

考虑到刘鸿生之前已经作好准备到香港旅行，因此看起来他有可能是自愿从上海到广州再到香港，而并不是如他的四子所说是被强迫的。早在刘鸿生所谓被迫从上海飞往广州的前一个月1949年4月，他已经与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 Transportation Company）联系安排了他在两个城市之间的飞行。同时刘鸿生家族以外两个高级生意伙伴——彼此为远方亲戚的程年彭和华尔康——向香港走私外汇、工业制成品和原料，价值总计500万美元。随后在5月初，刘鸿生的这两个堂兄弟自己从上海乘坐一架飞机前往香港。当刘鸿生的章华毛纺织厂工人尝试制止程和华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1页。
②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2~113页。
③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4~115页。

离开上海时，刘鸿生许诺说程和华将不会在香港停留很长时间，因此安抚了人们。但结果是，就在几个星期之后的1949年5月24日，刘鸿生就与他的两个生意伙伴在香港见面了，而程和华再也没有返回过上海。[①]无论刘鸿生是否被蒋介石胁持离开上海，但他自己看起来已经切断了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而且一直没有访问台湾。

4. 各种可能性

1949年5月刘鸿生决定既不前往由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也不留在由共产党统治的上海，这说明了当时刘鸿生可以选择的范围及其境遇是多么的变化无常。正如娜拉·狄龙（Nara Dillon）指出的那样，其他中国资本家也正在或者考虑出逃上海。与其他人相比，无论是待在亚洲还是前往西方，刘鸿生都有更多的金融和文化资源来保证他自己及其家族的未来。在1949年之前，他花了20年的时间让他的孩子们在海外受教育。1929年他将三个儿子送到英格兰，这三个儿子都在30年代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学位。随后在剩下的九个儿子中，除了一个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儿子，其余八个都被他都送往海外接受教育。他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送往英格兰接受教育，并让另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去美国大学受教育，让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去日本大学接受教育。但即使是拥有资金、技术、受过西方和日本教育的子女、其他可移动资产，刘鸿生还是很难决定在1949年到底要何去何从。这一问题并未因为他在5月24日抵达香港而结束，因为他仍在苦苦思考是要留在香港，还是返回中国。

二、返回中国

1949年11月，刘鸿生被家族成员和共产党高层领导说服返回上海。在5月到11月的六个月香港生活中，刘鸿生一直为是返回上海还是留在香港而犹豫不决，而他的第八个儿子按计划在11月中旬就要从美国前往香港。刘鸿生陷于一场拉锯战之中，上海和香港两边的家族成员都“拉他的后腿”，直到他最后作出了决定。[②]

1. 家族压力

尽管有内战、革命和混乱，但上海刘氏家族在刘鸿生停留在香港的六个月中从未与他失去联系。四子刘念智让他完全了解到生意状况，而早在刘鸿生离开上海两

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章德化（音）致父亲》，见《刘鸿生文集》，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1~112页。

②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6页。

个星期后的1949年6月4日，刘鸿生的次子刘念义就劝说他立刻返回上海。刘念义写了这样一封信给在香港的刘鸿生："父亲，听到您已决定与广东（指国民党——引者注）政客们决绝，我感到高兴。你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指上海——引者注）。"刘念义承认上海在共产党接管的前夕经过了一场危机，但是他认为"上海总算未经受多大损害而度过了危机"。他还抱怨说，损失主要是由国民党人造成的，"想起国民党军队总溃退前对财产的肆意破坏，真令人痛心。我们的橡胶厂（指炽昌新牛皮胶厂——引者注）就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但是根据刘念义的说法，疯狂而具有破坏性的国民党部队现在已经被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部队所代替，后者的好处与前者的坏处一样明显。"拿这批（译者注：指国民党）军队来与解放军对比，简直是不公平的。他们是全然不同的两类人。"①

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短短两周之内，新政府已经开始赢得了上海"老百姓"的人心。次子刘念义给刘鸿生的信这样写道："以下的结论是市内老百姓所一致公认的：新政府宽大、讲道理、十分廉洁、埋头苦干、讲求实际、爱国、朴素，因而肯定是好的……他们是十全十美的。"②在报告了老百姓认为新政府是完美的同时，次子表达了自己对新政府几乎是完全正面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他们完全有成功的机会。有一个时期，我对抗战胜利后所发生的事情极感悲观，但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我的看法。从人民政府获得的新希望将给我勇气去克服未来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③除了谈到自己和老百姓，次子还说上海反共分子中最怀疑的人现在都改变立场，看好新政府。"即使是过去对共产党严加指摘的人，现在也承认：我们国家的命运再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被有效地掌握着。现在的人民政府带来了使中国变成一个强盛国家的希望。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并将带来各种个人的困难和艰苦。然而，这是正确的方向。"④

既然新政府给老百姓、刘氏家族的成员、甚至是前反共主义者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次子告诉父亲现在是他回家的时候了。"你的家乡肯定是在这里（指上海——引者注），在这里您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事情，而您的才能将受到更好的尊重。"由于次子刘念义的信并未能够说服他的父亲，刘念义说他一旦得到新政府的允许就要自己前往香港。他写道："并且最恳切地希望您做好准备，和我一起回上海。"⑤

① 《一九四九年六月四日刘鸿生次子刘念义致香港刘鸿生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5~456页。
② 《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5~456页。
③ 《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5~456页。
④ 《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5~456页。
⑤ 《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5~456页。

但刘念义直到5个月后才得以前往香港。在1949年10月（就在10月1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上海市政府委派刘念义前往香港带他父亲回上海，但刘念义未能成行。根据四子刘念智的说法（他并未去香港），“……（香港）到处进行反共宣传。有一个朋友对他说：共产党什么办法都有，只是经济没办法。他认为这种说法颇有道理……主张等一等，看一看，再作决定。”①

1949年10月末，首都北京的新政府总理周恩来派出了特使到香港，劝说中国资本家返回中国。这些特使们向刘鸿生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资本家强调说，对于新政府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只要他们是爱国的，就欢迎他们回国，对他们的家庭和财产给予保护，并有机会作为领导人为国家服务。②

很明显，周恩来的特使确信刘鸿生会在上海发现比香港更多更好的商业机会。刘在香港的最大投资是从北方购买羊毛并出售给美国的地毯制造商，在这笔生意失败后，刘鸿生告诉他的儿子，他已经作好准备从香港返回上海。③作为答复，1949年11月1日次子刘念义前往香港。他一到香港，刘鸿生就向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要回国（据他回国后对家族的再次声明）：“我已经是六十出头的老人了！我的事业都在国内，不想留在海外做白华（指的是与俄国革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相似的中国人——引者注）。现在你们都盼望我回去，我一个人流落在海外，有什么意思呢！我决定回去。”④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特工的可能干涉，1949年11月2日刘鸿生和次子偷偷溜上英国贸易公司太古公司一艘蒸汽轮船上，乘坐这艘船从香港前往中国北方港口天津。⑤11月3日刘鸿生在甲板上遇到了新闻记者，他告诉记者他和其他资本家从香港返回中国的三个理由：所有人的企业都在上海，所有人带往香港的资金很快都要用尽，中国政府没收他们财产的担心已经消除。他预测，其他人会像他那样很快从香港回来，他提到了味精大王吴蕴初的例子，事实上后者很快就回国了。⑥

---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5~116页。

②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5~116页。在这一部分，刘念智并未提到周恩来特使的名字。他们也许是潘宗尧与张惠农，这两个人是1950年周恩来派往香港的特使，劝说银行家陈光甫和其他金融家、资本家返回中国。见陈光甫：《陈光甫日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9~251页。我感谢李培德博士对这一问题的指点。

③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六日八子刘念信致长子刘念仁函》，见《刘鸿生文集》；《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十九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刘鸿生自香港致胡逸耕函》（译者注：查《刘鸿生企业史料》相关页数，并无七月十四日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368~372页；《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刘鸿生五子刘念孝、七子刘念忠自台湾致相关刘鸿生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4页。

④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6页。

⑤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5~116页。

⑥ 《文汇报》，1949年11月5日。

2. 突然成为领袖

从 1949 年 11 月 3 日刘鸿生乘坐的船只进入天津港的那一刻起，刘鸿生就发现新政府的官员在答应给他机会成为领袖方面做得很好。太古商行轮船刚一靠岸，刘鸿生就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和次子到北京去。刘直接前往北京，并在这一天与周恩来一起吃了一次两个半小时的午餐。周恩来向他保证，他的工厂和其他财产将会获得保护，他可以保持他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他还被要求通过与新政府合作来为其他中国实业家和商人树立一个样板。

当刘鸿生听到周恩来说他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而不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时，他对此表示怀疑，并说明了他对这一词语是否适用于他感到疑惑。他指出，他过去在英国人所有的开滦煤矿管理局中担任过买办，还曾作为一名官员管理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有的轮船招商局。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共产党用这个词语，意在说明它赞同资本家中的一个群体（民族资产阶级）而反对另一个群体（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刘鸿生因此更有信心，他随后询问他的华东煤矿公司是否可以与他的其他企业一并归还给他，但却发现他的新地位并未能自动导致他所有财产都回到手中。周恩来解释说，刘鸿生可以拿回其他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都是轻工业企业，但是华东煤矿公司不行，因为该公司向重工业提供煤炭，而根据新政府的政策，这些企业都要归政府所有和管理。周恩来能保证，最好的条件就是根据刘鸿生在华东煤炭公司的损失而进行补偿。[①]

第二天，也就是 1949 年 11 月 4 日，刘鸿生在返回上海时受到了上海新市长陈毅的正式欢迎。在陈毅家中进餐时，陈毅热情地接待了刘鸿生，并鼓励他在遇到任何问题或困难时就直接找市长。几乎在一夜之间，刘鸿生发现自己与其他高级共产党党员一起被任命组成各种有影响的委员会。在返回中国不到六个星期的 1949 年 12 月 18 日，刘鸿生成为上海政治协商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由市长陈毅担任主席，并包括了副市长潘汉年这位上海新政治领导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键联络人。除了在上海的这一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担任职务之外，刘鸿生还在像华东军政委员会这样管理范围大于上海的组织中担任职务，并就各种国家、国际和地方问题发表演讲。[②]

在他的演讲中（都在报纸上刊印出来），刘鸿生公开支持新政府的领导并提出了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将会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遵守的各种政策。1949 年 12 月 7 日，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16~117 页。
② 《文汇报》1949 年 12 月 18 日。

刘鸿生作为上海人大的一名成员发表演讲，回忆了上海以前是“一座半殖民地城市”，像他这样的中国人在工业和商业都“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酷压迫……我们都喘不过气来”；但是现在“上海的解放为实业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辉煌的世界、创造了一个新环境，让我们可以摆脱枷锁”。他承认即使是在这个新世界，中国企业家仍然面临许多困难，他要求他们做好准备、采取共产党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一精神中，“我们必须首先吃苦，这样我们才能在将来享受快乐。”①

在要求他的中国企业家同伴从共产党那里汲取灵感的同时，刘鸿生还就改革中国工业以控制出口贸易提出了具体建议。在这些提议中，他预见到后来帮助香港和台湾在50和60年代、并帮助中国大陆在80年代后实现“经济奇迹”的出口战略。刘鸿生在提出他这一计划时引用了他自己毛纺厂的例子，暗示在这一个案中政府应当让他将其原则付诸实施。他提议，在第一阶段政府应当从中国西北采购羊毛，就像他几个月前在香港失败了的尝试那样。但两者不同之处在于，现在他计划利用他的上海章化毛纺厂将这些羊毛加工成毛纺制品，而不是仅仅向海外出售原料。在第二阶段，他要将这些羊毛制成产品出口国外，主要是出口到容易打开市场的亚洲、非洲和拉美，其次是向欧洲和美国这些较难进入的市场进行出口，以此换取外汇。在第三阶段，他将利用外汇来购买外国制造的资本物，特别是他的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制造火柴所需的化学品，来完成整个循环。②

在发表这些演讲的同时，刘鸿生还在私下里告诉他的四子，他预计政府的计划部门会通过向政府所有的企业——而不是他的工厂——提供政府合同的办法来实行他的想法。因此，当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计划委员会从他的纺织厂而不是国有纺织厂订购政府官员的制服呢时，刘鸿生十分惊喜。在刘鸿生看来，这一决定证明政府已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他当作是一名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资本家。③

3. 回家的实用主义理由

正如此处所言，刘鸿生选择在中国生活的原因在他回家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转变。在离开香港之前，甚至是在他刚返回中国的第一天，他回家的理由是令人吃惊的实用主义和非民族主义的。在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前夕，刘鸿生说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是年纪很大、希望能够贴近他的工厂，还有他在上海家属的期望——这些想法

① 《文汇报》1949年12月17日。
② 《文汇报》1949年12月17日、1950年2月8日。
③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18~123页。

在当时许多中国资本家考虑要在上海还是在香港生活时似乎都十分重要。[①]在到达中国大陆时，刘鸿生告诉了新闻记者略有不同、但同样是非政治的回家原因：他的工厂坐落在上海，他在香港有耗尽资源的危险，政府保证他可以保留他在人民共和国的财产。在他第一次与周恩来的会面中，他怀疑其中的意识形态意图，并对周恩来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而提出疑问，直到周恩来耐心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用这个词来表达对一些资本家的赞赏，用以区别其他的资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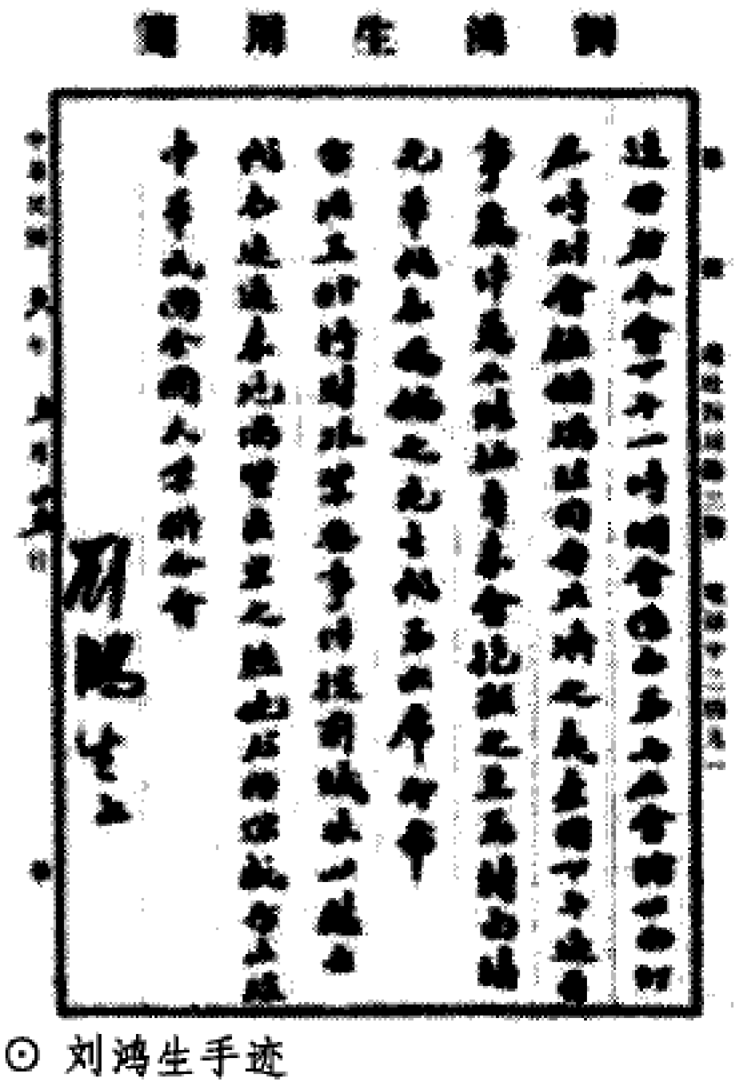
这些例子都说明，刘鸿生之所以离开香港返回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他持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官僚资本家相反）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者是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直到他返回上海并全面参与了人民共和国的生活和工作之后，他才开始在让所有中国资本家——特别是他自己的儿子们——返回中国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

三、号召家族成员回家

如果刘鸿生在返回中国大陆之后开始真心地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话，那么他的新取向是否使他改变了他家族的生存战略？返回上海之后，刘鸿生发表了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演讲和其他公开声明，号召所有中国企业家都效忠并献身于人民共和国。但他自己能否将家人从香港和台湾带回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而使自己言行一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他到达上海不久，他开始联系他的儿子们，要求他们全部从国外返回。

1. 命令儿子们回家

1949 年末和 1950 年初，刘鸿生不仅在演讲中公开拥护新的共产党政府，在给当时在香港的八子刘念信写的私人信件中也是如此。刘念信刚从麻省理工学院（1947 级）和哈佛大学商学院（1949 级）毕业，从美国开始坐船旅行并于 1949 年 11 月中旬到达香港，他原来估计会在香港找到逃到那里的父亲，甚至可能是整个家族。但事实相反，他发现他的父亲已经离开香港前往上海，



⊙ 刘鸿生手迹

① 其他例子见 Wong, pp. 31-32。

并留下了一个口信让他也这样做。

除了号召八子刘念信返回上海，刘鸿生还命令刘念信将已经在20年代末期被派往台湾的五子和七子和其他仍在海外的儿子们都带回来。父亲坚持五子和七子应当立刻从现在在台湾的定居地前往香港，然后与八子一起返回上海，“同作归计，乐叙天伦”。①

作为答复，八子并未将他的五哥和七哥带回上海，但是他自己在1950年初返回。在上海，他与他的母亲得以快乐地团聚，他的母亲一直十分宠爱他并与他保持通信，但是自从他于约5年前的1945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之后就再未见过他。而他与父兄的关系并不融洽，特别是在他应否永久返回中国并在共产主义下生活和工作这一问题上。父亲再次劝他在中国西北担任一个羊毛专家的职务，而长子也尝试让他有兴趣在华中的一个蛋粉厂工作。而二子和六子却并不十分尊敬他所受的训练。事实上，他们怀疑他是否已经作好就业的准备。他们说他在哈佛商学院受到的教育是“非常反动的”，他必须接受“再教育”才能开始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生活。只有四子建议他返回香港，说他应当遵从家族在解放前“不要将所有鸡蛋（我们这些兄弟）放在一个筐子里”的战略。在中国待了两个月后，八子接受了四子的建议，坐上了从上海返回香港的火车。

2. 捍卫中国作为自由国家

即使是在八子返回香港后，刘鸿生继续坚持八子和四子、七子应当永久定居在中国大陆，他还表达了因为他们的拒绝而日益增长的失望。他特别不满八子这样的说法——由于被剥夺了自由，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生活是不可忍受的。1950年3月28日，他写信给在香港的八子：

> 接读二十日来信，借悉汝畏惧国内思想不自由，以为逗留国外比较妥善，此系重视个人本位主义兼受国际歪曲宣传之影响，遂致真相不明，疑而不决。汝已达自立之年，与余六旬以外之人观点容有不同，但就事实研究，必可获得一致之意见。②

---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6~457页。

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译者注：查《刘鸿生企业史料》相关页数，应为“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复刘念信函”）

为了让八子刘念信在自由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父亲反驳了八子关于自由存在于美国、香港和解放前的上海的假设：“但究其（指这些地方——引者注）实际，则所谓自由，完全虚假。”

父亲刘鸿生宣称，因为八子自己在美国居住的特殊环境，使得八子具有关于自由的错误思想。他颇为悔恨八子在1937年只有16岁时就第一次到美国去：“汝出国太早，在美无年长者之商量，凡事全凭自己个人意见处理，渐至对父、兄之劝导亦发生怀疑……汝留美日久，受美国宣传之影响，成见已深，一时不易改变。”① 如果八子可以批判性地看待美国宣传并使自己摆脱美国式的偏见，那么那就可以看到美国缺乏自由，华人与黑人尤其缺乏自由。父亲告诉他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儿子：“又如在美华侨和黑人居住地区均有限制，不得自由选择，而华人进入美境时所受种种不合理之虐待，更令人疾首痛心。”②

通过对比美国，刘鸿生提到了香港“虽较美国自由”，但那里华人的自由也被英国殖民统治所限制。根据他最近的经验，他观察到：“至国人留居香港，虽觉嫖、赌、吃、喝，无不自由，但若经营正当事业，如国际贸易之轮船公司等，其董事长或总经理非英国人或其他国籍人士不可……”③父亲向儿子解释说，即使是自夸的盎格鲁——萨克森法律并未让给香港的华人以自由，因为“但法庭上所援用之英国法律，暗中包庇坏人，以达其繁荣香港之目的。故目下华人以香港为安乐窝，实与余未出国前不觉（在解放前上海）丧失自由之同样可怜也。”④

父亲刘鸿生承认，在解放前的上海，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在成长时都认为自己享有自由的信念而成长起来，直到1927年他已经快40岁时才认识到这一信念的虚假性。他现在记得在旧上海：

> ……在租界内之高等华人，其言行行动亦受外国巡捕之管制，仅身受者不自觉耳。余生长租界内，对于丧失自由，初亦未觉。迨一九二七年游历欧美，见彼邦公园人人可以入内游览，反顾上海租界内之公园，却高挂“狗与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②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④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华人不得入内”之告示，始恍然于欧美人对待华人之不合理。①

父亲指责了上海和香港的特权西方人与腐败的华人官员剥夺了华人的自由。他告诉八子：

> 须知沪、港两埠之发达，全由于欧、美人占据后靠不平等条约之保护，享受种种特别权利，兼以中国官吏贪污无能，人民知识浅薄，无世界眼光，但求舒适享乐，造成港、沪两埠之畸形繁荣。对于国内之普遍穷困，民生憔悴，漠不关心，此乃无可否认之事实，谅汝亦甚明了。②

刘鸿生认为，由于过去的中国领导人并不了解中国的贫困和正在降低的生活水平，因此从未给中国人以机会来体验真正自由的机会。他总结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由于没有这一盲点，因此成功地改变了中国。

他在1950年3月给八子刘念信的信中提醒说：“余返沪已五月有余，眼见上海解放后与前大不相同。”根据他的观察，革命者只是剥夺了那些罪有应得的人的自由，而不是剥夺了每个人的自由。“共产党办事谨慎小心，处处着重实际，务求彻底明了，不贪污，不徇情，人民不得隐瞒，不敢犯法，故除逃税或犯法不自由外，凡守法人士，并不觉得所谓‘不自由’。”③

在谈了自己的例子之后，刘鸿生再次提出保证，他将为八子在中国的羊毛工业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只要八子愿意接受父亲提出这些原则和看法。“若汝以余上述各点为然，肯改变观念，毅然返国，为生产事业服务，余当负责在西北之私营或公私合营之企业中，觅一适当位置。汝在美曾至毛毯厂学习试验毛样，必可大展所长，则有厚望焉。”④

父亲热情洋溢的讨论和对八子期望很高的表达都未能劝服八子刘念信（还有五子和七子）返回上海。但是父亲的态度说明，他已经抛弃了将家族成员分散到海外

①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刘鸿生致留美八子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关于这一引述中所提到的这一矛盾的告示，见Robert A.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142 (June 1995): 444 － 466。

②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复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③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复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④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刘鸿生复刘念信函》，见《刘鸿生企业史料》第3卷，第457~458页。

以分摊生意和人身风险的家族生存战略。刘鸿生在40年代末（之前几十年也是同样）教育自己的儿子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现在却坚持他们都要在一个地方重新团聚并要投身于一个事业。

刘鸿生在这些信件中的语气说明了他在意识形态上的献身并不仅仅局限在他的演讲和其他公开声明上。1949年11月，他对他自己返回上海给出了几乎是纯粹的非政治原因，但是在（仅仅五个月后）上述日期为1950年3月28日的信件中，刘鸿生向他儿子提出了高度政治性的原因要求他们回家。以此证据为基础，很难说刘鸿生的文风变得政治化，是否因为刘鸿生自己正在经受意识形态转变，抑或是他在返回中国后屈从于检查制度或者是自我检查。但无论刘鸿生是出于什么原因而发生了这一意识形态转变，他随后有了更进一步的转变，转而要求家族成员们注意留在中国的其他意识形态因素、并将他的家族成员带回国内。

3. 在朝鲜战争期间拥抱民族主义

尽管上述信件和演讲都批判了外国帝国主义，但在1950年末中国卷入了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之前，刘鸿生并未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过自豪，也不是因为这些成就而要求他的儿子们返回中国。自从成为圣约翰中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立的）的学生，他就十分仰慕美国的力量。即使是朝鲜开战，他最初对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疑虑重重。当1950年9月和10月美国人将北朝鲜部队赶出南朝鲜并夺取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后，刘鸿生担心美国人会在上海投掷一颗原子弹。[①]但是到1950年12月，随着中国“志愿军”进入北朝鲜并将联合国部队再次推回到三八线以南，他对这一成就产生了爱国主义自豪感，并开始热情地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刘鸿生并不是唯一向抗美援朝提供博爱性捐赠的资本家。但是在上海的企业家中，刘鸿生是领头者。他的企业提供了各种资金来资助购买战争所需的飞机和大炮，他自己发表了演讲鼓励他的职员和其他企业家也作出贡献。以一种实质性和象征性的姿态，刘鸿生向前线的部队捐赠了1 000套毛呢制服，并亲自向另外1 000名负伤的老兵写信。他的这些爱国行动使得《文汇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赞扬他是所有中国人的楷模。[②]

在刘的领导下，他的次子刘念义也自己卷入了朝鲜战争。1951年春，刘念义成为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的一员。该慰问团在北朝鲜旅行时，刘念义访问了

---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20页。

② 《文汇报》1951年1月16日。

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并用他于30年代在剑桥大学当学生时学到的英语与美国战俘谈话。1952年他再次成为第二届慰问团的成员。刘鸿生在听了次子关于朝鲜的描述后，他说他被中国士兵的勇敢所折服。1952年他告诉家族："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①

4. 在五反运动崛起而成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如果说朝鲜战争让刘鸿生及其家族有了新的民族主义原因而留在中国，那么五反运动又增加了政治原因，因为五反运动将刘抬升到国家领导人的地位。首先，他成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之一，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但是他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获得这些高位的。

在195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刘氏家族与上海和其他中国主要城市的资本家都成为共产党五反运动的目标，这一运动之所以被称为五反运动，是因为它要消除五种坏事：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窃取国家情报。从1952年1月~5月，上海的上千名资本家被工人、合伙资本家、甚至是自己的家人所谴责。当示威者在大街上游行并用扩音器喊着这些资本家的名字时，资本家们不得不向检查队打开他们的工厂和账本，在许多情况下被迫承认他们的罪行。五反运动对一些资本家的打击要重于对其他资本家，但是看起来这一运动对那些并未认定有任何罪行的资本家也进行了社会性的侵犯和侮辱。②

也许相比其他中国资本家，刘鸿生在五反运动中处在一个不受触动的位置。早在这一运动开展的两年前，当政府第一次颁布法律反对偷税和其他经济犯罪时，他立刻公开表示支持这些新法律。刘鸿生在1950年上海政协会议上代表资本家发言时说："商人有信誉十分重要。那些偷税的人没有信誉，都是垃圾。我们应当不和他们打交道。"因此刘鸿生很早以前就预见到了五反运动，他拥护"严厉并不要顾及脸面"地惩罚那些违反新法律的人。③

即使在五反运动之前刘鸿生就采取了道德上的高姿态、并要求合伙资本家遵守针对经济犯罪的新法律，但是他在运动中并未幸免于难。当党的干部在1952年将他当做靶子时，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64岁的刘鸿生因此心脏出了问题，他感觉不好而待在家中康复。在运动的高潮阶段，他向家人表达了这样的担心——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20~121页。

② John Gardner, "The Wu-fan Campaign in Shanghai: A Study in the Consolidation of Urban Control,"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 477 – 539.

③ 《文汇报》1950年9月5日、12月2日。引述部分来自后者。

这场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在人民共和国的结束。四子刘念智后来回忆，刘鸿生在病榻上告诉儿子们："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上也很有一套办法，可以不要资产阶级这个朋友了。你们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办法去罢！"①

但当五反运动的调查结果被公布后，刘鸿生和他的家人发现他们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从结果中受益匪浅。他们被证明是完全清白的，并被宣布是"守法户"。事实上他们被当作模范民族资产阶级来赞扬，他们获得了 250 万元的特别资助，此外还获得了来自于没收其他不法资本家的 280 万元物资。刘鸿生被邀请到北京与毛泽东一起用餐，当他回到上海时，他向他的家族保证说，共产党仍然未改变其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告诉一位日本记者，他作为全国人大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比以前更加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②

刘鸿生在五反运动结束时被证明是清白的，这使得他和他的家族在中国获得了一份无疵的政治记录，但是他在国外逗留的儿子们这一问题并未解决。如果刘氏家族是一个模范的资产阶级家族，那么为什么他的几个儿子没有返回上海加入他们？在海外的儿子们是否持有被偷运出中国的家族资金，是否应将这些资金正当地归还到上海？是否作为一个模范民族资产阶级的刘鸿生，并不能保证将整个家族和家族所有资源都奉献给国家利益？

就像前面所展示的那样，自从 1949 年末以来，刘鸿生曾命令身在香港的八子带领五子、七子返回上海，尝试以此来消除关于其家族对人民共和国效忠的怀疑。到 1952 年，作为父亲的刘鸿生虽然没有办法联系到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的五子和七子，但是他可以采取非常戏剧性的行动来迫使八子从香港回来。

5. 不情愿地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

在五反运动结束后的 1952 年 7 月，刘鸿生六子刘公诚从上海出发，前往香港劝说八子刘念信与他一起回国。表面上刘公诚和妻子是要出席妻弟的婚礼。因为刘公诚从 30 年代起就成为共产党员，并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就表现出对新政府毫不动摇的忠诚，因此他们并不困难地得到许可离开中国大陆。

出席了在香港的豪华酒店半岛酒店举行的奢华婚礼之后，六子与八子会面讨论家族问题。在岁数上他们十分接近，一个 36 岁，一个 31 岁。1945 年到 1947 年期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0 页。

② Watanabe Takujuro, "Shihonka no jiko kaizō" (Self-reform among capitalists), in Nihon hōritsuka hō-Chu daihyō dan, Kokusai hōritsuka renraku kyōkai, eds., *Chūgoku no bō to shakai* (*Law and society in China*) (Tokyo: Shin dokushosha, 1960), pp.164-166.

间他们彼此非常了解，因为他们当时都在美国进行商业实习。由于已经两年多没有见过对方，他们都要了解彼此的现状。八子将自己的工作自豪地描述为是一个名为海外贸易公司的瑞士公司（Swiss-owned Overseas Trading Company）的销售专家，并以此证明上海的兄长们认为他在香港找不到工作的警告是错误的。而六子自己讲述了刘氏家族在中国的生活。

作为报告家族情况的高潮，六子戏剧性地揭示了他最重要的消息：64岁的母亲已经病重，并希望八子回到她的身边。两个人都知道这一消息令八子十分痛苦，因为他母亲自小就对他十分宠爱并在他1937~1941年、1945~1949年两次长期留美期间一直与他保持通信联系。

十分担心母亲目前健康的八子立刻收拾了包裹与六子和嫂子一起返回上海，但是他们刚穿过香港——中国大陆边界，六子就承认他撒了谎。在深圳的罗湖火车站，当兄弟两人从香港来的列车上拿下了行李、准备换乘到上海的火车时，六子向八子保证说母亲身体无恙，并承认他只是要诱骗八子返回中国。听到了事实后，八子十分震惊，并将他的行李摔烂在月台上。从那时起，他一直绝望地想要离开中国，但是他在此后的27年中一直未能得到允许。最后在1979年他从人民共和国永久移居美国。①

结　论

随着八子的返回，刘鸿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有九个儿子在上海陪着他。1953年到1956年间，他和他在中国的儿子们拥护并执行了政府将私人工业国有化的政策。早在1953年10月，刘鸿生就在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会议上听到了党关于“社会主义转变”的号召。根据四子刘念智的说法，他立刻宣布将整个家族的事业转变成为公私合营，刘氏家族最终在1956年初完成了这一转变。②

当时被问及他丧失了所有权和管理权时，刘鸿生说他并不后悔。就像他对四子解释的那样，他非常感谢党将他的企业国有化，因为这解除了他最大的两个担心：在他有生之年破产，在他死后家族争夺财产。他说，在他的最后岁月中，国家按照他企业价值——1956年价值2 000万元——的5%对他进行补贴，以此他过着非常

① 刘鸿生于1949年和1950年初将八子带回中国的协调行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有例子说明有另一个六十多岁父亲在1949年与1950年初命令儿子从香港回上海管理家族企业，见 Wong, p.34。

②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123~125页。

安逸的生活。临终之时刘鸿生告诉四子，他死后他在中国的所有儿子应当平分他的补贴，之后他们应当自愿将一部分交给国家以证明刘鸿生对党的拥护。在留下了这些最后命令不久，刘鸿生因为心力衰竭于 1956 年 10 月 1 日死亡，享年 68 岁，这一天正是中国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 7 周年的时候。[①]

看起来 1956 年的刘鸿生不太可能像他四子描述的那样是满怀希望和平静的，特别是考虑到他和他的家族刚刚经历过的事情：革命年代的巨变、五反运动期间的羞辱、社会主义转变期间的家族事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丧失。但是，可以获得的材料的确说明，刘鸿生想要他所有的儿子都生活在人民共和国，对这么多儿子在他生命最后阶段陪着他，他感到真切的高兴。革命后他返回中国的决定、他劝说儿子们从海外返回的努力、他成功地将一个不情愿的儿子带回中国，这些都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已有理论对 1949 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期间中国资本家决定留在中国或返回中国的各种解都不足以解释刘鸿生的家族生存战略。就像这里说明的一样，刘鸿生从香港返回中国大陆的动机并不是符合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1949 年 11 月 3 日刘鸿生返回中国时，对周恩来称他为“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怀疑。只是在周恩来向他保证这个词说明党认可他后，他才接受了这个词并用这个词来指称自己。此外，在回国之前他并不赞成民族主义。直到他回到中国后他才以民族主义原因要求他的儿子们返回中国，直到 50 年代初中国卷入朝鲜战争他才在他生命中第一次声明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

如果刘鸿生决定返回中国不能由民族主义来解释，那么他决定将他家族都带回国也不能由跨国主义来解释。在革命之前，他已经作好准备，通过将他的孩子派往海外在美国、英国、日本接受教育来跨越了国家疆界，他还鼓吹这一信念——家族应当散居海外、应当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筐子里（例如中国）。直到 1949 年中期，当刘鸿生在香港停留了六个月并决定是否返回中国时，确定无疑的是他正在考虑是否应当将他分散家族和家族企业的风险（就像他在中日战争期间做的那样）。但是在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后不久，很明显他得出了这一结论，即这一战略不像过去那样可行。1949 年 11 月他一回到上海，就采取了各种方法让他家族所有成员都返回中国，他在私人信件中恳求他们，甚至将一个儿子欺骗回来。

刘氏家族缺乏民族主义和撤销其跨国家网络，这说明他们之所以留在或返回中

① 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第 125~126 页。

国，首先是作为一个家族而追求在中国的新机会。到1949年，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六十多岁，希望在晚年子孙满堂，刘鸿生及其儿子们预见到了他们作为资本家在共产主义中的特殊地位。在1952年初的五反运动中，他们表露出对自己重要性的怀疑。但是即使是到那时，他们也认同于整个家族应当在一起生活工作的信念，他们在1952年夏五反运动结束后成功地强迫八子回国证明了这一点。之后，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家族中的几个人开始后悔他们留在中国的决定，而在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二子自杀。但是在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除了八子以外的所有人都证明，他们相信自己资本主义的标记是可以与共产主义共存的。

50年代初，刘氏家族和其他在革命后留在中国或返回的中国人，是否成为一种能够长期在共产主义下发挥作用的资本主义先例？在当时看来，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段时期毛泽东主义的各种运动永远地清洗了所有资本家（如果不是所有走资派）。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以及2001年和2002年提出的让资本家加入共产党，这些使得刘氏家族的这一信念变得可能：在中国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存最终会被证明。

姚昱　译（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第一节课”

——1950年代初期中国人类进化的教学

舒喜乐[①]

（Sigrid Schmalzer）

提要：虽然到1951年关于上帝造人的造物论仍然在中国流传，但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在苏联的领导下，利用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一些经典文本来抨击这些造物论。他们认为人类是从猿类进化而来的，而“劳动”在这一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新政权以此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理论，以此赞扬劳动人民的历史贡献。但是舒喜乐注意到，虽然这一理论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国际主义的，但却暗藏着一些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到1952年，学者们已经坚决拒绝了外国人提出的理论——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北京猿人遗骸是人类进化活动中一个绝种了的分支。他们赞同的是另一种理论，即北京人是中国所有人——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祖先，也许也是全亚洲人的祖先。

关键词：进化论　北京猿人　民族主义

欧克澜（Cuthbert O’Gara）这位1924年被委派到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主教，见证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欧克澜一直主持管理着他的教堂，直到1951年6月大规模镇压基督教期间被捕入狱，随后又于1953年被驱逐出境。多年后，他记录了共产党进行控制后在全体中国人民中展开的各种学术讨论：“我问那些当时被灌输的人他们上的第一节课是什么？人们可能认为会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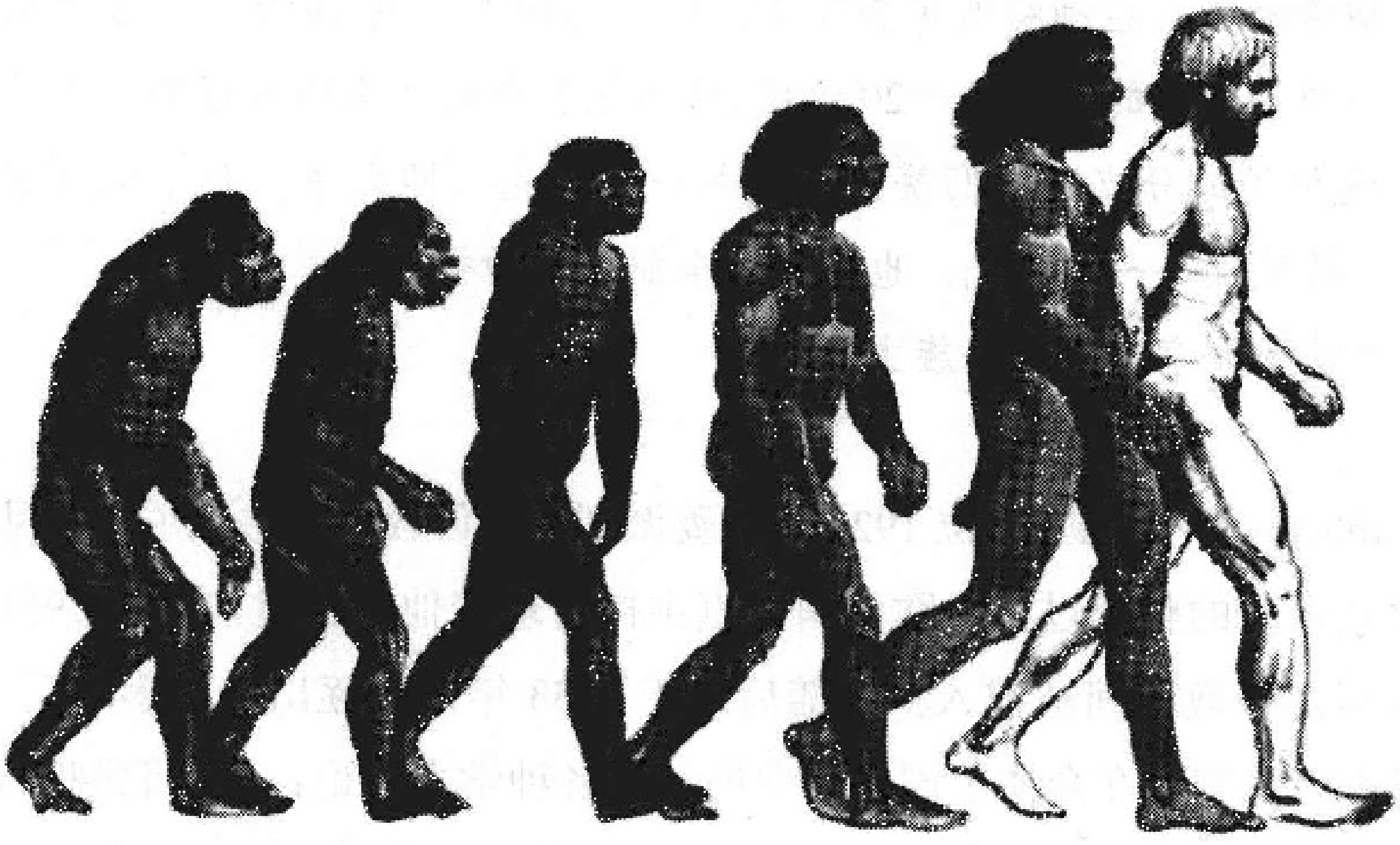
① 作者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历史系助理教授。

留下的智慧瑰宝。但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节课、也是重要的一节课，竟是从猿进化到人的达尔文学说！”[①]

“从猿到人”的故事的确是各种研究小组和政治演讲的“第一节课”，也是1950和1951年许多展览、幻灯片、杂志文章以及不同阅读水平的图书的主题。考虑到新中国还有其他不得不担心的重要事情，例如结束内地革命、控制文化机构、应付朝鲜战争，为什么向人们教授人类进化会具有如此的优先性？

答案就是新中国极度重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更为宏大的目标，办法就是改造人民的意识。也许讽刺的是，这些早期活动的一个重点是用“唯物主义”完全取代“唯心主义”。各种宣传以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本为基础，要求人们将自然和社会现象都看作各种物质力量的产物。但讽刺之处在于，教育人们以唯物主义者方式思考后就能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主张：思想高于物质、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然而，看起来1950年代初的宣传家并没有因这种矛盾而烦恼。他们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唯心主义”实际上等同于宗教和迷信，而“唯物主义”代表科学和客观现实。他们认为，向所有居民灌输唯物主义，是将这个国家迅速带入社会主义轨道的一种快捷手段。在人类进化学说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特别有力的方法来教化人们——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些人——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则。

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完美的文本的存在。伟大的马



⊙ 人类进化图示

① Cuthbert M. O' Gara, The Surrender to Secularism (St. Louis, Mo.: Cardinal Mindszenty Foundation, 1989[1967]), 11.

克思主义权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76年撰写了一篇简洁而文字优美的文章——《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这篇文章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一部分被编辑在一起，作为名称简单的《从猿到人》小册子而被反复出版发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这个苏联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研究基本框架中，即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文本成为最先的序幕。该文本作为一个起源学说，有力地挑战了宗教世界观并取代了后者。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宣称，虽然一些“唯心主义者”认为上帝造人，但是“我们讲从猿到人”。①

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古人类学所具有的政治效用，决定了它必须要由恩格斯理论来主导。但是古人类学的各种传播资料在内容与研究方法上还是有很大的多样性，这一点在人民共和国最初期间尤为明显。1950年和1951年初，内容丰富多样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十分鼓励知识分子甚至是宗教领袖，以令他们相信他们的观点是被尊重的，至少是可以容忍的。此外，虽然大多数知识分子打算适应辩证唯物主义的新范式，但是这一调整过程需要时间。古人类学家在跨越1949年分界线时还带着他们在非社会主义环境下——包括与外国科学家一起工作——获取的知识。最后，古人类学领域中仍未解决的问题更加重了主张多样性这一点。例如，人类最早出现在非洲还是亚洲的问题就为许多普及课本增添了不确定性。甚至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人化石作为人类祖先的地位问题仍然不清楚。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外科学家携手在周口店（就在北京城外）挖掘出来这些距今大约50万年的人类化石。虽然当时周口店是世界上人类痕迹化石最丰富的埋藏地点，但是那些化石与现代人类的准确关系还没有得到解释。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之后，几个重要问题得到了更清楚的定义，这使得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人类起源正统派学说的各种想法变得具体化。在区分受欢迎与不受欢迎的各种解释时，公开与批判的过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关于人类起源的各种文献资料一般在1951年清除了创世论和唯心论。此外，在鉴别政治反对派并加强反对他们所主张的意识形态方面，朝鲜战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在中国国内的表现）不仅激起对外国教堂的攻击，还凸现了新兴正统派学说中的两个最重要主题：国际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与此同时，纽约发生的古人类学事件完全改变了人类谱系形态，这反过来又极大地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34页。

推动了对北京人化石的解释。

通过对这些活动的追溯，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意识形态奠基工作中的巨大重要性得到了彰显。科学传播——特别是关于人类起源这一重要问题——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然而，我们必须反对那种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政治决定科学、科学服务于政治。科学并不只是政党领袖为了暗藏的目的而玩弄的一种政治文字游戏。虽然那些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受到限制，但是在古人类学内部产生的问题却十分重要地型塑了话语。另外，鼓励人民进行批判性与科学性思考本身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在科学传播中展现出来的经验主义证据证明了这一点，而愿意在必要证据不足之前让未解决问题保持未解决状态也证明了这一点。

旧石器时代的革命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开始几年中，另一个更早的开始——人类的起源——获得极度的关注。在 1951 年出版的《我们五十万前的祖先》系列图画书的绪言中，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在将这两件变革性的事件联系起来。他写道，“实际上，不仅我们在革命中翻了身，随着解放胜利，我们的祖先北京人也翻了身。”贾特别提到，新政府为了向“广大群众”传授人类进化知识，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北京人身上。但是他的叙述也有隐喻的含义：具有革命标志这一新意义的北京人开始了新生活。[①]“从猿到人”的故事是解放和改造之一，与当时的政治胜利发生共鸣。

1950 到 1951 年间，政府官员和科学家制作了大量资料，打算让“群众”熟悉关于“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社会主义解释以及中国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这些资料包括针对各种教育水平读者的图书、刊登在科普杂志与通俗杂志中的文章、政治大课与干部班、博物馆以及其他场所的展览、在工厂和其他工作场合发表的演讲、放映幻灯片。在最初突然兴起的活动之后，新的材料以较缓慢的速度仍然出现直到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所有这些传播的资料都以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论点为基础。1928 年，恩格斯 1876 年所作的关于人类起源的文章《劳动在从猿转变成人的过程

① 没有资料显示贾兰坡设计了这两个含义。杨鹤汀（原文拼音为 Yang Haoning，译者查证为杨鹤汀——译者注）（图）、贾兰坡（文）：《我们的祖先（一）：我们五十万年前的祖先》，天津：知识书店，1951 年，前言。

中发挥了作用》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发行。[①]1949年后，它立即成为大量图书与普及科学杂志中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些资料译自苏联文本，但是多数译自原文，译者常是那些曾在欧洲学习并同外国科学家一起从事北京人遗址挖掘工作的古人类学家，如裴文中（1929年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就归功于他）、贾兰坡以及刘咸。这些人把丰富的知识和种种经验并入恩格斯提供的新框架。虽然对他们许多人来说恩格斯是陌生的，但是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并不陌生。在根除“迷信”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官员是同盟者。

新政府并不依靠人民主动阅读关于人类进化的图书和杂志文章。相反，由像艾思奇这样重要的党知识分子讲授的“政治大课”向许多人介绍了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解释。[②]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参加干部、工人、农民和士兵组成的“学习小组”学习了恩格斯的理论。[③]根据在香港对不久后逃亡者的采访，鲍大可（A. Doak Barnett）写道，1950年代初学习小组“最普遍使用的课本之一是一本名为《社会发展史》（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的书……每个人都读《从猿到人》（From Monkey to Man）”。[④]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采访的一名中国人同样想起关于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令人难忘的”五个小时课程，该课程的开始阶段是以名为《通过劳动从猿到人》（From monkey to man, through labor）的通俗小册子作为基础。[⑤]

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直立行走“解放”了手、从而使劳动成为可能，而劳动反过来又促进了复杂的社会交流、语言和大脑的发展以及其他把人同猿区别开的特征。恩格斯强调劳动本身“改进”了手：“手不仅是劳动的工具，它也是劳动的产物。”[⑥]手的发展使更复杂的劳动成为可能，这促进了“相互帮助与互相合作”，这

① 它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名义出版，《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上海：春潮书局，1928年）。我没能找到这本书现存的版本或是1930年恩格斯文章的译文（此处所说1930年的译文，可能指成嵩翻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9月出版的《从猿到人》——编者注）。我最早发现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曹葆华、于光远译（石家庄：解放社，1948年）。

② 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北京：耕耘出版社，1951年。

③ 关于学习小组最详尽的资料保留在 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④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55*(New York: Praeger, 1964), 101.

⑤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69[1961]), 257.

⑥ 因为这部著作已经有很完美的英文翻译，所以中文没有重大的歧义，我引自 Frederick Engels, *The Part Played by Labor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pe to Human*(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0), 9（原文为斜体字）。至于中文，见恩格斯：《从猿到人》，第4页。

反过来又对语言产生了需要。只有在这些条件的刺激下，早期人类大脑的容积和“完美”才开始发展。①

重要的是：虽然恩格斯假设了一种积极的反作用循环圈，在这个循环圈中劳动和社会刺激促进了大脑的发展，而体积更大的大脑推动了更复杂的劳动形式以及社会交往，但是毫无疑问，对恩格斯来说，是劳动而不是大脑的发展，启动了这个循环圈。②对恩格斯来讲，这直接来自唯物主义者——与唯心论者不同——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大脑优先论是唯心主义的，它不仅不能解释大脑发展的物质原因，还认为人的智力发展是进化的力量。虽然恩格斯同时代的人未必同意他的哲学观点以及他阐释问题的角度，但他们却就大脑发展与直立姿势哪个更早出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至少直到20世纪中叶达尔文学说出现理论上的革命以及皮尔当人（Piltdown Man）化石被揭发纯属伪造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是非社会主义西方争论人类进化问题时的中心话题。在1912年皮尔当人“被发现”之后的41年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化石证明了大脑发展早于人类进化中其他形态学变化的这个流行观点。当1953年皮尔当人化石被证明是伪造的之后——将一个猩猩的颚骨和两个人类的头骨伪造成看似古老，人们就恩格斯提出的见解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科学家将此清晰的表述为劳动创造了人。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初期，每个描述关于北京人与其他早期人类的生活和时段的通俗著作都以恩格斯的论点为基础。一本1950年以韵文写的图画书用下面简洁的词句突出了恩格斯的论点：

只有经过劳动身体才变得直立，
能够奔跑，能够逃避，使用手和头脑，
然后他们用火去烧烤，用言语去交谈，
经过几百万年，猿变成了人，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劳动创造了所有的这一切。③

在另一本书中，读者了解到，“因为他们能够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参加劳动，

---

① 恩格斯：《从猿到人》，第6~8页。
② 恩格斯：《从猿到人》，第11页；恩格斯：《劳动在从猿转变成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第14页。
③ 薛宏达（音译）主编：《从猿到人》，上海：华东书店，1950年，第34页。

猿人才变成人，野蛮人才变成文明人。"[1]另外，几乎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普及读物都至少包括了"劳动创造了人"这个短语。科学被通过这种方式来将人解释为劳动者和群居动物，将劳动变成了一个对人类经验十分重要的范畴。因此，科普著作与像电影《思想问题》这样的文化产品一起将那些不劳动的人贴上了不是真正人类的标签。通过这样的话语，劳动阶级的政治特权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劳动创造了人"这个最基本观念很容易就扩展并容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核心要素。在"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组成了以内部和谐、外部十分危险为特征的小团体。制造工具、搜寻粮草、狩猎以及其他活动都需要共同劳动，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早期的人类才能勉强生存，保护自己免遭凶猛的食肉动物的伤害。在1950年出版的另一本图画书中，画家描绘了一群为制造工具而集体劳动的人，在图画的一旁，贾兰坡写道，"左边第一个人正在河岸上寻找石器材料；第二个人正在凿制石片；第三个人正在打磨一个石片工具；第四个人正在学习他们的制造经验；通过这种共同劳动，他们交流了集体的经验。"[2]几年后，一本适用于高层次读者的书，根据这一论点对比了社会主义人与资本主义人类学家。虽然"统治阶级"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充满竞争性和好战的，但是早期人类社会实际上通过文化交流与和平互动而保持运转。[3]此外，人人劳动，没有阶级界限，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投身于生产。[4]虽然这样的社会可能看起来充满了吸引力，但是一位作者提醒到，期望回到初期的历史时代是无用的。这位作者继续谈到，这并不要紧，因为有"更加美好、幸福、自由、快乐的"共产主义社会。[5]

从"上帝创造人"到"劳动创造人"

因此，从猿到人的故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中是精彩的课程。可是，许多普及材料的作者绝没有丢掉更大的重点。相反，他们后退一步，将恩格斯理论放到了关于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如何击败了唯心主义解释这个更大的叙事

---

① 贾祖璋：《从猿到人》，上海：开明书店，1950年，第30页。

②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一）》，第17页。

③ 裴文中：《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1页。

④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一）》，第17页；贾兰坡、刘宪亭：《从鱼到人》，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前言；杨叶（音译）：《我们的祖先》，汉口：武汉工人出版社，1952年，第35~37页。

⑤ 杨叶：《我们的祖先》，第35~36页。

中。苏联和中国的书籍把达尔文与恩格斯当作数一数二的唯物主义力量：达尔文证明了人类与动物的共同性，恩格斯宣告了劳动的首要性。这个计划主要打击目标是唯心主义，特别是宗教唯心主义，因此在这些叙述中宗教的创世故事被当作对手。

苏联书籍《人类如何进化》（How Humans Developed）开篇章节的标题坦率地问道，“你相信圣经还是科学？”[①]而中国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苏联著作的反基督教运动，有时他们还将中国的创世故事——最常见的是盘古开天辟地创造世界、女娲用泥浆造人——添作攻击目标。[②]在苏联普及科学作家米凯尔·伊林（Mikhail Ilin）的指引下，中国作者也注意到1925年美国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田纳西州的一名教师向禁止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的法律提出挑战，当地居民提出抗议，声明他们既“不是猴子”、“也不会是由猴子变来的”。[③]这个故事有助于加强这一政治寓意：想象中先进的美国实际上被宗教信仰束缚了发展。

总的来说，这些作者们极富同情心地诠释了关于自然现象的宗教解释是如何产生的。贾兰坡在他的一本图画书中谈到，迷信源自早期人类对诸如雷、电等自然现象的恐惧和误解。[④]中国以后几年出版的书籍进一步指出，古代基督教、埃及以及中国的起源故事共同的主题：都把人类描述为是由尘土、黏土或泥浆制成的，因此可能是在陶器制造成为这些社会重要技术时虚构出来的。[⑤]

虽然如此，大多数材料将注意力集中在后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欺骗、剥削劳动者上。在《人类如何生产与发展的》一书中，苏联作家普列雪茨基（M. S. Plisetskii）用整整一章的内容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支持宗教”这个问题，除此之外也讨论了宗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⑥] 1950年中国出版的《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一书宣称，“这种宗教迷信思想对劳动者十分有害……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战

---

① 古列夫（Gurev）：《人类是怎样长成的》，陈迎新译，上海：开明书店，1950（1946）年。

② 参见其他，王山（音译）：《劳动创造人类》，上海：上海群众出版社，1951年，第1页；郭以实：《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第1页。讨论佛教创世故事的资料非常稀少，王山的著作是其中之一。

③ M. Illin and E. A. Segal, *How Man Became a Gian,* trans. Beatrice Kinkead (London: Routledge, 1942), 19. 中文的例证见杨叶，第7页；贾祖璋，第2~3页。

④ 杨鹤汀（图）、贾兰坡（文）：《我们的祖先2：我们二十万年的祖先》，天津：知识书店，1951年，第47页。

⑤ 黄维荣：《中国猿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4年，第1~2页；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5年，第5页。权威人士可能认为女娲的劳动创造了人类。

⑥ 普列雪茨基（M. S. Plisetskii），毕丽（音译）译：《人类是怎样生产和发展的》，上海：中华书局，1951年，第17~21页。

胜压迫。"[1]中国有些书籍进一步将对人类起源的宗教解释嘲笑成"鬼故事"，以这种方式把它们同其他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根除的迷信联系在一起。[2]

虽然有些关于人类起源的材料也提到本土的信仰，最常见的是关于女娲的传说，也有佛教传说，但所谓"迷信"主要指的是基督教的创世说。在一个只有几百万基督徒、总人口超过5亿人的国家中，这有些奇怪。[3]毫无疑问，这部分归因于苏联模式的绝对影响力。在最初几年，这还可能因为源于党所担心的"中华民国"时期教会教育对知识分子和其他都市人的影响。至少在生物学方面，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几乎一直是去一些地方的教会学校上学。[4]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这些原因的渐渐消失，继续抨击基督教的"唯心主义"被当作一种方式来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优越性，特别是后者正在中国进行实践。

在这些材料中，之所以提到各种创世故事就是要让它们被科学打倒。达尔文通常获得最高的荣誉，由于证明了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他被人们赞扬"战胜了宗教"、是"伟大的科学家"。[5]这与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非常相近。例如，马克思在1860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6]在另一封信中，马克思详细阐述到，"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意义。"[7]

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赞同达尔文主义。更确切地说，他们认为达尔文受到他生活环境的过度影响。在一封1862年写给恩格斯、后来经常被引用的信中，马克思谈到，"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

---

① 王晓石（音译）：《从猿到人：通俗讲话》，上海：新亚书店，1950年，第61页。其他的例证很多。

② 杨鹤汀、贾兰坡：《我们的祖先（二）》，前言。后来的例证见董爽秋（音译）：《人是怎样来的》，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页。

③ 1949年，中国大约有3 000 000天主教徒和不到1 000 000新教教徒。Richard Madsen,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137.

④ Laurence Schneider, *Bi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3), 280.

⑤ 声名狼藉的李森科主义者（Lysenkoist）批评孟德尔（Mendelian）的遗传学没有阻止达尔文被奉为名人。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详细讨论了这个主题，Sigrid Schmalzer, "The People' s Peking Man: Popular Paleoanthrop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4)。

⑥ Karl Marx, "Karl Marx to Frederick Engles, 19 December 1860" , in E. J. Hobshawm et al., eds., *Karl Marx, Frederick Engles: Collected Works*(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5), 41:232.

⑦ Karl Marx, "Marx to Ferdinand Lassalle, 16 January 1861" ,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les: Collected Works*, 41:247.

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①

在中国和苏联，人类进化书籍的作者有时模仿马克思的批评。例如，中国1950年的一本书就提到，达尔文的唯心主义视角使他只看到竞争的作用，没有看到合作的作用。②1951年中国翻译出版的一本苏联著作进一步将达尔文对竞争的重视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联结起来。③然而，最常见的情况是，这类著作仅仅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描述成是不完整的，而不是哲学上的缺陷。正如另一位苏联作者谈到，达尔文"没有完全解决人类起源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全面解答人如何从生物世界分离出来。"④裴文中和贾兰坡1954年的著作《劳动创造人》同样解释说进化论有"重要缺陷"，因为达尔文"还没有认识到人类和动物世界的基本区别，所以不能指出人类进化与动物进化在原因上的不同。"⑤这些材料认为，恩格斯亲自弥补了这个缺陷。后来另一位中国古人类学家这样简练地总结到，"如果我们说达尔文把人从上帝的手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回到动物世界，那么恩格斯把我们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是劳动者、自然的改造者。"⑥

清除唯心主义

因此，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这一命题成为教育人们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强制而又有效的办法，同时又给予唯心主义、特别是基督教以渴望已久的"致命打击"。但是，新正统派学说巩固自身并规范已出版的材料颇费了一番工夫。而关于人类进化这一问题的各种材料由于几个原因而在最初表现出了多样性，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新国家承诺的宽容政治。

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党仍然坚持了"新民主主义"目标，该目标是在1939~1940年间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确立的。根据毛的文章《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的部分目标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可以"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只要后者摆脱了"反动的唯心论"。⑦

①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le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 1975), 120.
② 方且：《从猿到人透视：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和世界》，上海：上海编译社，1950年，第8页。
③ 普列雪茨基：《人类是怎样生产和发展的》，第56页。
④ 古列夫（Gurev）：《人类是怎样长成的》，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第18页。
⑤ 裴文中、贾兰坡：《劳动创造了人》，北京：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4年，第1~2页。
⑥ 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第11页。2005年，非常相似的话语还可以在北京动物园的大猩猩馆附近看到。
⑦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81页。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这种比较宽容的语言不断要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对社会和国家建设的贡献是受到重视的。1950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政治对人类进化论的作者十分重要这一点，可以从这些作者经常并且故意将新民主主义与自己的写作出版联系起来这一点得到证实。①

毛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承诺，"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可以在反帝反封的联合阵线中加入无产阶级，尽管党"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在1950年和1951年初，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同总理周恩来举行了建设性的会议，周甚至在会议上临时保证会维持中国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联系。③即使是当时特别强调普及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宽容政治气氛，就能理解1951年1月一部关于人类起源创世论著作为何得以出版。

由天主教教育联合委员会（the Catholic Education Joint Committee）出版的、题为《人类起源问题》的这本书，试图通过说服性的争论来否定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性主张是正确的（至少是确定的）。类似于今天创世论者所使用的方法，作者引用包括裴文中、亨利·费尔菲尔德·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在内的著名科学家的言论，揭示科学家本身承认化石记录并不连贯、难以解释过去到底存在什么。他接着指出，"我们阅读了解进化理论时，通常会见到这样的句子（提到达尔文的贡献）：'因此上帝创造人的鬼故事被推翻了。'我们上面所了解的就是人类进化这个问题只是个未经证实的理论。"④在提出几个与进化论相伴的问题后，作者得出了人类进化需要一个计划者这个结论。⑤如果作者耽搁几个月，他的书就不可能出版。到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把目标对准中国的新教和天主教会：宗教领袖遭到迫害，政府明显地加强了对所有与教会相关的活动的监视。⑥

我没有发现其他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出版的创世论出版物的例子。无论如何，唯心主义模糊的幽灵仍然在一些早期人类进化著作中徘徊。这部分是因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容忍，不过这也是当时科学家需要时间调整旧思考方式的结果。

知识分子适应新制度的过程最为生动地表现在刘咸的经历中。刘咸在伦敦跟随

---

① 发现的四个例证中的一个，见王山（音译），前言。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第380页。

③ See John Tong, "The Church from 1949 to 1990", in Edmond Tang and Jean-Paul Wiest, ed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Modern China: Perspectives* (Maryknoll, N. Y.: Orbis Books, 1993), 8-9.

④ 李庆波（音译）：《人类起源问题》，上海：新生出版社，1951年，第23页。

⑤ 例如，作者提出了为什么森林消失的时候有些类人猿依然是类人猿，没有进化成人的问题。李庆波：《人类起源问题》，第30页。

⑥ Tong, 10-11.

著名的阿瑟·基思（Arthur Keith）爵士学习。基思是这样一群学者中的一员，这些学者最关注大脑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认为人类大脑发展就是沿这一方向发展的一种潜在趋势的结果。[①]如前所述，这正好与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恩格斯认为大脑的发展是在双手解放以及劳动开始后发生的，而这些改变的根源在于物质世界。根据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基思的认识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哲学。至于进化理论，他赞同定向进化学说（orthogenesis）——进化是通过人类的内在各种趋势的实现而得以展开。

刘咸从英国回来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之一。1947年他在暨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②]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刘咸在新国家的前途最初看起来很有希望，他在1950年为普通读者出版了题为《从猿到人发展史》一书。他的同事卢于道（原文为Lu Yutao，译者查证为卢于道——译者注）为这本书写了绪言，乐观地宣称自北京人的石器时代以来，人类以令人惊讶的速度进化，现在“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时代，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双手和大脑进行创造”。[③]

八个月后，一位名为韩文理（没有通过其他的方法证实他）的读者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攻击刘咸的这本书。[④]根据刘自己的回忆，书店很快对此作出反应，把他的书从书架上撤下来。[⑤]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刘的唯心主义上。根据刘的描述，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之所以能成功完成从树木到地面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在积累新经验方面的大胆与利用这些经验思考行动计划的能力。的确，刘咸对人类进化的描述具有很强的唯意志论色彩，会使人联想到他的老师基思的大脑首要理论。在刘的解释中，类人猿看起来策划了自己的进化路线。[⑥]

但是，韩并没有明确地反对唯意志论。毕竟从奠基者李大钊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唯意志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⑦]让韩感到疑惑的是，刘的书认为在人类从事劳动所必需的第一个阶段之前这种唯意志论就已经存在。在引用了刘的著

① Peter Bowler, *Theories of Human Evolution: A Century of Debate, 1844-1944*(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8, 207-208. See also Arthur Keith, *Concerning Man's Origin*(New York: G. P. Putnam' s Sons, 1928), 27.

② Gregory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ao*(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4), 66, 68, 100.

③ 卢于道、刘咸：《从猿到人发展史》，前言二，上海：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50年。

④ 韩文理：《简评刘咸著 <从猿到人发展史>》，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第6版。

⑤ 《上海知识界谈贯彻“百家争鸣”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第2版。

⑥ 至于对刘的著作的不同解释，see Schimerder, 152-153。

⑦ Maurice Meisner, *Li D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作相关的段落后，韩问到，“这不是等于说，还没有开始劳动的古代人猿，已经能够思维了吗？”在几个段落之后，他总结到，“要知道，古猿的变成人，不是靠着气候的突然变化，也不是靠着‘勇气’和‘决心’；而是靠着长期的慢慢学来的劳动（的过程）。”①

但是刘没有回应。其实他并没有挑战恩格斯的野心，相反他在这本书中煞费苦心地想要证明恩格斯的理论。同样他也没有打算写一本书改来变人们对劳动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的传统看法。最可能的解释就是，刘只是在尝试把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理论加人他以前对人类起源的理解时失败了。他把自己的叙述夹在“劳动创造人”的厚面包片中做成三明治，但是肉和面包之间还有真实的哲学分歧。

1950年出版的一些人类进化书籍没有提及恩格斯及其“劳动创造人”的理论。②1951年1月，甚至可以出版一本对人类起源进行创世论解释的著作。但1951年5月对刘的批评、连同6月份对另一本人类起源普及读物的至少一篇负面评论表明，最初的宽松已经收紧。③由于朝鲜战争彰显了与外国唯心主义、资本主义保持瓜葛所具有的政治风险，而评论家又忙于阅读新近出版的材料以鉴定其中不当的政治内容，因此起初对新民主主义的希望迅速消失。就像刘咸那样，即使是要尝试认真解释恩格斯，但由于失败却会立刻遭到批评。

这个事件并没有结束刘咸的职业生涯。1952年，他协助在复旦大学建立了1949年后中国最重要的人类学系。但是，韩的批评为后来对刘咸的研究、教学工作接连不断的批评和干扰打下了基础。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一次反唯心主义运动中，刘咸再次成为批判目标，虽然《科学通报》的编辑们要求把他的观点作为该刊一次专刊的一部分刊登出来，但是他们认为他的稿件缺少足够的自我批评而最终未予刊登。刘回忆到，1956年他“戴了许多顶帽子”，其中就有“唯心主义”、“拟人论”。他的书也再次遭到批判，这次是因为宣传“反动政治思想”与“破坏研究活动”。④1957年毛泽东发动百花运动时，刘咸成为许多获得机会讲出自己挫折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连同其他几个人把他们的经历写成短文，发表在《光明日

---

① 韩文理：《简评刘咸著<从猿到人发展史>》，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17日，第6版。

② 见1950年再版的朱洗的1940年的著作《我们的祖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1940）年。

③ 《文汇报》副刊上的评论批评了一本图画书——涂景宗、陈光镒（原文为Chen Guangyu，译者查证为陈光镒——译者注）：《劳动创造人》，上海：上海文华书店，1951年——其中一个错误是把劳动的社会组织及其成果归功于类人猿。见周龙：《评<劳动创造人>》，载《文汇报》副刊，1951年6月19日。

④ 《上海知识界谈贯彻“百家争鸣”问题》，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第2版。

报》上——这就是本文引用刘的回忆的来源。但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期间，刘再次遭到批判。后来复旦大学人类学系的学生回忆，虽然刘咸有时（大约是1960年代初）被允许用人类学正统教材讲授几节课，但由于被划分为“右派”，他已经被驱逐到图书馆工作。①

“我们的祖先北京人”

新民主主义的兼容并包原则是1950年与1951年人类进化著作在意识形态上比较自由的一个原因；而知识分子需要时间来适应唯物主义观点是另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可以在国际古人类学的历史背景中寻找。1950年是这个领域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学者们一直在讨论恩格斯时代还没有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北京猿人的人类祖先地位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两个相关但又对立的问题十分重要。一个是某些进化理论是否能证明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北京猿人是否能作为一个民族象征。在这些问题上形成的一个正统学说（虽然有些自我矛盾）包含了古人类学的现代综合进化论和朝鲜战争这些完全不相干的因素。

在民国时期，北京猿人是人类祖先这一看法在中国内外都未得到广泛承认。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直至二战结束，科学家倾向于关注原始人类化石的差异而不是相似之处，因此不仅把它们置于不同的种，而且放在不同的属。②这样，爪哇猿、北京猿人和尼安德特人与其他猿人一样，都被看做人类谱系的旁支。他们已经灭绝，被很明显没有留下化石资料的人类直系祖先所取代。③

但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是一个例外。魏敦瑞接任1934年去世的步达生（Davidson Black）担任周口店遗址北京猿人研究主任。他坚持人类进化的线性模型，也就是任何单一进化阶段的人类都是单一个人种的不同种族。因此，并没有所谓的“取代”与“灭绝”，有的只是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进化。魏敦瑞确认了北京猿人和现代蒙古人种之间、其他化石与该化石发现地的现代人类之间很明显的形态学上的关键相似之处。这些现代种群中的每一个都保留着特殊的种群特

① 刘并不像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亡的那些知识分子那样不幸。文化大革命后，他甚至可以在更自由的邓小平政府时期参与人类学学科的重建工作。采访资料，2002年。

② Bowler, 75.

③ 阿勒斯·赫德历柯（Ales Hrdlicka）是早期的一个例外，他坚持尼安德特猿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See Ales Hrdlicka, “The Neanderthal Phase of M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7, (1927): 249-274.

征，同时遵循基本的、共享的人类进化“趋势”——与阿瑟·基思的模式有相似之处的定向进化模式。对于魏敦瑞来说，北京猿人不仅是人类的祖先，而且特别是中国人的祖先。[①]

1950年，在纽约冷泉港参加一连串座谈会的科学家把现代综合进化论引入了与古人类学关系紧密的进化生物学。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以激进的方式简化了人类谱系，将北京猿人放在直立人种（Homo erectus）中，直接成为智人（Homo sapiens）的祖先。[②]虽然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被回避了，但是他从事的“单一人种”研究成为多年后古人类学的理论基础。[③]重要的是，现代综合进化论也将基思和魏敦瑞所赞同的定向进化理论的反对者凝聚起来。但是，不像韩文理对刘咸的批评，冷泉港的科学家们对劳动在进化中的作用不感兴趣，他们的关注点是自然选择。

在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最初几年，也出现了向认为北京猿人和其他人类化石位于人类谱系主干中的人类进化线性观点的转化。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国科学家根据新的国际舆论改变了他们的主张。但是巧合是惊人的。既然这些年间中国的科学家一直与他们的外国同仁保持联系，那么就很难说中国的这种转变与国外发生了那些变化没有关系。[④]

虽然1950和1951年出版的一些材料把北京猿人描写为人类的直系祖先，但另一些材料继续认为北京猿人是旁支，或者坚持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最终解答这个问题。例如，裴文中在1950年写道，“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哪个猿人是人类的祖先。也许他们都不是人类的祖先，我们的祖先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他。”[⑤]1950年重新出版的1940年的一本重要著作甚至提出，北京猿人在某些方面更像现代欧洲

① See, for example Franz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Franz Weidenreich, “Some Problems Dealing with Ancient M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42.3(1940): 380-383.

② Ernst Mayr, “Taxonomic Categories in Fossil Hominids”, *Cold Spring Harbor Symposia on Quantitative Biology* 15 (1950): 109-118.

③ 关于战后单种模型和种族政治的论述见，Robert N. Proctor, “Three Roots of Human Recency: Molecular Anthropology, the Refigured Acheulean, and the UNESCO Response to Auschwitz”, *Current Anthropology* 44.2(2003): 213-239。

④ 例如，藏于北京脊椎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研究所的（the Institute for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Beijing）杨钟健个人藏书中有他在1950年代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集的资料。

⑤ 裴文中：《自然发展简史》，北京：联营书店，1950年，第58页。承名世和方诗铭重复了这个观点，承名世、方诗铭：《从猿到人通俗画史》，上海：人世间出版社，1951年，第42页。杨叶倾向于把北京猿人看作祖先，但坚持需要更多的证据去确认。例如，种系发生谱系显示北京猿人是分支，见薛宏达主编：《从猿到人》，第3页；裴文中：《自然发展》，第45页；王晓石：《从猿到人：通俗讲话》，第24页

人，而不是现代亚洲人。①

贾兰坡的《北京猿人》也在 1950 年出版，他认为北京猿人是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并特别引用魏敦瑞的论据来证实，但他不同意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他提到魏敦瑞证明了北京猿人和蒙古人种（包括东亚人在内的主要族群）共有特征，以及魏敦瑞关于这两者间有种族连续性的结论。贾随后明确反对这个简单的推论，指出现代的种族太相像，②不会有这样的古代祖先，人种的分裂一定是发生在尼安德特人时期之后。

但在 1952 年左右出版的著作中，北京猿人作为人类祖先地位的不确定性消失了。此后，中国作者越来越多的再三明确提到“我们的祖先是北京猿人”。在一本文辞特别绚丽的书中，“我们的祖先”这个词语在一百来个句子中出现了 24 次，其中 10 次详细说明“我们的祖先北京猿人”。③尽管贾兰坡并不相信，但 20 世纪 50 年代至少有两本书进一步指出北京猿人和她的现代后裔（有时被称为“蒙古人种”，有时又被称为“北部中国人”）之间在骨骼结构上的相似。④

虽然人类谱系的变化使得在科学意义上更加容易地将北京猿人称为人类祖先，但北京猿人在科普著作中变得脍炙人口却是因为其他原因。北京猿人的人类祖先地位问题中利害攸关的部分是中国人祖先的古迹在中国。一位作者察觉到了早期关于中国人最初来自巴比伦、中亚、日本和其他地方的理论损害了民族自豪感。⑤而北京猿人使得“中国人最终找到他们自己的祖先，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生长在中国大地，不是进口货。”⑥一旦人们承认北京猿人为祖先，那么就可以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权利上推 50 万年，并因此而加强了中国的民族认同。⑦

使人类进化故事更加“中国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古人类学的证据和中国经典

---

① 朱洗：《我们的祖先》，第 163 页。

② 贾兰坡：《中国猿人》，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0 年，第 135~137 页。

③ 程万赋、秦觉施（音译）主编：《中国猿人：我们五十万年的祖先》，南京：民风印书馆，1953 年，第 14~28 页。

④ 杨叶：《我们的祖先》，第 10 页；方少青（方宗熙的笔名）：《古猿怎样变成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年，第 48 页。

⑤ 关于共和时代的“西方起源”理论见 Fa-ti Fan, “How Did the Chinese Become Natives? 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Origins in the May Fourth Era, in Kai-wing Chow, Tzw-ki Hon, Hung-yok Ip, and Don C. Price, eds., *Nation, Modern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Beyond the May Fourth Paradigm*(即将出版)。

⑥ 杨叶：《我们的祖先》，第 6 页。

⑦ 关于北京猿人在当代中国民族认同中的有效性见，Barry Sautman, “Peking Man and the Politics of Paleoanthropological Nationalism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1(2001): 95-124。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详细叙述了萨特曼（Barry Sautman）的论点并做了评论。

著作中的典故编织在一起。古代文本把人类社会追溯到诸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这些对文明创造作出重要贡献的远古人物。1950 年与 1951 年的历史课本将北京猿人化石和这些传说人物放在一起介绍。①传说使得这些骨头有了血肉，提出了“我们的祖先”如何生活的概念。这些课本也强调这些传说人物的故事情节充分符合现代的历史知识。“根据进化的一般规律，人最初生活在树上，然后发明了火，捕鱼、打猎，饲养动物，最后开始农耕。这与有巢氏、燧人氏、犕羲（也称为伏羲，渔猎的发明者）以及神农氏的故事大体一致。”②

关于人类进化的通俗书籍和课本一起利用名著为中国创造了中国历史。根据刘易斯·亨利·摩根（Lewis Henry Morgan ）和恩格斯的著作，1952 年一本关于人类进化的书籍利用有巢氏、燧人氏以及伏羲描述了早期人类社会组织的转变。有巢氏过着平等主义的生活，所有的社会成员与他人分享劳动成果。在燧人氏时代，男性打猎，女性采摘果实，每个团体和其他团体分享劳动成果。伏羲时代进入母系社会，有了更复杂的生产关系，但还没有私用财产。③另一本书则花费大量篇幅引述了古书《礼记》中关于远古人类穴居与茹毛饮血的描写。④

没有比因北京猿人化石下落不明而引起的激动和失落，更能使人类进化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关切的事情。1941 年，化石在为了安全保护而送往美国的途中不见了。1950 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作者谈到化石的丢失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人民财产’的巨大损失”，暗示美国策划了“邪恶的阴谋”，心怀“野心”劫掠了这个珍宝。⑤1950 年和 1951 年发表的报纸文章提出了更明确的控诉。《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纽约时报》和全世界的其他报纸都详细报道了这个指控，即在裴文中的帮助下，丢失了的北京猿人化石被秘密收藏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① 中国历史研究会：《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新华出版社，1950 年；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1950）年。

② 例如，中国历史研究会：《高级中学中国历史》第一册，第 5 页。这种叙述按照徐旭生提出的步骤进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和增补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1943）年。

③ 杨叶：《我们的祖先》，第 25~28 页。还见于贾兰坡：《中国猿人》，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24 页。

④ 方且：《从猿到人》，第 70~71 页。官方的历史教师手册特别规定这样利用《礼记》举例说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的转变。Joseph R. Levenson, “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Communist China” , in Albert Feuerwerker,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8), 60.

⑤ 方且：《从猿到人》，第 79 页。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e History)。[1]这些声明在中国有现成的相信者。中国公众已经对美国非法收集许多文物感到愤怒。[2]反美运动营造了政治气氛，在这种氛围中，这种情绪能够变成持久的愤怒。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人民共和国继续出现广泛的反美控诉。1956 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1953 年建立）的参观者经常在来宾留言簿的意见中强调这个问题。一位来自建筑科学研究院（th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的参观者怒斥到："我们看了许多化石，但没有一个是最初的、真正的化石。日、美帝国主义用卑鄙的办法偷盗了所有最初真正的化石。这些化石都属于中国人民；我们应该要求帝国主义偿还这笔债。"[3]另一位来自人民解放军的参观者写道："在参观期间，我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看到模型，不能看到实物，因为它们被美国人劫走了。这使我对美帝国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事实上，我们应该在全世界面前斥责他们偷盗文物的罪行。"[4]1961 年发行的一部电影剧本把"偷盗"化石作为它的主题，题目为《国恨家仇》(Nation' s Vengefulness, Family' s Enmity)。[5]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为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感到痛心，但是这对科学的损害与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损害相差甚远。正如 1946 年一本中国的科学杂志预言的那样，30 年代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制造的精美石膏模型以及魏敦瑞的详尽描述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的需要。[6]当今一位中国古人类学家解释说，"北京猿人化石的丢失是非物质的损失，是精神损失"，而不是科学损失，"因为它们已经被研究的非常仔细，几乎不可能再发现新的、非常重要的信息。"[7]人们之所以十分关注失踪了的化石、特别是所谓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是因为这种"非物质的损失"所具有的特别意义："非物质的损失"这个词激发出了这样一种相关的民族感情——北京猿人化石代表

---

① 有许多描写寻找失踪的化石的著作。1952 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驳斥了新近来自大陆的要求，暗示苏联从中国拿走了化石。见魏鞠宪（音译）：《北京人的下落》，香港：说文社，1952 年。新近研究这个题目的著作是李鸣生、岳南：《寻找"北京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年。关于这个题目在中国最著名的英文书籍 Harry L. Shapiro, *Peking Man*(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沙毗洛（Shapiro）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物理人类学家，因此对揭开这个谜有个人兴趣。

② See Cheng Te-k' un, "Archa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in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53.

③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来宾留言簿，1956 年 4 月 19 日（以下引用为周口店来宾留言簿）。不幸的是，看来只有 1956 年的留言簿保留下来。以后的留言簿只有名字和日期，没有评论。

④ 周口店来店来宾留言簿，1956 年 6 月 29 日。

⑤ 王遂汉（音译）：《国恨家仇》，载《电影文学》1961 年第 5 期，第 18~33 页。

⑥ 这篇文章特写谈到，"虽然真的没能发现北京猿人化石，但是人们不会认为这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大博物馆都已经有石膏模型了。"季智（音译）：《北京人头骨下落不明》，《科学知识》第 1 卷第 2 期，1946 年，第 42 页。

⑦ 采访作者，2002 年 10 月 8 日。

了中国人民的祖先。

国际社会主义："全世界是一个人种"

那些在人民共和国初期撰写人类进化普及读物的作者们，一直十分艰难地平衡着各种互相冲突的影响与重点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彼此敌对的民族主义范式和国际主义范式。一个世纪的反帝斗争在朝鲜战争时达到高潮，人们普遍坚信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对于保护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与苏联的关系，当时中国成为一个推崇国际主义、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大团体中的一员。根据国际社会主义的话语，在全球压迫"有色人种"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致力于传播国际社会主义解放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中，中华民族本身居于次要地位。

关于人类起源的教育材料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极好的结合点。非社会主义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充斥着为帝国主义进行的公开辩护，其所依据的是种族生来不同与不平等。另外，马克思、特别是列宁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又令人信服的描述。有这样容易的目标和现成的武器，苏联和中国的作者们在他们关于人类起源的叙述中轻松地演习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由于朝鲜战争的反美政治，人民共和国早期人类进化著作的作者们加大了力度抨击人类学中的帝国主义论调。人类进化著作有时会挑选美国的人类学著作作为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特别劣迹。例如，一位作者于 1950 年指出，人类学最糟糕的例证就是 1900 年出版的美国书籍《黑人野兽》（The Negro a Beast）以及当时刚出版不久的美国人欧内斯特·A. 胡顿（Earnest A. Hooton）关于人类起源和种族的著作。①讽刺的是——也许是更加荒谬，这些批评的主要目标之一不是别人，正是魏敦瑞。即使北京猿人当时正在获得中国人祖先的地位而魏敦瑞又曾大张旗鼓地捍卫这一点，但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却抨击为美国帝国主义的象征。

更讽刺的是，魏敦瑞作为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不同于他指责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人类学家。逃离德国后，魏敦瑞只在美国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战争迫使他离开中国后他才不得不回到美国。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与臭名昭著的多地起源说不同。他明确抵制早先提出的人类多地起源理论，该理

① 方且：《从猿到人》，第 7~8 页。Charles Carroll, *The Negro a Beast*(St. Louis, Mo.: American Book and Bible House, 1900).

论认为现代人类种族来源于不同的类人猿（“黑人源自大猩猩，蒙古人源自猩猩，白人源自非洲的小人猿”）。[①]在魏敦瑞的解释中，所有的人类都源自一种类人猿，变种混交使得人类种族在整个进化历史中保持着单一的种。然而，由于种族问题被赋予了政治敏感性，这两个理论很容易被混在一起。

魏敦瑞和贾兰坡之间有深厚的师生关系，这可能说明了为什么贾接受他的北京猿人是现代人类祖先的结论。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以前见到的，1950年贾也否定了魏敦瑞的种族连续性理论。然而，即使贾兰坡对魏敦瑞有这样的批评，裴文中在为贾的著作撰写绪言时还是表示担心贾会吸收魏敦瑞的观点并因此受到唯心主义的毒害。裴策略性地建议贾在为第二版进行修订前多读马克思主义哲学。[②]到1952年，贾兰坡已经意识与他的外国老师明确拉开距离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用人类学的观点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的文章中，贾公开批评魏敦瑞是现代种族有不同进化起源这个观点的代表。[③]

1950年出版的《从猿到人》一书的作者方且，在他1951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一书中，进一步把对魏敦瑞的批评和中国国内大汉族沙文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根据方的论述，魏敦瑞宣称北京猿人是“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与过去中国人中流传的一个观念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他们是黄帝（传说中的中国统治者）的后裔”。方且指责说，这个观念的吸引力在于人们认为黄帝征服了苗族领袖蚩尤，于是颂扬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方继续谈到，实际上，认为中国人是黄帝后裔的观点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辩护，是为颂扬大汉族沙文主义而树立的错误的、趾高气扬的石碑”。然后，他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当前生活在中国的多民族长期交往史的论述，也提到了斯大林的话，大意是“民族不是由单一种族构成的共同体。”[④]对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合成更大的“中华民族”这一看法的这种强烈坚持，反映了国家要获得这些民族的忠诚并因此严密维护以前中华帝国版图的努力。[⑤]有趣的是，这个新的中国民族主义计划从对旧的汉族“沙文主义”的抨击中获得了力量。

作为一个整体，对魏敦瑞与古人类学中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批判，成为

---

① Weidenreich, *,Apes, Giants, and Man*, 24.
② 贾兰坡：《中国猿人》，第2~3页。
③ 贾兰坡：《用人类学的观点看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手段》，载《科学大众》1952年第5期，第110页。
④ 方且：《中华民族的儿女》，上海：上海编译出版社，1951年，第3~6页。
⑤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见，June Teufel Dreyer,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Ralph Litzinger, *Other Chinas: The Yao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Belonging*(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社会主义中国关于人类进化的科普材料所具有的鲜明特征之一。中国作者并不仅仅是要揭露在政治上声名狼藉的外国同行其相关作品中的种族主义；他们还有正面的任务。通常在最后的章节才出现这种批判，该章节被乐观地命名为“全世界是一家(All the World Is One Human Family)”或者这一题目的其他变种。①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览馆播放的一部1959年拍摄的影片，其结尾是一幅有趣的图画，在这幅画中来自不同种族的一群年轻人高兴而坚决地手拉手，画外音解说到，“全世界的人类，无论肤色，无论种族，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过程。”②1954年为青年写的一本书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个观念。当那部电影突出所有人类以往进化的同一性时，这本书以预言他们目前和未来的发展为结尾。作者解释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苏联的许多少数民族遭受压迫、生活简单、文化退步。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迅速发展，现在和最先进的民族处于同一水平。他暗示，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带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希望。③

因此，加入这样主题的著作经常强烈地突出国际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对人类起源的解释。但与此同时使用《礼记》这样典型的中国资料，加之越来越将北京猿人当作中国人的祖先，却是服务于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目的。对这个明显的矛盾，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对这种奇怪情况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作者们根据不同人群的权力关系而以不同的标准加以衡量。因此，从中国人观点来看，西方帝国主义控制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而考虑到中国少数民族时汉族人控制的民族主义是有害的，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而受尽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中华民族来说，它的民族主义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十分恰当的。

1950年代初中国的科学和意识形态

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统治最初时期的“第一课”是“从猿到人”的故事这一点来说，人们不应该再为此感到惊讶。人类进化作为一个令人惊讶的解放与转变的故事，并不仅仅适于革命胜利时期；对新领导人来说，全体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至关重要的。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可以理解为给马克

① 见例如，林耀华：《从猿到人的研究》，第149页；黄维荣：《中国猿人》，第33页；裴文中、贾兰坡：《劳动创造了人》，第16页；裴文中：《人类的起源》，第11页；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第73页。

②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国猿人》，1959年。

③ 黄维荣：《中国猿人》，第35页。

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添加了序幕。此外，它还为批判唯心主义、特别解释人类起源的创世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武器。恩格斯否定了“上帝创造人类”，取而代之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类”。在用科学世界观取代宗教世界观的努力中，国家在科学家中发现了既有的拥护者，他们把“劳动创造人类”和化石证据融合在一起，为不同的读者打造出各种各样的教育读物。

对于那些国家认为对宣传是十分重要的概念来说，恩格斯关于人类进化的看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强调这些概念。将劳动定义为人类的本质，就是赞扬了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劳动阶级。另外，一个曾在过去存在的和谐无阶级社会，还有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这对部分对立的不同侧重点，都在关于人类起源的科普读物中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国家手中，科学是强大的工具。以古人类学而言，从1949年革命后不久国家就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普及它，就对它的政治效用略见一斑。此外，国家认为人类进化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允许其他解释的存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见证了人类进化论正统学派日渐僵硬，而被认定为异类的理论和解释遭到了批判与审查。清除的目标特别瞄准了关于人类进化的创世论、唯心主义和帝国主义解释。这次清除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种审查和政治干扰手段在民主社会中都是被公开拒绝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古人类学中的所有上述创世论、唯心主义与帝国主义论调也遭到了20世纪中后期全世界的科学家强烈批评和鄙夷。①现代综合进化论应当会认为，刘咸的进化模式缺少对物质力量的关注。

此外，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科学进行宣传，并不是无视科学本身是一种追问的经验主义模型。宣传家之所以关心科学，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有效地把政治真理转变为“自然”，宣传家特别偏爱对国家的各种政治重点有帮助的科学理论。但是，他们也认为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可以把人们从意识形态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并进行批判性思考。在这一点上，科学家和党的官员再次有了共同利益。科普读物强调经验主义证据在证明人与类人猿之间进化关系方面的重要性。虽然在这种文本中恩格斯是无可争辩的权威人物，但他很少单独宣讲他的理论。作为使读者相信人类进化事实所需的证据，化石、解剖学、胚胎学、人与类人猿的行为比较轮番出现。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科学问题会被公开宣布因缺少证据而悬而未决。即使是明确的政治利益面临风险时这一点也是真实的。例如，虽然中国作者们偏爱人类的亚洲起源多过非洲起

① 我并未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不会发生审查和政治骚扰，但是这种行为通常会遭到反对，法律会限制它的影响程度。

源，但是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这个问题不能定论。[①]

当科学普及成为早期人民共和国整个图景的一部分时，后者看起来有些不同。意识形态是新国家至关重要的优先问题之一，这一点并不是新的发现。鲍大可、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怀默霆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较早研究都凸显了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教化”的重要性。[②]但是这些研究中的典型缺憾是缺乏关于意识形态输灌的细节内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文章是激发新思想的丰富源泉。虽然“劳动创造人类”被用做攻击敌对思考方式的棍棒，但它也有助于使数百万人了解进化理论以及经验主义证据在解决世界问题中的价值。一位在1956年参观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作家协会成员给这第一课下了定论。毫无疑问而且可以理解，主教欧克澜会把访客的评论当作意识形态教化的证据。但我认为，无论如何，我们还能够辨别出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的真正启示：

> 这次参观特别有意思义。在1949年一次干部班上，我听一位教授关于“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那时，我心中充满了疑惑。人怎么能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呢？理论不能证明社会发展的历史。只有事实让我由衷的佩服。我们祖先的化石这一铁般的证据告诉我，“劳动创造了人类”。从此我不再怀疑。从现在起我将更积极地参加各种劳动，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充分利用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产。[③]

郭又新 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① 见例如，朱洗：《我们的祖先》，第146页；贾兰坡：《中国猿人》，第11~16页；黄维荣：《中国猿人》，第29~32页；方少青：《古猿怎样变成人》，第91~92页。

② Barnett; Lifton;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Whyte.

③ 周口店来宾留言簿，1956年6月22日？。（原注如此——译者注）

回忆与口述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当代中国史研究

沈善炯院士访谈录

——《我的科学生涯》补遗①

熊卫民　访问整理

受访人：沈善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善炯家

受访人简介：

沈善炯（1917年～），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当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鉴于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

① 本文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编号：KACX2-YW-001）资助。

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7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思想改造”运动

熊卫民（下文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①]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下文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遭遇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

① 沈善炯：《我的科学生涯》，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1年。

“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①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生“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的，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②、王仲良③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④、罗时钧⑤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受尽了欺骗，你们回去尝尝味道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

① 罗宗洛（1898~1978年），植物生理学家。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② 李亚农（1906~1962年），历史学家。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建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③ 王仲良（1899~1974年），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他任办事处中共党委书记。1957年，他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载《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

④ 赵忠尧（1902~1998年），物理学家。1930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⑤ 罗时钧（1923年~），空气动力学家。1950年从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职。

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呆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成一派，以至那留洋回国的也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剧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在后面一直跟着。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也许就有了特务嫌疑。

“批判胡适”运动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接触到的人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

缘听他的课。复员[①]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②]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青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③]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

①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回归原址。

② 张景钺（1895~1975年），植物形态学家。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③ 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年），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一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反胡风”运动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上课完了之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跟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么？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批判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反右派”运动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1]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2]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之一为，在“反右派”运动时，他不同意把科学家划为右派，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3]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

① 张劲夫（191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副院长。

② 柯庆施（1902～1965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③ 黄鸣龙（1898~1979年），有机化学家。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①]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②]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

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

①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干部巴延年、桂世茂亦支持沈善炯的回忆，而不赞成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一文（载《党史纵览》2003 年第 9 期）中的有关说法。见巴延年等：《政治风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 年 4 月（上半月期）。

② 邹承鲁（1923~2006 年），生物化学家。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大跃进”运动

熊：“反右派”运动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使人们不再敢讲真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①]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自己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②]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困难时期、广州会议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大饥荒——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

① 殷宏章（1908~1992年），植物生理学家。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② 植物生理所研究员朱家璧（1935年~）也曾于2008年7月向笔者谈及此事：“罗先生是很耿直的。说出自己的观点后，他遭到大批判。党总支召开全所大会，组织了很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上台去批判他，微生物室也有人上去发了言，不能不表态，还贴了很多大字报。罗先生就坐在台下听，他骨头硬，一直没怎么做检讨。”（访谈稿收藏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 1959 年回国，随后的 1960 年、1961 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 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①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 12 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也。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

① 曹天钦（1920~1995 年），生物化学家。1951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② 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做《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 1962 年 3 月 2 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 1962 年 3 月 5 日。

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要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四清”运动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 1957 年 4 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作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作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 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 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工作队，一道算总账。

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①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

① 朱家璧也曾向笔者谈及此事：“那个时候，他（指沈善炯）跟支部书记陈某谈话很多。我当时心里说，怎么你们每天都有那么多讲不完的话！要知道，因为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我们实验室内，不要说跟沈先生，就是年轻人之间也不怎么闲聊的。同事、同事，真的只是共同工作，不大谈生活的，更不会私下交流对社会上某些事务的看法。万一不小心说出来的话在下一个运动时被告发出来了呢！但沈先生和陈某不一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相当融洽。陈某是专职的行政干部，不搞科研，平时她对贯彻沈先生的意图是十分积极的。我们从来没想到陈对沈有那么多的‘意见’……我猜测，她之所以突然揭发沈先生，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嗅觉。她是搞政治的，感觉‘四清’运动的对象可能包括沈先生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殊党员’。为了‘立功’，为了划清与沈先生的关系，她做出了第一个起来揭发的决定。”（访谈稿收藏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

沈：有位老先生在看了我这本书后说："老沈啊，你少年得志，风头太盛，所以遭人嫉恨。"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1950年回国以来，领导对我相当器重，而我则把精力全都投在科研上，呕心沥血地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果，应当说，我的科学道路一直是相当顺畅的。突然遭此打击，真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我的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熊：对于这个运动，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沈：完全没有。此前他们曾叫我去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根本就没听，脑子里都想着科研工作。

熊：您的自传中提到，"桃园经验"传达一个月。您去听了一个月吗？

沈：是啊，去了一个月，但我的思想一直开小差，什么"四清"、"四不清"，我根本就没听。现在弄到自己头上来，才觉得不对了。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违背宪法、侵犯人权的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汲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许良英先生访谈录①

尉红宁　整理

受访人：许良英（自然科学史家）

访谈人：樊洪业、王德禄、尉红宁（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访谈时间：1990年10月18日上午

受访人简介：

许良英（1920年～），自然科学史家。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先生。解放前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曾负责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1957年因公开反对"反右"运动被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当农民20年。后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科学史、物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爱因斯坦的思想、科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科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是迄今最全面的爱因斯坦思想资料。是《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的主编之一。

到科学院之前的经历

樊：我们请许先生谈一谈初到科学院时的情况，最好是您亲历的事情。您来科学院之前的经历，也希望能做个介绍。

许：好的。先从我个人早期的情况谈起。

---

① 本文受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与编撰"（编号：KACX2-YW-001）资助。

我1920年生，1942年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时王淦昌[①]先生要留我当助教，我没答应。那时我一心要搞革命，想出去找党的关系。

我一生走过的道路很曲折，有过三次大的转折，也可以说已做了三世人。

我在高小、初中时就想做科学家，上大学前，想做个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但那时我也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刚入学时，我在选课单背后的学生调查表中"将来的志愿"栏很认真地填了："当代物理学权威"！以后想想非常可笑。第二学期的志愿填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则改为"追求真理"，以后是"维护真理"，最后一个学期的志愿填的是"做一个人"。那时候很自豪，懂得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了，以前却不懂得。所谓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普通的真正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要干革命。大学四年——实际是三年半，就是这样的思想历程。人生观的根本转变是在1940~1941年，它决定了我的一生。本来是立志搞科学的，结果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这个人本来是个书呆子，凡是书上讲的有道理的，我就信，并要跟着学。当初学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哲学和革命理论，没想到自己真的会干起革命来，因为觉得自己口才差，又没有活动能力。1941年皖南事变激起我的革命义愤，下决心投身革命斗争，要参加党。但那时浙大没有一个党员，就决定大学毕业后到外面去找党的关系。结果去了桂林，找了两年没找到。以后桂林沦陷了，王淦昌先生在报纸上登广告找我，我就于1945年回浙大（当时在贵州）物理系当助教，同时搞地下革命活动，一直到1949年。1946年到重庆《新华日报》解决了入党问题，1947年担任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那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反迫害运动——于子三运动，[②]由国民党杀害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而引起的。随后担任新成立的地下党杭州工委委员。1949年杭州解放后，在中共杭州市青委负责党务工作，后任学生部长。

解放后，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应该继续搞政治工作，应该回到科学队伍搞研究工作。政权机关里的事有些我看不惯，有些党的干部的作风使我感到失望。不过，后来经过"三反"运动，情况有些好转。

---

① 王淦昌（1907~1998年），核物理学家。时为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②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29日，于惨死狱中。惨案发生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向记者披露真相，称此案为"千古奇冤"。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厦门、西安、重庆、广州、长沙、武汉等十余个城市的大中学生为此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调到科学院

许：最近读到《竺可桢[①]日记》才知道，早在1950~1951年间科学院就已在设法调我来，由于浙江省委不同意，未成。理由是，全国刚解放，地方工作吃重，开展工作需要大量干部。1952年1月再进行，直到6月初才获准。那时杭州市委通知我，中央组织部来电报，要我马上移交工作去北京。

樊：您来科学院之前，与科学院有什么关系吗？

许：科学院成立后创办的《科学通报》，[②]从创刊号起，每期都寄给我，同时还寄一些关于科学哲学方面的稿子要我审查。记得有一次寄来一本很厚的稿子，是关于什么宇宙体系的。这部稿子原是寄给毛泽东的，作者说自己创造了一个什么体系，请毛主席审查，党中央办公厅要科学院审查，可是科学院却转给我，让我审查。当时《科学通报》的负责人黄宗甄[③]是科学院秘书处处长，比我早一年从浙大毕业，1945年我们共同创办过《科学时代》，[④]后来他任社长，我在《科学时代》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我原来以为是黄宗甄提名调我来科学院的，最近他告诉我，不是他提名的，只是在1950年他向党组介绍过我的情况。从1952年1月14日《竺可桢日记》[⑤]看来，提名调我的，可能是丁瓒[⑥]和竺可桢。1947年4月我曾在潘菽[⑦]和丁瓒主编的《文汇报》副刊“新科学”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科学分类的论文（用笔名“田由申”）。

樊：科学院调您来，有什么直接需要吗？

许：为什么调我来，1952年1月11日至14日的竺可桢日记中写得很清楚。

---

① 竺可桢（1890~1974年），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1937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② 创刊于1950年，初期为中国科学院的机关刊物。

③ 黄宗甄（1951年～？），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9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时任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后任编译局编译处处长等。

④ 创刊于1946年1月，由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进步青年主办。

⑤ 该日竺可桢日记记载：“八点半至院。余与郭院长谈《科学通报》编辑非加强人力则不能胜任，并告以昨日晤龚育之结果，又推荐前浙大物理系毕业生许良英来编译局，许系共产党员，丁瓒亦知其人，早已接洽，许愿来，（党）部亦通过，但浙江省不肯放行……”见《竺可桢日记》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40页。

⑥ 丁瓒（1910~1968年），心理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

⑦ 潘菽（1897~1988年），心理学家。时任南京大学校长。

1952年1月10日，龚育之[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脱离政治倾向。在此以前，陆定一曾写过一封信给郭沫若，指出科学院出版物政治上的错误。陆当时是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郭沫若，但实际管事的是陆定一）。这样，科学院几个院长搞得很紧张，想找个人在政治上把关。郭沫若本来想找龚育之，但竺可桢去了解后，知道龚育之大学刚念了三年，在家养病，所以决定要调我。

樊：您到北京后，科学院最早和您接触的是谁？

许：恽子强。[②]我是1952年6月22日（星期天）到北京的，先到中央组织部报到，住在前门外煤市大街中组部招待所。第二天一早，科学院党组书记恽子强来接我到科学院。恽子强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朴实、憨厚，穿着一身褪色的干部服，坐着一辆破旧的小轿车来，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官架子，完全像一个年长的学者。他告诉我科学院所以要通过党组织调我来，是要我为科学院的出版物把政治关，并且具体负责《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因为中宣部和《人民日报》接二连三地批评科学院出版物，特别是《科学通报》的政治错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应付不了。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工作。我问他党中央对科学院有什么方针？他说没有，主要靠自己摸索，碰到问题，及时向主管科学院工作的中宣部请示汇报。党中央对科学院的工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使我很惊奇。但这个问题一个月后解决了，那就是1952年7月18日陈伯达代表党中央对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的讲话中所宣布的[③]。

恽子强还告诉我科学院几位副院长的排列次序完全是从政治上考虑的。第一副院长陈伯达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第二副院长李四光，[④]他反蒋坚决，靠近共产党。第三副院长陶孟和，[⑤]也比较靠近党。第四副院长竺可桢，为人正直，

---

① 龚育之（1929~2007年），时为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休学养病期间，于1952年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

② 恽子强（1899~196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为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实际负责人，并任编译局副局长。

③ 即《陈伯达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是关于共产党员在科学院的工作中与党外科学家的关系，老科学家与新科学家的关系，第二是关于科学院的工作方向，第三为科学家与爱国主义（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1949-1954》，1955年，第23~34页）。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

④ 李四光（1889~1971年），地质学家。1949年10月即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4月自英国归来。

⑤ 陶孟和（1888~1960年），社会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解放前表现不错，深为浙大师生所敬重，但政治上基本属于中间。最末一位副院长是吴有训，[①]科学院刚成立时只让他当近代物理所所长，一年后才让他当副院长。他过去历史上有点问题，在西南联大时，反对过学生运动，解放前一两年他的态度转变了。恽子强还告诉我，因为科学院的出版物受到中宣部批评，科学院党组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编译局。编译局是科学出版社的前身，局长杨钟健[②]是老科学家，不太管事。恽子强从原来办公厅副主任任上调到编译局任副局长，同时还把近代史所的刘大年[③]也调来当副局长。刘大年当时是科学院党支部书记，负责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党组书记[④]和党支部书记都调到编译局，可见当时编译局所受压力之大了。那时科学院的党员一共只二十几个。恽子强告诉我，这些人大多不懂科学。少数懂科学的，过去主要搞业务，没有搞过群众运动，缺乏政治锻炼，因此，政治上比较弱。政治上比较强又懂业务的，要从地方上调来。我是第一个从地方调来的党员。他要我提出可以调来科学院的党员名单。我提了十几个人，除了几个在北京市和军队系统的以外，1952 年 9 月以后他们都陆续到科学院来了。他们是：周志成、[⑤]范岱年、[⑥]王来棣、[⑦]吴洵高、任知恕、[⑧]过兴先、[⑨]薛禹谷。[⑩]我还在名单中列了张劲夫[⑪]、顾德欢[⑫]。

---

① 吴有训（1897~1977 年），物理学家。1945~1948 年曾任中央大学校长。

② 杨钟健 (1897~1979 年)，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49 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伊始，即任出版编译局局长。

③ 刘大年（1915~1999 年），历史学家。1951 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中共党组成员、机关党支部书记。

④ 文中此处“党组书记”即指恽子强。但恽为院中共党组实际负责人，迄今未见过其党组书记正式任命的有关资料。

⑤ 周志成，1943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0 年代曾任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

⑥ 范岱年，出生于 1926 年，194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调到科学院后，负责《科学通报》编辑室的工作。后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

⑦ 王来棣，出生于 1926 年。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曾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总支委员。1952 年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⑧ 任知恕，1924 年 10 月出生。1952 年底技术干部归队时，由杭州市政府调至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局长等职。

⑨ 过兴先，1915 年出生，193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艺系。1954 年由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调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工作，后任学部副主任等职。

⑩ 薛禹谷，1923 年出生。194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54 年由浙江省农业厅调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⑪ 张劲夫，1914 年出生。解放后曾任中共浙江省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杭州市副市长、浙江省财委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等职务。1954 年 9 月调任国务院地方工业部副部长，1955 年 1 月起兼任地方工业部中共党组书记。1956 年 3 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书记兼副院长。

⑫ 顾德欢，1912 年出生。解放后曾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等职务。1956 年 8 月调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备电子学研究所。后任该所党委书记兼所长等职务。

樊：都是从浙江来的吗？

许：是的，除了张劲夫、顾德欢以外，都是浙大毕业的地下党员。顾德欢当时是浙江省交通厅长，我知道他在山东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念过，解放前是浙东区党委书记，打过10多年游击。

樊：张劲夫是财政厅长吗？

许：不，张劲夫解放初期在杭州市当过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不久任浙江省财经委主任），我们办的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请他做过报告。我觉得他对知识分子很有感情，能很好掌握党的政策。张劲夫和顾德欢都是1956年才调来科学院的，我从未同他们有过个人接触。1979年我才认识顾德欢。

政治把关和黄昆的书稿

樊：为出版物把政治关，当时政治上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许：恽子强交代我，政治把关就是要掌握三个问题：立场，观点，保密。立场是指政治上是否反共反苏；观点指是否反对马克思主义；保密是指是否泄露国家机密。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经我审查签字后才能付印。还有一些书我去时已印好了，但还未发行，也要我审查，有问题的，立即卡下来，改为内部发行。我觉得这项工作政治责任太大了，什么都要我审查。那时我才32岁，而科学业务已荒废了很多年。后来我因忙于《科学通报》工作，这个政治把关工作就让吴洵高去做。

我到编译局上班的第一件工作是审查一部英文稿子，是黄昆和马克斯·玻恩（Max Born）合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是在英国开始写的，1951年黄昆回国，继续把它写完，准备寄给波恩。但当时政务院规定，所有寄往国外的科学论文和专著稿件，都必须送交科学院审查。黄昆的稿子送到科学院已多日，一时找不到人审查，我一到就碰上了。我花了5分钟翻阅一下，认定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著作，觉得这样的专门著作也要审查，未免可笑。于是在便纸条上写了处理意见：此稿不存在立场、观点、保密问题，应尽速放行。鉴于马克斯·玻恩是国际知名的大物理学家（当时还未获诺贝尔奖），此稿除送国外出版外，国内也应争取出版，这是我国科学界的光荣。恽子强看后，马上让人把书稿送走，他们觉得我这人干脆，敢于负责。

那时一些“兄弟国家”（苏联、东欧诸国、朝鲜）的科学家常常通过驻华使馆送文章给《科学通报》要求发表。我发现，其中有些文章有明显的原则性错误，发

表时我做了删改。如当时在苏联红得发紫的女生物学家勒柏辛斯卡娅1952年给《科学通报》的专稿[①]中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不能有巨大的科学发明的，是不能进行重要科学研究的”。这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历史事实，难道牛顿和爱因斯坦是依靠马克思主义来进行科学探索的吗？发表时，我把语气缓和一下，把两个“不能”改成“很难”，1953年春，我通过党组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反映这类问题。想不到中宣部在批复中竟把我训了一顿，说这些文章原意没有错，是我理解错了。我准备写回信反驳，郁文[②]表示支持，秦力生[③]（当时代理党组书记）则劝我忍耐些，说硬要去顶撞，会把领导关系搞坏，科学院党组就难以工作了。我只好忍着。

《科学通报》

樊：除了这项工作外，您还做别的什么工作？

许：另外是负责《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科学通报》是科学院的机关刊物，是当时科学院用以指导全国科学工作的工具。1950年创刊，主要反映全国科学工作的进展和成果，推动科技人员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苏联。为了加强科学通报工作，我建议成立科学通报编辑室。编辑室于1952年10月成立，主任是副局长刘大年兼任。但他是搞中国近代史的，不懂自然科学，基本上是挂名性质。所以每次室务会议都由我主持，每期稿子的审定也都由我负责。

樊：刘大年是主编吗？

许：不是，《科学通报》一直没有主编，当时有个编委会，恽子强是主任，刘大年和我都是编委。由于刘大年是室主任，有些问题要向他汇报，每期目录要请他过目，他很少有什么意见。

樊：《科学通报》与《自然科学》合并的情况您了解吗？

许：《自然科学》是全国科联[④]（科协前身）的刊物。1952年我到科学院前一个月，《科学通报》与《自然科学》合并了，实际上是把《自然科学》停刊了，他们

① 详见 O·Б·勒柏辛斯卡娅《祝为和平造福的科学繁荣起来》，载《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第609页。为该期特稿。

② 郁文，出生于191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院中共党组成员。

③ 秦力生（1915~1993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院中共党组成员、院机关党总支书记。

④ 即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的一些积极分子，像沈其益、[1]张青莲、[2]葛庭燧、[3]胡为柏、钟士模、[4]马杏垣[5]等都成了《科学通报》编委。他们只是在开编委会时提些意见，作用不大。

樊：您了解当时党组的情况吗？

许：我到科学院不久就经常列席党组会议。当时会议的主题是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0月，党组要我搬到东厂胡同2号（现在的3号）科学院第六宿舍来住。当时党组书记恽子强、副书记丁瓒、办公厅副主任曹日昌[6]（党员心理学家）以及汪志华、[7]保卫科长赵龙奎都住在那里。范文澜、刘大年住在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家比较宽敞，党组会经常在他家开。1953年开始，党组成员全部换了，[8]会议都在院部开。1953年上半年党组书记由秦力生代理（张稼夫[9]参加了访苏代表团），1953年下半年至1956年张稼夫是党组书记。

思想改造运动及整党

樊：您到科学院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吧？

许：是的。我在地方上刚参加过"三反"、"五反"运动，思想很"左"。刚到科学院时，觉得科学院不像"解放区"，没有什么政治空气，以后也就慢慢习惯了。科学院的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并不厉害，比较稳，不像大学里出现了许多过分伤害科学家自尊心的事。那时我和关肇直[10]共同负责编译局和图书馆的思想改造。我们先自己检查，然后大家提意见。关肇直讲他燕京大学毕业后校长司徒雷登推荐他去美国留学，他拒绝了，后来去了法国。他自我检查后，就有人问他："你不去美国是什么动机？"我一听很恼火，"不去美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人家交代有什么不良的动机？"那时大家都很"左"，都检查自己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狠

① 沈其益（1909~2006年），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自然科学》合并前为该刊主编。
② 张青莲（1908~2006年），无机化学家、教育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③ 葛庭燧（1913~2000年），金属物理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④ 钟士模（1911年～？），电机工程和自动控制工程学家。时为清华大学教授。
⑤ 马杏垣（1919~2001年），构造地质学家及地震地质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⑥ 曹日昌（1911~1969年），心理学家。时为院党组成员、办公厅副主任。
⑦ 汪志华，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共党组成员、计划局一处处长。
⑧ 原党组成员范文澜、恽子强、刘大年仍保留。
⑨ 张稼夫（1903~1991年），1952年底由中共中央西北军政委员会调至中国科学院任中共党组书记，后兼副院长。
⑩ 关肇直（1919~1982年），数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处长、图书管理处处长、图书馆办公室主任等职。后任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等职。

狠地批判所谓“崇美、亲美、恐美”思想。

樊：科学院搞得比较稳，是不是有特殊的政策指导？

许：有。这与乐天宇事件有关。我到北京前一两个月，中宣部和科学院党支部公开批判了乐天宇，并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乐天宇原是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馆长和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对教授和科学家十分粗暴，震动了科学界。这使中央意识到，思想改造运动不可过分伤害科学家，要求共产党员不可对党外人士无礼粗暴。1952 年 7 月 18 日，陈伯达代表党中央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所作的思想改造运动报告就定了这样的调子。

陈伯达说他这个讲话的要点是经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个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都看过的，表明他的意见是代表中央的。这个报告最重要的是确定了科学院的工作方向：“科学院的大量工作应该服从人民迫切的需要”。同时说明，有少量工作可以不同国家建设任务有直接关系。这个精神我觉得不错。其次是介绍列宁的论《统一经济计划》中所说的科学家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与职业革命家不一样，他们是通过自己那门科学的实际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个讲法和过去不一样。还说讲空话的共产党员几十个、几百个也不及一个实干的专家，批评得很厉害。但陈伯达的讲话中也有两个问题，当时不觉得，现在觉得是错误的。一个是他批评理论脱离实际时，举无土栽培研究为例，他说有些植物学家把作物放到水里栽培，作物脱离土壤就是脱离实际。他这是没有眼光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批评陈寅恪。在科学院党组会议上我知道陈寅恪解放时在岭南大学，有人劝他去香港，他不去，这一点表现很好。但他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或是给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明显表示他“抗拒思想改造”。于是陈伯达在报告中有意点名批判他，说他研究唐史是最出名的，但他考证杨贵妃进宫前是不是处女，是理论脱离实际，毫无价值。[①]

在陈伯达讲话以后，科学院又请了李富春[②]副总理和十来个部长作专题报告，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情况和计划，以供科学研究工作怎样联系实际作参考。这种正面阐述，对科学家有启发作用。

---

① 陈伯达报告中并未点名批陈寅恪，原文为：“我听说有些科学家想在个别枝节的题目上‘追求达到和超过世界的水准’，想在某些偏僻的小题目上‘做出一鸣惊人的工作’。我想……”。见《陈伯达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 1949-1954》，1955 年，第 30 页。

② 李富春，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樊：思想改造运动中，有哪些典型人物？

许：张宗燧[①]就是一个。我在党组会上听汇报时听到了这么一件事：张宗燧检查了三次都没过关，第四次检查时，讲到中间，他痛哭流涕。他老婆就起来揭发他，说他在演戏！他在没讲之前，就跟他老婆说：今天我一定能过关，讲到什么地方我就流眼泪。

那时候我思想很"左"，一到科学院就做了一件蠢事。思想改造以前，先由党内领导人作思想检查示范。第一个做检查的是丁瓒。我到科学院时，丁瓒已经作过检查报告，我参加的第一次党支部大会，正是大家开始给他提意见，参加这个会的，除了二十几个党员以外，还有党外的副院长、所长等，共100多人。会议主持人刘大年要我也准备发言，我说我根本不了解情况。他给我看了上一次支部大会的记录。我看了记录，觉得大家的发言都轻描淡写没击中要害。我站起来发言，首先引用毛泽东在"三反"时所说的，要扒开每个共产党员的皮，看他究竟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然后说"从丁瓒自己的检讨和大家揭发的情况来看，他不像个共产党员，倒像个民主人士。"一说出口，我发觉自己失言了，因为在座的大多数是党外科学家，其中还有我所尊敬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我是无辜得罪了他们。

樊：思想改造之后就是整党了？

许：是的。整党是10月开始的，那时科学院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包括科联、科普[②]的几个党员，秦力生也来了，他担任支部书记，负责领导整党工作。全院的党员分两个组，我是第一组的组长，朱兆祥[③]为副组长。我们每天上午工作，下午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支部还成立政党办公室，范岱年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一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开展得比较好，每个人都认真地检查自己，相互批评也很尖锐。到最后处理阶段有两人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出党，有三四人因思想觉悟低，被"限期提高"，这相当于留党察看，但不算纪律处分。像关肇直、吴新谋[④]都受此处理。关肇直以前党内开会，他老在底下看自己带来的书，不关心政治。以后他改了，但又有些矫枉过正，显得有些"左"。

刚开始整党，科学院组织访苏代表团，出国前先集中学习。本来丁瓒参加代表

---

① 张宗燧（1915~1969年），物理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教授，并1951年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

② 即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编者注。

③ 朱兆祥，出生于1921年，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时任全国科联、全国科普中共联合支部书记（新中国初期，科联、科普工作由中国科学院代管）。

④ 吴新谋（1910~1989年），数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团，不参加整党。但我们提意见说他历史有问题，而且作风不太好，怎么能不参加整党呢？胡乔木（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管科学院工作）只好让丁瓒留下来参加整党。那时整党已经结束，支部就集中力量为丁瓒整党补课。结果，他因30年代初在苏州反省院写过悔过书，并参加过反省院“自治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他已于1968年病逝，80年代初得到平反，据说当时党中央是曾允许狱中的党员写悔过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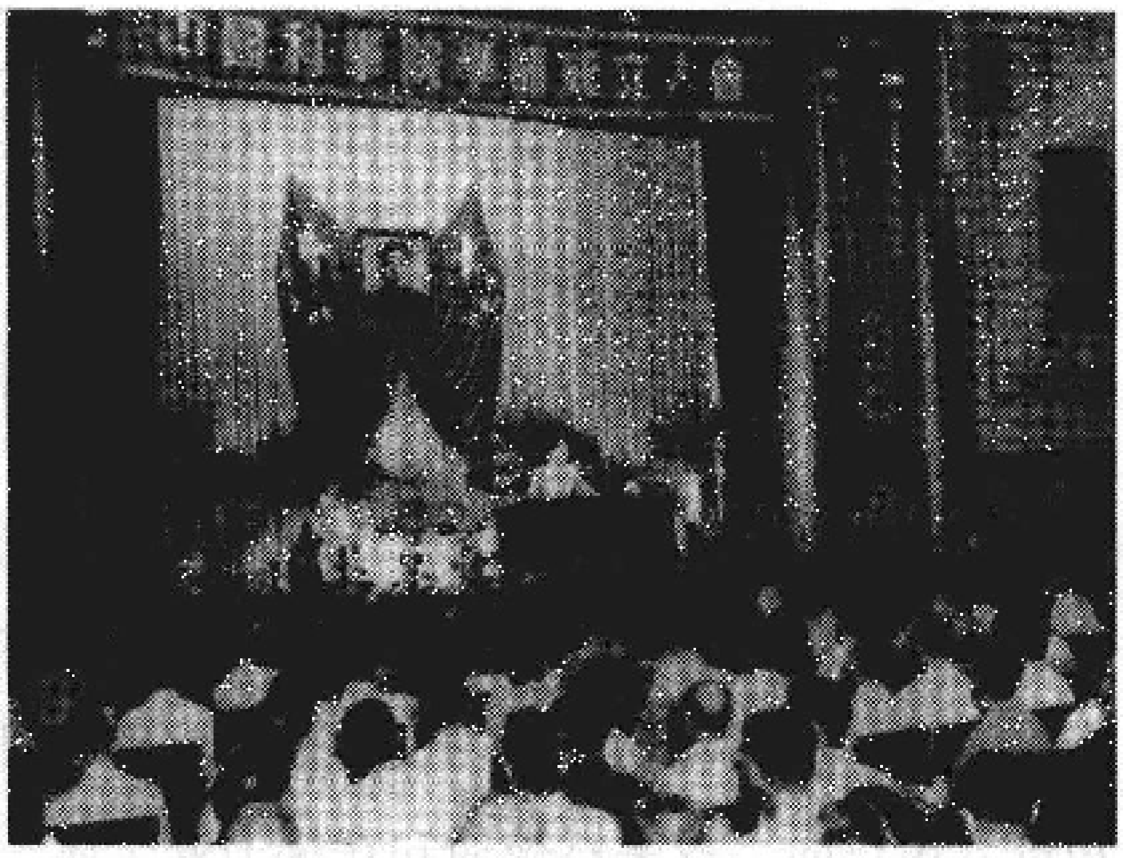
学部成立大会

樊：您后来参加了学术秘书处的工作？

许：1954年1月成立了学术秘书处，我负责的“科学通报室”从编译局转到学术秘书处，我还兼任秘书处党支部书记，并负责对外宣传工作。学术秘书处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当时强调学习苏联主要有四个方面：（1）成立学部；（2）成立学术秘书处；（3）搞全国科学规划；（4）培养干部，建立研究生制度、学位制度。

樊：您能谈谈这一段的事情吗？

许：比较重要的意见是学部成立大会。学部成立大会是1955年6月1日召开的，开了10天。会务工作主要由秦力生（大会副秘书长）和郁文（大会秘书处主任）负责，我担任宣传组长，“科学通报室”的同志大部分都参加了宣传组。



⊙ 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大会，宣告成立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4个学部。图为学部成立大会。

当时代表中央领导科学院工作的是陈毅副总理。大会开始前的一天晚上，陈毅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讲到郭沫若的政治身份问题。他说郭沫若院长虽然不是党员，但他是一个长期与党合作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科学院党组应该尊重他的意见，把他的意见看做党中央的意见。

事实上，据我所知，科学院有关方针、计划、组织、人事、经费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都是先经党组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再由党组书记向郭院长（他通常每周只来科学院工作两天）汇报，然后在他主持的院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作为院领导的正式

决定。从1953年4月到1955年6月，每周一次的党组会议和院务会议我都列席。

那天晚上陈毅的讲话中，曾批评几个对共产党有怨言的科学家，其中有汤飞凡，①说他政治上反共，思想上反动。陈毅刚领导科学院工作时，就批判所谓“白专道路”、“单纯技术观点”，以及“成名成家”和“个人奋斗”思想。他说，凡是对国家有用的专家都是红的，不是白的。从事科学研究，就是要成名成家，我们的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非常难得。

学部成立大会期间，有一天晚上郁文来到宣传组办公室，看见我们都在专心尽力地工作，他感慨地对我说：“你们这里生气勃勃，不像另一个组，那6个组的负责人事事不敢负责，鸡毛蒜皮的事也要请示，真该枪毙！”当时我们科学通报室的编辑有应幼梅、汪容、范岱年、苏世生、管绍淳、叶蒸等，都是工作积极、主动、负责的，思想也很活跃。以后他们转到别的部门，工作得也都很出色。

科学院党组为确定学部委员人选开了很多次会，逐个讨论审定由各部委、各省市党委提出的名单，着重审查其科学成就和政治表现。有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由于某些言论，甚至一件原因不明的事故而长期受到怀疑。如鞍钢总工程师邵象华，②在鞍钢的建设中贡献很大，但在地方上怀疑鞍钢几次事故可能是他搞破坏。这很荒唐，科学院党组的同志不信，结果还是让他当上学部委员。

反胡风运动中受牵连

许：学部成立大会一结束，就搞反胡风运动（后期称为肃反审干运动）。我因为1950年在杭州市曾介绍“胡风集团”骨干方然（原名朱声）入党，成为科学院重点审查对象。在运动初期学习文件阶段，秘书处的学习还是由我负责领导的。7月中旬进入肃反时，我突然被通知在秘书处全体干部学习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我讲了两个下午，无保留地详细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我交代后，无人发言。有一位领导人劈头说我是“两面派”，同胡风集团那些人完全一样。于是我就被作为反革命两面派嫌疑犯受到连续一个月的“揭发批判”。聊以自慰的是，我在科学院三年的工作，未受到任何指责。随后被勒令“停职反省”。第二天党组书记张稼夫找我谈话，态度很诚恳，我比较放心了。一个月后，那位领导人调走了，由秦力生来接替。由于我

① 汤飞凡（1897~1958年），医学微生物学家。时为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兼主任。

② 邵象华（1913年~？），钢铁冶金学家、钢铁工程技术专家。时任鞍山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并先后兼任炼钢厂生产技术副厂长、鞍钢技术处处长等职。

们整党时同一个小组，他对我比较了解，我也就完全放心了。直至1956年5月，我的审查才做了结论。院党委（1954年成立）书记郁文[①]告诉我："这次肃反审干对你有好处，党组织花了很大的力量对你的历史进行调查，调查回来的材料都说你很好，证明你是一贯积极的。"一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就这样静静地收场了。

写作《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

樊：停职期间您干些什么事？

许：先是写检查材料，后写了一份自传和一份关于浙大地下党以及地下党杭州工委系统的详细材料，并接待了几百批外调人员。还为科学规划查阅了有关原子能的材料，去铁道研究所做过一次调查，并为《科学通报》写过一篇社论。后期主要干两件事。一是参加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后改称自然辩证法）12年研究规划的制定，二是为人民出版社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②]

樊：这本书是您停职期间开始写的吗？

许：是的。这是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约我写的。9月间秦力生找我谈话，我问他这本书要不要写。他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当然应该完成。"我说："我还是党员吗？"他说："你怎么不是党员！"他马上写了个条子给秘书处管资料的同志，要他供给我所需要的各种内部资料。1956年1月进行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正要动笔写作时，于光远通知我到中宣部科学处讨论如何着手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的制定。以后两个月我就参加这项工作，并住到西苑饭店。5月回科学院，用了40天时间，写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面三章。第五章是到哲学所后写的。因时间来不及，第四章请范岱年写的。

哲学所一年的自由书斋生活

许：我所以要求调到哲学所，是因为我上大学前就对哲学发生兴趣。1954年科学院筹建学部时，从中南局调来潘梓年（原是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③]负责筹建

---

① 1954年，郁文应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院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

② 1957年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许良英、范岱年著）。1982年在纽约出版英文本 Science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China, M.E.Sharpe, Inc.. 该书是了解中国科技政策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

③ 潘梓年此前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

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在一次讨论筹建哲学所的院务会议上，我向潘梓年建议，哲学所应设一个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组，组长可以请原来学物理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担任。潘老立即接受了我的建议。

樊：您是1956年调到哲学所？

许：是1956年6月下旬。在5月我在审干结论上签字后，就提出要调到哲学所作研究工作，秦力生不同意，他说院里要成立宣传局，要我去负责。我说："我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而适合搞研究工作，我对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很有兴趣。"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给党组，并附了一份我为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写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说明书。那时张劲夫刚调来科学院，接任张稼夫为党组书记，结果党组批准了我的请求。

6月28日，我到哲学所报到，当天于光远就打电话要我第二天下午到中宣部开会。会上于光远宣布我们研究组正式成立。组里共五人：于光远、龚育之、林万和、张乃烈和我。其中只有我和张乃烈（195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两人是专职的。于光远半开玩笑地宣布他的施政方针是：一、官僚主义；二、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实指具体事他不管，只靠遥控；"自由主义"就是大家先读几年书，不规定具体研究任务。当时哲学所在中关村，借用一座宿舍楼，9月搬到大操场西北边的那座灰楼里。以后组里陆续增加了一些人，如：何成钧（兼职）、[1]赵中立、陈步（兼职）、[2]胡文耕等。我到哲学所第一件工作是编《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3]创刊号就是12年研究规划说明书。那时我的确非常自由自在，读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书。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反右"运动，我和赵中立、何成钧、陈步都成了右派分子，于光远和龚育之也岌岌可危。

"极右分子"

樊：您被打成右派是在哲学所？

许：是的。当时要是我仍在院部工作，可能不会被打成右派，因为我根本没有

① 何成钧，时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② 陈步，时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

③ 于1956年10月出版创刊号。《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及其65份专家说明书，在该刊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全部发表。先后由许良英、赵中立、龚育之、孙焕林、傅憬和、胡文耕、赵璧如、张乃烈、查汝强、范岱年等负责编辑，到"文革"时停刊。

·2·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图为《人民日报》刊发的陆定一报告。

所谓右派言论，而且一向“左”得很，一向迷信毛泽东。例如鸣放时，吴传启[①](他是以后给我定案的）等人说：“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领导内行。”我就反驳，认为科学院的主要矛盾是客观任务重，主观力量小；党对科学是外行，但要领导全国的工作，把科学纳入国家建设，这是内行的科学家无法做到的。2月至3月间我听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详细传达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以及随后反复动员“鸣放”的一系列指示。正当鸣放处于高潮，6月8日突然爆发了“反右”运动，说是出现了新的阶级敌人。我思想不通，认为这会使党失信于人民，很可能有人在反对毛主席路线（2月间他就说过，有90%的老干部对鸣放政策有抵触)。于是我以“捍卫毛泽东路线”的忠诚共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公开反对这一运动。于是我就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受到全院批判的右派，被定为“极右分子”。这次运动中，不仅自然辩证法组有4人成为右派，原来浙大地下党员中又有两人（范岱年、周志成）也成为右派，3人（王来棣、朱兆祥、吴洵高）被开除党籍。结果我回到老家当了20年农民，直至1978年才回科学院工作，1979年彻底平反。

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许：1956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那的确特别。

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强调，

① 吴传启，“文革”开始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66年5月，与林聿时贴出大字报，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杨述，揭开该学部“文革”的序幕。

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时又搞科学规划，要在12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号召全国“向科学进军”。5月间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那一年，知识分子得到尊重，心情也确实比较舒畅。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优厚的待遇。例如高级研究人员，每年可以休假一个月，可以到外地休养，如不去外地，每天给伙食补贴3.3元。我就是利用哲学所给我的一个月休假时间，写了《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后一章的。这一年，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汽车公司还为中关村一带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设定时的专线，用面包车接送我们进城，直至东华门。有时人很少，只一两个人也开。这只那一年有，“反右”以后就没有了。科学院中关村服务楼上开了个娱乐部，有牛奶、咖啡，不到一年也取消了。此外，新华书店在锡拉胡同设了一个“外文书籍专家服务部”，里面卖外文原版书和影印书，有沙发座，还有很好的茶喝，招待很周到，但顾客很少。当时的确把科学家当作国家的财富，希望他们把科学知识贡献出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欢呼党的科学政策的。

对几位领导的印象

樊：对科学院早期的主要领导同志，您能谈一谈吗？

许：我可以讲一点恽子强、秦力生、张稼夫给我的印象。

恽子强是科学院第一任党组书记（1949~1952年），在东厂胡同时我们住在一起。他是恽代英的亲弟弟，原名代贤，学化学的，20年代入党，曾被捕过，脱离过党的关系。恽代英牺牲后，他的孩子都是恽子强带大的。抗战前他在大学里教化学，1944年左右到了延安，毛泽东请他吃过饭，担任过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在东厂胡同，他住三间平房，每间只有六、七平方米，总共不过二十平方米，生活非常俭朴，待人诚恳谦虚。竺可桢日记（1949年9月29日）中曾记载他“一身之外无长物”，“可称共产党之代表人物矣”。我很庆幸，一到科学院，就接触到了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和长者。

秦力生来科学院之前是西康区党委副书记，是第一位从地方调来的高级领导干部。他说，我们到科学院士来是伺候人的，我们不懂科学，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科学家，使他们工作得更好。他从不不懂装懂，指手画脚，盛气凌人。他非常敦厚，但又有原则性。1953年他吐血很厉害，医生认为很危险，但他还是坚持上班，有

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1972 年他支持我提出甄别平反的要求，对我说："你哪里是反党，不过是把自己心里想的说了出来！""文革"时说这样的话，是要有很大勇气的。

张稼夫给我印象也不错。他抗战前曾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对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后担任过晋绥分局副书记和西北局宣传部长。他身体不很好，魄力不够大，但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比如在学习苏联问题上，他并没有盲目地"一边倒"。当时来了个苏联专家叫科夫达，当科学院顾问。他原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搞土壤的，知识面很窄，却要指手画脚，说科学院有三个历史研究所，太多了，该合并。张稼夫并没有像许多部门的领导人那样把苏联专家当太上皇，而是给顶了回去。他在一次党组会上说，苏联只有几百年历史，而我们有几千年历史，怎么不可以有三个历史研究所！他对《科学通报》的社论很重视，每次我写好稿请他审查，他都认真仔细地修改。

史料辑录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当代中国史研究

朝鲜战争文献·志愿军战士家书往来[1]

1. 致谢超群[2]

超群哥：

自你离家参军以后，光阴迅速，不觉已数年矣。惟弟体力素弱，又兼咳症，时愈时发，所以对于重大劳动不能经 ×，就要休息。弟现在不似哥哥在家时之幼稚气，朝夕在家勤劳辛苦代 × ×。慈母望哥哥不要挂念家中，安心在军中服务，能为国家为人民尽力谋幸福，就是赐弟之光荣矣。哥哥与弟共勉之，哥哥尽忠国家，弟当尽孝慈母，不愧人生数十年。望哥哥在外保重身体，起居饮食请宜留意，余无后详。此并祝春安，诸同志不另。

弟有德谨上，一月二十一。

超群儿：

你信并军人家属优待证已经查收，知尔在外安适甚慰。吾与尔弟均各如常，希尔勿念。惟吾与尔弟体力薄弱，每年收入不甚宽裕，仅可度时光，毫无积蓄。唯一希望只有望尔在军中安心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尽最大力量谋幸福。抗美援朝，举国一致，希尔能立功建业，享无上光荣。吾虽老迈，经日动点不觉其苦也，勉之，勿负慈嘱。吾乡已经土改完成，外区未动，不久当有妥善办法。吾望尔常常来信，即知尔之进步与安适，余无他言无嘱。

超群儿：接到你由朝鲜最前线的来信，我非常的快慰，在正月里曾传信给你，

---

① 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文件》，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藏。除少数错别字外，基本未做其他改动，以尽可能保持原貌。辨认不清者以×标出——编者。

② 此信寄自安徽省含山县。

你没有收到，想必是邮误了。

家中生活是有点困难，我们住在小城里也没有分到田，仅与你弟有德种点菜园地，蔬菜在家乡也不成钱，现在人人劳动，买菜吃的人少了，但是我们的生活在政府的照顾下，我们是可以克服的，希你也不必挂念。如你能要求上级对我们想点办法，那就更好。

你弟有德在家担任民兵，对工作也很积极，并且每晚还抽空上冬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在新社会里我们一家真正翻身了。

你在朝鲜前线为着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这一伟大的神圣任务，我们一家是多么光荣啊！希望你要格外团结同志们，多出一把力，把美帝赶走，争取胜利早日来临。

以后希望你时常带着胜利的消息来家，这是妈的很大的愿望。

祝你与志愿军全体同志们、朝鲜人民兄弟们健康愉快！

妈手字　四月十四日于含城

有德弟也附笔祝

（第4卷，第56~59页）

2. 致彭修善[1]

修善吾弟：

很久没有接到你的来信，家中很是挂念，不想昨日竟接到你亲笔写的家信，并知道你在部队很好，家中人口都很平安，土改已分到了一石七斗田，田也很好，斗争中又分了几次果实，现在生活过得很好，不像从前愁吃愁穿了，见于你在外面打美国鬼子，我们在家中受到农会和政府的优待照顾，曾经得到了二次优待米。我们在家处处觉得非常光荣的，希望你在部队中努力学习，努力锻炼，好多杀几个美国兵，我们这里也正在展开抗美援朝捐献运动，闹得正起劲，家乡的一些恶霸杀了不少，我看以后我们的日子在毛主席领导下，只有一天比一天更要好，请你安心，不需要挂念家中一切，你的母亲身体很好，她听说你在外面很好，她也喜的不得了。

你上次（正月）写的信我们也收到了，关于你的左手的伤是否好了吗，望你多

① 此信寄自湖北省应山县十里河紫共乡。

多保重，你的舅舅在不久前病死了，我们也帮他安葬了，请不必想念。我们住的地方现在改为应山县十里河区紫共乡第二村第四组，你以后写信就可写这里。我们村里已在立识字班呢，我们也马上能学习文化，你接到信后请写个回信转来。专此祝你努力学习，身体健康。

兄彭修彬上　七月八日

（第 4 卷，第 66~67 页）

3. 致郭树德

吾儿树德：

今来信不未别的事情，因古历 ××××× 收到你的家信一封，我从看信上的言语，咱全家甚是喜乐，合村老少人也都甚是一喜，都说是久日不见信，谁也挂念。再咱家中全家安好，你父母亲身体都康健的，你都不用挂念。生产生活两方面都不困难，不缺吃穿烧，今年年景收成的太好，就是挂你手中无有钱化，你若是无有钱的话，回信说明，就给你捎来，你好化。再者你新嫂子与孙希文他母亲都问你好，再希你见信勿要务必回音，你小弟叫你们照个相片，有空有照，无有空照的话，速来回通信就好。

你父郭桂清，兄长树文（无日期）

（第 4 卷，第 68 页）

4. 致万 × 传

× 传家儿：

自你离家光荣的参军以后，时间也不短了，只接了你的两封回信（连这一次的回信（五月三十号）。在接你第一封信后，家即忙的回信给你，不料你没有接到，仍然退回了，这是地址移动的关系，希你今后回信写明番号及详细地点，并希时时回信，免家二老挂念。家中事务不要你担心，政府照顾非常周到，自土改后分得了田地一石九斗半，又佃种公田六升，现在大小麦都割了，秧也栽了，家最希望你在

外更好保养身体，毛主席说的“健康第一”，并希你要努力学习，好好的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关于你妻在家和你母亲时常发生矛盾，希你再回信时附笔教育她一下，家也时常说服她。关于你在第一次回信时需钱零用，因你地点不明确，连信一并打退回来了，你如再需应用，可再回信搞清地点以便再寄，你能自己写信吗？再回信时谈一下吧！你要好好学习，对文化上有进步，家才更安，你要以实际出发，不要敷衍的学习，再谈吧！祝你进步！健康！

父万才启　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

（第 4 卷，第 70~71 页）

5. 致泽斌

泽斌：

接到你十二月二日的来信，知道你记念着我，现在我的病是完全好了的，只是身体（已 72 岁）衰弱，不能劳动，泽芳是古历九月初四日结婚的，媳妇还好，只是泽芳不大爱劳动，他结婚把我的钱用完了，生活很困难，我们是在今年春天土改的坡上的土放弃了，只有坝上房子田还保留着，田计新挑 18，可产新石 18 石的左右。前信所说哥哥是指的长寿，他出去八年回来，没有照顾，我孃孃身体很好，只是生活困难。你问伍拾万可买多少东西，× 谷子粮食公司牌价上等 × 千十斤，布土小白布需 × 元一个。你去年兑拾贰万在辽宁被没收了。你务须兑钞回来我做生活，你在部队里要好好学习，不要挂念我。长寿他现在分居帽角寨，对我毫无照顾，我只望你靠你供养我，可是切不要为我思想背包袱。祝你思想学习前进。

祖母字，十二月三十日

（信眉批：兑钞一定邮兑，不要装在信封里，来信仍寄在四川省垫江县新民乡后街卢开梅铺内转交）

（第 4 卷，第 73 页）

6. 致王全福①

全福吾夫：

我于八月二三号接着你的回信，并知到你抗美援朝是很光荣而又英勇的，但我在家更是光荣军属，对于生产等均是代耕的。在分得的田地是 × 斗，这是母亲和你我三人共得的，是你在家所耕原来大泉寺杨 × 场，所得田就是这 × 斗。再来分了房屋 × 间，是本村地主王文秀的，全禄弟已经于今二月间与我们分开了。现在我和母亲同住一起，再来接着你的来信说，你随信带了人民币叁拾万元，我并未收到，也不见汇票，只见信中空谈，究竟不知什么原因。此时若收到此款，那就可解决家中大部困难。希速回信说明，把带回款子搞清，以免遗失。在家母亲的身体很健康，请不要挂念，起居一切皆由我全力负责，我在家中是工作生产两不误。你在朝鲜前方必须认真服从上级命令，多杀敌人，保证我们在家过安全幸福日子，并要加强自己文化政治学习，保重自身，我在家要多多增产节约，支援你们。希你在尽前方任务，我在后方尽负后方任务。言不多说，以后再谈。

妻子左上圣［无日期］

（第 4 卷，第 74~75 页）

7. 致云升

云升吾儿知悉：

接到你由六月十八日发来的信，看了之后知你在前防和美国鬼子坚持作战，工作很顺利地进行，同时得知你的身体很健康，精神非常愉快，因此我们全家也都很高兴的了不得。但是因为你时间一长不往家来信，家中当老人的很是放心不下的，并且你的妻子更是昼夜不放心，非常的怀念。所以今后虽在百忙之中，无论如何困难，总是时常设法往家写信，告知你在外一切的情况，以免家中老少的挂念你。近来咱家生产的状况进行的很好，二遍地都快事养好了，再过些日子就可以挂锄了，所有各地的田苗都很茂盛，雨水方面好，下面很调和，生活也很安适，并没有什么

① 此信寄自湖北省大冶县。

困难问题，希你在前防要安心工作吧。至于抗美援朝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大任务，我们必能达到，政府的号召，你所嘱咐我们的话，我们早已了解，对政府尽力的帮助工作所有一切的领导也都能听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给一个光荣的军属争取最后的光荣。我们订立爱国公约，一定要都做到。希你在外安心服务，为祖国，为和平争取最后的胜利吧。别不多示 ×，祝健康精神畅，并希学习进步。

父名不 ×　五二年七月十四日

（第 4 卷，第 76 页）

云升同志：

自从接到你往家送到喜报以后，不觉又是三个多月的工夫，也没有接到你的来信，因此我是非常的挂念，家中老人都是放心不下的，不来信的原因不知道你是忙迫的关系或是你另有别的心情了。咱区和咱村左近有不少的前防同志都转业回家了，我想你参军多年，又是岁数也很大了，也就应该转业回家生产吧，不然的话，把你住兵的地点告诉我知道，不让去我也不能强去，但是常此把我扔在家里，打算怎样呢，二位老人由我在家朝夕事奉，虽是应该尽到的天职，可是所有的一切难处和苦恼的地方也是很多，各种问题你都要替我想想吧。近来咱家老少人口都很平安，时下正忙着开铲头遍地的时候，别多谈，即希你来信言明一切为盼，此致　敬礼

蔡素芳（无日期）

（第 4 卷，第 77 页）

8. 致龚建华[①]

建华吾儿：

你的元月三号的信，收到很久了，因为在土改中，我的事情很忙，所以也未能早一点回你信，你也多等了些吧。这次家乡土改，我家分了二十三亩半地，沙淤都有，房子也得两间，几家合着分了一条大牛，还有农具。又分了两石多粮食，被子

① 此信寄自安徽省阜阳汤口子王小庄。

也分了一条，以后的生活可说要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村下各干部们对咱都非常照顾，因为我是志愿军军属，在咱家是特别光荣的，你在部队要好好的学习，切实努力，好好打美帝侵略军，来答报后方父老待咱家的照顾，和毛主席领导咱们翻身的恩情。

我同你母亲身体都好，你妹妹也上学了，一切都好气象了，我只希说说的，能立点功，咱们就更光荣了，以后常常来信。祝你平安。

父亲　三月十 × 日

（第 4 卷，第 78~79 页）

9. 致世庆

世庆儿：

还是去年八月接到你寄回的军人证明书一件（光有证明没有信），很是盼望的。昨天接到你十二月二十号的信，心中才是宽阔一点也，可心说一切的愁闷一下散开了，现在我高兴，我欢喜，孩子呀，让娘慢慢说给你，听吧。

自你离别，我没有一时把你忘掉，因为你是伪政府时把你逼去当兵。虽然接到你几回信，总记不清你在什么地方，接到你这封信才知道你光荣的参加了志愿军，替人民谋幸福，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我望你坚决意志，扫尽美帝残余，让娘及劳苦大众们过着幸福自由的生活，那才是你真正的光荣，也是娘的光荣。

现在后方的情形，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领导，是大大变了样，老百姓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方面都翻了身，就我们乡的情形来说，去年三月间土改，农民分了土地屋宇耕畜粮食家具，加之去年的年成全 ×，基本上农民生活好转，再没有一个缺衣少粮的人了。去年冬的复查进乡，现在农民又分了大批土地果实（每人一石八斗四升产量），真达到“耕者有其田”。现在我们的乡长是蔡克勤，主任是陈悦星，都是农民出身，总之，真感谢你们同志们的努力。

谈到家庭情形，你也听着。你走时，我不是跟你另住吗？但是你走后，我处处感到不仅年老体衰，也劳动不了。去年三月土改时，我就跟你哥哥合拢了，一切都由你哥嫂照顾生活。虽困难，今后是要好转的。你又有两个侄女（侄儿丢了），全家连你一共六口人。冯正斌种的我们的地完全收回了（计一石五斗收入）。今年又补水田一石八斗，下年的生活根本不成问题，现在政府对家中也有不少的照顾，家

中一切都好，我的身体很健康，你都放下心努力的干别的再说。祝你努力。另外下次写信通讯处可写：湖北竹山县宝丰区秦家乡交冯世杰收

母字，五二年三月九日

（第4卷，第81~82页）

10. 致母亲[①]

母亲大人：

儿自离别家中好几个月了，写有两封信回家，不知大人收到了吗？也不见回儿的信，也不知家中老少安康吗，家庭生活怎样。由其在柳州儿所寄回的军人证明书不知大人收到没有。这几件事真是使儿挂念急了。儿自在柳州的拉甫区训练时，我请求了上级好几次，给我去抗美援朝，上级都不答复我的要求。我想到很是难过，我用手血写了一张请求书，上级看到这情形也就答复了我的要求。我的心里非常的高兴。八月十二日，就在柳州出发，先在柳州上车，直坐了四天四夜的火车，到了武昌。在武昌就过长江到汉口。在汉口住了一天，第二天马上又出发，又在汉口上车，又坐了三天三夜，才到达辽西省绥中县，就在这里休息四十多天……

（第4卷，第83~85页）

11. 李家全家书

父母亲大人膝下：

儿自离别家中以来，都是有信回过，不知家中老少平安吗和现在生活怎样，儿都不得知，真使儿挂念，儿所在柳州寄回的军人证明书不知收到了吗？现在儿自在柳州出发，先在柳州坐上车，直坐了四天四夜到达汉口，住了一天。第二天马上又上车，又坐了三天三夜到达了辽西省绥中县，就在这里休息了四十多天。在这里出以一路平安，身体健康。在四十多天休息过后，又由辽西绥中县上车，直到安东，在安东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又出发……

（第4卷，第86~87页）

---

① 该信寄至广西省柳城县大埔区。

家全胞弟：

七月五日来信已经收到十余天（是八月二十九日收到的），因想等待邮局或政府的汇款通知，才好将用途一并告述你，但至今仍无汇款通知，又恐你部队有移转，所以仍先速回你的信，家乡自去年土改以后，我们家中三十一挑田，四挑山土。今年秋收，产量较好。家中人口尽都平安，你在志愿军工作服务前线，是我们家中的光荣，实在是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希你一条心加紧努力学习和工作，放心不要挂念家里的情形。因为农会和政府各方面都是有照顾的。至于你所兑二十万元，以后收到，如何在生产上开支，又在来信告诉你。假如有其他情形没有汇兑此款的话，你也要来信告知，也免我们悬念。你的部队有变更，通信地点有变换，随时要来信，不要失去音讯上的联络。

特此即祝戎安。

兄家明、家富同启。一九五二年九月八日。

家全胞弟：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朝鲜志愿军回的信，昨天收到，知道你在部队工作很进步，身体已康健，全家人都非常欢喜，望弟加强这种志愿，一条心为革命而奋斗前进，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也是全家人对你的祝望。以后一月两月，切不可拖延到三月之久，还不写信回家。因为你在去年六月寄照片三张和优待证明书的信，收到了以后，就差不多八月之久，没有接到你的来信，你想家里当然是非常悬望。所以望你随时务要与家庭切实联络音讯为盼。还有你写信回来说，带回来的衣服收到没有。总之，除在黄旗坝当面交我长衫二件棉短衣一件和帕子一张共四件和以后你交二哥带回的面巾一张以外，其余完全没有收到过其他任何衣物了。恐怕有错误，究竟是如何的？你可来信说明白，我才好清理。

我村土地改革，在去年农历九月初二日实行征收没收，跟着就改革分配完成。我家共分得了五人三十一挑水田和四挑山土，仍在原石碑塆，原房屋居住，你四嫂在去年九月初五日添了道改儿，所以和你的一份，共分五人土地。家中一切村里农协会是照顾很周到的，我们的工作生产，因为人力够硬，能保证搞好，你在外一切都请放心。现在正在赶修村里防旱的堰塘，来保证今年生产的成功。三反运动现正

展开，其余以后详谈，即祝进步。

兄家明、家富同启。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

（第 4 卷，第 88~89 页）

12. 致刘德辉[①]

德辉吾弟鉴：

自你来信一封现在已经收到了，将信看完，我以全部知道了我是非常高兴，我真佩服你，希你更要加强工作消灭美帝国主义，兄在家加强提高生产支援前线。现在我们母亲玉体健康，精神矍铄，比昔年还要好些。家乡在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现在我们真正彻底翻身了，所分的田土房屋，我真高兴。至于秋收工作完全结束了，我将收的稻谷计算亦有六石有余，至于家庭生活全部解决得了，请弟一切不要挂念家庭。母亲和我与汝侄，假是我们家庭生活和生产有困难，已有村上帮助。至于母亲有我孝养侍奉，请弟千万不要挂念，请你安心抗美援朝，你的功劳十分伟大极了。我物价谈之，现在食米每升价四千元，合作社猪肉每斤贰千四百元，花 × 每斤一千六百伍拾元。外批付么哥之家庭仍在 × 堡坪，家庭人口一切仍是很好。言不再叙，后信再谈。祝你工作胜利。

兄刘怀钦，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 4 卷，第 90~91 页）

13. 致陈生[②]

陈生吾儿如面：

得知于十月十六日得接你九月十八号付回的信，经你弟辅世阅读给我听之后，一切已知吾儿在朝鲜负担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平的重大责务。这是很光荣的，而且我很光荣的做了母亲，我还很希望你在前方奋勇作战，多杀美帝敌人，能早一天将他消灭，我们能早一天相会，共同过着美满快乐的生活。

① 该信寄自四川省 ×× 县。

② 该信寄自广西省容县。

关于家庭中的情况，我再详谈一、二。现在共五口人，我已年老气弱，工作困难，你弟今年添了一个女孩，现正会坐。辅世本年已在家做生产工作，无法再帮森叔做生意，无法向外找到一文钱回帮 ×× 之需。你传兄在洋行被英帝压迫，工价甚低，生活无法维持，所以他亦无法汇款帮助家庭之生活。本年五月间，我地已新造一个粪厕，亦用去四百斤谷左右。因为几份众一个粪厕，很是 × 气，无法积肥。所以粪厕是必要做的。现在我地分到的田是 × 斤种左右，每种约能产谷一千斤左右，做粪厕用去几担，每月亦要食一二担。现在已经缺乏粮食，正向森叔借到两百斤。吾儿你在部队希望节省俭用一些，将你的月薪寄一些回，可以解决家中生活的困难，还能帮助生产的必要。你写回的信言及身旁有一些钱，但无法寄，你可交到邮局代寄，但必须写明寄到广西寮县杨梅邮局转陈森记交你弟名收，便到，决不会失掉。本村军属马振皆现收到他儿子进三汇的款叁拾万，其他各个都有，这是他们很喜欢。解决了他们生产上的困难，希望我儿见信之后，身旁有钱，请设汇点回来，帮助我们生活和生产的困难。这是极盼望的。我也能得你帮助一些款，生活没有困难了，来年才有办法送楚闺妹中学读书。否则，靠做田和养牲口的，是没法供给她去读书。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系全住森叔的，现在村中物价稻谷每百斤八贰万元，盐每斤 × 千元，油每斤 × 千元，猪肉每斤 × 千元，其余物价很定，不有起落。现各村各县都在将查田定产工作搞好，准备明年大生产建设运动。盛世兄之生活比以前改善，今后共七口人，均各平安，请勿远念。我近来身体也很壮健，请你安心吧。上面我谈的事情，请你答复达知，并望将朝鲜的情形简报一、二。其余后谈。

母亲余氏言，弟辅世代笔。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七日

（第 4 卷，第 92~94 页）

14. 致依全

依全吾儿：

见字知悉，你的来信已经收到，军属证也收到，父等非常欢喜，知儿身很好。现家中生活甚是艰难，每日炒花生卖，你的小弟弟们太小，妹妹们也小，没有劳力，只靠我和你母操作，一家八口人，生活不够，外靠政府接济一点，只能够大半

饱的生活。儿说要相片，那有余钱照相呢，只得违儿心愿。好在见信如见人，望儿每月要来信，我也常去信，这样也如欢聚一堂一样，望儿在外努力工作学习，早日完成革命，家中也能过足饱的生活了，现你哥在“永康平阳部队十三大队侦通连”服务，望你也要常常通信，别容后先，希进步。

父母同谕　五一年一月一十六日

（第 4 卷，第 95~96 页）

15. 致余年福[①]

年福儿：

是去岁六月中接到你的信，迄今没有接到你的信。只在今年元月接一封拜帖，在二月一封立功喜报。但这都是你的机关寄出的，其余并没有你的字迹，所以不知你在这半载之中，然而又加上今半载余当中的一切好否。所以这点家里少许有点挂念。其家里也知道你在外，少许不勉挂念，不知觉在瞬间已接你的来信。× × 悉知家里人们欢迎无边，愿你在前线坚决英勇抗美援朝，消灭美帝，保卫祖国，保卫人民过好的日子。希望你努力学习技能，祝你的前途光明、幸福。自元月来拜年帖和立功喜报时，家即写信给你，到今知你未接到。有你兄贵福写给你信一封，照来喜报机关字号（零二部队七区队）寄发。自八月二十七日接到退件声明和信，时家又少许加点挂念，即有 × × × × ×，或是机关编散，或是调往他处，今接儿你信，果然 × × × ×。希望你不必挂念家里，请你放心。家里情形告诉：去岁家乡已实行了土地改革，长福户中农成分，也没有什么抽出分进，贵福户贫农成分，分进田二分五厘，你自家分进田六分，× 屋后线沙凸脚。卫汗家抽出文划家垅里 × 树坏上旁，汪海家田内有佃田，已经并来了。又铜罗沿地继四九、五〇、五一共三年中被水冲掉，× 自申请，免除面积三分只有二分。长福地分上。关于你媳妇的生活和田地生产问题，有你兄贵福代耕。你家田地（3.050）山 × 包（0.500），合计（3.550）。田地等级全丁等。每亩（2.40）合计产量全年（723.185）。家中大小身体健康，诸事顺利，请你不必挂念。再者，长福已订了婚事，锡坂垅杨家菊花之女

---

① 该信寄自浙江省淳安县水南乡。

儿，现年十八岁。春花已聚配人，小金山陈家，来年十二月起家。

祝思想进步。

父字，兄代写，古历八月二十九日

（第4卷，第97~99页）

16. 致国斌

国斌吾儿：

来信于十月十五号收阅，勿虑。双亲已年老，少力劳动，家庭生活问题比较困难，我地已在七月份土改完竣，我家庭已分了田二亩（今年收九挑），蒙政府的 × 救得到翻身，不过因我年迈，对生产有影响，所有的困难就是这样，我们的政府对我军属特别优待，有村内互助人耕组帮忙，可不挂念。希你在连队，革命立场中要站稳，多多立功，多打几个美国鬼子，为人民为自己除害才好。必须你寄一份证明书回来。村里才按军属土改。现在你还没有分得土地，由因没证明书。你弟弟在家经商，积极参加生产，增加抗美援朝之力量。同你弟弟都站在新时代岗位上学习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县长是（李明），镇长姓（姚），不知名，村长唐银华，他们对我们非常观照。

父治安，十月十六日

（第4卷，第100~101页）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书评书介

当代中国史研究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DANGDAIZHONGGUOSHIYANJIU

[illegible]

季羡林:《我这一生》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邱　路

当今中国，仍然活着的，称得上大师的人，没有几个了。不论学界对季羡林的成就评价如何，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以后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至今，熟练掌握多门外语，尤其在中印欧语言方面研究成果卓著，仅此就足以让普通人仰慕不已了。

但是，真正让很多普通人开始注意到季羡林的，倒并不是他的那些语言学研究的成就有多大，而是他10年前出版的那本用调侃的笔调讲述自己文革不幸遭遇的《牛棚杂忆》。凡读过此书者，无不为“文革”的残酷和文革中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丑陋，慨叹不已。因此，更多地了解季羡林的生平际遇，也就成了许多读者的一种心愿。《我这一生》应当可以大致满足这些读者的愿望了。

本书系根据季羡林不同时期的回忆连缀成书的，因此，《牛棚杂忆》的内容自然也在其中，但相信即便读过“文革”这一章的读者依旧不会对本书失望。因为季羡林一生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我们后人了解的情况。尤其是他早年生长、学习和初入社会的种种见闻，在他生动的笔触下，都十分引人入胜。即便有些读者不容易被季羡林的早年经历所触动，读一读他1949年以后的经历，也一定能够印象深刻的。毕竟，1949年以后，类似于“文革”这样的运动实在太多了，而季羡林也都一一经历并写了出来。其幽默调侃的写法，仍会让人心隐隐作痛，却又哭笑不得。

试举两段：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宁，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大家都知道，运动一来，首先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套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筋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作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

……

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父母，都被波及，他说了父母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号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季羡林到老也还是一介书生。他这里所说的教师们检查深刻与否，和能否过关，“全由群众决定”，其实只是他看到的一种表象而已。他显然太低估了组织的力量和作用。包括那位因“瞥见”几个“哭”字而揭露教授假检讨的“主席”的做法，怕也不是什么无心之举，而是依计而行。换言之，如果组织上已认定这位教授可以通过，这位“主席”即使再多“瞥见”几个“哭”字，也不会站出来揭露；如

果组织上认定这位教授当时还不可以通过,这位“主席”就是没有发现那几个“哭”字，也还是会引导群众不让这位教授通过的。当然，深入了解这些幕后的故事，也不是语言学家季羡林分内的工作。

本书各章标题如下：

一、朦胧的童年岁月
二、难忘的中学时光
三、勤奋的大学时代
四、短暂的教学实践
五、漫长的留学生涯
六、坎坷的北大经历
七、痛苦的“文革”记忆
八、收获的二十年间
九、幸运的老人生活
附录：季羡林年谱

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6–1968）》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

邱　路

把已经退休的哈佛教授傅高义40年前出版的这本书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且一版就印了5 000册，对广东人民出版社来说，很难说不是一种冒险。但是，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汗颜的是，虽然已经过了40年，却没有哪位中国学者利用如今已经多得多的史料，对中共统治后广州政治社会的种种变迁，像傅高义教授那样，做过全面系统的实证性研究。结果，不是奇迹的奇迹出现了：一本40年前写就的关于广州的外国历史书，如今在中国竟然又成了无可替代的新书。广东人民出版社实在毫无冒险可言。

傅高义这本书的主要各章目录如下：

绪论：旧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建立

一、共产党前的广州

二、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

三、中央控制：土改的遗产

四、经济控制：社会主义改造

五、缓和：右派插曲

六、乌托邦："大跃进"

七、重建：恢复工作及其后果

八、政治复兴主义：1966~1968年2月

九、对社会的政治征服

就一本城市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来说，这本书最出色的部分是在前四章。我们通过这几章小节的目录，就能有所了解。

如第一章（共产主义前的广州）分为如下几下小节：

南方边疆

地理环境

商业传统

广州人的多样性

市政当局：现代组织的构建

革命的摇篮

第二章（地方城市控制：接管与巩固）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后解放区”

当务之急：平稳过渡

共产党干部的整合

干部的录用和训练

镇反

驱逐外国人

调整教育、工业和商业机构

创造收入和财政稳定的条件

改造知识分子

秩序的恢复

第三章（中央控制：土改的遗产）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土改运动的开始

南方抵抗的原因

南北冲突的激化

从妥协到纠正

一竿子插到底

第四章（经济控制：社会主义改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广州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迅速改造的负担
思想准备：肃清暗藏的反革命运动
粮食准备："三定"运动
组织准备：乡政府
农业合作化运动
广州的工商业、手工业、个体摊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新秩序

和随后几章着重于描述历次运动和政策变动影响的情况不同，前四章更多关注了新旧政权在制度、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包括干部整合和市政管理等不同层面的区别与联系，并动态地说明了中共实现这种社会大变动的复杂经过。在毫无档案史料和其他内部参考性文献做参考的基础上，傅高义神奇地依靠当年的《南方日报》，基本准确地描述了共产党人进城后的种种举措与政策，并且注意到大批北方干部南下所造成的中共干部队伍内部的分歧与冲突，以及中共中央巧妙地运用政治手法撤换了广东主要负责干部，进而将广东中层干部基本北方化，最终在土改过程中成功地解决了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问题。

本书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节，是傅高义对1949年广州解放后新政权驱逐外国人的做法的描述。他指出，随着中国实行抗美援朝运动和中美关系恶化，新政权从1951年1月起，逐步采取了驱逐在广州的外国人的作法。他显然认为，"中国当局的基本倾向是动员群众去批评外国人"，和通过个别案例，甚至不惜"编造"外国人残酷的虚假消息，以达到切断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联系的政治目的。他特别提到了当年圣婴儿童之家中5名加拿大修女被谴责杀害了2 116名中国婴儿的所谓暴行。

由于当年完全没有档案文献可供参考，这本书自然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包括许多重要的，特别是有争议的史实，例如像圣婴儿童之家的案例，傅高义也没有条件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和考证。这些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本书的史料价值。但在没有更进一步的建筑在档案史料基础上的新的研究成果出来之前，人们要了解1949年以后广州城市政治社会变迁史，还是非读这本书不可。

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年

邱　路

历史研究，注重的是第一手文献史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真相只存在于白纸黑字写成的文献史料当中。人们研究古代史，不得不依靠文字史料，是因为历史上留上来可供还原史实的材料实在太少太少。但研究现代历史则不同了。除了文献史料之外，还有许多"活材料"，就是历史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宝贵记忆。许多不见于文献史料当中的重要史实，都可以从他们的回忆或口述中，获得惊人的发现，从而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

张胜的这本书，名为"两代军人的对话"，实为"张爱萍人生记录"。而这个"记录"，又主要是建立在张胜和他父亲张爱萍日常相处的过程中长期积累下来的谈话资料的基础上，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张爱萍自己的口述史。当然，从儿子的角度来编织父亲的形象，即使有父亲的许多谈话资料为依据，也还是难免有"歌颂"的嫌疑。而因为张爱萍从没有认真地留下较系统全面的口述材料，张胜对父亲谈话的记述也很不完整，必须要靠自己进一步调查研究来补缀缺失的内容，因此，这本书又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张爱萍自己的回忆。但即便如此，张胜的这本书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在历史文献中，包括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中看不到的历史惊奇。

众所周知，张爱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期间是新四军皖东北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建国后一度担任过海军司令，被授予上将军衔，且曾经官至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而他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是曾长年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成功地领导并主持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与开发。但是，在这张看上去一帆风顺、功成名就的履历表背后，张胜这本书却让我们了解了一个个性张扬，浑身是刺，人生旅途也曾磕磕绊绊的张爱萍！

张爱萍的个性，和中共党内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给他一生带来诸多麻烦的根源所在。关于这一点，在书中有很多反映。

如1942年因为不满华中局领导人过分保守实力，不敢拔掉日军插在根据地中的据点，被指责为冒险、“左倾”，张一直憋着气。当日军扫荡行动开始，日军插入根据地据点成为整个根据地巨大威胁，华中局被迫部署转移时，张爱萍当场顶了牛，称：“我不干！”虽经陈毅打圆场，他最后还是气哼哼地撂下一句话：“打完了仗，那几顶帖子最好都给我收回去。”

如1944年整风期间，华中局开扩大会议，张云逸主持，揭发陈毅闹独立性，与会者大多跟风而上，张愤然发言：“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

如1966年军委传达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事件，张爱萍听传达的过程中不满地对身边的两位很熟悉的干部说：“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他（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军队的事情老向他汇报？还不是看见人家势力大了，自己去挤！去靠！去年国庆节还请人家吃狗肉呢，现在讲起来倒这样轻松。我看，党内投机分子就是多，各种各样的投机分子！”结果，身为总后、科委的这两位高级干部，马上写了揭发信，并拉上后排也听到张牢骚的一位总参作战部的干部，一并把张告了。

可以看出，正如书中所写，张爱萍在许多地方、许多时间，都表达过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这种强烈不满情结。说：“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了这种风气！”

张爱萍的这种性格，也影响到他主持的国防科研工作。张胜说，父亲所以会成为铁杆儿的独立自主派，也正是其性格和军人经历使然。书里讲的下述这个小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1990年代初，中美实现了高层间的军事交流。但美国人显然依旧限制中国利用这种交流从美国获得先进武器。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来华访问时，张口闭口美国不能卖武器给中国。负责与布朗谈判的张爱萍一听就火了，马上反唇相讥，说“是谁要向你买武器了？你在这里给我说说看。”刚刚还趾高气扬的布朗顿时哑巴了。张紧接着讽刺说：你们美国是卖过武器给中国，不过那是卖给蒋介石，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但这倒是帮助了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从蒋介石手里缴获了美国的武器，打败了蒋介石的。

本书对于希望了解1949年以后政治军事历史的读者来说，有几部分内容十分值得去读。一是其受命初创海军的情况；二是中国第一次实施的海陆军联合作战，即解放一江山岛的决策和指挥过程；三是张受命主持国防科工委，研制两弹一星的情况；四是从张爱萍的角度看到的军队文革的情况。虽然这不是一本历史研究著作，但它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却足以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

本书各章目录如下：

一、皖东北
二、八千里云和月
三、第一代海军军人
四、最后的战争
五、最高统帅部
六、大漠黄沙
七、桃花源
八、大彻大悟
九、艰难的航天之路
十、强国之梦
十一、最后一个“士”

谢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年

邱　路

在中国，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新旧中国转换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的专家，有两位特别有名。一位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一位是刚从个体研究者转入体制内的厦门大学文学教授谢泳。严格说来，谢泳既非科班出身，又非历史学者，但他和许纪霖都以写论文擅长，只不过，许的研究更西化，更理论，更高深，而谢的研究却更东方，更平实，更多史料，更像讲故事。

继1998年推出《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2005年推出《储安平与<观察>》两部谈论1949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文集之后，去年他又再度推出了他的这部新的文集。

本书各篇目录如下：

一、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二、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三、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

四、1957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

五、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

六、胡适思想批判与《胡适思想批判参考资料》

七、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像这样能够显示其在搜集史料和分析史料方面优长之处的内容，在书中比比皆是。但谢泳的研究并不纯粹是靠史料取胜，恰恰相反，读他的文章，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他强烈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很多情况下都会使研究者把握不住自己的客观立场，以至于在对史料的选择和辨别上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谢泳有时是很注意不同史料所反映出的不同历史情况的。比如，他就注意到，即使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身在大学和身在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们的经历常常会有天壤之别。而有时候，谢泳也会因自身的倾向性而被史料误导。比如，谢泳大段大段地征引顾颉刚的“日记”，却没有发现，顾的“日记”因为多半是事后补记，甚或在多少年之后还有修改，因而可信度大成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谢泳的这本文集，都是值得一读的。

智效民：《刘少奇与晋绥土改》

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年

邱　路

读过2007年杨奎松《开卷有疑》一书中谈1946~1948年中共土改政策变动一文的读者，对智效民这本书的题目一定不会陌生。杨文细致地探讨了1947年中共土改政策急剧“左”倾的来龙去脉，其中具体研究了刘少奇在这一政策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原因。相对于杨文来说，智效民的这本书在中共中央土改政策急剧变动，和刘少奇个人作用的问题上，似乎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有些历史原因的解读甚至可能还略嫌牵强。但是，对于许多想要具体了解1947年中共土改政策急剧“左”转在根据地所造成的巨大影响的读者，这却是一本非读不可的重要历史书。

1947年土改在中共许多根据地的农村里，都造成巨大的冲击。杨文中提到了包括东北、山东、华中，特别是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深受影响的情况。但是，在所有这些受影响的地区里，最值得一提，也是最具典型性的，还是晋绥边区的土改与整党斗争。迄今为止，时常为后人所提及的这一时期的众多极端案例，许多都发生在晋绥。像以政治态度来划地主富农成份，一个村的农民20%~30%被划成地富；像逼着共产党干部牛荫冠牵着分明是开明地主、、统战对象的父亲的鼻子游街；像贫农团把红军时期的老党员、村支书刘玉明打得死去活来，然后扔进黄河淹死等诸多令人发指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个晋绥区。

晋绥区为什么会做得如此极端？过去还从来没有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依据晋绥区的史料，做过深入全面的考察。智效民的这本书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通过大

量史料比较全面地还原了当时晋绥土改和整党的历史情况。

当然，由于作者的胃口较大，架式拉得很开，前面从中共建党初期的农民运动讲起，连带讨论刘少奇政治上的崛升过程，后面又归结到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对中共土改政策的看法问题，故关心晋绥土改问题的读者大不可必从头到尾地来读这本书。本书值得一书的相关各章目录如下：

四、土改前的晋西北地方
五、刘少奇与“五四指示”
六、1946年的晋绥土改
七、康生到临县“蹲点”
八、刘少奇否定晋绥土改
十、天灾，还是人祸？
十一、推广晋冀鲁豫经验
十二、全国土地会议召开
十三、《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
十四、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十五、腥风血雨“斗牛大会”
十六、张老汉的回忆
十七、如何分配土改“果实”
十八、在干部中制造恐怖
十九、关于晋绥土改的历史记录
二十、毛泽东批评晋绥土改的真相
二十一、土改被迫转向
二十二、毛泽东路过晋绥
二十三、晋绥土改以后